



李瑞环等谈中华炎黄文化



板门店的“隐形巨人”



青年毛泽东的心路历程



一代名士林语堂



李雪健的军旅生涯



“局外人”李雪健



“天津事变”始末

创刊号

7·1
创刊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



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应运而生

始于炎黄绵延数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影响深远，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份极其丰厚、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思往事以知来者”，旨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统一大业做贡献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应运而生，于1991年5月10日在北京宣告成立。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是由热心研究和弘扬炎黄文化的专家、学者、社会活动家、企业家等人士组成的全国性民间文化团体。名誉会长薄一波、李政道（美籍），会长周谷城，执行会长肖克，副会长中有程思远、庄炎林、黑伯理（回族）、李宝光（女）、冯征、杜寿正、戴逸、魏巍、黄青等。研究会聘请李约瑟（英籍）、韩素音（英籍）、潘毓刚（美籍）为特邀顾问，还聘请了年高德劭、深孚众望的王平、卢嘉锡、朱学范、伍修权、陈慕华（女）、赵朴初、侯德如、倪志福、黄华、楚图南、曹洁琼（女）、王淦昌、匡亚明、张友渔、张岱年、李贻林、爱新觉罗·溥杰（满族）、谢冰心（女）等知名人士共88人为顾问。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筹建和开展工作，历时已近四年。这个团体的前身炎黄二帝巨型塑像筹建委员会，早在1987年开始酝酿，1988年12月在北京召开了部分副会长、常务理事座谈会。当时总的形势是：国内经济政治形势比较好，中外交流扩大，海外华侨、华人寻根问祖，愿为祖国昌盛做贡献的心情越来越高，台湾同胞希望国家统一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但是同时，国内一些地方在一个短时期内，出现了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民族虚无主义的逆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革命前辈和老干部、史学界、文化界、科学界及其他各界爱国人士，对筹建炎黄二帝巨型塑像表示了极大热情，认为此举可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海内外中国人、华人的凝聚力，因此一时间自愿作为发起

人在倡议书上签名的达数千人。很多人自愿为这一义举作奉献，常香玉等表演艺术家为筹资义演，有的书画家捐赠书画艺术品，海内外人士也慷慨捐款。

1990年，随着形势的发展，开拓了会务工作的新领域，遂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民政部申请成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8月获得批准后，草拟了新章程，充实了机构，设炎黄文化学术委员会，专事炎黄文化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召开了以《炎黄文化与民族精神》为主题的第一次学术座谈会，编篡大型《中华文化通志》的系统工程，也在酝酿中。设组织联络委员会，以加强与所有热心炎黄文化的人士和团体的联系，促进各民族之间、乃至海内外炎黄子孙之间的文化交流。1991年春，又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成立了炎黄春秋杂志社，《炎黄春秋》创刊号，将于7月问世。设在河南郑州的炎黄二帝巨型塑像筹建委员会，在河南省和郑州市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步伐加快，造型设计经十余次论证，已基本定稿。修建在黄河之滨的以山为体、头高20米、全高100米的炎帝和黄帝的塑像，将于今年第三季度举行奠基礼。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我国第二步战略目标的现实需要，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将为此全力以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作为一个民间的文化团体，愿意与所有单位和团体，包括台湾、香港、澳门以及远在海外的炎黄子孙，为祖国的统一与建设，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团结合作，共同奋斗。我们相信，中国人民在二十一世纪，必将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与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相称的伟大贡献！



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应运而生 1

· 本刊特稿 4

顾问: 伍修权 楚图南 费孝通
屈武 谢冰心 杨静仁
冯文彬 王朝闻 赵朴初
胡絮青

特邀编委:
王俊义 冯其庸 张 镔
张国琦 李学勤 刘颖南
苏双碧 常 征 温济泽
戴 逸 韩劲草 魏久明
魏 巍

社长(法人代表): 杜导正
副社长: 方 实 丁洪章 宋文茂

总编辑: 洪 炉
总经理: 徐 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3-1170

美术编辑: 小 雁



李瑞环等谈中华炎黄文化 李瑞环等谈中华炎黄文化

· 七一专稿

青年毛泽东的心路历程/ 李 锐 8

· 殒星篇

丰碑永立万人心/ 温济泽 14

永不忘却的纪念

——龙华 24 烈士牺牲 60 周年祭/ 麦 阳 16

血染的记忆/ 林 莺 44

· 英杰谱

周恩来的另一个世界

/ 水 静 28

罗瑞卿 入党轶话

/ 点 点 38

板门店的“隐形巨人”

——朝鲜停战谈判中的李克农将军/ 简 妮 48

· 访谈录

访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

李默庵先生

/ 孙本尧 73



炎黄春秋

创刊号 1991/7/1

· 同根结

一代名士:我的父亲林语堂

/林太乙 56



蒋纬国的仕途与婚恋

/汪兆骞 64

三毛生前故事二则/文哲 81

· 古今谈

从“羊”字说到汉文化/韩少华 86

台湾“湖口兵变”之谜/沈默 47

· 时代风

“局外人”李雪健/何东 82

· 春秋笔

“天京事变”始末/苏双碧 25

隐忍

未必不抵抗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张学良将军

/周平生 76

张学良二、三事

/赵云声 80

张学良渴望访问大陆

/文选 87



· 神州光

画家黄胄和炎黄艺术馆/邢俊勤 88

千秋壮举 四海瞩望

——炎黄二帝巨型塑像雄姿(图见封底) 90

· 九州景

神州山水 处处如画

——湘西张家界速写/王耀中 90

民居古建 华夏奇观

——闽南土圆楼孙振宇(图见封三) 89

· 古辙台

炎黄二帝历史考略 92

· 文香园

中共“一大”珍闻 87

炎黄文化在海外 95

贺诗/魏传统 43

亲爱的朋友:

正当中国共产党七十华诞之日,炎黄春秋和您见面了!她将保持并发展原中华英烈、炎黄子孙的风格特色,增强刊物的思想性,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团结中外炎黄子孙,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实现祖国现代化和统一大业为己任,着力记颂我国历代英杰,回顾民族发展历程,反映人民生活斗争,描绘神州人文风貌,展示炎黄文化成果,交流中外文史信息,内容更为丰富多采,形式务求生动活泼,愿望成为您的又一知心朋友,为此我们热切希望得到您亲爱的读者特别是作者的关心支持,愿我们共同办好这份杂志,使她更好地为亿万炎黄子孙竭诚服务

本刊编辑部

羊年仲夏

社址:北京海淀区北洼路5号

邮政编码:100037

李瑞环等谈中

李瑞环：

首先对许多老同志、老前辈和专家、学者参与这项有益于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动表示敬意。

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影响深远，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份极其丰厚、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在当今世界上，凡是炎黄子孙，不管什么地方，只要他良知未泯，都不能不为辉煌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感到骄傲。更好地使人类这一文化宝藏发扬光大，为建设四化、振兴中华服务，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它有利于振奋民族精神，凝聚各族人民的力量和智慧；有利于加深海内外炎黄子孙的相互理解，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我们要尽最大的力量，扎扎实实地、一件一件地把这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做好。

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绝不意味着排斥外来文化，也不意味着“食古不化”。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吸收外来文化的气魄应该更大一点。不管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凡属人类创造的积极的文明成果，我们都要善于分析、鉴别、选择和吸收，以达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目的。

在1991年5月10日于北京召开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薄一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周谷城，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肖克发表了讲话，现摘要发表如下：

薄一波：

今天，以研究和弘扬中华民族炎黄文化为宗旨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正式成立了。在此，我谨致以衷心的祝贺！

炎黄二帝是传说时代的英雄人物，远古两大部落集团的领袖，其活动区域主要是黄河中游，即中原地区，与今日的中国疆域相比，自然是有限的。有人说，今天的中国人中不但有炎黄子孙，还有蚩尤子孙，九黎后代，等等，这些说法也是不错的，但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世代的口耳相传，炎黄已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提到炎黄，除专家学者外，人们一般不再细究其族属、地域，想到的只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故土。我想，正因为如此，以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为宗旨的这一学会才命名为“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不管什么人，要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做一些有益于人民、有益于民族、有益于历史进步的重大事情，就必须深入了解和研究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早在几十年前，毛泽东同志就号召我们在学习马列主义、了解中国现状的同时，要学习、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文化。他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利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光辉典范。

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是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的现实需要，也是建设有

华炎黄文化

近年来,有些人由于羡慕西方发达国家的物质生活,以致于盲目崇拜西方的一切,用西方的价值观来品评一切,言必称希腊罗马。有些年轻人已不大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国有句古语“思往事以知来者”。不了解自身的过去,就不能正确地认识现实,也难以探索未来。我们反对民族虚无主义,主张自尊、自信、自强,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自尊、自信、自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是辉煌灿烂的,这一点在座的各位专家、学者都会有深刻的见解。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人,可以从吸取历史文化的营养中得到丰富,走向成熟,成就事业。当然,经验有正反两方面的,文化遗产也有精华与糟粕,只有通过科学的、深入的研究,才能去粗取精,古为今用。唐太宗就很善于总结借鉴历史经验,他了解“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的道理,所以他能开创唐朝“贞观之治”的局面。杜牧写过著名的《阿房宫赋》,最后一句是:“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其意思就是说,不了解历史的人们必将重蹈历史的覆辙。

我们要积极地学习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但是我们只能站在自己历史的基点上前进。有些人认为中国的出路是彻底抛弃传统,以西方社会为模式,这是不现实的。即使你对西方文明羡慕得要命,即便我们的文化传统中确有不少糟粕,我们也不能抹煞自己的历史,去借用别人的历史。马克思说过这样一段话:“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不是在他们的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

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况且,一个连本民族传统都无力更新的民族,又怎么能正确地借鉴、吸收其他国家的长处呢?中国要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就需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传统的变革与更新,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建国之初,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纵

周谷城:

今天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正式成立了。我以会长的身份,向今天所有到会的同志和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谢意。很抱歉,我因为有事在上海,不能亲临大会。

关于成立研究会的目的和宗旨,我们的执行会长肖克同志在报告中



观一个半世纪以来,我国爱国的仁人志士,学习西方的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但都失败了,这样才使我们选择了走社会主义之路。这是来之不易的,我们决不能有丝毫的动摇,一定要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好。

我希望,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能够联合海内外一切热爱中华、维护祖国统一的炎黄子孙和团体,共同研究和发掘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使之弘扬光大,继往开来,不断开拓创新,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做出独特的贡献。



将有很好的阐述。在此我只想简要的说明：

我们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我们通常讲自己是炎黄子孙，就是说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儿女。炎黄二帝是我们民族的象征。研究和弘扬炎黄文化，就是要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中华民族文化，历史悠久，上下五千年，涉及面广，关系到文史哲、数理化学、天地生和工农兵学商的方方面面。因而，研究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优良传统，是我们全国各民族人民共同的事，是全国十一亿人的事，也可以说是包括远在海外所有炎黄子孙共同的事。我们研究会只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更多的工作要依靠大家共同来做。我们作为一个社会团体，愿意与所有的有关单位和团体，包括台湾、香港、澳门以及远在海

人类历史所作的巨大贡献而为全世界所瞩目。

中国是世界上经济、文化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我们祖先创造的物质文化包括农业、手工业、水利事业、医药、冶金、陶瓷、织造等许许多多发明创造，曾经遥遥领先于世界。在思想文化领域，我们的祖先在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军事学、哲学、历史学、文学、戏曲学、教育学及伦理道德等方面，创造了曾经领先于世界的思想和理论。在中国大地上从北到南，从西到东，从大陆到海岛，从内地到边疆，到处都可见到传统文化的奇葩。

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从远古起，中原地区各族互相交往，文字语言逐渐融合，学术思想也相互渗透，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连风俗习惯都发生了变化。秦汉时期的大融合，形成了统一

方的文化来丰富自己的同时，又以自己的丰富内容和磅礴气势影响其他民族的文化。东亚、东南亚诸国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之大，早为世人所知。欧洲近代许多启蒙思想家、科学家都曾从中国古代儒学、理学和其他学说中吸取过养料。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曾引起列宁的注意和称赞。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受到国外许多专家学者的密切注意和广泛研究。

中华文化有许多优良传统和积极的思想因素。“自强不息”的人生哲学；“发愤忘食”的持生规范；“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立身情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品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天下为公”的“大同”的思想等等，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是中华文化的精华，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诚然，同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有两重性一样，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有其封建性的糟粕。“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礼制；“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特权思想；“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因循守旧的形而上学的思想等等，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曾经起过阻碍作用。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成分占主导地位。中华民族创造的光辉灿烂的炎黄文化，经五千年而延续不衰，主要原因就在这里。

千百年来，炎黄子孙都为自己的伟大民族而自豪。中华民族以勤劳、智慧、勇敢、开拓、进取著称于世，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从未因战争和大的自然灾害的破坏而一蹶不振。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反对战乱，成为几千年来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从而决定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方向。尽管历史上各民族之间或民族内部，产生过种种矛盾、冲突，以至战争，也曾造成国家的分裂和地区间政权的对立，比如魏晋南北朝、五代十



外的同胞们，为了祖国的统一和现代化建设，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团结合作，努力奋斗！

最后，让我预祝大会成功。祝我们的研究会万古长青，不断进步！并祝大家身体健康！

肖克：

中国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创造了优秀的民族文化。中华传统文化以其源远流长、精深博大、丰富多彩、区域广阔以及对

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制度。从南北朝到唐朝，各民族之间取长补短，共同进步，科学、艺术、文学繁荣昌盛，成为当时世界上文化中心之一。到宋元明清，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达到了高潮，形成为既有统一的认识，又富有民族特色的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中国文化的融合，开始众派分流，然后汇成巨川，最终奔向大海，形成以炎黄文化为主体的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文化。

中华文化在不断吸收东方和西

国、宋、辽、金、西夏并峙等等时期，但统一的时间长于分裂的时间，而且越到后来，统一的时期越长，统一的局面越巩固。

中华民族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在历史上，各民族采取多种方式，加强相互间经济文化交流。许多有识之士，强调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今天，海外的炎黄子孙，怀着强烈的思乡观念，以各种方式支援中国的“四化”建设，许多人落叶归根，从心理上说，正是这种民族认同感的反映。

中华民族牢固的稳定性和巨大凝聚力，扎根于传统文化。从历代典籍中发现，中华民族自我意识和民族认同感的发展演化轨迹，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强烈。夏、商、周三代族别不同，发祥地各异，但都尊奉黄帝为共同祖先。直到魏晋以降，北方少数民族南下纷纷建立政权，许多族还尊奉黄帝、夏禹为祖先。尽管民族学和历史学已经证明华夏民族并非单一祖先，而后人却一直把炎黄二帝作为中华民族始兴和统一的象征。这种发端于上古，绵延数千年的观念，成为不同时间、来源于不同地域的人们所共同具有的民族意识，炎黄文化成为一种反映共同民族感情的联系纽带，体现和包融了华夏多民族形成一个统一体的自我意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稳定性，正是这种文化传统结出的硕果。

国共两党有过对国共双方和整个中华民族都有利的合作的历史。台湾同胞在历史上具有维护祖国统一，反抗外族强权侵略凌辱的光荣传统。今天，弘扬炎黄文化的优秀传统，相互加强交流、加深理解，从文化、从历史的启示中，我们将共同得到的是民族自我意识和认同感，共同向往于祖国的统一大业。

一定的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同时，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不可能离开它赖以存在的社会

为《炎黄春秋》杂志创刊题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一九九一年五月 萧克



经济基础，即使是反映新的政治和新的经济的新文化，也有其历史连续性和继承性。

今天的中国仍然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段，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一定要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已经融化在中国人民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里，成为民族心理的一部分，制约和影响人们的现实生活。因此，要想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不但是不足取的，也是不可能的。一个割断历史、遗忘过去、抛弃祖先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电视片《河殇》一出台，就受到人们的批评，原因就在这里。对待历史文化的正确的态度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予以批判地总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温故而创新。只有对民族文化批判地继承，才能创造具有民族特点和历史特点的新文化，才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大的中外文化交流，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和社会进步。隋唐时期佛教的传入，推动了中国哲学的进步。明清之际传教士东来，促进了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十九世纪中期以后，西方侵略军的炮火震动了神州古国，促使孙中山等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寻找救国救民的思想武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

主义。陈独秀、李大钊发动和领导的“五四运动”，掀起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涌现出以鲁迅为代表的一大批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在中国革命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中国这一土壤里生根发芽，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可以说，这是中华文化吸收外来文化最成功的范例。

中华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珍贵遗产，也是全人类的宝贵文化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说，弘扬民族文化，是居住在中国境内的每个中国公民的责任，是全球炎黄子孙的责任，甚至也会引起关心中华民族的国际友人的热切关注。如何弘扬民族文化，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同时，更好地吸取世界文化的精华来充实与发展自己，作为我们这一代炎黄子孙不得不认真考虑。现在，我们成立了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就是要勇于担负这个任务。我们广泛联系并团结海内外炎黄子孙，开展利于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有益活动，深入研究并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我相信，中国人民在二十一世纪，仍将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与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相称的伟大贡献。

七十个春秋了。同样的太阳从东方升起，从西方落下，世界早已换了面貌，曾经波涛汹涌，那最初的涟漪是嘉兴南湖的游船荡出的；曾经挥手转乾坤，那巨人的脚印最早是踏在农家前窄窄田埂上的。不必讳言“孔夫子”的书，不必讳言梁启超、谭嗣同、严复，也不必讳言唯心主义乃至心物二元论。给中国人民引路的旗帜上，最终画的是镰刀和斧头。这旗帜引我们到今天。七十年后的今天，让我们来看看青年毛泽东走过的荆棘路，探寻拯救中国改造中国的道路吧！

青年毛泽东

毛泽东同志当初是怎样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让我们先看看他本人的有关说法。

关于学生时代读书情况，毛泽东晚年的一次谈话作过这样的概括：“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

关于自幼成长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据刘斐回忆，毛泽东晚年曾对他说：“我是从农村生长出来的孩子，小时候读过私塾，读过孔孟的书，也信过神，母亲生病也去求过神佛保佑哩！旧社会的东西对我都产生过影响。有段时间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主义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走西方富国强兵的路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列主义传入中国，我才接受马克思主义。我们青年时代一批朋友去法国勤工俭学，我没有去，打定主意走自己的路。”当谈到唯心主义把个人神化的错误时，他特别强调说：“哪里有什么生而知之的圣人呀！我也从逐步认识社会，走上革命道路的，最主要的是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

关于学校生活结束时的思想状况，1936年他同斯诺谈话时，这样说道：“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我

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最早的社会经验也是在这里取得的。”

那么，是怎样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呢？同斯诺谈话中他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任何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毛泽东究竟怎样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上述摘引大体回答了具体时间、主观条件、客观原因，及其关键所在。现在就这些方面，作些综合性的扼要说明。

走出农家屋场，关注天下兴亡

毛泽东是一个在湖南闭塞山村长大的农家子弟（不是书香子弟），自幼参加田间劳动，目睹和经历了贫穷、饥寒、失学、欺侮和种种的不公正。经过同父亲的斗争，直到16岁，



·李锐·

《毛泽东在北京逗留期间，尽力搜集有关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

年青新

LA JEUNESSE



社会主义史

階級爭鬥

的心路历程

才得以读完六年私塾。读孔夫子的书没有兴趣，但天分高，会读书，能背诵如流。他最喜欢读的是中国历史小说，许多故事都熟记在心。描写造反英雄的《水浒传》，使他神往；对长沙“抢米事件”中无辜者的镇压，使他悲愤；只要力所能及，他总是像他母亲一样，援助受苦的穷人。为力争继续求学，反抗了父亲的安排，他才得以走出家门，先到邻县湘乡一所新式高小，读了半年“洋学”。这时接受了梁启超变法维新的影响，尤其是“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的《新民说》的影响。从而感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辛亥革命前夕，他自作主张来到长沙继续求学，这是晚清以来新旧斗争特别剧烈的地方。当武昌起义，湖南响应时，他立即剪辮从军，过了半年士兵生活。在军营中养成了每天看报的习惯，直到上井冈山从未中断。

退出兵营后，由于文章写得好，以第一名考取省立中学，但不愿受束缚的性格，难于习惯呆板的课堂生活，半年后即退出学校，在省立图书馆自修了半年。他贪婪地阅读西方各种新书，爱读严复译的名著，尤其是《天演论》。于是进一步接受了“尊今叛古，尊民叛君”的进化论思想。毛自己回忆：“这是我学习历史最有价值的半年”。可是父亲不支持儿子这种自由行为。二十岁，毛泽东终于又以第一名考取了不收学膳费的省立第一师范。

贯通中西文化，却从不坐而论道

从1913年到1918年，他在这个学校读了五年半。这时正是世界大战和中国军阀混战的年代，湖南三次为北洋军阀统治，成为南北拉锯的战场，课堂也是不平静的。当年，这是一所办得好的“新式”学校，有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这样一批思想进步、道德高尚的好老师，学生多出身贫寒，读书用功。一批不满现状力求上进的同学，与学贯中西的杨昌济来往密切，师生之间，切磋问难，交换心得，如鱼得水。

毛泽东是一个特殊的学生，仍以自修社会科学为主。在这个学校的前期，毛泽东很重视“国学”即中国古典经籍的研究，这主要是指他说的“孔夫子的书”，包括孔孟儒家和宋明理学的学说，也有墨学、道家和佛家的学说。这是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的主体。毛泽东对这些古籍的熟悉，翻开《毛泽东选集》便知，有关成语典故触目皆是，总不下几百条。由于时代（国家存亡之秋）和地域（湖南“湘学”传统）的关系，在国学方面，毛泽东深受从王船山、颜习斋、曾国藩、谭嗣同直到老师杨昌济的影响，其最根本处在于重视理想和道德力量，讲究“立志”“修身”的理学精神，同时又重视经验、重视实际、重视行动、重视“知行

合一”、“即知即行”的经世致用的实践精神。

《新青年》出版之后，毛泽东和他的朋友成为这个刊物热心的读者，他进一步接受了“德赛二先生”（民主与科学）的熏陶。于是“胡适和陈独秀代替了康有为和梁启超，一时成为我的楷模”。他还向该刊投稿，参加了《新青年》的战斗行列。从儒家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融会贯通中，他在这个学校的后期，特别喜欢哲学，手抄杨昌济翻译尚未出版的《西洋哲学史》七大本，尤其以批判精神读了德国康德派哲学家泡尔生十万字的《伦理学原理》，批注达一万二千余字。这些书引导他的世界观由儒家的唯心主义转向心物二元论；而且在“物质不灭”这类批语中，已含有唯物主义的因素；



陈独秀



△国民党“一大”后，毛泽东担任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执行委员、组织秘书等职。

至于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则更为明显。由于早已从中外古今学说的参照中得到启迪，加之自己坚持体育锻炼等实践经验的体会，关于辩证法的理解、掌握和运用，在批语和文章中（发表于《新青年》的长文《体育之研究》），就表现得更为自觉了。

在第一师范五年半以自学为主的学习生活中，毛泽东勤奋读书，独立思考，从不作书本的奴隶，而是真正眼到、心到、手到；他读过的书多是打满各种记号，密布批语；所写的读书笔记共积有一大网篮。

除开读书外，他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他天天仔细读报，特别关注时事，常向同学们解释时局的发展，头头是道，被誉为“时事通”。反对袁世凯称帝时，他做了卓有成效的宣传活动。他的忧国忧民之心，被朋友们称为“身无半文，心忧天下。”他主持学友会，锻炼同学们的自学能力，活跃各种课外活动。他创办工人夜校，精心为失学工人服务。在南北军阀混战、一次长沙城短暂真空时，他领导同学护校，竟缴了一支溃军的枪械，同学们以双关语谑称他为“毛奇”。

他喜欢漫游，要读无字书，“从天

下国家万事万物学之”；为多了解社会实情，一个暑假，以“打秋风”送字方式，不费一文钱，与好友萧子升周游洞庭湖五个县。此外，他还带动同窗和朋友，实行冷浴、冬泳和露宿等抵抗自然外力的活动，有意识作“野蛮其体魄”的锻炼。这些方面，说明毛泽东在求学时期，就不是一个坐而论道的书生，而是一个知行结合、凡事身体力行的实践家。

毛泽东在学校时，没有机会接触纯粹讲唯物主义的书本，他只能从教科书和课外读物所涉及的古今中外各种唯心主义和二元论哲学中，以及从《新青年》倡导的民主、科学和个性解放的思潮中，加以分析、批判和选择，以树立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当时他认为哲学是一切事物的“大本大源”，既是“宇宙真理”，又是“思想道德”。“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他强调一个人要确立信仰和志向，首先要研究哲学和伦理学。他认为人生目的在“实现自我”，极力主张“身心并完”，“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从而十分强调个人主观意志的能动作用，即“个人精神主义”，追求“独立所有”的道德完美境界。基于夸大个人主观意志的作用，谭嗣同和杨昌济都弘扬“心之力”的作用，毛泽东以“心之力”为题，写了一篇作文，唯心主义的老师对此文奖掖备至，打了一百分。这种从学生时代形成的“改造世界”、“舍我其谁”观念，似乎贯穿他一生。

毛泽东当年这种探究大本大源的另一思想特征，来自他年青时所掌握的辩证法，即认为运动、抗争为宇宙人生的普遍规律。他从体育之研究，人皆乐“动”，而得出“天地盖唯有动而已”这一理论观点，认为“动”是天地身心的本性。他对一切差异、对立、冲突，不仅持肯定态度，而且持喜爱态度；自然界水力、风力因遇地势之抵阻，而益增其奔猛怒号；战国、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他的结论是：“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

生所喜也。”不断运动，顽强奋斗，克服外界抵抗，实现自我，成了他身心存在不可缺少的一大需要。他在早年的日记中写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看来也并非单纯从身体锻炼得来的偶感，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种思想。

有感于国家的危亡和追求个人的进步，毛泽东和同窗好友蔡和森、萧子升、萧子暲兄弟、陈昌、张昆弟、罗学瓚等十五六人，都深受杨昌济老师影响，再加上校外好友罗章龙，他们都具有“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都有一种共同的感想，就是“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如何达到这种目的？他们感到急待讨论的是“个人生活向上”的问题。从1915年到1917年冬，他们“有遇必讨论，有讨论必及这类问题。讨论的情形至款密，讨论大概在百次以上。”最后的结论，就是“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于是新民学会于1918年毛泽东毕业前夕的四月正式成立。学会的宗旨为“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1920年学会宗旨改为“改造中国，改造世界”。会员最多时达七八十人。学会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起了打基础的作用，其中三十多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

1918年初夏，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从上述情况可以作这样的总结：有两个方面为他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和从事艰巨的革命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一是他自己的学识才具、革命气质和思想方向，已经树立的世界观、人生观、尤其是知行结合的实践精神。二是，他不是单枪匹马孤军奋斗，而是结合了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一个进步的团体，共同追求真理，共同从事战斗。

初识马克思主义，“东风”就不断压倒“西风”

毕业之后，恰遇赴法勤工俭学的机会，毛泽东和一群学会会员第一次

来到北京,这是他久已向往的地方。十多个会员前后两批到法国去了,他决心留在国内,潜心研究中西学说,探求救国救民之道,并为学会打好基础。在北京停留的半年使他眼界大开,进一步了解到俄国和欧洲革命的情况,以及国内政治和思想界的新形势。他结识了陈独秀和李大钊,接触了许多思想激进的人物,吸收了许多新的思想,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粗线条知识;参加了许多有意义的活动,交结了许多思想先进的青年朋友,脑中装满了许多社会实际问题。其间最为震动的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人们看到新的曙光,感到中国会有新的出路。毛泽东自己回忆这半年的生活说:“政治的兴趣继续增加,思想越来越激进。”后来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这可以看作是对他本人思想历程的叙述。

毛泽东带着许多新的思想和新的活动经验,于1919年4月回到长沙。五四运动爆发了,他立即投入这场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斗争。他通过学会会员积极领导了湖南学生和各界的爱国运动。这一革命实践,标志毛泽东伟大革命生涯的开始,也是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所在。他主编的四期《湘江评论》,充满了反帝反封建的叛逆精神。他自己共写了大小四十来篇文章,尤其是《民众的大联合》长文,在全国发生了影响。这个刊物被封闭之后,他继续利用其他报刊,发表了许多批判旧社会,鼓吹新思想的文章。

综观毛泽东在五四运动那几个月内写的文章,唯物主义思想大大前进了一步,集中表现在崇尚科学与民主,反对迷信盲从,反对以孔子为中心的守旧思想。他认为办事情,研究问题,都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要“研究事实和真理”;要敢于

“狂妄”,要敢于打破各种强权和独断,不能“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这些文章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有了某种初步的认识。在他撰写的《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提出吃饭问题是人类生活最根本的问题:“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后来在《学生之工作》一文中,还明确指出:“社会制度之大端为经济制度”。这可以说明,毛泽东已开始注意到经济生活和经济制度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所赖以维持自己的特殊利益,剥削多数贫民的公开利益者”,无非就是“知识”、“金钱”和“武力”这样一些法宝。他们同广大劳动人民之间,是“贫富”、“智愚”、“强弱”根本不同的阶级。“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实业愈发达,要哭的人愈多”。许多文章很注意用经济原因去分析西方国家的政治情况,认为罢工与社会革命都是经济原因引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在殖民地国家,“连空气阳光都专利起来”。这也说明,他已认识到经济关系对人们的政治地位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已初步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说明社会与国家间的对立。显然,这里有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他在总结巴黎和会文章的结尾,还预言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没有战争,就是阶级战争”。他满腔热情地讴歌当时各国人民汹涌澎湃的革命斗争;尤其欢呼“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

由于毛泽东开始走向唯物主义并以此观察社会历史,也就必然重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及其历史作用,他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不过是一些留学生、哥老会和新军在活动,“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这是一个伟大的觉醒。这样,《该伦理学原理》时冥思苦想的唯心主义,“圣贤豪杰”同“愚人”、“小人”,教化与拯救的关系,就让位于“民众的大联合”这

一改造国家社会的根本力量了。当年世所公认的《民众的大联合》这篇重要文章,标志毛泽东已开始用不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且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吹起了最初的一声号角。

毛泽东这时还分不清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间的原则区别,因而他幻想“呼声革命”,“温和的手段”的革命,也赞成“多研究些问题”,但这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已在《湘江评论》上露出端倪,显示出了必然的趋势:即对封建主义的痛恨,对资本主义的排斥,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在1919年7月14日出版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的宣言及《炸弹暴举》等文章中,可以看出在“呼声革命”与“阶级战争”之间,作者本人思想的这种矛盾,这种趋势。虽然杜威的“实验主义”,克鲁泡特金的“社会互助论”,托尔斯泰的“泛劳动论”,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民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这个“大杂烩”还相当色彩缤纷萦于脑际,但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不断对毛泽东起着“东风压倒西风”的作用。

▽在北京,毛泽东过着极为清苦的生活。图为毛泽东当时的住地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



取“阶级斗争”四个字，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

湖南“五四”运动的直接继续是驱逐北洋军阀张敬尧出湖南运动。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积极策动和领导了这个运动，他们手无寸铁，却不畏强暴，敢于“秀才造反”。1919年12月，毛泽东率领湖南人民代表团等，义正辞严地赴北京请愿：“张毒不去，湘无宁日”，震动了北京政府，造成全国声势。使这个盘踞湖南三年臭名远扬的皖系军阀，终于在南北军阀对峙形势变化中，从湖南败走。

经过群众的火热的革命斗争实践后，时间只隔了一年多，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同第一次相比，不仅身份不同——刚出校的学生和全省人民代表，思想状况也起了唯心论向唯物论的变化——开始了世界观的“根本的转变”。他利用第二次到北京的机会，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向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请教，尽可能找这方面的书籍阅读，从而思索为改造中国当前“最急切”、“最重大”的问题。他决心走俄国人的路，接受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国家与革命》）。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自己谈到，促成他下决心确定方向的，是受了三本书的影响。1941年在延安的一次讲话中，他又谈到这一情况：

“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是1920年4月离开北京到上海去的。陈望道所译《共产党宣言》是1920年8月出版的，他如果是在北京时读到的，可能是罗章龙等人以“亢慕义斋”名义翻译的油印本，那时他同罗章龙等北大左翼学生交往很密。他读的究竟是哪一个译本，不必深究，他自述从这书受到深刻影响，却是毫无疑问的。《宣言》开宗明义所说的，“到目前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成了毛泽东毕生服膺的格言。

《阶级斗争》是恽代英所译，原本是考茨基的《〈爱尔福特纲领〉解说》。列宁对这书评价甚高，他在《给农村贫农》这部著作中阐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苏联共产党的前身）纲领的时候，推荐了考茨基的这部著作作为参考书。恽代英将中译本书名改为《阶级斗争》，毛泽东就从这本书中加深了他对于阶级斗争的知识和信仰。

英国柯卡普著、辟司增订的《社会主义史》，李季译。蔡元培在译本序言中说：

“克氏、辟氏都是英国人，自然是稳健派，所以对以前的社会主义，很有消极的批评，又如辩护家庭；辩护宗教；辩护中央与地方政府；甚至辩护英国的殖民政策。读的人一定有嫌他们不彻底的。”看来蔡序所说是符合事实的。例如书中说：“从现在过渡到社会主义时代，……一定是渐进，必先做一番预备功夫，使大多数人民的知识、道德、习惯和组织，都合于一种更高的社会经济生活。”这正是费边社会主义的观点，蔡序所说的稳健派，其实就是费边派。费边社会主义思想，大约就如同英国工党的政府和政策，与马克思恩格斯论述的社会主义思想根本不同。恩格斯说：“费边派是一伙野心家，不过他们有相当清醒的头脑，懂得社会主义变革必不可少，但是他们又不肯把这个艰苦的事业交给粗鲁的无产阶级去做，所以他们惯于自己出来领导无产阶级。害怕革命，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原则。”这些同马克思论证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有

着极大差别的。看来，毛泽东只是从这本书中接触到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材料，引起他进一步研究的兴趣。

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或“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具体时间，他自己说的是“1920年夏天”或“1920年”。现在许多党史研究者，对这个具体时间有几种不同意见，上限有1920年夏天，下限是1921年初。我认为这都关系不大，笼统地说一个“1920年”也是合理的。

毛泽东到上海同陈独秀讨论了湖南形势和建团、建党问题之后，1920年7月回到长沙。随即参加领导了“湖南自治运动”，这是一次藉谭延闿打的“湖南自治”的招牌，开展以全体人民为主的民主运动，想让湖南从此脱离北洋政府的控制，“造成一个较好的环境”，以便今后进行各种革命活动。他为此在上海和湖南的报纸上，一连发表了十多篇文章，并在长沙领导了一系列活动。运动虽无结果，但也暴露了统治阶级的面目（“在老虎口里讨不出碎肉”），锻炼了自己的队伍，还交结了广泛的朋友，新民学会增加了许多新的会员，也清除了几个消极不良分子。那时马克思的原著介绍到中国来的还很少，而一些号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出版物，并没有能够作出正确的介绍，其中错误还很多。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还只能是很初步的、不系统的。因此，那些文章中也还有些模糊的甚至相当混乱的观点，这是不足为奇的。五四运动的先驱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等，当年都难以完全避免这种情况。

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完成这种转变的根本标志，反映在新民学会的两次会议上。1920年6月，在法国的学会会员蔡和森、萧子升、李维汉、向警予、张昆弟、罗学瓚等14人，在巴黎近郊开了五天会，主要讨论学会宗旨“改造中国与世界”如何进行。以蔡和森为首的多数人，主张立即组织共产党，走俄国的道路，通过彻底的革命以改造中国社会，特别注重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主义精神。另外萧子

升为首的少数人则持反对意见,主张以教育为手段的温和的革命,倾向于蒲鲁东式和平的无政府论,以改良资本主义。会后蔡和森将讨论情况和自己的坚决主张,写了一封长信给毛泽东。由于信收到很迟,1920年12月1日,毛才写了一封长的复信。他坚决支持蔡的全部意见,关于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和俄国的道路,尤其表示“深切的赞同”,而根本不同意改良主义的方法。信中藉当时英国哲学家罗素在长沙的演说,其观点正同萧子升的相似,以透彻说明必须用俄式暴力手段夺取政权,才能获得一切包括教育的权利;用教育手段改造社会,不过帮资本家的忙而已。

1921年元旦,毛泽东约集在长沙的会员何叔衡、彭璜、陈章甫、易礼容、熊瑾玎等18人,接连开了三天会,重点讨论三个问题:一、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二、达到目的用什么方法?三、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毛泽东介绍了巴黎开会的情况,还谈到国内外流行的各种所谓的社会主义派别。大家热烈发言,各抒己见。讨论结果一如巴黎,大多数人赞成,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用俄式革命、阶级专政的急进方法;有组织共产党的必要,先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便利公开活动,进行研究、宣传、组织等工作,除已办文化书社、通俗报外,还要兴办夜校、编译社、讲演团等社会事业。在1920年同学会会员的通信中,毛泽东不断说到大家要作主义的结合,说马克思主义为“一面旗帜”。1921年1月下旬,毛在致蔡和森的信中谈到建党的情况时,明确说道:“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综上所述,从1920年到1921年1月之间,根据本人自述和第一手资料(本文引号中语均见已出版书刊),关于毛泽东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标志,可以概括为这样几点:

一)反对种种改良主义,确认马克思主义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一面旗帜”。

杨开慧与长子毛岸英(右)次子毛岸青合影。

年青新

LA JEUNESSE



第五卷 第四期
青年书社



△1920年5月从北京到上海

二)确认以劳农为基础的人民群众,是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决定力量。

三)确认以俄式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为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必由之路。

四)必须组织共产党,以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神经中枢”。

近百年来中国国难频仍,许多志士仁人为国家民族复兴作了不懈努力。青年毛泽东为强烈的时代责任感所驱遣,殚精竭虑去探寻拯救中国改造中国的道路。正好这时候,俄国轰击冬宫的炮声响了。中国人才知道马克思和列宁,知道了俄国式的革命。

正苦于没有找到适当道路而向中外学说继续探索的毛泽东,看见了希望,在自己已经达到的思想水平上,很自然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方向。他学习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书斋中的学术研究,坐而论道;而是学以致用,为用而学,特别是在实践中向社会向群众学习,“在战争中学会战争”。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学得最勤,特别重视的是列宁和俄国的革命经验,即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终其一生,他都是重视马克思主义这一部分内容,并有所发展,扩大了这一范畴的应用。

丰碑永立万人心

——《革命烈士传》编辑记事

用革命的事迹来教育我们的子孙万代。像我们前一辈那样。像我们的先烈那样，永远与一个革命党，永远与一个为人民大众的集体无私奉献的社会主义党，永远与一个社会主义者。

邓小平

温济泽



在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70周年的时候，我们庄严地献上一部珍贵的书——10卷本《革命烈士传》。

这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系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烈士传。这是上千位值得我们永恒纪念的先烈的血写成的书。

一

编写这部书，是老一辈革命家李维汉，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向中央提议的。后来中央党史研究室把这个任务委托给我。

当时李老已82岁高龄，正在病中。我到医院去看望他，他语重心长地谈了他的一个心愿：“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牺牲了许许多多同志。我希望你们能编写出一部比较完整的、系统的烈士传，反映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过的艰苦革命历程，让子孙后代了解过去，记住过去，永远不要忘了过去。”

他提出，写烈士传，不仅要写党的重要领导人，也要写中层的、基层的干部，他们也是党的各级领导人啊！还要写普通党员。不仅要写共产党人，也要写两次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为革命、为抗日牺牲了的人士，还要写其他党派和无党派的人士以及普通革命群众。他不只一次说过：“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牺牲奋斗得来的啊！”

在1984年8月他病已垂危的时候，我最后一次去看望他。他睡在病床上，鼻孔里插着氧气管，呼吸和说话都很困难，在听到我说《革命烈士传》第1卷即将发稿时，他微笑着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这——件事——就——托付——给你们了！”

令人深感遗憾的是，李老生前未能看到《革命烈士传》出版，第1卷问世，是在李老去世快1年的时候，我们在编写过程中遇到资料上、工作条件上的种种困难，直到1988年上半年才全部编成。在出版上的困难，更是开始时未曾料到的，直到今年上半年才全部出齐。从开始筹划到全部完成，历时12个春秋。李老离开我们将近7年了。

二

筹划编写这部烈士传，从1979年5月开始。当时，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正在进行。不少烈士在“文革”中遭受诬陷，尚未得到昭雪。宣传工作遇到很大困难。从何着手呢？

听说1928年党开“六大”时在莫斯科出版过一本烈士传，我

未找到。许多同志在延安时读过一本《烈士传》，那是1936年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编辑出版的，其中有25位烈士的传记。这本书给我留下很深刻的记忆。新中国成立之后，五六十年代出版过一些烈士传，大部分我都读过。我觉得这些烈士传，按“比较完整的、系统的”“反映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过的艰苦革命历程”来要求，都还不足。

我想到了1945年党开“七大”前在延安编纂出版的烈士英名录，倒是“比较完整的、系统的”。我为此到中央组织部访问了陈野萍同志。他要档案室的同志找出了这部英名录。他告诉我，1947年从延安撤退时只带出来这一部，这是现在全党保存下来的唯一的一部了。其实这是两部：一部是中组部编印的《死难烈士英名录》，一部是中组部和总政治部合编的《军队烈士英名录》。前一部有4册，后一部有3册。这7本名册中，每位烈士只有姓名、年龄、籍贯、性别、职务、何时何地牺牲，每人只占1行。除去相互重复的，两部英名录共9000多人。我在延安参加过前一部烈士英名录部分的调查的编纂工作，但看到这7本名册还是第1次。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默默地读着每位烈士的名字，仿佛看到了20多年间烈士们在祖国大地上洒遍的殷殷血迹。

我们访问了民政部和其他部门，得知到1979年底为止，全国登记的烈士总人数是157万多人，其中在建国前牺牲的有140多万人。怎样“比较完整的、系统的”反映出如此巨大的牺牲呢？究竟为多少烈士立传呢？

我们同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反复研究，最后确定：我们为具有全国影响的烈士和那些事迹突出有向全国宣传价值的烈士立传，建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其所属地、县分别为其本地区有影响的烈士立传；立传范围既要精选，又要广泛，要包括各个革命战争时期和各个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立传烈士以国家授予烈士称号的为主，某些在革命战争年代对革命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因劳瘁而丧身的同志也应列入立传范围；主要为个人立传，对在同一重大战役事件或案件中牺牲的诸烈士也可以写成集体的传记；立传的人数暂定在1000人左右，各地区的立传人数自行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这个计划，得到了胡乔木同志的批准。并于1981年5月14日，由中央党史研究室通知了中央有关部门和各地。

三

确定立传烈士的名单,是工作开始后的第一件大事,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同中央的有关部门和有关同志,同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党史和民政部门多次研究磋商,拟定了初步的名单。又经过4次编辑会议认真讨论,几次调整,最后确定:建党初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立传的烈士92人,写成75篇,编为第1卷;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290人,写成251篇,编为第2、3、4卷;抗日战争时期300多人,写成245篇,编为第5、6、7卷;第三次国内革命时期158人,写成136篇,编为第8、9卷;以后又加上各个时期补遗的155人,写成100篇,编为第10卷。10卷总计807篇,1000多人。

在确定立传名单的时候,我们十分注意和重视包括有各方面代表性的人物。在这部烈士传里,有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有为党为国捐躯的人民军队的杰出将领,有党的很多中层、基层干部和普通党员,有很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及一般革命群众,有中国国民党的左派人士,有国民党军队的抗日将领,有爱国民民主人士,还有在中国的土地上为中国革命牺牲的国际友人。

历来编辑烈士传,像这样动员了中央和地方难以计数的人力,像这样经过周密调查,反复研究,拟出立传名单和编辑计划,这还是第一次。而在一部烈士传中,包容了各个革命时期的、具有如此广泛的各个方面的代表人物,这也是过去未曾有过的。

这么多的传记,怎样编排呢?开头有两种意见:一种是,看材料多少,先编写好的,字数够一卷,就先安排,这样可以出得快些;另一种意见是,确定了名单,一律按照烈士牺牲的年、月、日次序编排,这样可能开始出得慢一些,但是通过烈士的事迹,可以系统地看到各个革命时期中国革命走过的艰难曲折的历程。我们坚持采纳了后一种意见。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上,谁是最早的牺牲者?经过查证,最早的牺牲者是两位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黄爱和庞人铨。他们是湖南劳工会的领导人,因领导罢工,在1922年1月16日夜被捕,未经审讯,就于17日凌晨在长沙浏阳门外被斩杀。他们牺牲时都只有25岁。李大钊在《黄、庞流血记序》中写道:“中国社会运动的首页,已由黄庞两先生用他们的血为我们大书特书一个新纪元。”黄爱在五卅运动时期,在天津参加过周恩来组织的觉悟社。周恩来在柏林得到黄爱牺牲的消息后,写了一首悼念他的诗,诗中悲愤地写道:

“没有耕耘,哪来收获?没播革命的种子,却盼共产花开!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却不用血来染他,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

我们就把这首诗写在《黄爱、庞人铨》一文的开头。这首诗也就成了这10卷《革命烈士传》的开头。可以让读者看看,千百万先烈是怎样在祖国大地上播下革命的种子,是怎样用血来染红了我们的旗帜——党旗、国旗、军旗、团旗、队旗的。

按烈士牺牲的年、月、日次序来编排,有很大的好处。比方说在“二七”京汉铁路大罢工中,全路各站工人牺牲的有50人,我们编写了《林祥谦》、《施洋》、《高斌》3篇传记。“三·一八”惨案牺牲47人,我们编写了《刘和珍》、《韦杰三》、《彭廷雄》3篇传记。……每篇传记都写了事件的一个侧面,这样,连续着起来,就可以比较具体地了解事件的全貌。

统观全书,也就能较详细地了解各个革命历史时期一些重

大历史事件的面貌。从这个意义来说10卷《革命烈士传》,可以作为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卷)》的一个重要补充材料或辅助读物。我们说,这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系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烈士传,其意义就在这里。

四

这部烈士传里的先烈,是千百万死难者中的杰出的代表人物。他们都是中国革命的先驱,中华民族的精英,子孙万代的楷模。他们的事迹和精神,可歌可泣,是我们应当永远传颂和学习的。他们都具有崇高的理想和伟大的献身精神。他们在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月,挺身站到人民的前列,同侵略者战斗,同暴君战斗,同人吃人的制度战斗。他们要“从崩溃毁灭中救出中国”,“从水深火热中拯救人民”。他们看到“眼前大敌狰狞甚,誓为人民灭豺狼。”他们“不肯昏庸同草木,愿输血汗改山河。”他们愿将“鲜红花洒遍地洒,投笔从戎救中华。”他们“愿拆满腔青春血,洒遍劳工神圣花。”他们意识到自己所肩负的前驱的使命,把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看成是同自己“血肉相连的生命”。

他们都有高尚圣洁的道德情操。他们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宽广胸怀,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博大精神。他们认定“一个人不是为一己而生,是为社会、为人类而生,以大多数人之最大幸福为人生的最终目的,最大责任,而以尽此责任为乐。”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在敌人面前,坚硬如铁;和同志相处,手足情深。他们大公无私,舍己为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他们冒着枪林弹雨、鞭打屠戮,粉骨碎身,在所不惜。他们顾全大局,不计个人得失生死,严守纪律,坚决维护革命利益。他们“以艰苦奋斗为最大的乐趣”、“以卧薪尝胆为自己的天职”。他们所受的苦难是人类历史上空古未有的,他们所表现的品德和精神也是人类历史上不多见的。

他们有凛然正气和坚贞气节。他们有铮铮铁骨和耿耿丹心。听听他们在慷慨就义时的豪言壮语吧:“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满天风雪满天愁,革命何须怕断头”,“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志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引颈辞世诚快事,瞑目庆祝红旗飞”,“我们倒下去了,千百万人会站起来的!”他们中许多人是在高唱“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的壮烈歌声中流尽最后一滴血的。

陈觉烈士在1928年10月14日临刑前写给已被判处死刑的妻子赵云霄的诀别信中说:“我即日便要处死了,……你也迟早不免于死,……谁无父母,谁无儿女,谁无亲人!我们正是为了救助全中国人的父母和妻儿,所以牺牲了自己的一切。我们虽然是死了,但我们的遗志自有未死的同志来完成。”赵云霄因怀有身孕,被通知待生下孩子后再执行死刑。她在生下女婴刚一个月后,于1929年3月24日接到执行通知书,她立即伏在床板上写了一封给女儿的遗书:“启明我的小宝贝,……我不能育你长大,希望你长大后好好读书,且要知道你的父母是怎样死的。……当我死的时候,你还是在牢中,你是个不幸者,……小宝宝,望你好好长大成人,……不负你父母的期望。”

刘伯坚烈士在1935年3月21日临刑前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妻子:“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并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事业。”

(下转第63页)

六十年前，一批中共领导人、活动家和青年作家、诗人，在上海龙华一起死在敌人的屠刀下。鲁迅曾满怀悲愤为此写下了《为了忘却的纪念》。其实，这是永远不会忘却的。因为牺牲者身亡，不只有着敌人射中的弹孔，更在他们心上留下了深深的伤痕。但愿这些“弹孔”和“伤痕”会给后人以启示、教益或教训！

永不忘却的纪念

——龙华 24 烈士牺牲 60 周年祭

· 麦 阳 ·



从题外开篇

郁积很久的寒潮中响起了 1931 年新年的钟声，中国革命仍处在低潮时期。围绕着结束立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王明宗派主义小集团活动，又日甚一日。

1930 年底，王明被任命为当时在党内有重要地位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管辖江苏、浙江、安徽的党组织和当时中央所在地上海的党组织，其工作范围，包括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国民党统治的政治中心南京，还有无锡、南通等工业城市。这是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来华的米夫为王明设置的晋身台阶。在 1928 年 8 月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王明曾给米夫当过翻译。米夫毫不掩饰他对王明的青睐和器重，称其为中国革命天才的领导者，王明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个机遇。

1931 年 1 月 7 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

米夫不断使用组织手段控制会议的进行，把王明又扶上了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高位。尽管会议始终充满了激烈的争论，但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此时的党中央已是身不由己。王明以“执行国际路线”为旗号，指责李立三的错误路线是在“左”的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指责瞿秋白在纠正立三路线时犯了所谓“调和路线”的错误，因而提出了一系列比李立三冒险主义还要“左”的错误观点。自从中国共产党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下，艰难地跋涉在混着血与泪的征途上达四年之久。

王明的上台，引起了有力的抵制。在六届四中全会上被压制发言，并在会议结论中被米夫点名批判的何孟雄等人，在全会的第二天即 1931 年 1 月 8 日，就在党内发表了《告同志书》，反对六届四中全会。1 月 13 日，米夫在上海英租界沪西花园洋房内召集了不同意王明当选的数十人开会。米夫极力赞誉王明，称他为中国马列主义水平很高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是百分之百能够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人。并说，四中全会是共产国际领导的，是体现共产国际路线的，你们信任它，就是信任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指示是绝对正确的。反对四中全会就是反对共产国际，反共产国际代表就是反党，要开除党籍。

1931 年 1 月 17 日，何孟雄、蔡博真、王青士、罗石冰等人，在当时的上海天津路 275 号中山旅社 6 号房间召开反对王明接管江苏省委的会议。林育南、柔石和冯铿等，曾经参加过中华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几位左联作家，则在上海三马路东方旅社 31 号房间开会研究讨论如何反对王明错误领导问题。

有人告了密。从这一天傍晚开始，敌人先后在上述地点及其他党的机关逮捕我党干部 30 多人。

2 月 7 日，24 名志士在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里被秘密枪决。他们是：林育南（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会秘书长）、何孟雄（中共江苏省委候补委员、原中共沪中区委书记）、李求实、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均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作家）、欧阳立安（共青团江苏省委委员）、龙大道（上海市工会联合会秘书长）、彭砚耕（中华苏维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会秘书)、王青士(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恽雨棠(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李文(党的机要工作者,恽雨棠夫人)、蔡博真(中共上海沪中区委书记)、伍仲文(共青团闸北区委书记,蔡博真爱人)、罗石冰(中共青岛市负责人)、殷楠(上海市工会联合会秘书)、费达夫(上海市工会联合会沪东办事处主任)、汤士伦、汤士伦(均为红军第14军干部)、刘争(华德小学教师)、贺治平(中共上海沪东区委委员),以上是经过有关方面大量查证工作后查到的22名烈士的真实姓名和职务,还有两名烈士,人们至今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长夜风雨骤

1931年1月17日,一个寻常周末的晚上,街上行人稀少。几辆警车悄然而至,先后停在上海三马路东方旅社与天津路275号中山旅社门口。路人惊恐走避。化装成茶房的探子打开了房门,荷枪实弹的军警与英租界巡捕快速地冲了进去。分别将在东方旅社31号房间、中山旅社6号房间开会的林育南、柔石、冯铿、殷夫、胡也频、彭砚耕、蔡博真、欧阳立安、王青士、罗石冰、伍仲文、殷楠等人全部逮捕。

对照手上的黑名单,任务还没有全部完成。狡猾的敌人没有立即撤走,他们设置了陷阱,要一网打尽。

果然,没过多久,何孟雄就来到了中山旅社,他白天没有参加这里的会,此时匆匆赶到旅社了解会议情况。还未和战友见面,却落入敌人手中。两天后,他的后妻,五岁的儿子和三岁的女儿也身陷囹圄。

龙大道因有别的工作需要处理,未能准时出席中山旅社的会,匆忙赶来,在门口与碰见的一位同志刚交谈了几句,就遭到埋伏在旅社门口的包探逮捕。与此同时,家住华德路明园坊的费达夫也被敌人抓走。深夜,敌人对华德路小学进行突然搜捕,当场捕去三人,并把正巧返校的刘争也推上了警车。

李求实1月10日送妻子回杭州家中生孩子。父亲见他神经严重衰弱,面容瘦削,劝他多住几天;在南京教育部做事的表兄也表示可以推荐他到学校做教授。李求实均谢绝了。假期未到,便匆忙赶回上海。1月18日到愚园路庆云里15号林育南住处,听说林育南一夜未归,心急如焚,立即



左:柔石
(1902—1931)
右:冯铿
(1907—1931)
欧阳立安
(1914—1931)



左:王青士
(1907—1931)
右:李文
(1910—1931)



左:何孟雄
(1898—1931)
右:龙大道
(1901—1931)
殷夫
(1910—1931)



左:胡也频
(1903—1931)
右:林育南
(1891—1931)



乘车按林育南家属提供的地址去寻找。来到东方旅社，见四处平静如常，走廊上也闻无人声，徘徊片刻，他还是拧开了31号房门。感觉告诉他情况有变，但后退已来不及，守在那里的特务一拥而上，抓住了他。这一天，敌人搜捕的势头未减，在华德路同兴里和鸿兴坊逮走了汤士伦、汤士佳兄弟，在华德路小学逮走了贺治平。

任南京市委书记的恽雨棠，由南京到上海汇报工作，1月21日中午，一批密探闯进了他在新闻路福康里623号的住所，大肆搜检。恽雨棠妻子李文眼疾手快，迅速将一些同志的来信撕得粉碎，但是敌人还是搜出了家中藏着的一支手枪和一篮俄文的马列著作。恽雨棠夫妇双双被捕。持续五天的搜捕，共逮走党的各级干部三十多人，破坏了党的机关十余处。

他们先被关在老闸巡捕房，1月19日，即由国民党江苏省法院第二分院开庭审理。被捕者都编好了自己的化名和假口供以应付敌人。

何孟雄化名陈方，自称安徽人，是搞印刷业的，到中山旅社是找朋友。林育南化名李少堂，自称湖北人，广告商人。然而敌人对此只是冷笑。他们对这些共产党人的真实姓名和身份都掌握得很清楚。开庭审理，不过是走走过场罢了。于是草草收场，将他们引渡至国民党上海公安局。

上海公安局对这批重要人物不敢掉以轻心，立即对他们进行逐个地拍照、按指纹。审讯时，敌人手中拿着被审讯者的照片，照片背面赫然已写上了他们的化名、真实姓名和身份。被捕者自此明白，党内出了叛徒。他们必须做好牺牲的准备。

欧阳立安当时只有17岁，是被捕者中间年龄最小的，他被列为第十三号被告，敌人称之为“人小地位倒不低”。欧阳立安父亲欧阳梅生，是中共早期党员。立安自小习惯了充满风险的颠沛流离的生活，继承了父辈的勇气和机智，也促使了他政治思想的早熟。同时，他又充满了少年人的热情。他13岁就在欢迎北伐军的民众大会上登台讲演；15岁就由何孟雄介绍加入了共青团和共产党；16岁就作为中国青工代表到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最喜欢唱的是《国际歌》，他对审讯者说：“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国民党迟早要灭亡。我是共产党员，就是筋骨变成灰，也还是百分之百的共产主义者。我为人民而死死而无憾！”这令其他同志深为骄傲。

1月23日，被捕者全部被押至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钉上了20多斤重的脚镣手铐，作为重大政治犯关押。

月光如水照缙衣

龙华，在上海西南郊，是个风景区。相传那里有三国时期建造的龙华宝塔和龙华寺。每逢清明前后，景区桃花盛开，灿若云霞，游客如潮。但是，这块世外桃源依旧没有躲过人间的血腥。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将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设在了清同治年间李鸿章在龙华创建的兵工厂内。警备司令部内军法处、法庭、男女牢房和刑场样样俱备。龙华成为冤魂游荡的人间地狱。

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牢房里，有中共党的地下支部。此时，支部已得到指示，说林育南、何孟雄这一批人都是反对党中央的，都是右派，不能让他们编入党的支部。这比敌人的中伤和严刑更深深地刺痛了他们。面对死亡，他们久久无语。或许他们想象到王明此刻的态度。的确，王明在得知何孟雄等数十人被捕的消息时，表情十分冷淡，说，这是早就预料到的，是何孟雄等反党反中央、搞分裂活动的必然结果，是咎由自取。他们是在进行反党活动中被捕的，与一般同志在工作中被捕，性质有所不同。

转入龙华看守所后，敌人将他们集中关押，审讯也少了。这意味着他们活着的时间不会长了。

没有人比何孟雄的心情更复杂。他在1920年曾与邓中夏等发起成立了我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团体——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加入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历任中共北京地委和青年团北京地委第一书记，和李大钊等曾共同领导北方的工人运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被派来上海，在江苏省委工作。他是党内的第一个公开站出来反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有影响与号召力的负责人。他袒露自己的政治观点是那样的坚决，无私无畏，毫不掩饰，因而屡受打击；他不会见风使舵，因而政治生命之船屡屡搁浅。李立三说他是“帮助取消派来破坏党”，撤销了他上海沪中区委书记的职务，停止了他的工作，并多次在党内点名批判。党中央的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但何孟雄仍被视为“何孟

雄机会主义”、“取消派暗探”。1930年12月16日，中央通过了《何孟雄同志问题的决议》，终于承认何孟雄反对立三路线的观点一般是正确的，是符合共产国际精神的，对他的批评与攻击是很大的错误。但这个决议最终没有公布，他一再向党要工作做的请求也被置之不理。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后，何孟雄由于对这次会议持否定态度，旗帜鲜明地反对王明，从而又一次卷进了党内斗争漩涡的中心。王明掌权后在江苏省委扩大会议上称何孟雄是“老机会主义者”，“有个人野心”，进行“反组织的非法行动”，宣布要集中力量开展反对何孟雄等人的斗争，要把不与何孟雄划清界线的干部清洗出去。王明在另一次会上还说，和何孟雄在一起的蔡博真等几个老资格的区委书记，对上海的工作威胁最大，对他们必须进行重点批判，开除他们出党。何孟雄一无工作做，二无生活来源，政治上备受孤立，处境艰难。

在这样的政治境遇中身陷囹圄的何孟雄，受到了敌人放肆的嘲讽、挖苦和挑拨离间。审讯时他们故意问他：“你死后共产党会给你什么处分？”的确，要开除何孟雄党籍的说法狱中已有传闻。然而，这位久经血与火考验的共产党员，仍保持了他一身正气和不屈的气节。他是为自己的理想与信仰而斗争的，个人的冤屈和敌人的严刑同样无法使这个硬汉低头。他默默咀嚼着苦果，识大体，顾大局，主动热情与秘密支部联系，争取编入组织。在夜阑人静的时候，他和林育南、李求实三人共同商量，给党中央和共产国际写信，继续申述他们对六届四中全会和王明的看法，报告他们这次被捕的经过。牺牲前两天，意见书写好了，三人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细心地将给共产国际的信翻译成俄文，连同给中央的信交给难友，请他设法转出狱外。信中说：反国际代表不是反共产国际；国际代表处理问题不合中国国情；米夫无视中国已有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犯了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以亲信作为改造中国党的唯一干部来源，是危险的。这样内容的书信是无法也不可能传达至中央和共产国际的。

林育南34岁，在被捕者当中是最年轻的。他1921年入党，是个面容严肃、秉性刚强却心肠火热的汉子，同志中对他有“志士品德，烈士性格”、“硬肩膀，尚信用”之誉。他也是反对立三路线，反对六届四中全

会和王明上台的。对此，他说：“这比拿着枪在阵地上开火还要残酷，‘阶级的生活’决定了我如此。”林育南被捕后，和何孟雄一起成为狱中斗争的领导核心。敌人对他说：“你们反对李立三。我们也反对他，我们可以联合起来。”林育南义正辞严地回答：“这是我们的家务，与你们不相干。我们反对他，是因为他不懂得怎么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和你们这些走狗。你们反他什么？”铮铮数语，敌人无言以对。

李求实多才多艺，能诗会文，懂音乐，擅绘画。与林育南相识多年。当年他遭到父亲的庭训一气之下离家出走，是林育南把他从一个破祠堂中找出来的。他于1922年入党，并在武汉担任《日日新闻》总编辑。他和当时由林育南主持的《真报》彼此呼应，配合默契。李求实的报道生动翔实，林育南的评论精辟泼辣，两份报两支笔，成为当地工人运动的喉舌，一时名噪武汉三镇。1930年春天“左联”成立后，党派他参加“左联”的领导工作，他始终把革命视作他的专业；而当把作家视作他的副业。他和林育南不仅友情深长，政治观点立场也十分接近。他对王明的印象十分不好。王明平时讲起话来滔滔不绝，慷慨激昂，一遇紧急关头就手忙脚乱。他没有做过基层的工农工作，没有到过任何苏区，和干部群众没有广泛的联系。这样一个威信不高，缺乏经验，夸夸其谈的人怎么能够领导整个中国革命？但反王明是一回事，对敌人又是一回事。当敌人以爱惜人才为由，劝降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人，并单独提审李求实时，得到的回答是：“共产党员都是千锤百炼用纯钢打成的人。这样的人，你们永远杀不完。我们的良心和灵魂，永远属于我们的党。”

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这样一些资深的职业革命家对牢门内外的形势是看得很清楚的。他们深知现在面临是什么样的命运并为此做好了准备。他们不存幻想，坚毅而深思熟虑。他们不再打算出狱后做些什么，而在思考身后应该留下些什么。

与他们相比，左联几位年轻的作家，似乎更把狱中的生活视作命运的一次挑战。他们入党不久，凭着初生牛犊的气概和一腔理想与信仰，唱出“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囚歌。他们无限热爱生活，不肯放弃重新出狱的希望。

柔石曾经说过：“做人应该尝尝苦，才算作真正的人。读书人更应该从苦中磨练

出来，才能够懂得比书中深一层的道理。”这是他的人生体验，也是他的处世观。他从清苦动荡的生活中走过来，在鲁迅的帮助下，在1929年才正式发表自己的作品。自从师事鲁迅，他发誓要努力刻苦忠心于文艺。柔石狱中写信给朋友，说他一时恐难出狱，正在努力地学习德文。他的确是相信自己可以出狱，继续他刚刚旺盛的创作生活的。

胡也频给妻子的信则说，牢里的生活并不枯燥与痛苦；身边的同志都有很丰富的生活与斗争经历。天天听他们讲故事，有了很大的创作欲望，相信自己可以写出更好的作品。他向妻子索取更多的稿纸，说：“坐二、三年牢是不怕的，自己很年轻，不会让青春在牢中白白过去的……”胡也频聪颖机灵，他是放弃了要做技术专家的梦，才跨入神奇而美丽的文学殿堂的。

他们的心境安详而乐观。然而处境一天天坏下去。当躲避敌人追寻的鲁迅正在惦念柔石索要的洋铁碗收到没有，天气愈冷那里有没有被褥的时候，他们正青肿着脸，把困苦不堪、饥寒交迫而又生满了虱子的身子，蜷缩在散乱的杂草中。阴冷的水泥地寒气逼人，冷风从窗口吹进，令人无法成眠。夜深人静，只有双手双脚的铁镣撞击出金属的声响。最温暖的时候，便是有探视者从小洞递进两包饼干，大家分而食之，享受难友间一点一滴的真情。他们知道不知道，那血腥的一天就在眼前？

上海互济会设法往龙华看守所送进一些钱和日用品，难友们讨论如何使用。有人说添些过冬的衣服，有人主张存起来以后备用。胡也频建议拿钱请理发师理发，他对敌人和死表示了一个文学家的蔑视：“就义后给反动派拍起照来亦可威武一点。我就是做了鬼，对反动派也不会放松的！”

而年龄只有17岁的欧阳立安，对这笔钱的安排，显出几分豪侠之气：“我们是有今天没有明天的人，不如买点酒菜，吃个痛快，到时候唱国际歌，喊口号也有精神！”

墙外桃花墙内血

1931年2月7日深夜，天黑月暗。又是一个星期六。零星的爆竹声响过之后久久沉默。此时，离春节只有10天了。

龙华监狱的门打开了。林育南、何孟雄等24人被点出押往军法处，一一验明正身后，敌人声称要将他们解往南京。

走出牢门，看到自由的夜空星光闪烁。最后的时刻到了。

唯有这时，他们带镣走在荒芜的小径上，心中涌起的温情与思念，是献给已经死去或还要活着的亲人们的。

何孟雄已经告诉难友，在他死后把现在尚在狱中的两个孩子转交兄长抚养。他的后妻，一个孤单的女人是没有能力照料两个孩子的。这两个孩子是他亲爱的前妻缪伯英留给他的，孩子身上处处留存着他们母亲的影子。缪伯英曾是中共北方区委妇女部长，到上海后任沪东区委妇委书记。斗争环境盘根错节，艰险恶劣。食无定时，居无定所，天未亮出门，深夜始归。遇紧急情况，往往抛家舍业只身出走。长期清贫而不稳定的生活，损害了她的健康。1929年10月，她突然患病去世了。她把两个孩子交给丈夫，眼中含的满是依恋与期望，那时正值她风华正茂的30岁！两个孩子以后的生活是走向刑场的何孟雄的唯一嘱托。然而，无法告慰孟雄夫妇英灵的是：两个孩子在这之后被转入上海孤儿院，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犯上海时，失散于战乱中，从此下落不明！

而2月7日，对于林育南来说，更有特别的意义。1923年2月7日，爆发的是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和随后的血腥大屠杀。那天夜里，施洋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施洋是林育南极要好的朋友，那时他们一个担任湖北省工团联合会秘书长，一个担任法律顾问。那一夜，是林育南含着眼泪，带了个人力车工人，到刑场收殓朋友的尸骨的，随后便离开了武汉。每年的这一天，都会想起血迹斑斑的施洋。当林育南三年之后随北伐军重回武汉时，他写下了诗篇《不要忘记了我们的施洋》；当第四个“二七”纪念日来临时，他告诉人们不要忘记施洋、林祥谦，他们宁愿杀头的不屈服的精神，应该时刻在我们的头脑和血管里颤动。他曾说：“后死者不能忘却自己的责任，誓死消灭一切敌人，为死者报仇！”现在，仇未报，却身先死，死不瞑目！可以感到一点安慰的是，他林育南正是为了自己肩上的那份责任而赴死的，死在老朋友施洋死去的一样的“2月7日”，这个日子难道是好友冥冥中的召唤吗？他走向战友走过的血染的路，他因为自豪而微微地笑了！

24位就义者中，有两对夫妻。一对是蔡博真和任仲文，还有一对是恽雨棠和李文。恽雨棠身材高大，身着长衫，留着分头

长发，搀扶着正怀孕的妻子。他的心刺痛着，结婚两年来，第一个孩子出生时，正值他们生活无着，他们忍痛把孩子送进了育婴堂。现在，第二个孩子还未出生就被迫走向死亡！他出身贫寒，靠艰苦的努力自学成才。当接连被李立三、王明斥为“反党分子”、“托派分子”时，他仍坚信，只要努力工作不怕牺牲，就不难取得党的信任。他只怜惜他的妻子。李文年轻美丽，气质非凡，刚21岁！她自幼活泼机灵，能说会唱，热情开朗，被人昵称为“小八哥”，工作起来却是十分的投入。恽雨棠深爱李文。他1930年赴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时，就竭力劝阻李文不要随他同行。南京的白色恐怖是全国之冠，他宁愿抱一人牺牲的决心，不愿连累她。现在，他们同赴刑场，他心中充满了对妻子和未出世孩子的愧疚。身边的妻子是那样从容自若，他觉出她的美丽实在是比任何时候都光彩夺目。如果真有冥冥世界，他将给予她胜于现在千百倍的爱情！

铁镣的撞击声中，《国际歌》响起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响起来了。从容赴死的人们排成双行，向前走着，走过小桥，走过荒地，直至黑洞洞的房里显露出黑洞洞的枪口，响起暗哑的枪声。枪声中，战士们一个个倒下去，枪口的火舌，映出他们瞬间也是最后的年轻的面容和身影。

在这血与火的时刻，在这生与死的交界，让我们来听听他们曾经高吟过的诗歌吧：

“呵，战！刺心也不变！砍首也不变！只愿锦绣的山河，还我锦绣的面！”这是柔石的诗。

“我们手牵着手，肩并着肩，喷着怒气。世界大同的火已被我们煽起，煽起。我们的摇篮上，招展着十月革命的红旗。”这是殷夫的诗。

并不圆熟简炼，也不静穆幽远，但却是东方的微光，林中的响箭，冬末的萌芽，昭示着另一个世界，它是另有一番意义的。它意味着文学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参与，更意味着文学家用整个生活的参与。

这是殷夫。他自喻，他的生命是一个矛盾和交战的过程，是啼、笑、悲、乐、兴奋、幻灭，一连串正负的情感划成的曲线。当他从孤芳自赏的情趣和个人奋斗中走出来时，他就对为之献身的事业作出了不仅仅是诗的预言：“未来的世界是我们的，没有

刽子手断头台绞得死历史的演递。”他的大哥徐培根历任国民党航空署长和总司令部秘书处等要职，在过去的几年里曾多次保他出狱，也多次规劝他放弃革命，但他最终告别了兄长：“二十年来手足的爱和怜，二十年来的保护和抚养，请在这最后的一滴泪水里，收回吧，作为恶梦一场……别了，哥哥，别了，此后各走前途，再见的机会是在，当我们和你隶属的阶级交了战火。”他选择了满是危崖荆棘，黑的死和白的骨，又多砭人肌肤的冰雹风雪的路。在两个阶级交战的血火中，殷夫倒下了。

这是冯铿。她头脑聪慧，敏锐而多思，不喜修饰，爱辩论。做起工作来自信十足，半路碰到特别拦路检查，躲避不及，她干脆以攻为守，怀揣党的文件直冲到人前闯过去。她的感情世界却细腻而复杂。自从认识柔石之后，两人便成文章知己。柔石在故乡有一个遵从父母之命娶进的妻子。她不识字，文化素养的巨大差异，使敏感而富于才情的柔石倍感孤寂和隔膜。他对妻子既不满又悲怜，只身漂流在外不愿归去。两年前的除夕之夜，他便是在鲁迅家过的。菜的丰盛，气氛的融洽，令柔石感慨万端：“我虽偶尔想起自己离开父母妻子，独身在上海，好似寄食一般在人家里过年，但精神是愉快的。去年，因为妻要我送灶司，不是和我口角么？在三十夜流泪，叹息自己的命运，是不会忘记的。今夜呢，虽则孤零，倒是觉得人间清凉，尘世与我无碍。”现在，他有了冯铿。尽管冯铿宣称没有人能够十分充足地了解她，他们仍然陷入了不能自拔的感情中。冯铿倒下了，身中九弹，子弹穿透了她的蓝色羊毛背心，穿透了她女性的胸膛。她的羊毛背心是在乘电车的间隙之中为同居多年的恋人许娥编织的，许娥又把它穿在了她的身上。在那最后的一瞬间，眼镜落地了，她的眼睛灿若星辰。几个月前，她向柔石袒露过自己低回幽怨的情绪：“自看了你的《二月》以后，一种神秘的、温馨的情绪萦绕着我差不多每一件事物，每一个时间空间里。我的心里总是充满了这样不可救药的情绪，弄得自己简直莫名其妙，好像完全转换了另一个人”，在月夜的凄清中，产生了这样的念头：“我们沉醉在这样可爱的秋月下，这样令人迷惑的桂花香下吧！什么都应该抛弃，我们找一处隔绝尘寰的幽香来尽量沉醉吧！”然而，他们还是没有沉醉在花间月下，却为主义倒在了弹雨之中。柔石也倒下了，和爱人同生共死

已不再是纸上的灼灼誓言。只是无缘再见生养他的父母和给他生了三个儿女的妻子！谁说革命者只是钢铁铸成？爱情并不只是凡夫俗子的奢侈品，这些具有卓越品质的先驱者的生命之花理应开放得辉煌无比。

这是胡也频。少年时候在一家金银首饰铺当学徒，因老板怀疑他偷东西，他就怀着报仇的心理果真偷了金首饰只身逃往上海。走上文学之路后，伴随他的是孤灯清影的写稿卖稿生活。直到他打开自己的那扇门让那外面的世界涌入进来。他不再属于自己，他是一个进步作家，更成为一个有组织能力的政治活动家。妻子丁玲称他是“一块毫未经过雕琢的璞玉”，虽然有些简单，有些蒙昧，有些稚嫩，却“比起那些光滑的烧料玻璃珠子，不知高到什么地方去了”。1930年11月8日，丁玲住医院为他生下了一个男孩。那天他正好完成了他的长篇小说《光明在我们的前面》，正好得到了他被批准入党的消息。他兴奋地对妻子说：“光明不是在我们前面吗？”抱着新生的婴儿，激动地哭了，他觉得自己也获得了一次新生，他要为儿子的明天，一个“为劳苦大众谋福利”的自己的政府而去斗争，而献出自己的生命。胡也频倒下了。在昨天，在留给人间的一片文字中，他说起他们的小宝宝，风趣地称丁玲为“年轻的妈妈”，自称为“年轻的爸爸”。

沉闷的枪声持续着，冻冰的地上流着热的血，躺着尚未冷的身体。在屠杀与死亡的进行曲中，最后倒下的是任仲文。当中了第十枪时，她还在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她一身憧憬列宁式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生涯，认为在旧世界坐牢，流放，是一个革命者不平凡的大学历程，她倒在她的革命伴侣蔡博真身边，用生命最后地走完了这个历程。

枪声终于沉寂了。久久地，只有风从荒草上飒飒而过，令刽子手们惊惧之余冷颤不已。为了掩盖这一起罪恶的大屠杀，他们不管是死是活匆匆把烈士们横七竖八地埋在旁边早已挖好的一个大坑内。坑挖得很深，土盖得很厚，他们想趁这冷而黑的夜，把淞沪警备司令部刑场的荒地弄得不留一丝血腥。他们不相信黎明的到来会把罪恶暴露在阳光下。

尽管消息封锁得很紧，我地下党通过龙华看守所内的关系，还是很快把大屠杀的消息传了出来。

王明的态度还是那样的冷漠。说这是何孟雄等人“个人野心”“反党分裂党”的必然结果。声称，对那些支持何孟雄的人，要用这个血的教训来警告他们，争取他们，分化瓦解他们。种种罪名，烈士们死后仍然背着。

寒冬过去之后，清明又来。游人早已绝迹的龙华，仍然开出了一片灿若云霞的桃花，带着鲜血的颜色，向着太阳。

谁解其中谜结？

何孟雄、林育南等30多人分别被捕，24人被害于龙华刑场。告密者究竟是谁？

近些年来，党史工作者对龙华24烈士的研究，特别是有关具体问题的探讨在深度广度上都有所拓展。对是谁告密这个问题，有两种说法。

一说是王明告的密。这个说法最早由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也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和王明的王克全传出。何孟雄等人被捕之后，他便在党内传播这个说法。但当时的政治局认为这是对王明的诬陷，后来虽曾为此组织过审判委员会进行审理，但还是不了了之。当时还有人更具体地说，王明是通过他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做事的一个安徽籍同乡告的密。曾任中共中央委员的张金保也回忆说，解放大连后，在接收伪公安局时，发现有一日本出版的书上说，何孟雄等人被捕是王明告密。

另一说是唐禹告的密。唐禹，当时是《红旗日报》交通。1927年何孟雄从武汉到上海，在九江轮船码头收留了只有17岁的唐禹，并给他找了事做。后来唐禹又在上海沪东区委工作，被捕叛变后当过中统特务，1934年前后病死。对于唐禹告密，1950年8月27日欧阳立安的母亲陶承，摘录当时与24烈士同时被捕的黄理文等三个给中央组织部写的材料中说到：“烈士被捕于1931年1月17日、18日，当时正准备于2月7日在苏区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上海的东方饭店及中心旅社设有临时联络处及招待处。因交通唐禹告密而破坏。”王明在《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中则称：“上海东方旅馆的破获，林育南等24位同志的牺牲为罗章龙派的王拙夫——唐禹告密”。有党史工作者访问了当时与24烈士一起被捕或知情的人，何孟雄的后妻和两个孩子也被关押，其妻说她亲眼看到是唐禹带敌人去抓人的，使被捕同志也由怀疑王明告密而认定

唐禹告密；敌人在审讯时，是拿着已写上被捕者化名、真名与身份的照片逐个审问的，有人认出那是唐禹的笔迹；烈士之一汤士伦被提审后回牢房曾说，敌人非常注意他的断指，特别让他伸出验证。他的手指是参加江苏如皋1928年“五一”武装暴动被打断的，此事他在1930年被捕与唐禹同时关在提篮桥监狱时向唐禹介绍过；烈士恽雨棠夫妇是在1月21日敌人搜捕的最后一天被捕的。几天前恽雨棠自南京到上海后，与唐禹有过联系，有同志告诫他唐禹靠不住，最好搬家，恽雨棠认为他与唐禹的关系很好，未加防范，结果果然被捕。

两种说法中唐禹告密的分析似乎更充分些，到底孰是孰非，抑或还有其他的答案？这都有待于更多档案材料的发掘和更具体深入的探讨来解开这个谜结。

但不论谜底如何，有一点似乎可以这么说：这次集体被捕事件，不可能与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及反对王明无关。敌人持续五天的搜捕，其地点和对象都是很明确的。被捕人员几乎全是持激烈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及王明政治态度的。而中山旅社6号房间，原是江苏省委的联络点，六届四中全会后，就成为江苏省委区委部分领导人秘密集会商讨对付王明办法的一个地方。东方旅社31号房间，原是全国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会的联络点。六届四中全会后，这里便成为林育南等人反对四中全会和王明的聚会地。华德路小学，则是何孟雄等人影响很大的地方。1月17日，江苏省委其他各组织也在秘密集会，贯彻六届四中全会精神，这些在上午召开的有拥护四中全会的人出席的会议，均未遭受敌人破坏。王明本人在这事件中的态度，也起码说明他无法推脱的干系。史学界有这样的叙述：就在敌人要对何孟雄等人下毒手前夕，我党中央特科有关人员曾从敌人内部得到了敌人要行动的情报，向王明汇报。王明知道何孟雄、林育南等开会是在商讨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反对他上台的，他早已视何孟雄他们为反对中央分裂党的右派，正酝酿将他们开除出党。他对特科的报告毫无表示，组织上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是谁告的密？这个谜结也许最终无法解开？

永不会忘却的纪念

血雨腥风之中，上海报章对已经传出

的林育南何孟雄等24烈士被秘密杀害的消息不敢登载。在3月12日党的《群众日报》第三号最先刊载了周恩来写的《反对国民党残酷的白色恐怖》社论之后，反应最强烈的是“左联”，4月25日，“左联”对国内外发表《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书》，其机关刊物《前哨》秘密编辑出版了《纪念战死者专号》。

这是一片沉默中的几声呐喊，却穿不透层层乌云。

鲁迅拿起了笔，在莫大的悲愤中，纪念与他有着密切联系与友情的左联青年作家，还有许多他不曾相识的人。这首“确无写处”的《七律》吟在一个万籁俱寂的深夜，吟在一个堆着破烂杂物，陌生的客栈院子中，那时他知道他已失去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已失掉很好的青年了：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1933年2月7日，鲁迅专门写了《为了忘却的纪念》，“只因为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

曾记起，时常在家中搭伙吃饭的柔石，有着台州式的硬气，有着一“迂”。他总相信人是好的，当涉及人会是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的话题时，他就前额亮晶晶，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罢？”当他终于敢和女性一同走路的时候，却还总保持着三四尺距离，令人疑心这距离前后的年青漂亮的女性是否都可能是他的朋友。出门的时候，他总要搀着鲁迅，怕鲁迅被车撞死，结果倒是鲁迅为他近视却总爱照顾别人的样子而担心，而仓皇失措地愁一路。“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这就是柔石啊！还有那个有点罗曼蒂克，急于事功，对柔石小说创作风格改变影响很大的冯铿——一个体质弱，也并不美丽，同样眼睛近视的女孩子！

也曾记起，面貌端正，颜色黑黑的自称为“民众诗人”的殷夫，侃侃而谈他崇敬的诗人裴多菲。那首爱情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是他译出的吧？忘不了殷夫第三次被捕出狱时的情形：是在一个热天，有人来打门，来的

就是殷夫，却穿着一件厚棉袍，油汗满面，笑笑说：这是第三回了，自己出来的。前两回都是哥哥保出，他一保就要干涉我，这回不去通知他了！

……

多少往事涌出，使鲁迅沉吟：“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栈里，他们却是走向刑场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声中逃往英租界，他们则早已埋在不知哪里的地下；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旧寓里……我又沉重地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

“这30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起他们的时候的。……”

的确如此。

1934年春天，当又一批革命志士被囚禁在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牢房时，他们集体吟成一首诗抄写在墙壁上，为悼念龙华24烈士：“龙华千古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穷。墙外桃花墙内血，一般鲜艳一般红。”

1945年，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六届四中全会后“错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中的绝大多数同志”，“当时的所谓‘右派’主要地是六届四中全会宗派主义的‘反右倾’斗争的产物”，“林育南、李

求实、何孟雄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人地下有知，也该含笑九泉了。他们的心和他们的血同样的鲜红！

1950年上海解放后，党和政府根据群众和烈士家属提供的线索，经过多方寻觅调查，终于在原淞沪警备司令部内刑场的荒地上，找到了当年深埋于地下的大坑。尚有整具的遗骨18具，头、骨不全的约数具，还有锁在烈士身上的镣铐，银角和铜元，冯铿烈士那件早已变了颜色的羊毛背心。这是烈士的忠骸，这是漫长的黑夜里国民党反动派血腥屠杀的见证。

烈士遗骸发掘出后，先被葬在大场公墓。上海市烈士陵园建成后集体移葬于陵园墓区，并立碑纪念，以他们为主体的上海烈士群雕矗立于陵园大门正中，把他们的音容笑貌留给人们。

“有的人活着已经死去，有的人腐烂了还散发着毒瘴，有的人虽死却永远活着，活在人们的心底，化作永恒的力量。他们——‘中国的脊梁’，他们没有留下财产，没有留下勋章，甚至没有骨灰和姓名，但是留下了真理和对真理的坚贞信仰。”

60年匆匆岁月已过，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还有两位至今不知姓名的烈士），让我们把抄录的这首诗作为对他们永不忘却的纪念。

本文论述了太平天国历史上一段极其可悲的血淋淋的史实。震惊世界的太平天国起义，也没能脱出「大胜利——大骄傲——大失败」的怪圈。这固然因为农民革命首领们有其阶级局限性，但他们留下的历史教训却是永远值得记取的。今天，我们改革开放，建设四化的宏伟事业，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离建成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强国，还有很长的征途要去跋涉。我们决没理由骄傲，更没有理由享乐腐化，脱离群众，危害安定团结，落入历史的覆辙。

一百四十年前，由金田起义揭幕的太平天国革命，轰轰烈烈，所向披靡。太平军自广西出发，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席卷了半个中国，建都于天京（今南京）。特别是1856年上半年攻破清王朝江南大营后，政治上、军事上都进入全盛时期。这些大胜利，给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带来了大骄傲。天王洪秀全于是不思进取，不理国政。东王杨秀清则得意忘形，骄横无忌，滥用神权，所有将领几乎都受过他的凌辱。为了把革命事业推向胜利，他把包括北王韦昌辉在内的将领们都派到外线作战，京城疏于戒备，却自以为江山十分牢固。他想借此整顿朝政，结果树敌过多，遭到暗算，导致大规模的天京变乱。

在这次天京事变中，韦昌辉勾结燕王秦日纲在佐天侯陈承瑢接应下，潜入天京，包围东王府，袭杀东王杨秀清，并残酷屠杀杨的家属及部将两万多人。从此太平天国革命元气大伤，由盛入衰，并逐步走向失败。那么，这一惨痛的历史事件是怎样发生的呢？它的经过、结局及教训又是怎样的呢？本文想从天京事变的起因说起，而起因又是由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封建化，即腐败和争权夺利等诸多矛盾构成的。

·新·书·介·绍·

《中华英杰谱》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从历史上众多的爱国英杰当中，选取了200余位有代表性人物，讴歌其感人肺腑的爱国业绩。具有知识性、思想性、可读性。全书分上、中、下三卷，100余万字。所写人物时限上自西周，下迄当代。他们中有政坛巨擘、军事大家、科技精英、思想明星、文史俊彦、爱国志士、革命先烈、英雄模范等。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科学地审视和评价人物，实事求是地判定其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全书以弘扬爱国主义为主线，分则各人和事独立成篇，合则纵横连，浑然一体，使读者从中既可瞻仰个体形象，又能领略群体风貌；既能具体体察某一时期爱国主义的表现特征，又有助于概观爱国主义的历史演进轨迹。（陈智英）

“天京事变”始末

苏双碧

一、洪秀全并非诛杨的罪魁

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首义诸王很快封建化，宣扬“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建立了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于是享乐腐化、争权夺利之风遂起，旧式农民战争的一些弊病又重新暴露出来。本来在起义和进军阶段，太平天国从天王到士兵称兄道弟，官兵平等，部队积极性很高，战斗力很强。清特务人员张德坚在《贼情汇纂》中说到：“太平军之所以能成‘燎原之势’，是因为‘首逆数人起自草莽结盟，寝食必俱，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于一室，得计便行，机获迅速。’”又说：“太平天国官兵都是‘自携军火，裹粮以行，无舟车之载，安能觅轿马？洪杨诸首逆亦敝衣草履，徒步相从。’”在这种情况下，首义诸王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进取心很强。太平军从广西到南京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兵锋所及，如摧枯拉朽，斩关夺隘，所向无敌。太平军将领之间，当时并没有明显的抵牾，也未发生对权力的争夺和角逐。但是，农民领袖们一旦取得政权，就很难按原来的“平等”思想来建设曾经设想过的“地下天国”了。他们可以用平等思想来约束士兵，却不能用平等思想律己。而原来他们反对过的封建特权以及地主阶级对财富的拥有，就逐步变成他们所追逐的目标。在天京建都之后，首义诸王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快放弃了进军阶段崇尚平等、积极奋发的思想，而革命酝酿时期的各种不同思想和矛盾在这时也重新萌发，逐步朝着不利于农民阶级的共同事业的方向发展。特别是领袖人物洪秀全、杨秀清的思想中所滋生的封建特权和享乐思想，对革命事业危害尤为严重。

洪秀全在建都天京后，也确曾想用平

均主义思想来开创“地下天国”，他制定并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主张“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提倡“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个方案是不可能实现的。其它可行的方案又拿不出来，在经过若干尝试失败之后，便不得不退回去，朝着封建制度的轨道上滑行。洪秀全是饱读经书的，他对封建主义、封建特权的一套十分熟悉。因此，他并不需经过什么质变，便很自然地继承了封建皇帝所拥有的特权，而使自己逐步封建化。突出的表现：一是爱听颂扬，什么“公正威风者为万民之主”，什么“元首明，股肱良，贡赋献雉，航海梯山。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洪秀全俨然已经建立一个“一人垂拱于上，万民咸归于下”的封建王朝，而自己也俨然成了封建皇帝。于是那些显示帝王尊严的敬避字讳和回避之类的制度也制订出来了。洪秀全为了显示尊贵，把自己拘囿在神秘的与世隔绝的小天地里，甚至连昔日草莽结盟的伙伴也“罕识其面。”沉溺在享乐的宫闱生活之中。二是一入城就大兴土木，营建天王府。史书记载，当时的天王府，“城周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殿曰金龙殿，苑曰后林苑，雕琢精巧，金碧辉煌，如大兰若^①状”。而且广选后妃，多至88人。洪秀全在广西提出的“小天堂”，本来是用以号召太平军将士奋勇前进的目标，如今却缩小成了天王府。三是革命意志锐减，不理朝政。以至天京建都一年多，清江南大营向荣在给清廷的一个奏折中还说：“至洪逆之有无，向有传闻异词”。时人谢介鹤在《金陵癸甲记事略》中也说：“天贼尸位而已”。更有传闻“洪秀全实无其人”，不过是“刻一木偶，饰以衣冠，闷置天王府”而已。《贼情汇纂》中也说，太平天国一切号令都出自杨秀清，“洪秀全徒有其名”。洪秀全把权力都交给杨秀清，结果大权旁落。

杨秀清是一个精明能干的统理朝纲的军师。在起义阶段，他曾假托“天父上

帝”下凡附体，传言群众，安定人心，因而取得了天父代言人这种至高权威。后来他便集政权神权于一身。《李秀成自述》说，建都天京后，“东王佐政以来，事事严整，……民心佩服”。但由于杨权力过于集中，封建专制主义思想膨胀，非常骄横跋扈，“一朝之大，是首一人”。为他营建的东王府，其富丽堂皇，奢侈华丽，仅次于天王府，出门的仪仗队十分庞大，过于张扬。后来甚至发展到以天父^②的名义要挟洪秀全，要洪秀全下跪接驾。洪、杨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突出。不过，在处理和杨秀清的关系上，洪秀全采取了忍让和顾全大局的态度。这是因为他要维护天父皇上帝的尊严，并要依靠杨秀清来掌管朝政。请看以下事例：

一是1853年（癸好三年）^③11月，杨秀清自称代天父下凡，因洪秀全虐待宫女，要杖洪秀全46板。那时建都天京刚刚八个月，洪秀全正集中精力，并亲自监督营建天王府，在此期间，发生过任意辱打甚至处死侍从、女官的事情。杨秀清便以天父下凡，下令杖责天王，以示警告。杨



天王洪秀全画像



秀清并借此，要洪秀全对幼主严加管教，使幼主从小“体念物力维艰”，“节用而爱民”。要洪秀全体恤臣下，不要任意打骂诛杀。杨秀清还劝洪秀全要善于“纳谏”，他说，“君有未明，良臣启奏，君则当从；臣理君事，亦必先启奏始行。如此则君臣同德，上下一心”。这些劝告是颇有道理的，尽管手段粗暴，洪秀全还是能忍让的。他在得到天父赦免对他的杖责之后，破例在金龙殿宴请杨秀清、韦昌辉等人，并称杨秀清的谏言是“金玉药石之语”，“至情至理之言。”但这件事造成洪秀全心灵上的不快却是必然的，在洪、杨的关系上投下新的矛盾的阴影。

二是杨秀清凌辱王兄洪仁发、洪仁达。二洪是洪秀全的兄弟，经常凭借天王的权势为非作歹。有一次，杨秀清代天父下凡，下令各官听令，洪仁发迟到，杨秀清指责他对天父不敬，洪秀全得悉后，即下令要洪仁发到杨秀清处“内祖请罪，并请杖责”。洪秀全尽管出于宗族血缘，对洪仁发等的劣迹有所袒护，但他为顾全大局，还是站在杨秀清一边，责备其兄洪仁发。

三是杨秀清经常以天父皇上帝的名义下凡，用神的威力凌驾于洪秀全之上。有时甚至以天父名义下令将东王“迎至金龙大殿”。有时在夜深人静时，突然以天父下凡，并要登朝，但天王府朝门数重，洪秀全出来晚一点，杨秀清就斥责他“甘久还不开朝门？真是该打！”逼得洪秀全跪在地上“求天父恩赦小子迟程之罪”。遇到这种事，洪秀全出于维护天父的绝对权威，总是忍让，但与杨秀清在思想深处的裂痕却在加深。

从以上材料看，洪、杨之间确实存在着严重矛盾，但还没有发展到洪秀全非杀杨秀清不可的地步。据天京事变中曾经赶到天京排解的石达开后来追述说，韦昌辉曾

经请洪秀全诛杨，“洪秀全不许”，正因为如此，当韦昌辉发动天京叛乱杀害杨秀清后，洪秀全曾予以痛斥。可见诛杨并不是洪秀全的初衷，天京事变的罪魁祸首是韦昌辉，而不是洪秀全。

二、韦昌辉行韬晦之计

韦昌辉在太平天国的地位，仅次于洪秀全、杨秀清。在进军阶段和定都南京之后，他都是重要的决策人物之一，对太平天国的事业曾经起过重要作用。但是，他有着地主阶级的劣根性，“阴柔奸险”，对杨秀清是“阳下之面阴欲夺其权”。韦昌辉对杨秀清献媚讨好也很突出。据《天父下凡诏》记载，有一次洪秀全、杨秀清在金龙殿议事，洪秀全说：“尔二兄果然有差处，始操劳天父下凡教导也”。韦昌辉立刻把话接过去说：“二兄无差，总是我们为弟之错。”在谈到袍服时，洪秀全说：“现今尔二兄之袍服至足，不用缝先。”韦昌辉又马上接过去说：“二兄为天下万邦（国）真主，富有四海，袍服虽足，亦要时时缝来。”这种无原则的阿谀奉承态度，当即遭到杨秀清的驳斥：“袍服不足方要多，若云既足，缝些再缝，方见二兄节用爱人之德。”洪秀全为此对杨、韦作了如下评价：“清随真是古之所谓骨鲠之臣。正胞④，尔虽是爱兄之心诚，终不若清随直言无隐更为可嘉也”。这两件事反映了韦昌辉内心世界的卑鄙。

韦昌辉耍两面派，行韬晦之计的事是很多的。《金陵癸甲记事略》中说：韦昌辉“事东贼甚谄，舆（车）至则扶舆以迎，论事不三四语，必跪谢”。有一次，韦昌辉的哥哥与杨秀清的亲兄争房屋，杨秀清把他交韦昌辉议罪。韦昌辉竟要将其哥哥处以五马分尸，说不如此，不足以警众。又一

次，韦昌辉部下任意殴打水兵，激变水营，杨秀清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杖责韦昌辉数百。有个裨将为此大呼不平，韦昌辉听罢大怒，竟杀了这个裨将“以谢秀清”。这种超出常规的谄上作风，包含着极大的野心。韦昌辉为了有朝一日取代杨秀清，行韬晦之计，下了极深的功夫，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应该说，韦昌辉的努力是收到效果的，甚至连十分精明的杨秀清也误认为他慑于自己的威严，“有惊恐之心”。杨秀清没把韦昌辉看透，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种下了悲剧的祸根。

对韦昌辉的险恶用心，太平天国内部是有所察觉的。太平天国的理论家曾钊扬在事变前很久，就曾议论韦昌辉“阴忍而残酷”，“其心叵测，萧墙之祸正恐未远。”清廷特务人员在事变前一年就判断说：“杨贼与昌辉互相猜忌，似不久必有并吞之事。”故我双方都看到杨、韦之间的深刻矛盾，杨秀清作为当事人自然不会无所觉察，但由于过份自信而忽视了韦昌辉的韬晦之计。这就使韦昌辉有机可乘。

三、积怨酿成刻骨仇恨

丙辰六年（1856年）七月初九日，杨秀清代天父下凡，宣布“秦日纲弑妖，陈承瑞弑妖”，又说：“朝内诸臣不得力，未齐心敬拜上帝真神。”弑妖就是降清，罪当即诛。但杨秀清宣布秦、陈弑妖之后，却没有采取任何相应的措施。而秦日纲是个带兵将领，有一定实力，陈承瑞是朝中最高行政长官，可以来往于洪秀全、杨秀清之间。他们两人不会坐待其毙。从某种意义上说，策划天京事变的核心人物是陈承瑞。他有得天独厚条件，利用和洪秀全往来之便，把自己的行动说成是天王的意志。勾结韦昌辉这个野心家，以及联合与杨秀清有前怨的秦日纲，共同发动天京叛乱。

那么，杨秀清宣布秦、陈弑妖是否有根据呢？现在不得而知。但他想利用破清朝江南大营之后来整顿天朝的政权机构，却是可能的。秦、陈都受过杨的杖责，杨在甲寅四年的一次代天父下凡时，曾经下令把陈承瑞锁拿起来，虽然没有宣布什么罪状，却说了这么一段话：“尔爵居诸王之下，位列群僚之首，便当一条草（心）对天，真草（心）扶主……切莫变妖变怪之人。”随后把他放了。这段话自然是在批评

陈承培等人对主不忠心，有变妖变怪的嫌疑。而秦日纲则因打败仗，屡受杨的处罚。《天父天兄圣旨》中记有乙荣（乙卯）五年二月十三日天父下凡，令将秦日纲“奴其三载”，即革职为奴三年；并记有因“屡次失守之罪，锁押在牢，未经主断”。一直到半年后，才下令复其原职。从这些材料看，秦、陈都是与杨积怨很深的。如今，杨秀清既然宣布秦、陈帮妖，就把矛盾推向白热化了。杨不动手，秦、陈也必然动手反击。

那时节，韦昌辉在江西瑞州连吃败仗，连“黄轿绣伞”也被清军夺去。也正是那时，韦昌辉得到陈承培的通报，令即率军潜回京师，并在路上会合从丹阳奉召归来的秦日纲。就这样，韦、秦、陈三人勾结起来，策划入京诛杨。按照太平天国的纪律，败将归来是不能马上入京的。况且，天京尽是杨秀清的部队守卫，韦昌辉的三个亲军要进入天京，必须有陈承培在城里策应才有可能。

就这样，韦昌辉率军顺利进入天京，并立即包围东王府，袭杀杨秀清。东王府兵将措手不及，几乎都是束手待毙。由于韦昌辉捏造了一个诛杨的所谓“天王密

诏”，他才能顺利得逞而未遭抗拒。

四、京城里血雨腥风

韦昌辉在袭杀杨秀清之后，立刻乘机扩大事态，残杀杨秀清所有的家属和部将。从凌晨到拂晓，几个时辰内，东王府内外已经是尸体累累，血泊遍地。可以看到韦军士兵“府里争先恐后地抢夺，府外穷凶极恶地火并，不管脚下践踏的是男是女，是死是活，惨不忍睹。这都由于韦昌辉曾许下诺言，即攻进东王府可以随意抢劫归己。否则，太平军纪律严明，攻下清军城池尚不敢随意抢掠，何况在太平天国的东王府，怎能出现如此野蛮的行径呢？韦昌辉在诛杨时宣布他是奉洪秀全密诏诛杨的。当时天京还传说杨秀清要谋篡和逼封万岁，如果不是韦的部队赶到，天王就要被杀了。这些舆论显然出自韦的炮制，但在不明真象的军民中却造成了以假乱真的影响。经考证，在清方记载和太平天国官书以及将领的记述中，都没有谈到洪秀全的诛杨密诏。另外，韦昌辉诛杨之后，曾经下令在东王府搜查鸦片和烟具、

烟灯，力图证明杨是吸食鸦片的。按太平天国律例，吸鸦片当杀头。但证据都没有找到。这件事说明，如果洪秀全确曾下诏诛杨，就没有必要再寻找杨吸毒的证据了。

韦昌辉在袭杀杨秀清之后，看到城中杨的部队还很多，一不做二不休，决心进一步消灭杨党。正在这个时候，天王洪秀全想平息杨秀清部将的激愤情绪，决定当众惩罚韦昌辉、秦日纲，罪名是杀人过多。因为这样一来，洪秀全既不必承担诛杨的责任，实际上又清除了政治上长期对他产生威胁的政敌。同时他用惩罚韦、秦的办法，也可以向东王部属交代，使他们继续忠于天王。而韦、秦虽然受杖责，也只是说他们杀人过多，照样可以充当天朝重臣。可惜，洪秀全这时已驾驭不了局势。事变是由韦、秦、陈发动的。其中韦、秦在明处，而陈在暗处，甚至当时天京都很少有人怀疑他参与其事。这样一来，洪秀全惩罚韦、秦的计划，很快被陈承培等所利用，实行对东王部属大屠杀的骗局。他们在天王府门前宣示惩罚韦、秦诏令，同时通知东王最精壮的部队几千人来观看韦、秦受刑的情状。东王士兵毫不怀疑天王的



诏令，都放下了武器。韦、秦受刑之后，六千多东王部队也被囚禁在几个大房子里。当天晚上，经韦、秦等周密策划，派兵施用最残酷的手段，枪、炮、炸药包齐发，消灭这批东王部队。最后韦、秦又命人冲进囚室，把剩余的东王士兵统统杀掉。接着又在天京城里穷搜东党，凡是有点牵连的皆难幸免。

洪秀全对韦、秦的惩罚，并没有制止住他们对事态的扩大。诚然，成千上万的东王部众，都是久经锻炼的太平军战士，他们的存在，对韦、秦显然是个威胁。韦昌辉一伙在接受刑罚的同时，却关押了东王主力部队，并把他们缴械。据一位外国传教士记载说，东王府的五六千士兵之所以被缴械而不反抗，是“因为曾有天王的谕传知众人，凡是幸存的杨逆余党，一概赦宥不问。”这里所说的谕传是传闻或转述的，未必准确。但洪秀全认为既杀了杨，其部属是无辜的，应该“一概赦宥”，这是符合天王的逻辑的。然而，惩罚韦、秦的诏令，却成了屠杀杨部属的根据和帮凶。这当中陈承瑑的作用不能低估。天京叛乱发生以后，陈承瑑仍然充当一个秘密角色。这样他可以继续取得天王的信任，并借其名义来推进韦、秦的叛乱，并继续扩大事态。当韦、秦、陈凶恶的面孔暴露无遗的时刻，洪秀全便只有采取守势，完全丧失控制局面的能力。叛乱局势继续发展，屠杀达二三个月之久，凡是和杨有关系的，男女老幼皆在劫难逃。天王只好听之任之，没有力量制止。这场罪恶的叛乱先后屠杀了几万人，令人发指，实在是太平天国历史上的一大悲剧！

五、石达开回京排解

天京城里为争夺权力在进行大屠杀，而京外的太平天国将士在各个战场上和清军进行浴血奋战。但是，天京事变对于每个太平天国将士来说，毕竟是不能不关心的。当时在京外将领中声誉最高的并有资格进行排解的，只有翼王石达开。他在京外不但职位最高，拥有重兵，而且没有参加天京事变的任何行动。当时，石达开正在武昌督兵，获悉天京变乱之后十分不安，便迅速赶回天京。要进行排解。但是，石达开来到金陵城下，城门却紧闭着。他只好用箭射书要求入城。韦昌辉限令他只身入城。石达开入城之后，直奔天王府，见

到洪秀全，得知天京事变的大体经过。石达开十分气愤，就来北王府，当面谴责韦昌辉不该残杀自己的兄弟。韦昌辉把石达开看成异己，指责石“忠于杨氏”，并暗召集部下，声称“不去石氏吾愚未已。”决心除掉石达开。

石达开是一位谋略颇深的将领，他发现韦昌辉已动杀机，便在天京的一些旧部属的帮助下，杀死了守门官，从西门夺城而出。当石达开逃离天京之后，有人报告韦昌辉，韦顿足曰：“我即不欲仇石氏，石氏亦必仇我，我怨不可解矣。”韦昌辉为人十分残忍，他一不做二不休，遂率兵包围翼王府。洪秀全闻讯，立即派人加以阻止，但已“救之不及”，石达开的母亲和妻子等十余人已成刀下之鬼。

以上事实，说明石达开光明磊落，指责韦昌辉滥杀无辜也是合乎情理的。尽管石达开和杨秀清关系一直很好，是一位唯一没有受杨以天父名义责罚过的将领。他对韦昌辉矫诏诛杨自然是不满的。但如果石达开入城后公开袒护杨秀清，不但于事无补，并且必然要引起更大的冲突。而指责韦杀人过多，则和洪秀全意见是一致的，韦、秦理亏，很难反驳。洪秀全当然知道石达开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对韦昌辉杀石的家属十分不满，并再次指责。这就进一步加深了洪、韦的矛盾。但是在韦昌辉的面目没有彻底暴露时，天京军民普遍受韦矫诏的蒙蔽，以为韦的胡作非为是天王许可的，韦昌辉骄横跋扈有过于杨秀清，而洪秀全尽管处处受到韦的掣肘，也只能忍气吞声。石达开的到来，自然给洪秀全带来一点希望。但是，石达开逃去，其家属又被韦所杀，洪秀全处境就更加困难了。因此，尚须创造条件，等待时机，才能除掉韦昌辉。但在条件没有成熟前，洪秀全对韦只好更加恭顺，更加显得无能为力。

在石达开逃出城之后，韦昌辉等便以洪秀全的名义发了一个捉石的诏令。《金陵杂记》中说“《韦贼张示四乡，有能拿获（石达开）者赏千金，封万户侯。”当然洪秀全也可能知道有这个诏令，他即使不同意，也不会公开反抗的。只有这样才能麻痹韦昌辉。因此，韦后来被诛，石达开并没因这个诏令而忌恨天王。

六、秦日纲率部伐石

石达开逃离天京以后，韦昌辉预感到

石可能会聚集力量打回天京。于是一方面在京进行新的屠杀，另一方面派秦日纲率军追击石达开。秦的讨伐军到达西梁山时，得悉天京以外的太平军全体兄弟都表示同情翼王石达开，而且翼王正在芜湖统率一支压倒优势的强大部队。秦看到太平军归心于翼王，便无心再去和石达开作战，对石善于用兵深有所了解，与石在感情上也不那么敌对。

秦日纲在西梁山停止前进之后，经过一番思索，便下令进攻就近的清军，想以此来表明他不与石达开部对敌，而把清军看成是他们的共同敌人。然而，秦日纲参与韦昌辉的叛乱，对太平天国的共同事业造成的极大危害，毕竟是不能原谅的。石达开率军在芜湖，决定兴师靖难，兵锋指向天京，构成对天京的威胁。就在这时，石达开呈书天王，要求杀掉韦昌辉及其同伙秦日纲、陈承瑑，否则即率兵进攻天京。韦昌辉是否了解石达开的请诛信，现在不得而知。但是，韦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用天王的名义派出讨伐军，各路太平军就会归附于他。当他知道秦日纲军停止在西梁山，以及石达开兵锋所向时，知道石进攻天京已是时间问题。于是便在城内修筑工事，并把可能被石达开作为进攻阵地的古报恩寺塔炸毁。准备负隅一战，或则采取新的行动，去洪秀全以自代。

七、洪秀全诛韦靖难

韦、秦的部队在天京本来就少，如今又由秦日纲率领几千人去讨伐石达开，城中兵力大大削弱。加上城内纷纷传闻，说石达开就要来进攻天京。洪秀全看到时机已到，便着手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组织力量。这当中必须有一个很精明的强有力的人在协助天王策划，可惜史无记载。

韦昌辉为人奸诈，自然看出洪秀全的动向，或者消息来自陈承瑑。韦昌辉焦急跳墙，决心先下手。这一天，韦以请朝为名，要求见天王，并向洪索取石达开。这纯属是挑衅，不过是找借口，擒杀洪秀全以自代。韦昌辉兵临天王府前，天王府大门紧闭，洪秀全不敢出来见他。韦声言，如不交出石达开，即用火攻。就这样一直相持到薄暮。显然，洪是在拖延时间，等待反击；而韦却是孤注一掷。在天京，以洪秀全为一方，以韦昌辉为一方，阵线非常

分明。天京军民几乎用不着动员，便都自觉地站到天王一边。

当黄昏时刻到来，天王府的大门突然大开，在门前竖起翼王旗帜，一大群王府的侍女裹发效男装冲杀出来。韦昌辉及其部属不知有诈，误以为石达开果然藏在天王府内。只因韦昌辉弄巧成拙。韦的部众，一看到天王府里冲出石达开的部队，思想缺乏准备，都惊慌失措。府外军民见翼王部队冲出，便自动起来配合作战。韦部亲兵大部分作鸟兽散了。

洪秀全乘韦部溃乱之际，立即以天王名义下令捉拿韦昌辉，号召军民凡“知道此奸隐处者急首告”。这样一来，就连韦的亲军也纷纷倒戈，全军民同心协力捉拿北奸。两天后，韦终于被擒，天王立即下令将其肢解，枭首示众。同时下令到西梁山前线捉拿秦日纲，随后将秦日纲、陈承瑢等首要叛乱分子也一概处斩。由于时机成熟，并借用了翼王的军事声威，仅两天，就平息了这场叛乱。

《李秀成自述》中也说：“北王在朝，不分清白，乱杀文武大小男女，势逼太重，各众内外，并合朝同心将北王杀之。”这里说的“各众内外”，应是指天京内外的天朝将士；“合朝同心”则专指天京的文武大臣和将领。这些人当然不可能是自发起来诛韦的，而是有人在组织和号召，中心人物当然是洪秀全。石达开的兴师靖难，虽然没有打进京城，但对京城在心理上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对洪秀全的诛韦决心也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从洪秀全诛韦过程，可以看出洪对天京事变的基本态度。他对诛杨没有明显持反对态度，默认了既成事实，但对杀人过多是坚决反对的。他谴责韦滥杀杨的部属，又出面干涉韦杀石达开家小。可见，洪秀全并不是天京事变的魁首。洪秀全在金田起义的酝酿阶段，赞同了杨秀清代天父下凡，又赞同了萧朝贵代天兄下凡，这些举动从某种意义上说促成了太平天国起义的迅速成熟，但却使权力转移到杨身上。杨总揽大权，如果不是经常以天父名义下凡作威作福，伤害了洪秀全的自尊心，洪是不会同意诛杨的。诛杨之后，洪想就此了结。但是，韦昌辉品质极坏，他们诛杨对天京政权造成的后果，却远比杨

的跋扈危害更大。可见，洪对诛杨最多只是默认而已，而诛韦则是他出自内心的意愿和行动。

从天京事变的整个历程，可以看出太平天国的将领们，并没有在路线方针上发生过什么明显的分歧。而是农民领袖的历史局限，在封建主义的侵蚀下，封建专制主义意识膨胀，争权夺利，互相火并。当然，这种内讧，如果仅是在洪、杨之间进行，未必能酿成大端。不幸的是有了一个阴险凶险无恶不作的韦昌辉。洪秀全对韦十分憎恨，他死后便废掉他一切爵位，并称之为“叛爷”。而对杨不但保持一切尊号，并将他死的日期定为“东王升天节”。

八、翼王辅政又出走

韦昌辉被杀以后，首义诸王除洪秀全之外，只剩石达开一人。由于石达开不但没有参加天京叛乱，而且回京排解，最后兴师靖难有功。他的威信自然空前提高，成为太平天国军民所仰望的人物。洪秀全当即下诏。这一措施表达了合朝文武的意愿，军民大众无不对石寄予厚望，并大力支持。

石达开为人坦荡，好打抱不平，青少年时代就有小宋公明之称。天京事变中，为维护天国事业出生入死，得到了太平天国军民的爱戴。一个外国传教士在《镇江与南京》一文中写道：“在残存的首领中，除翼王石达开外，其它状况几乎一无所知。这位青年领袖，作为目前太平天国的中坚人物，各种报道都把他描述成豪爽好义，勇猛无畏，耿介正直，无可非议，可以说是太平军中的雅培德^⑤……他是一个有教养的人，敢作敢为的人。”李秀成在《自述》中说：“翼王回京，合朝同举翼王治理政务，众人欢悦。”这种恢复天京大叛乱造成的混乱局面，是大有希望的。李秀成《自述》别录说：“义王即石达开，本系翼王，后来大家喜其义气，推为义王，石不肯受。”石达开这个人有自知之明，对他自己的地位也有所节制，并不因为大受抬举而忘乎所以。

洪秀全和石达开的合作，使太平天国在动乱之后重新见到曙光，出现新的希望，振奋了天京军民的精神。也给正在幸

灾乐祸的清军以沉重的打击。在天京叛乱期间，清军没有能力乘机攻破天京。他们曾经把希望寄托在石达开、洪秀全、韦昌辉之间的矛盾上。清廷曾于1856年10月命令曾国藩招抚石达开。清军对石达开看得很重，认为得到石达开比攻下天京更为重要。还认为石是太平军的“主谋”，几次主要战争，“皆石逆之计。”又说：石“才智出诸贼之上，而观其所为，颇以结人心，求人才为急，不甚附会俚教邪说，是贼之宗主，而我之所畏忌也”。洪秀全有这样一个人将领辅政，如果洪、石能精诚合作，太平天国的被动局面将会得到扭转。然而，遗憾的是，洪秀全对石达开不能体察大度，加以抚慰和信任。石内心蒙受的阴影，只有洪的信任才能洗清。然而，洪却偏偏在这个问题上缺乏开阔的胸怀，他看到合朝文武对石的崇敬，不是高兴而是不悦。农民小生产者的狭隘思想，使他重用同宗兄弟洪仁达、洪仁发，以牵制翼王。并以三洪为一边，上有天父皇上帝扶持，下可君临臣民。有这股力量咄咄逼人，石达开纵使有广大军民支持，也是很难立足的。

但是，问题并没有因为大臣的不满而使洪秀全有所醒悟。相反地，由于洪仁发、洪仁达品质恶劣，他们仗势对石达开步步进逼，特别是看到臣民对石达开的尊敬，对他们的鄙视，更是不能容忍。据清方得到的情报说：“金陵各伪王忌石逆之能结交人心，石逆每论事，则党类环境而听，各伪王论事无肯听者，故忌之，有阴谋戕害之意。”石达开也认为洪氏兄弟对他“疑多将图害”。在这种情况下，石达开决定率师出走，避免再出现一次天京大屠杀。1857年6月2日，石达开率师离京到达安庆，随从者有20万精兵，这是太平天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分裂。从此太平天国局势江河日下。由于领导集团的腐败和争权夺利，给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并最终导致了这场革命的大失败。

注：①兰若，庙宇，梵文阿兰若的略语。

②洪秀全为反清革命创立拜上帝会，以上帝为天父，自称是上帝的次子，耶稣的弟弟。

③癸好，即癸丑年。太平天国起义于1851年（辛开，即辛亥年），故1853年为癸好三年。

④韦昌辉原名韦正。胞，同胞兄弟之意。

⑤雅培德，古代法国的一位名将。

周恩来的另一

· 水 静 ·

作者是中
共原江西
省委第一
书记杨尚
奎的夫人。
她与老一
辈革命家
有较多往
来，本文
记叙了周
恩来总理
生活中少
为人知以
至不为人
知的一面。

周恩来总理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国际事务活动家，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世界地图的每一种色块上。在我和总理的多次接触中，觉得他是一个幽默随和、兴趣广泛人情味极浓的人，他没有什么领导人的“架式”和“气派”。似乎他一走出会场、一离开正式场合，就是一个普通人，一个老大哥。他跟谁都谈得来，无论工农士商，无论大人小孩。他像我们每个人一样，有自己的业余爱好和嗜好，而且非常精通。

他的交谊舞艺术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对于文艺，总理不仅爱好，还是行家。据我所知，中央在北京或外地召集会议时，以及在庐山会议期间，只要不是国事缠身，他一定会参加晚上的文娱活动。

总理对江西的几个剧团都很熟悉。他曾为江西省歌舞团指挥排练《洪湖水，浪打浪》；看了江西省京剧团创作的革命现代京剧《大渡河》，并为这个戏的修改作了具体设计：要掌握好“过彝区”、“安顺场”和“夺桥”三个环节；要加重份量，改成一出大戏，等等。赣剧是具有江西地方特色的古朴高雅的剧种，更受到总理的青睐。他喜欢它的音乐，喜欢它的表演，喜欢它的演员，给予了“美、秀、

娇、甜”的高度的评价，并欣然为省赣剧团题写了团名。此外，他还在北京接见过江西省话剧团的演员，给他们创作的《八一风暴》提出了重要的意见。他对每一剧种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并且总是循循善诱地告诉演员们，如何提高上演节目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他是文艺的热情的欣赏者，也是文艺的出色的领导者，而且把这种领导融化在亲切平和的交谈之中。这本身就是一种艺术，所以每次陪总理看戏或看望剧团，都有许多“份外”的收获。

懂音乐、懂舞蹈、懂戏剧的周总理，还喜欢跳交谊舞，而且跳得极好。舞姿潇洒自然，优雅大方，你可以看到一种英美之风，随着他的舞步飘逸开来。即使一个舞池里几十对舞伴同时起舞，你一眼就可以把他找到。他那种特殊的魅力，是内在素质的外延。

那时，佳楣、余叔和我经常一起参加舞会，总理知道我们几个人很要好，总是轮番请我们跳舞，我们也很喜欢跟他跳。因为和他跳舞可以说是一种艺术享受；你的双脚会感到十分自由，无论节拍的徐疾，无论步法的宽窄，都像是走在广阔的绿草地上一样地悠然自得。你的身体似乎轻若鸿毛，不管你朝什么方向转动，也不管角度多大，都飘然如风，身随意飞。随

着轻巧的舞步，悠扬的乐曲，使你进入一个美妙的境地，如置身在四月的花径，八月的桂丛，听鸟语，闻花香，心旷神怡。乐队要是奏起快三步的乐曲——这是总理最喜欢的——他跳得更为精彩。如果你是在一旁欣赏，那就会看到一个风柱绕舞池而疾走。如果你跟他一起跳，就像是随着那“抟扶摇而直上”的鹏鸟，跃向无尽的苍穹；又像踩着他的神奇的冲浪板，滑过一个又一个浪尖。在似乎有些眩晕、甚至有些失重感的状态下，不觉步入一种超尘脱俗、忘物无我的愉悦之中。

我无法理解，从中学时代开始就为中国革命夙兴夜寐的总理，怎么会有时间去掌握那么广泛而丰富的知识，除了天赋的才干之外，还能作什么解释呢？他决不会浪费时间去刻意地学习跳舞的，他的交谊舞之所以有此精湛的造诣，是因为他拥有一般人所不具备的特殊的艺术素质。

很少有人具有像他那样的领导魅力和领导艺术

总理的艺术天才，还在于把工作也艺术化了。他的领导魅力、领导艺术，连敌人也不能不钦佩。即使最棘手的事，到了他手里，也会办得十分得体、十分圆满、十分出色。这常使我想起来一些陷入窘境的同志，他们把

个世界



易办的事办难了，把难办的事办砸了，更不用说把好事办成坏事了。究其原因，自然各有不同，但缺乏平等待人的态度，以职位压人，靠命令行事，缺乏领导艺术，则是共同的弊病。总理是党的副主席，政府的首脑，他的领导地位和权力，除了毛主席之外，谁也不能相比。但是从他和尚奎的生活接触到工作接触中，我感觉到他的品德、人格，感觉到他的喜悦和忧虑，唯独感觉不到他的地位和权力。他对人总是那么诚挚、尊重，那么有商有量，可是却没有一件事情没办成。这里我只说一件印象比较深刻的事。

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每个家庭最操心的莫过于粮食。当时，全国有好些省灾情非常严重，饥荒到处横行，已经吞噬了许多人的生命。到1960年，这种悲剧没有一点收敛的迹象，而且还有继续发展之势。作为全国几亿人的总当家的周总理，思想是如何沉重，心情是如何焦急，那是可想而知的。我们听说总理和主席一样，几个月不吃肉，饭吃得很少，心里很不是滋味。

这年四、五月间，我随尚奎到北京开会，就感到总理心事重重，眉宇间深藏着一种忧郁之色。星期天休息，我们打算去看看朋友，忽然接到通知，说总理和华东的几位书记个

别地谈一些问题，希望不要出去。这样，我们就在房间里等着，一边猜测总理的谈话内容。尚奎皱眉头说，这个时刻，八成是谈粮食问题。

大约十点半钟，总理到了我们房间。总理用很客气的、商量的口气对尚奎说，去年全国有好几个产粮省，包括四川这样的粮食大省都遭了灾，估计今年的生产形势也很糟糕，所以中央在粮食问题上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目前，北京、天津、上海的粮食库存都已经挖空了，调进的不够市场供应，如果不马上调一批粮食救急，像这样的大城市一旦发生粮荒，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这就不得不向你们求助了。谈到这里，总理说道：“江西已经调出了10亿斤粮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你们自己也有困难。但是，和别的省比较起来，你们还是好的。所以我今天特来和你商量，能不能再增调两亿斤，支援中央、救救燃眉之急？”

总理讲得真挚恳切，通情达理，尚奎也非常感动。但是，江西的问题也不小，尽管总理有所了解，尚奎觉得仍有必要将江西的情况作个比较详细的汇报。

尚奎说，江西是个农业省，主要是产粮。自古以来，特别是从南北朝时期起，江西就是重要的粮食产地和供应地；现在给中央调运粮食更是理

所当然，又不容辞的。但是，这两年我们的困难很大，1958年，许多地方顾了炼钢铁而误了农业，结果或者是增产而减产，不少稻子烂在田里；或者是晚稻缺乏管理而歉收。去年大灾，江西也未能幸免；今年的情况又不大好。灾情严重的地方，已经出现大批浮肿病人，个别县还出现了饿死人的问题。虽然我们及时发现了，采取了有力措施，防止进一步恶化，但我们一点也不敢大意。“要是今年又歉收，明年再遭灾怎么办？要准备最坏的事情发生。”尚奎说。

“你的想法很对，尚奎同志。”总理叹口气说，“老天不听我们的，有人又趁火打劫，又是逼债，又是切断援助。是的，要准备应付最坏的局面。”

“所以在中央调走10亿斤粮食之后，我们又重新调整了用粮计划，压缩了群众的粮食定量。”尚奎接着说，“富裕的地方，还可以勉强吃饱；困难的地方，那就要靠‘瓜菜代’了。这次来京开会之前，我到临川县一些公社看了一下，公共食堂煮的‘饭’，基本上是红薯叶子呀……”

尚奎的声音哽咽了。农民吃不饱饭，他感到不安，有愧，不管这场饥饿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也不管谁该负主要责任。

“在山东，红薯叶子都吃不上哟！”总理很难过地说，“问题是并不

止一个山东。”

“江西应该比山东那些地方好，它历来就是个出粮食的地方。”尚奎说，“也正因为如此，江西用粮也一直比较宽裕，农民喂猪、养鸡都习惯用粮食。可现在，人都不够吃了。”

“你们干部定量多少？”总理问。

“在粮食情况最好的县，干部最多定量为24斤。”尚奎说，“在猪肉、食油、禽、蛋之类都少到几乎没有的时候，一餐吃一斤米，就像吃根冰棒一样。干部直喊饿，我们不让喊，不

扶着尚奎的肩膀说：“放心，我不会给你们再加压了！”他知道尚奎的肩头压力，体贴尚奎的困难。

临走前，总理又说，尚奎谈的情况很有价值，对中央今后研究有关问题很有帮助。

作为尚奎的秘书，谈话的整个过程我都在场。我认真地听着，重要处还作了纪录。我想，总理，日理万机，紧张繁忙，像这类重大问题，召开各有关省的书记会议进行布置，或者以中央或国务院的名义，下一道文件，谁敢不遵从？总理却要花那么多时间，一个一个省地谈，为什么呢？这是对地方领导人的尊重；同时，这样才能造成一种亲切、和谐的工作气氛，使人敢于说话和便于说话，从而能得到真实情况，把工作做得更完美，更符合客观实际。这需要道德力量，需要领导艺术，而总理正是兼而有之。

一次喝了那么多酒，兴犹未尽，然后还要去参加晚会

我们经常从新闻媒介中看到总理宴请国外来宾并干杯致意的报道。大家闲谈起来，常常提出这样的问题：总理左敬一杯右干一杯的，难道不会醉吗？后来一位“见过世面”的人说：“唉，你们不懂。服务员给外宾倒的是酒，给总理倒的是水呀！”我将信将疑，因为这可以解释总理为什么不会醉，但我认为，服务员拿的应该是同一个酒瓶倒酒的。

后来我渐渐进入交际场合，的确看到国内同志闹酒的时候，常玩这类把戏，但很容易被发现。至于和外宾间的相互敬酒，是一种通常的礼节，一种良好的祝愿，说“干杯”并不需真干，可以喝一点，也可以像中国传统那样“沾唇为意”，不会喝醉的。而且也不允许醉，任何因酒多而失态，都是违反外事纪律的行为，是要受到批评以至处分的。那么总理到底能不能喝酒呢？有的说能，有的说不能，莫衷一是。直到1961年第二次庐山会议期间，我才弄明白了。

一天下午，尚奎一开会回来便告诉我：“刚才李富春同志说，离开江西苏区之后，就没有吃过老表的饭了。他说，要到我们家吃一餐有江西风味的饭菜。”

“请他来就是了。”我说，“他想吃什么，我就准备什么，那还不简单。”

“哎，不只他一个人，他还邀了十几位同志哩。”尚奎说，“周总理、小平同志、柯庆施、李井泉，还有华东局的几位书记：曾希圣、江华、江渭清……他们都会来。”

听说这么多中央的和地方的领导同志要来，我就不敢夸口了。钱倒花不了多少，可是谋齐那些土特产得花时间呀。我默算了一下，便说：“可以，不过要等我准备好了，再去请他们。”

经过两天的准备，第三天傍晚，开完会后他们都陆续来了，可就是不见总理。于是大家一边品尝我给他们沏的云雾茶，一边说笑。等了好久，总理还没来。我有些着急，忙摇电话去问，原来总理被毛主席找去了。又等了一会儿，一位同志说：“我看我们先吃吧！总理到了主席那里，说不定什么时候能来。”于是我立刻摆上酒菜，让大家边吃边等。

这顿饭准备得很有特色，连我自己都很满意。总体上是以尚奎家乡兴国的“四星望月”为主。这个颇为雅致的名字还是主席取的哩。据说在中华苏维埃时期，毛主席到兴国搞调查，有天突然到一位农民家吃饭，这个老表没有任何准备，一时也买不到东西，便把剩下的一点肉用米粉蒸了，又炒了青菜、辣椒等四样蔬菜。老表很过意不去地说：“毛主席，对不起你了，实在没有菜。”毛主席很高兴地指着中间一架小蒸笼和周围的四个碟子说：“好得很嘛，同志，你看，这是‘四星望月’。”所以“四星望月”，主要的就是粉蒸菜，是兴国老传统、老手艺。我准备的就有粉蒸肉、粉蒸鸡、粉蒸鱼、粉蒸豆腐泡等好几样。至于“星星”，那就多了几颗了，把江西主要几种有特色的菜都拿了出来；三



让发牢骚。他们嘴一闭，牙一咬，挺下去。”他的眼眶又潮湿了。

“江西的干部，有艰苦奋斗的好传统。”总理说，“都是好同志。”

“总理，我说这些不是向中央叫苦，而是让中央知道江西的情况。”尚奎继续说，“我们既要识大体，顾全局，又要考虑江西这个鱼米之乡的群众对饥饿的承受力，至于再增调两亿斤粮食，总理既然提出来，我们说什么也得支持。我回去再做做工作，统一一下认识，就是再勒紧一次裤带也是要给的。”

“我就知道老表的风格高！”总理高兴地笑了，说，“谢谢你，尚奎同志，我代表中央和人民谢谢你！”接着又

杯鸡、鲮鱼头、炒鳝丝以及庐山的名产“三石”：石鸡、石鱼、石耳等等。大家都感到非常高兴，说是几十年没尝到这些具有地道的江西风味的菜肴了。

从兴国菜谈到兴国，从兴国谈到中央苏区。这些领导人很多都在中央苏区工作过。小平同志担任过瑞金、会昌等地的中心县委书记；富春是江西省委书记、尚奎是省委宣传部长；江华曾是井冈山前委秘书，后来和红四军一道到达赣南……所以说说笑笑，话题很多，直到九点多钟才尽兴而散。

可是总理还没有来。

“你就在家里等着。”尚奎对我说，“总理一向重诺守信，说了来一定会来的，总是什么事情耽搁了。”说着，便陪小平、富春等同志出去了。

果然，没过半小时，总理就兴致勃勃地来了。

“水静，我迟到了。”总理笑嘻嘻地说。

“真对不起，总理，他们等你很久了。”我说，“听说毛主席找你，知道一下来不了，就先吃了起来。”

“好嘛，不用等。”他随和地说，“我答应了就会来的。”

“现在他们吃完都走了。”我继续表示自己的歉意，“尚奎也陪他们去了。”

“不要紧的。”他一边在桌边坐下来，一边又问道，“有剩菜吗？”

“剩菜怎么行呢，总理，我给你留了菜。”我说。

“那我就吃吧。”他说。

我立即收拾好桌子，摆上饭菜。

“有茅台吗，水静？”他问道。

“有。”我说着，便拿来一瓶茅台。

“还有吗？”他又问，“有就再拿一瓶来。”

我一边应着，一边把另一瓶茅台放到桌上。双眼直看着总理，不知他要两瓶茅台是什么意思。

“好了，水静。”他指指桌边说道，“来，你也吃一点。”

我说，“总理，我刚吃过了。”

“吃过了就随便吃一点嘛。”总理说。

我想，请客人吃饭，哪有让客人独酌独饮的道理？尚奎不在家，作为女主人，我理应作陪的。于是，我着人取来餐具，也坐了下来。

总理这才将一瓶茅台推到我的面前，说：“听说你会喝酒，今天我们俩一人一瓶，怎么样？”

我急忙说：“哎呀，总理，我哪能喝这么多呀！”

“喝吧，喝吧。”他说，能喝多少

回敬。

他对我说：他代表小超大姐敬我一杯，我当时一愣，呵，小超是总理对邓大姐的爱称。我一高兴，也代表尚奎敬他一杯……

“还有酒吗？”总理似乎酒兴正酣，“你还能喝吗？”

“酒是有的，不过我不能喝了。”我说，“我不嗜酒，今天喝得太多了。”

“如果你不喝，我也不喝了，吃点饭吧。”总理说，“不过，我今天算是知道你的酒量了。”

一九五六年七月，周总理在乌鲁木齐和各族青年同唱革命歌曲



就喝多少。”

总理很喜欢粉蒸菜，他说，在中央苏区时，常吃到这种菜，而以兴国的最具特色。于是他斟满一杯酒，对我说：“感谢你和尚奎为我准备了如此佳肴，干！”说着，一饮而尽。

我忙说：“都是些土产，总理太客气了。”也斟满一杯酒喝干了。接着我回敬了一杯，感谢总理的光临。我干，总理也痛快地干了。

“这次又在庐山开会，江西是东道主，尚奎和你都很辛苦。”过一会儿，总理又举杯说，“这一杯是为你们优质服务工作道谢的。”稍稍一仰脖便干了。

我没有理由不喝，而且也不能不

“什么酒量呀，总理？”我不解地问。

“我在北京就听说杨尚奎的夫人很能喝酒。”总理笑道，“你把我们的农业部长廖鲁言同志都灌醉了，对不对？”

“哎呀，总理，那可不能怪我。”我说，“不是我主动找他喝酒的。”

“廖鲁言同志是部长中最能喝酒的一个，竟然败在你的手下，说明你很不简单。”总理哈哈一笑说，“今天一试，果然名不虚传。一个女同志，一次能喝这么多酒，是不多见的。”

“真的，总理，我平时是不喝酒的。”我解释说，“刚才是总理让我喝，才不知不觉地喝了这么多。我已经



它的知名度有限。而总理却深知，茅台是国中第一佳釀，此后才名声大振，身价百倍。

“人怕出名猪怕壮”，酒出名了也一样，需要的多了，供不应求，竞争的也就多了，盯着那“酒皇”宝座的大有人在。全国第二次评酒时，五粮液跃居第一，茅台未能卫冕。总理刚从国外回来，便调来样品，亲自品尝，并肯定这是新酒，而不是老窖，不能代表茅台参赛。他还指出，茅台之美，不仅在于它的工艺独特，气候、水质更是不可替代的条件。所以他多次指示要保护好赤水河一带的自然环境，上游不得建设工厂，以确保水质的自然成份不受污染。今天茅台酒的地位以及它能继续保持良好的质量，是和总理的知识、远见和关切分不开的。

能喝酒，酒量再大，如果对祖国的传统酒文化一无了解，充其量不过是个酒徒。总理喝酒，才是真正的知酒，懂酒，才可称之为善饮。

他赠给魔术师一只手表，同时留给江西一个魔术团

江西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并不轻松，但和重灾区相比，我们的粮食状况的确要好些，所以被称之为“富农”。因为“病”势较轻，恢复起来也较快。到1961年秋，中央召开第二次庐山会议时，江西已渡过了最困难的阶段，经济已开始回升。而且江西省委具有全局观念，在自己最困难的三年里，每年仍调出10多亿斤粮食支援国家。作为全国当家人的总理，对这点是非常满意的。加之这次庐山会议主要是研究经济问题，进行得很顺利，当然令人高兴。所以全国经济形势趋向好转、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良好心境，乃是这次总理庐山豪饮、和随后来南昌痛饮的根本原因。

会议结束之后，9月17日，我和尚奎陪同总理从庐山出发，经观音桥、海会寺返回南昌。一路上边走边看，直到傍晚才下榻江西宾馆。早已下山的罗瑞卿夫妇、柯庆施和华东局的几位书记，也住在这里。当晚，省

委举行便宴，招待总理、总长和其他领导人。

尽管经过一天的跋涉，没有很好休息，总理的精神仍然极好，兴致极高。他说：“从八一起义到现在，已经整整34年了，早就想到南昌看看就是腾不出时间。这次给了我旧地重游的机会，我要住几天，好好看看这座城市的变化。”说着，举起酒杯道：“今天我很高兴，请大家多喝几杯。”

他率先干了杯，继而便开怀畅饮。大家见他情绪这么好，都一起来助兴。尚奎、刘俊秀也代表江西省委相继敬酒，他都痛快地一一干了。接着又为江西粮食丰收、晚稻增产而频频举杯。这样一杯又一杯，的确喝了

不少。行前受邓大姐委托，要好好照顾总理生活的罗瑞卿夫人郝治平有些慌了。“不得了了，水静！”她摇摇我的手，悄悄说道，“总理今晚太兴奋了，怕是要喝醉了。”

“这里是领导八一起义的地方，几十年没来，能不高兴吗？”我说。

“要劝他少喝一点就好。”她着急地说，“可又怎么好劝呢？”

“这个时候，是不好扫他的兴。”我口里这么说，心里却很踏实，因为他且饮且说，谈谈笑笑，话讲得很多，这正是酒醉的前兆。

然而，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总理虽有几分醉意，但并未过量，语言、神态和行动都没有失控现象。而且饭后还在罗瑞卿、柯庆施、尚奎和其他领导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观看了省委安排的杂技表演。

当时，担任这次演出任务的是上海星火魔术团。这个团在南昌演出多场，很受群众欢迎。有关部门向尚奎反映，江西没有魔术表演团体，要从头培养，花钱不说，还得很长时间。如果通过组织出面，把这个团留下来，那就太好了。尚奎早就同意这个想法，只是等待合适的时机。而今晚这个机会再好没有，柯庆施是华东局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总理又在，所以在看演出时，尚奎便当着总理的面，

醉了。”

“没有醉，没有醉，我看得出来。”总理说，“舞会还没有散，跳舞去吧？”

“总理你先走一步吧。”我摸摸额头说，“我有点头昏，休息一下再去。”

他笑了笑说：“好吧，我就先走了。”

我送他到门口，看他步子非常稳健，喝下这么多酒，一点事都没有。似乎再喝个半斤八两的，他也不在乎。如此海量，着实令人吃惊。

后来我才知道，总理不但能喝酒，而且很懂酒，对中国的酒文化，颇有研究。江西名产四特酒，就是在总理品尝后作了“清、香、醇、纯”高度评价之后，才蜚声海内的。人们都知道贵州茅台是国宴用酒，但很少有人知道国宴上茅台是1950年国庆节前总理亲自决定的。茅台虽然早已获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奖，但“墙内开花墙外香”，在国内却不过尔尔，50年代，每瓶不过2元多，和汾酒、竹叶青等属同一等级。1950年国庆节时，整个北京城没有一瓶茅台，可见

向柯庆施提出了这个要求。

“把这个团送给江西，就填补了我们的缺口。”尚奎说，“上海文艺团体很多，这类魔术团也不少，基础雄厚，培养起来也容易。”

见柯庆施没有吭声，总理便主动帮忙说话，“尚奎同志的要求是很合理的。上海应该支援江西嘛！大方一点，划给他们吧。”

柯庆施只是笑笑，仍没有表态。

总理和尚奎两人一唱一和，边开玩笑边说服，最后柯庆施才笑着说：“待会儿我和他们团长谈谈，如果他们同意，那就留给江西。”

演出效果不错，总理几乎为每一个节目鼓掌。当“表箱通表”节目开始，魔术师一出场便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请台下哪位观众，借一块表给我。”魔术师伸出右手，向观众深深一躬。

“我这块表借给你！”总理立即站了起来，满面春风地扬起了自己的手表。

卫士将手表送上舞台，魔术师接过表，向总理鞠躬致谢，台下掌声雷动。

当时，这是个很精彩的节目，大家看得目瞪口呆。总理也很喜欢。表演结束，魔术师将手表还给总理的时候，总理右手朝前一挥说：“这块表就送给你了！”

又是热烈响亮的掌声，此起彼伏。

“糟了，糟了，总理真的有些醉了。”郝治平又轻声对我说，“一块表倒不要紧，只是总理还要到外地去，目前不回北京，手上没有表怎么行呢？”

“没事！总理清醒得很，不过很兴奋就是了。”我说，“表的事好办，难得的是总理这么高兴。”

晚会終了，总理便去看望演员，和他们亲切地交谈，询问他们来了多久，生活是否习惯等等。

“你们说江西好不好呀？”总理又问。

“好，很好……”演员们大声回答说。

“是的，江西是好。”总理说道，“江西是毛主席亲手创建的革命根据地，江西人民是英雄的人民，对革命贡献很大……”

大家静静地听着总理说话，显得非常激动。他们也谈到江西的观众非常热情，江西有关部门对他们工作和生活的安排也十分周到。

“那么，你们就留在江西，做江西老表好不好？”总理问道。

“好！”

这个团随即通过正式手续，整团

调到江西，又并入了南昌市的一个小杂技团，成为“江西省魔术杂技团”，后来又改称“江西省杂技团”，在江西生根、开花、结果了。他们不忘总理的教诲，勤学苦练，技术精湛，演出认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从1986年开始，他们先后到非洲、南亚、西欧的十几个国家访问演出，而且非常成功。每当看到他们的节目获奖，或者从国外载誉归来，我的眼前就会出现总理亲切的身影，听到他那熟悉的声音：

“这块表就送给你了”……

到他家里作客，才知道他常吃剩饭剩菜

1964年初夏，尚奎到北京打肝蛭虫的一个多月里，总理两次请尚奎和我到他家吃饭。

我和尚奎是取道上海去北京的。在上海，恰好遇到了罗瑞卿夫妇，罗总长热情地邀请我们搭乘他的“伊尔



——18”专机进京，我们当然从命了。一到南苑机场，就看到了受总理之托来接罗总长的邓颖超大姐。我们很高兴地问候了邓大姐，邓大姐也询问了尚奎的身体，并且记下了我们在京的住址。

过了几天，尚奎刚住进北京友谊医院，我就接到总理家中打来的电话，说总理和邓大姐明晚请我到他们家吃饭，要我届时在住处等候。

次日傍晚，我便乘邓大姐派来的车，到达总理在钓鱼台的临时寓所。这时，广东省省长陈郁同志已经在座。

邓大姐笑嘻嘻地接待了我，又问了一下尚奎的治疗情况，然后便陪我们聊起天来。她告诉我们，因为中南海的西华厅正在修缮，所以暂时在这里住一段时间，待房子一修好就搬回去。

“总理听说你们到了北京，就让我安排一下，请你们吃餐便饭。”邓大姐一边招呼我们喝茶，一边说道。

我们对总理和邓大姐的邀请，表示了谢意。

“你们就别客气了，实际上没有什么好东西请你们的。”邓大姐笑道，“昨天宋庆龄同志从上海托人捎来几条鲥鱼，挺新鲜的。恩来说，‘鲥鱼就是吃个鲜嘛，快把陈郁和水静找来’……”

我说，宋庆龄同志是送给总理和邓大姐吃的，没想到被我们赶上了，我们的口福真不错呀！

“在北京吃新鲜鲥鱼的确不容易。”大姐说，“可是在你们南方，特别是长江边上，那就不稀罕了。”

我们边聊边等，过了很久，仍不见总理回来。邓大姐说：“上午恩来还在家，下午是毛主席把他找去了。”一直到了八点多钟，邓大姐说：“算了，不用等了，我们先吃吧。”

几道菜之后，鲥鱼也上桌了。我忽然想到总理，便对邓大姐说：“大姐，给总理留了菜吗？”

“不用留。”邓大姐笑道，“我们吃剩的，厨师会给他留下。”

我觉得很不好意思，也很不理解，怎么能让总理吃我们的剩菜？

邓大姐可能发现了我的疑问，便解释说：“水静，你不知道，恩来有一副天生的好肠胃。他经常不能按时吃饭，也不要我给他留菜，他说：‘剩下的菜热一热就行了’。”

这哪里是他肠胃好，这是他的品德高！做的是领袖的工作，却又像老百姓一样勤俭过日子。

快到10点钟，我们吃完很久了，总理才从毛主席那里回来。他匆匆吃过饭，就到客厅陪我们说话。他和陈郁同志谈了几句之后，就对我说，今天有事耽误了，没有和我一起喝酒，说下一回一定陪我喝。又问我：“你是安徽人，有没有到过黄山？”我说：“一直没有机会去。”他便开玩笑说：“没有到过黄山呐，那你算不得是安徽人。”直到我们告辞时，总理和邓大姐还一再要我代他们向尚奎问好。

尚奎出院后，也住进北京饭店。没多久，我便接到总理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说是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两家邀请尚奎和我吃饭。我们如约来到总理住处，总理、邓大姐、陈老总和张茜同志都在。在吃饭前，张茜提议，我们一起去钓鱼台园中散步，回来再吃饭。邓大姐和张茜还边走边向我介绍这里的建筑特点和园林布局。总理、陈老总则和尚奎谈论江西情况，偶尔还扭转头来和我开几句玩笑。

吃饭的时候，总理没忘记和我斗酒。

因为陈老总在座，谈笑风生，妙语如珠，总理也非常高兴。小小的聚会，显得热闹非凡。

有了他的暗中保护，我们才渡过了那场浩劫

“文革”开始后，我就没有见到过周总理了，但是，如果没有总理的关心和照顾，尚奎和我真不知道如何渡过那场浩劫。

1967年初，继所谓“一月风暴”之后，造反派夺了省委的权，并且贴出海报：定于2月21日在人民广场揪

斗刘俊秀。届时尚奎和省委其他书记都得“陪斗”。谁都知道，这种揪斗通常就是武斗，最“文明”的造反派也得搞搞“喷气式”，否则便缺乏“革命性”。这对于年过花甲的老人来说，乃是一种不堪忍受的折磨。我非常担心，不知如何是好。

正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候，即2月18日，总理办公室来了电话，传达了总理指示：限令江西造反派在二十日前负责将杨尚奎、刘俊秀安全送到北京。造反派开始不相信；打电话到总理办公厅核实之后，又讨价还价，要求推迟几天再送去。回答则明确而干脆：按时送来，不得推迟。他们这才无计可施，立即派出2人，于2月19日乘飞机将杨、刘两书记“押送”北京。一到北京机场，已在那里等候的总理办公厅的同志，立即将杨、刘二书记扶上轿车，并对这两个造反派说：“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可以回去了。”接着，小车一发动，便扬长而去。

当时我就想到，这一定是周总理将他们保护起来的，因为总理了解他们，知道他们是几十年来为革命忠心耿耿、出生入死的一代革命忠良，为社会主义建设呕心沥血、废寝忘食的好党员、好干部。后来我才知道，总理当时不顾自身的安危，保护了一大批省委主要领导以及党政军负责干部和党外知名人士。他在“文革”中，遭受了多少磨难、压力、诽谤、甚至攻击和污蔑呀。“四人帮”一开始就把矛头对着敬爱的周总理。而总理迎着狂风巨浪，毫不畏惧，坚韧不拔，运用着自己的智慧、才能、威望，方寸丝毫不乱地对付着这一伙发了疯的野心家。不知熬过了多少艰难苦涩的日日夜夜，终于积劳成疾，身患绝症，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实际上总理是将自己的生命送给了一切被保护的同志，送给了他苦心孤诣所维护的浩劫中的祖国和这个国家里的每一个善良的人。

尚奎被总理接走之后，解除了我心里一个最大的负担。但我自己就惨了，没完没了地挨批斗，无休无止地

写“交代”，一些人似乎把尚奎“该受”的那份灾难，加倍地压在我的头上。我咬紧牙关，坚强地活着。我必须在受批挨斗、“检查”、“交代”之余，照顾好尚奎的父母和自己的父母一共4位老人，给他们以安慰，为他们治病痛，使他们健康长寿；我必须抚育好一大堆未成年的孩子，使他们在这个混乱不堪、无教育可言的年头里，受到良好的教育，能够健康地成长，不致于被社会上那种腥风恶浪吹上岐途。否则，我将来如何向尚奎交待呢？

磨难似乎没有尽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朋友们为我担心，怕我承受不了这多方面的重压。有时我也怀疑自己，能不能支持到明天。我常常觉得自己的牙根似乎咬碎了，全身的骨架经络，就像暴风雨中的小屋的梁柱，摇摇晃晃，吱嘎作响，随时都可能倒下来。次日起来，我又觉得这一天可以支撑下去。在我实在无力站起来的时候，我便想给总理写一封信，告诉他这一切。但我最终没有写，因为我认为总理是了解情况的，所以才把尚奎接到北京；同时这也是明确地告诉我：“水静同志，尚奎很好，你可要坚持下去呀！”

于是我又有了坚持的勇气，有了坚持的信心。

和尚奎分开两三年了，1969年9月，当时的省革委突然通知我说：“中央办公厅来过电话，让你到北京探望杨尚奎。”这意味着，尚奎没事了，我也“解放”了。我喜出望外，稍作收拾，便匆匆忙忙地赶到北京。我想，这肯定又是总理的安排。

我被接到中央办公厅招待所，尚奎和许多被保护起来的老干部都住在这里。可是尚奎不在，他到北京新华印刷厂体验生活去了。蓦地卸去重压，突如其来的兴奋，使我一住下来便病倒在床。招待所的同志见我病情严重，立即将我送到部队的301医院。我全身瘫软，疲惫无力，连说话的劲儿都没了。我知道，这几年来，我的心力和体力都消耗殆尽，全靠一点

精神勉强支撑。现在，我把四位老人、五个小孩如数地、健康地、端端正正地交给了尚奎，任务完成了，我累了，累极了。趁我头脑还能思索、手脚还能动弹的时候，我要给总理写封信，把尚奎和我以及一家老小的近况告诉他，向他表示我的深深的谢意。我写了，写得很吃力。

没过两天，一位陌生的同志来找我。

“你就是水静同志吗？”他问。

“是的。”我带着几分怀疑地回答说：“你是……”

“我是周总理的联络员。”他自我介绍说，“总理委托我来看看你。”

我从病床上陡然坐起，也不知哪里来的这股劲。“啊！谢谢你呀，同志。”我精神也好了许多，兴奋地说，“总理和大姐好吗？”

“很好，但总理特别忙。”他说，“总理看了你的信，实在抽不出时间，所以特地派我来一趟，要你不要着急，好好养病，同时叫我交代医院领导，替你全面检查一下身体，认真地给你治疗。你放心，我已经向院领导传达了总理的指示……”

我哽咽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觉得泪水夺眶而出。我从小参加新四军，生活在革命大家庭里，并且受到这个大家庭的宠爱。“文革”一来，使我生活急转直下，变成了一个无人理睬的孤儿，一个被遭白眼的路人。我像独自驾着一叶扁舟，载着一船老小，在苦海里漂流，任风浪捶打。大海没有边际，苦难没有尽头。现在，突然看到绿色的大地了，听到亲人的呼唤了，我怎么能抑制住自己的感情呢？

在总理的关怀下，一个多月之后，我便病愈出院了。

他回归了大自然，但还领导一次声势浩大的运动

1976年4月5日，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清明节。这天上午，我和尚奎不顾被“四人帮”进一步迫害的危险，坐着小车，缓缓地行驶在天

安门广场，参加了首都数十万人民悼念周总理的活动。

实际上，这也是一次对“四人帮”的声势浩大的示威。

总理逝世的时候，我们都在南昌。当尚奎听到总理去世的噩耗时，正在穿的衣服滑落在地，呆了半天没有说话，泪水纵横于脸；我则悲痛得哭出声来。

随即，被“四人帮”控制的中央发来电报：不准各地设周总理的灵堂，不准各地召开追悼会。从组织原则上说，这个电报通知还是应该执行的。尚奎整日闷闷不乐，踱来踱去。最后他拿起了电话，找到当时主持省委工作的负责人，说：“既然不能在南昌设总理灵堂，又不让我们去北京，我到八一纪念馆去看看总可以吧？”那位负责人说：“杨老，你最好不要去，你是省委主要领导人之一，免得人家说你执行中央指示。”尚奎没法，气得整日铁青着脸。我只好忍着悲痛，极力劝慰。第二天，他把我叫到身边说：“水静，听说群众自发地为周总理设了好几处灵堂。我的行动不得自由，你可以不受约束。你代我悼念、去奠祭周总理。”

于是我带着几个孩子，还有尚奎身边的工作人员，开了一辆吉普车，先后到了八一纪念馆，工人文化宫和其它三处总理灵堂。灵堂都布置得庄严肃穆，人们心情沉重，悲痛哀伤，有的流泪，有的抽泣，有的失声痛哭。我的泪水扑扑而下，我为自己，也为尚奎，默默地献上一瓣心香，还有不尽的思念……

在那段日子里，我对于周总理的去世，特别伤心悲痛，又不敢在尚奎面前吐露，免得使他更伤心，只能暗暗地哭泣。我们的党、国家、人民怎么能失去总理呢？他是党和国家的顶梁柱哇！我想得很多很多，又无处说去，总是闷在心里，我的心脏哪能承受得了，以致2月上旬，我的心脏病突发，严重心律失常、心绞痛。一次使我失去了知觉，休克了，虽然经医生抢救过来，但从此我便带上了冠心

本·刊·稿·约

本刊用稿总体要求强调：思想性、知识性、可读性；既不自命高雅，又不迎合低俗，更不冷面说教。征稿内容及主要栏目如下：

“古今谈”及“访谈录”，对于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精神等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的探讨、议论及有关名人、专家的谈话、专访。

“英杰谱”及“颗星篇”，颂扬记述我国历代特别是现代杰出人物和英雄烈士的功勋业绩、品德风范与艰苦历程。

“春秋笔”及“古镜台”，对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寻踪述迹，力求有新的史实发现和更为真实、具体。

“赤子心”及“同根结”，反映海外华人华侨与台、港、澳同胞的生活情怀与人物、事件。

“时代风”和“人海浪”，当代新人新事和凡人轶事，知名人物和普通群众均可，写他们的闪光一页及其喜怒哀乐。

“争鸣录”和“群言堂”，关于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议论、讨论和争论，对某些事件、人物和观点、作品的评价、批评与反驳。

“神州光”和“九州景”，古今各地的文化创造、建设成果、文物古迹、革命遗址、奇景风貌等的生动描述。

“他山石”和“天下事”，国际人物及事件与文化信息的及时介绍。

“文荟园”与“多味豆”，专题性的文摘页与补白性的格言、语丝、幽默及小资料、小掌故等等。

视需要加“本刊特稿”和“编读往来”专栏。但如有佳作可不受此限，热点力作可另设新栏。

作品内容文责自负，但要求言之有理、有据和有文采，有不同见解，可以争论及批评、反批评，但要求实事求是、与人为善。

作品形式主要有纪实文学、报告文学、传记故事、回忆录、专访、散文、杂文、短论及与本刊内容有关的诗歌、说唱、摄影及美术作品等。

作品篇幅力求精练短小，但重要作品不限。

一般稿件及复写、复印、打印和印刷稿稿，恕不退还。作品发表后即付稿酬。如三个月内无选用通知，可自行处理。请勿一稿两投，如蒙转载，请注明转自本刊并通知本刊，并按规定付酬。

病的帽子至今。那时我才48岁呀！不久，尚奎在忧伤中也病倒了。当中央批准他前去北京治病时，我便同去北京，他住进北京医院，我则到阜外医院治疗。这已是1976年的2月中旬了。我先尚奎而出院，住京西宾馆，但每天都要乘车到医院陪陪他。清明前两天，我看到天安门广场的人越来越密，花圈越来越多。有人告诉我，北京人民要在清明节这一天组织一次大规模的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尚奎时，他立即说：“我没有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明天就参加这个大追悼会吧。”我说：“我也是这个意思。你向医生请个假，就说这里的水不热，想回京西宾馆洗个澡。”

当时“四人帮”极力阻挠和破坏这次活动，但群众都嗤之以鼻，我们也不予理睬。4月5日上午9点多钟，我和尚奎就到了天安门广场。尽管天气很冷，还飘着小雪，但广场上已是沸沸扬扬的一片人海，和一座座小山般的花圈。尚奎几次提出要下车，要和群众一

起参加悼念。我考虑他已经年逾古稀，病又没有好，身体又很虚弱，如何经得起人流的冲撞？一旦卷入群众当中，三两个小时是出不来的，他不可能在拥挤中坚持这么久。我极力劝慰他，要量力而行，心意到了就可以了，总理有知，也会高兴的。同时请司机把车慢慢开，让尚奎看得清楚些。

我们看到，许多工人、学生、干部在发表悼念周总理、诅咒“四人帮”的演说，在他们的周围，都分别围着大片大片热情的听众。半导体扩音喇叭的声音，时起时伏的掌声，不断地传进车内。以花圈为先导的人潮，继续拥进广场，各色各样花圈，从人民英雄纪念碑直摆到长安街大道的边上。花圈上还贴有许多诗词，有的在抄写，有的在朗诵，我看到朗诵者和听众的泪花，在寒风中闪烁。我和尚奎都无声地哭了，被人民群众的真挚的感情和恢宏的力量感动得哭了，被总理的崇高的品德和伟大的精神激励得哭了。总理活着的时候，特别是10年浩劫中，是正义的

象征；他不在了，仍然是人民团结起来以正义反对邪恶的思想凝聚剂。他还在领导人民为真理而斗争，他和人民在一起，敲响了“四人帮”倒台的丧钟。

回来之后，几位朋友听说我们在天安门广场转了很久，都为我们捏了一把汗。因为他们得到可靠消息，说是有人下令：从上午8时开始，凡是经过天安门的车辆，都有人监视并且登记了车牌号码。因此，尚奎坐的车肯定被登记了。当“四人帮”镇压了“四·五”运动并把它打成反革命事件之后，朋友们的担心更甚了。尚奎却毫不在乎，说：“登记就登记吧，纪念周总理就是反革命？笑话，没有什么可怕的，不怕！”

他不怕，就使我更不怕了。我当时想，如果还有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我还要参加！“四人帮”总不能把全中国人民都镇压了吧？！人们心中的悼念你镇压得了吗？

（选自作者回忆录《大人物的隐秘世界》）

中共“一大”珍闻

中共“一大”会址的选定

党的“一大”会址是由李达夫人王会悟选定的。当时李达要她安排会址和代表住处，她找到比较熟悉的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壮，说要借空教室开个“学术讨论会”。又买了苇席，铺在楼下的教室里。毛泽东、何叔衡、陈潭秋、邓恩铭、王尽美等代表抵沪后，就住在那里。王会悟又借到李书城的空房子，党的“一大”就是在贝勒路树德里30号李书城家中召开的。

后来“一大”被法国巡捕觉察，在上海已不能开会了。到哪儿把会开完呢？代表们意见不一。王会悟想起她家乡嘉兴的南湖，建议在那里包一个画舫，在湖中开会。李达与代表们商量同意后，遂分头乘车去嘉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我党“一大”在游艇上开了一天，就胜利结束了。

（摘自《革命史资料》第1辑）

中共“一大”会址的确认

解放初，上海市委经过艰苦认真的查证，终于初步弄清了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也就是后来的“恒昌福面坊”——望志路（兴业路）106、108号，便是中共“一大”会址。

1952年5月22日，中共上海市委在核实这个面坊确是“一大”会址后，对此进行了初步修缮，并在《解放日报》披露了这个消息，1954年3月，曾出席中共“一大”的包惠僧与李书城夫人、当年望志路106号的女主人薛文淑一起来到上海。他们详细回忆当年的情景，使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布置接近于原貌。薛文淑指出会议是在楼下召开的，而李达曾说是在楼上开的。不过薛文淑没有出席会议，而李达是“一大”代表，因而人们仍遵从李达的意见。把会议室布置在楼上。1956年春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来到兴业路作了裁决。他说：“当年开会不在楼上，而是在楼下。”董必武说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当时不似现在，人家有女眷，我们怎

么好走到楼上去开会呢？何况那时我们的会议还有外国人参加。”董老的话，一锤定音。从此，那长方桌从楼上搬到楼下，完全恢复了历史原貌。

（摘自《八小时以外》）

李大钊为何未出席

中共“一大”？

郑天贵的《李大钊陈独秀未参加党的“一大”之原因》（载《党史纵横》1990年第4期）一文，认为李陈未参加党的一大原因有三：忙于公务，无法分身；一大不可能在北京、广州召开；一大也不能改期召开。路海江、林修敏撰文认为，郑文提出的理由值得商榷。李大钊没有出席中共一大，有其不可忽视的主观原因。其一，李大钊平时就不愿意直接参加党的会议，对不出席中共一大恐怕也是如此。其二，作为建立全国统一的党组织的中共一大，当时没有引起李大钊的足够重视，这是根本原因。不能因为李大钊对中国革命有巨大的贡献，而对此问题进行回避，或只强调客观的原因，而不从主观方面进行研究。

（摘自《党史纵横》第1期）

汗奸陈公博与中共“一大”

中共“一大”文献在美国发现，引起世人重视。而更令人关注的是这个文献与陈公博的关系。

陈公博，稍知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此人乃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大汉奸，在汪伪政府中担任过“立法院长”、“上海市市长”要职。在汪精卫死后，他起而代之，任伪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正是此人1924年在美国写出了《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论文。

陈公博在回忆录《寒风集》中说：“我不是想自己保守秘密，我曾参加过共产党，并且是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是公开的事情。”陈公博在《我与共产党》一文中详细记载了他参加中共一大的经过：一连四日都在李汉俊的贝勒路家中开会。中共

一大曾就纲领和决议案进行激烈的争论。应否发出，授权新任的书记决定。我回广东之后，向仲甫先生（仲甫即陈独秀，当时在广州，未出席中共“一大”，但被选为“书记”痛陈利害，才决定不发。

这清楚地表明，中共“一大”的纲领和决议是由陈公博带到广州的。由于陈独秀“决定不发”，使中共“一大”文献没有发表。正因为此，以后多年找不到中共“一大”文献。

陈公博在《我与共产党》一文中还写及：“在民国12年（即1923年）2月12日我随美国总统号赴美。

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史教授韦慕庭认为，陈公博既然是中共“一大”代表，那么他在1924年写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也就合情合理了。

（摘自《文汇报》）

中共“一大”文献的发现

中共“一大”曾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这是中国共产党极端珍贵、重要的历史文献。遗憾的是，这两篇文献当时只有手抄稿，并没有正式发表过。1990年，在美国纽约意外地发现了这份珍贵文献。

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史教授韦慕庭，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颇有研究，他从朋友那里得知，哥伦比亚图书馆在整理资料室时，从尘封已久的故纸堆里，发现一篇1924年1月该校的硕士论文。论文是用英文打字机打印。而论文的题目令人注意——《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韦慕庭在他细读完《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之后，认为这篇论文倘若不掺杂虚假的话，将是一个重大发现，特别是论文的附录收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案，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宣言、决议案、章程和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言。这六篇附录中，多是散失数年、连中国共产党自己也未曾找到的重要历史文献。

（摘自《文汇报》）

罗瑞卿入党轶话

点点



△作者和她的父亲

历史的风云已经飘移了半个世纪。但是关于一个热血青年在寻找信仰的道路上走过的一段艰难困苦的道路，关于这个近乎悲壮的故事对很多人来说也许还是新鲜的。为证明其真实，我将较多地引用父亲自传中的一些材料。

在成都我考上了高等蚕桑学校。钱花光了，我写信向家里要学费。外公认为我是“忤逆不孝”，怎么也不肯给，所以，我考上学校并未入学。恰在此时，得知国民革命军打到武汉，黄埔军校要到重庆招生。我当时想：国家这么乱糟糟的，学蚕桑也未必能够救国。闹闹学潮，写写传单，发发宣言不顶用的，就决心去重庆报考黄埔，

彻底与我的那个家庭决裂。但是没有钱，还不了寄宿舍的饭费，亦没有路费，还是走不动。于是，我就在一位同学的劝说下，佯装愿意回乡去，要外公寄路费来。外公相信了我的话，兑了二十元钱来。我还了饭费就同一位姓郑的，还有一位姓张的同学跑到了重庆。

到重庆后，首先碰到南充中学时的好朋友任煜、王义林。住在他们就读的中法大学。在那里认识了任伯芳，同时知道了任煜、任伯芳、任启慎（又名任济民）都是共产党员。王义林还告诉我，南充有共产党组织时，他们就都是党员。在重庆还见到了在南充当过我的教师的任子勤，听到刘伯承、杨闇公（当时是四川党的负责

人）的演说。

投考学校时，我同任伯芳都被录取。原先同行的郑、张二人却没有考上。我们乘学校招生机构包的轮船东下武汉。那个姓郑的也与我们同行，以后，他考上了唐生智的军官学校——亦称长沙分校。1933年中央苏区反第四次“围剿”时，他是国民党五十二师的一个连长，该师被我们全歼后，他被我军俘虏。找到我后，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我还买了一只老母鸡款待了他。后来他被送往瑞金，经教育释放，临走时还曾写一信给我，表示感谢。可他一回到南充，即到处活动，逢人便说“罗瑞卿在共产党里当头子……”并以此到我家去进行敲诈。这是我妹妹和我那个女孩子到延安后告诉我的。

1926年底，我们到了武昌，见到了过去的教师李鸣珂，此人也是共产党员。因学校还要复试，他曾约叶楠、叶德生在旅馆为我们几个南充人和他的同乡南乡人补习了功课。复试时，又有不少人落选，我同任伯芳仍被录取。

入学后，我编在第一大队第二队，任伯芳编在第一大队第四队。我那个队的队长姓王。区队长叫廖岭奇，学校名叫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驻在武昌的两湖书院。

在学校过的是很严格的军事生活，训练很紧张，很严格。冬天手和脚都冻坏了。出操时前面有泥水，教官不喊停步，大家就都走到泥水中去。

我在军校，除了任伯芳等几个同乡，我那个队上没有我原先认识的人，也没有交上什么比较好的新朋友。陈伯钧、张赤男、周高潮都是以后到红军见面谈起才知道的。虽然我同他们同队，但是当时并不相识。张是红军第四军的师政治委员，1932年在江西作战牺牲。周当过彭德怀的秘书，后来在江西打AB团时下落不明了。

在学校的教职员中，我唯一的熟人就是李鸣珂。但很少见到，他可能在学校的政治部工作。记得打夏斗寅前，曾见过他，他给我们几个学生讲：

“打仗不要怕死，枪子打死不仅光荣，且比什么死都痛快，扎个眼就过去了。”说得我们都笑了。

在军校我曾想加入党的组织，但苦于不得其门。我向任伯芳提过。四川“三·三一”惨案后，王义林到了武汉，我在汉口见到他，也向他提过。他们对我说的大意都是：只要我好好努力进步，党是不会对我关门的。

蒋介石猝然地发动反革命政变。“四·一二”后，当时学校的教育长张治中不辞而别。校长是邓演达，党代表恽代英，政治部主任施复亮。

马日事变后，当时的武汉政府的军队正在北伐，敌人夏斗寅、杨森率领反革命军队乘虚向武汉进攻。我们学校同毛主席当时在武汉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编为中央警卫师。师长是侯连斌，出发打夏斗寅，归叶挺指挥。

在武昌以南纸坊、土地堂地区打第一仗，敌人被击溃。第一仗后，我即被调到团部当传令兵。团长蓝腾蛟。

部队回师武汉后，反动形势已经表面化。部队拖出去“打野战”，天气酷热，学生患病者甚多。听说要开到鄂城去会叶挺，可又没有去，又开回武昌，驻在南湖。其所以未去会叶挺，当然是机会主义的缘故。此时武汉反动空气更浓了，谣传也更多了。此时学生中很多人纷纷离队，任伯芳没有告诉我就走了。

我们队上很多人，如我们班的班长、副班长、队长、区队长廖岭奇、见习官柳献尤等等都走了。

此后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即张发奎的教导师。我被编在第二连，当副班长。叶毓是连长，听说也是支部书记。部队改编后，每人发一支三八式破枪，五发子弹。很快即由武昌坐小火轮拖的木船出发，名为东征讨蒋。

出发后不久，有一个叫陈刚乘的到我的船上，同我谈了一次话，他说：“此次东征，是蒋、唐（生智）两大军阀间的军阀混战，我们为此牺牲不值得。有机会时可以离队。”此人大约也

是共产党员。

船到黄石港后，我们听到了南昌八一起义的消息，部队停下来。听说党委曾讨论行动方针。可是由于机会主义和反动分子的影响，我们没有能够像武昌警卫团一样，去找八一起义的部队，而是打电报给张发奎，问部队可否继续开去九江。张当然同意开去，于是部队向九江开去。八月初某晚，船到九江，部队一上岸即被第二次缴枪。先把枪架在马路上，等了很久，又命令大家把枪背到一个据说是总指挥部指定的地方。

缴枪后，全部人员被关在一个医院的草坪上，电灯都没有。黑暗里张发奎跑来训话，他说：南昌方面如何对不起他，消灭了他的部队，并称学生中的“CP”、“CY”分子可以站出来，他可以负责送他们到南昌去，决不加害于他们等等。

此时，学生中笼罩着一片悲观、低沉、惶惶无主的情绪，也没有人来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办。于是，又有许多人纷纷离队。

当时，我的脚上生了疮，又开始发烧、拉肚，接连两次缴枪，当然也有些悲观失望，身边的人都不熟悉，又加上陈刚乘在船离武汉时给我说的那些话。我便也决心离队。我打算回四川去找任煜、王义林等人。因为我是知道任煜等人的共产党员的身分的。

在等船的夏船上，我遇上了四川同乡，也是黄埔学生的冯开琼，我们两人便同船回到了武昌。

到武昌后，我们住在四川会馆背后的一个小旅馆里，很快，我的病大发作，躺倒了。

当时我们没有什么钱了。因我的病越来越严重，冯开琼陪我到武昌昙花林一个叫做仁济医院的教会医院去看病。医生检查了说是肠热病，中医又叫伤寒，要住院，要隔离，还要吃流质。但住院要交两个月的住院费和伙食费。我们把仅剩下的钱全部给了他，又说了许多好话，说我们是四川人，家里兑了钱来就交上。这样，才勉强把我收下了。



△罗瑞夫妇

在医院大约住了一个月。开始时冯开琮还去看我，因交不出费，稍后他也不敢来了。当时我的眼也害模糊了，耳朵也听不清了。热未退，神志还不清醒，医院就把我硬赶出来。我走不得路。医院叫了一辆黄包车把我拖回那家小旅馆。旅馆老板看到我快死的样子，无论如何也不肯收，黄包车又把我拖回医院。那个医院的院长就要车夫把我拖到四川会馆，放在一间又黑又潮湿的小房内，连床也没有，只在地上放一块板子。头下枕着我从军校带出来的一条棉被。

在会馆里呆了多久我不大清楚。那时候对时间的概念已经不太明确了。稍微清醒的时候就想想自己的事情：举目无亲，又无友，大病缠身，还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我躺在这间黑屋子里。看看四肢，只剩下皮包骨。陷在这样艰难的环境里，我自以为绝没有活的可能，曾想自杀以结束痛苦，但是当时却连动一动的力气也没有了。

这一次，父亲能够活下来，实在是一个奇迹。多少年后，父亲提起当年的这一段经历，仍然惊叹不已。

黄包车夫因为怕四川会馆的人不收像父亲这样一个快死的人，实际上是悄悄地把父亲丢在那间黑屋子里的。本来，父亲不病死也得饿死。幸好，四川会馆里一位姓熊的龛师（父亲说，龛师就是管理房子的人）偶然发现了。总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吧，不忍看着一条生命白白送掉，这位熊师傅就在每天自己吃饭的时候端来一碗稀薄的米粥给父亲。

正是这起码的生存条件，有意无意地对父亲那可怕的伤寒病起了作用。又冷又潮的地面，即使高热也不致损坏父亲的神志。稀薄的米粥使得被细菌侵袭的胃肠道得到了休息和恢复。出乎自己也出乎别人的意料，父亲竟然一天一天地好起来了。

逃脱了死神的魔爪，恍若隔世。大病初愈的父亲怀着抑制不住的温情给他的外公和父亲写了一封信，向他们讲述了自己死里逃生的经过，并请他们寄点钱来，渡过眼前的难关。回信

很快就到了，信的内容却使父亲大吃一惊。回信除大骂了一通“忤逆不孝”之外。还讽刺父亲说：你都是堂堂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学生了，还要这个家接济？父亲没有想到家庭会对他这样冷酷，竟还不如萍水相逢的熊师傅。如果当时的家庭能够给父亲一点起码的温暖，也许父亲追求革命的道路还会曲折一些、漫长一些。正是他们绝情绝义的态度，使父亲生发了“宁做千秋鬼雄亦死不还家”的信念。

我当时十分气愤，也针锋相对地回一信，表示：“我虽在外冻死饿死，也绝不再求救于若是之家庭也。”

武汉的白色恐怖，特别是桂系军阀占领武汉后便更加严重。四川会馆里经常有人被捉。当时反革命的口号是“宁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还有一种说法是：“凡是四川人都是共产党。”

反动派杀共产党杀红了眼。父亲呢，找共产党急红了眼。可是，到哪里去找啊？街上那些一串串一队队捆了去杀头的人是共产党，可是活着的共产党在哪里？为了不让敌人捉去杀，为了在白色恐怖过后继续和反动派斗争，他们都躲起来，藏起来。这可急坏了父亲，难坏了父亲。在四川会馆里，他苦等着、死守着，尽管那里天天都在搜查，尽管自己随时可能被当做共产党杀掉。他虽然知道并非所有的四川人都是共产党，但是他知道四川籍的闹革命的人确实是多。无论如何，他非要找到共产党不可，就算是早上找到了共产党，晚上被捉去杀头，也心甘情愿。

“朝闻夕死”这句极而言之话，却是父亲当时急迫心情的真实写照。

1927年，大约是十月份的样子，任启愤从上海或是广州来到了武昌。他到四川会馆来住，我们两人碰上了，他是我南充中学的同学，在四川会馆我们同住一间房，他有个汽炉子，我们一同做饭吃。

任启愤带有当时武汉党的关系。

他是知道我的倾向和为人的。我同他一起到汉口去接两次或三次头。他把我介绍给党的关系的接头人。记得这位接头人曾经说过：湖北边界处有一个一百多人的党领导的游击队，有交通时就送我去那里。还说，如果自己能够找到社会关系立脚也是可以的。以后，因为白色恐怖严重，关系又断了。

武汉实在难以立脚，像我们这样无职业的年轻学生模样的人实在太引人注目。这时候，任启愤就建议我们一起离开武汉到湘西常德去，因为当时我们得知秦汉山（原驻南充小军阀何光烈的一个旅长，参加顺（庆）泸（州）兵暴后，已将该部拖出四川，被军阀鲁涤平收编后驻在常德。任启愤与秦汉山有旧，可以到那里谋点事情暂时存身。大约在1927年12月底到1928年1月初，我们将走未走之际，一天晚饭后，我们两人外出散步，天黑了，我们回会馆，走到街口见一国民党兵持枪坐在凳子上。他将我们拦住，问我们哪里去。我们说回四川会馆。兵问：四川会馆出了事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们回说不知道。兵说：还不快走开。我们就又在附近转悠，直到国民党军队撤走后我们才回去。

熊龛师见着我们，惊恐地说：刚才大搜查，你们不在，你们的房子他们以为是我住的，才没有搜（我们的房子在龛师住房对面，很近）。你们应该马上走。欠我的伙食费，你（指我）有良心以后兑给我，没有良心也就算了……

听了龛师的话，我们立即坐了两辆黄包车到汉阳门买了船票，上了小火轮。第二天早上船开以前，又听说国民党兵把四川会馆围起来搜查，还捉了人。

我们就这样离开了武昌。

四川会馆的熊龛师连他自己家有五口人，大女儿好象在外面帮人做工，二儿子刚上学，还有一个老婆及一个幼儿。全国解放以后，我曾托武汉公安局打听却没有打听出来。解放初期我到武汉，也到原来的四川会馆旧

址看过，完全变了样子，已经不是什么会馆，而是居民区了。

到常德后，秦汉山给任启愤派了事情做。对于我，则表示没有名额，爱莫能助。于是我又被困常德，进退不得，时间大约一个月左右。

不久，我得知军校的老同学任伯芳在常德附近澧州的一个被军阀鲁涤平收编的中队里当参谋，便写信去问他能否帮我落脚。他回信告我：该部队成立不久，要成立政治部，正在找人。我便要任伯芳的介绍下去到澧州，在那个部队的政治部宣传科当了一个所谓的“中尉科员”。这大约是1928年2月的事情。

我在那个部队里呆了五个月左右。部队要改编，来了一个反动分子，先在师里当参谋，后来到我们团当团副。任伯芳告诉我，那个反动分子放出空气要查我们这些人是广东黄埔，还是武汉黄埔。所以，这个部队又是呆不下去了。于是，任伯芳和我商量离开部队，决定先去长沙，然后到上海。为了不引人注意，决定任先走，我后走，去长沙会合。

在那个部队里，我又几次向任伯芳提出帮我解决组织问题。他告诉说：他也失掉了关系。我们之所以决定到上海去，就是听说在那里容易找上党的关系。这便是我们决定去上海的决定因素。

当时的长沙白色恐怖也很严重，正是那亮牺牲，任卓宣叛变以后。我们伪称自己是被国民党部队遣散了的人员。这种身份不仅起了一定的保护作用，还使我们利用旧关系搞到了一张沿途乘车准予免费的护照。我和任伯芳就是用这张护照从长沙坐火车到武昌，改乘招商局的轮船经南京，又改乘火车到上海的。搞那张护照，我同任伯芳花了很大的力气，所以在长沙耽搁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到上海时约是1928年7月底或8月初。

到上海后经同乡潘先知的帮助，先住在一个寄宿舍。潘先知、任伯芳、我和一个小青年四人同住一房。不久，潘和任都搬走了。因寄宿舍的收费较

贵，我又去找了一个叫吴季璞的同学，他在江湾劳动大学。我就在他那里的穷苦学生的破旧宿舍住了一阵子。饭费与房费都比较低。

1928年，大约是9月份，任白戈、王义林等到了上海，同来的还有任光俊、葛泗桥。他们到后，在生活上我可以取得一点帮助。我同任伯芳都与他们搬住在一起。地点是当时法租界甘司东路田汉同志办的南国艺术剧院出租的一个亭子间。大家自己做饭吃。

关于这一段的生活，任白戈同志曾对我说过：“那时，我们这些四川同乡住在一起，还是真有点共产主义的味道呢。经济来源：一开始是王义林、葛泗桥家里寄来的钱，他们的家里都比较有钱。后来我出去教书，经济上就又好一些。那个南国艺术学院因为没有经费，就把房子租给别人住。我们住的那个房子是个亭子间，不算小，但是没有床，大家滚地铺。钱是一起用的。我平时教书，星期六和大家一起住，星期日来打牙祭的。你爸爸会烧菜。小菜买来了，别个洗菜、搞菜，他做上手活，只管炒。吃了饭，他们就闹着要我洗碗。我脾气好，又大他们几岁，每次都洗碗，做下手活。那时候你爸爸吸烟，大家都劝他戒掉。钱不多，省下吸烟的钱还好多加几个菜吃。但那时候，你爸爸心里烦得很，接不上关系，生活上又无着落。我还站出来替他讲了几句话，上街买小菜也忘不了带包烟给他。虽然，我们那时已经是党员，但是党的纪律是不允许我们随便接关系的。那时的党正处在白色恐怖中，在特务和叛徒的包围下。一切都得谨慎又谨慎。你爸爸的烟后来是戒掉了，听说是在红军里得了一次很严重的肺病后彻底戒掉的。”

正在这个时候。我知道任伯芳已经和上海党接上了联系。因此，我又向他提出帮助我解决组织问题。10月里的一天，我们两人走在南京路上，他要我充作在军校入党的党员，与党失去了联系，写个报告给中央，要求恢

复关系，报告由他转。信头写“中兄”，并写明他是证明人，否则组织问题一时难以解决。当时我也感觉到这样做有些不合适，但由于入党心切，就照他说的办了。报告由他转上去。不久，中央军委就派欧阳钦在上海黄浦滩（外滩）公园同我接了头，简单地询问后即告我关系已经恢复，并说：即由一位姓陈的交通与我联系。很快这位老陈同志就同我联系了，并送了文件和生活费给我。

这就是父亲入党的经过。这就是一个热血青年寻找信仰的一个真实、又有点悲壮的故事。它的产生不仅是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也反映了父亲性格中的一种冲突。它是一种个性，甚至也许是父亲其人独有的理想主义方式的产物。它急切、热烈，也就自然带点偏颇。因为他不斤斤计较，不细致地去权衡利害，所以他就常常造成一种遗憾，一种久远的深刻的遗憾。

是的，父亲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心灵上都罩着这个影子。也许是由于我们党在长期被敌人包围的复杂环境中形成的、对于组织手续过于严厉的态度，也许是由于在繁忙的战斗生活中没有合适的机会，想想看，这种事情应该在什么场合，问什么人，怎样提起呢？总之，父亲确实是一直沉默着。不过，即使是由于轻率也罢，幼稚也罢，父亲总觉得自己是做了一点对不起党的事情，他使用加倍的忠诚和努力来弥补这一点。有的时候，他甚至觉得他用自己卓越的工作和贡献已经修复了这个缝隙。他没有想到，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在“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中，这个遗憾，这个缝隙却演变成了罪恶，天大的罪恶。

当林彪、康生、“四人帮”借助政治运动的可怕力量，把假党员的帽子戴到父亲头上的时候，他们认为，父亲就是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罗瑞卿是永无出头之日了。但是，我的父亲，我的坚强正直的父亲在痛心疾首地回顾了自己全部历史和严厉地审查过自己的良知之后，却不能够再保持沉默

了。在非人的待遇和巨大的精神折磨下，在专案组法西斯式的逼供信下，父亲带着悔恨，带着愤怒，一次又一次诚恳地向党、向毛主席陈述这段真实的经历：

1926年夏，我从我那个破产的地主家庭分裂、偷跑出来后，就带着一点进步的倾向（当然是很微弱的）向革命寻找出路。第一次大革命的浪潮，把我卷进了黄埔武汉分校。我没有参加任何党派，但有比较强烈的愿望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就是大革命失败被敌人打散后，无论是想回四川找朋友，或病困武昌，或因桂系军阀占领武汉后白色恐怖更加严重，同任启愤去湘西以致流浪各地，或以后同任伯芳到上海，都没有改变这种愿望，有些还是为了实现这个愿望的。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我都未能如愿。从中学起，不管在什么地方，我接近的人都是当时的共产党员和带有某些进步倾向的人。我没有同坏人亲密接近过或求助于他们。我没有做过任何反对党，反对革命的坏事。这些，如果党还没有审查清楚，请求党严加审查。

我的加入党，没有组织手续，当然是不能允许的。但是我到党内来是革命的，不是来混日子，更不是来投机、来破坏的。这是被历史决定也被历史证明了的。因为当时的社会严重地压迫我，我除革命而外没有别的出路。去年11月我向主席的报告中说：我如果当时不找到党的依靠，不仅无法革命，连生存都成问题，这是确实的。因此，我同党发生关系后，党要我去湘鄂西红军，我就去。到宜昌后，因交通断绝，党要我去一个县委当秘书暂时隐蔽。去后，那个县委不肯接收，说隐蔽不下来，党又要我回上海等交通恢复，我就回。回到上海不久，毛主席率领的红四军就打下了汀州，党又决定我们同行的两人，一去闽西上杭游击队，一去闽西永定游击队，我都是坚决服从的。

我在主席和党的领导下，工作三十几年，党给了我职务，并有不少重

要职务。每想起此事心里总觉不安。职务每提拔一次，自己就震动一次，但是总以“好好为党工作吧，我又没有对党破坏”的想法来安慰自己。我在自己的岗位上确实是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地为党为人民利益工作的。除上述这个问题外，我在党内确实没有再做过任何坏事。我的工作上也犯过一些错误，有些还带有它的严重性，但那是我对于马列主义和主席的思想，对于主席和党的路线、政策、指示学习不够，理解不深。没执行好所致，决非我有意损害党。

我必须说明的是，这段往事多少年来，甚至当“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都像一块石头一样压在父亲的心上，压在我们心上，压在许多关心父亲、爱父亲的人们的心上。

1975年早春，我从插队的陕北途经北京来到福州。那时候，出狱不久的父亲和妈妈都在福州休养，而主要是因为福州有一位姓林的中医骨科大夫，父亲在他那里治腿。

经过长久的分离之后，能够比较长时间地和父亲和妈妈住在一起，对我来说实在是一种巨大的幸福。还记得我刚到的那天晚上，父亲妈妈和我坐在汤井巷省委招待所一幢二层楼的会客室里。会客室那么大，可我们三个人挤坐在一张并不宽大的长沙发上。我们说啊，说啊，说的什么，今天都已经忘记了，但是我们不停地说着。汤井巷里的春夜是这么静谧，不时从哪里飘来幽幽的花香。我觉得世界上仿佛就剩下了三个人，父亲、妈妈和我。我坐在那里感受着父亲妈妈身上的体温，他们的气息亲切地拂过我的脸颊，他们的声音那么温柔地震荡着我的耳鼓。

我们沉浸在天伦之乐中。每天晚上，我和妈妈先向父亲道别，然后我还要在妈妈的房里磨蹭到不能不去睡的时候。每天早饭之后，规定是要自己做自己的事情的，妈妈看书，我学英语，父亲读报和治疗。午饭时又会成为一个欢乐的聚会。一些最普通的

关于饮食起居的相互关心和询问，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享受。

一天，吃过早饭，我正和父亲在楼下说话，妈妈喊我到楼上去。我觉得父亲的脸色有些异样。他注视着我走上楼梯，一句话也没有说。

妈妈递给了我几张纸，我一眼就认出了那上面是父亲的笔迹。那几张纸对我的吸引力，使我都没有能够注意妈妈的表情。我读着，尽量让自己的心跳得不要太快，尽量让自己准确地理解字里行间的意义。我又一次感到了由高大的白玉兰树遮掩的汤井巷招待所里的静谧。

父亲写的，正是他入党的这一段经历。是写给我们的。当然首先是写给妈妈的。就像他写给党，写给主席的一样一丝不苟，甚至充满了更多的自我责备。我读完了我看着妈妈的脸。妈妈对我说：“爸爸妈妈觉得这件事应该让你们都知道。”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也不知道做什么好。我把那几张纸放回妈妈的书桌上，我觉得它们仿佛有千斤重。我呆呆地站着。

妈妈又说：“你下楼去吧，爸爸可能还有话要对你说。”

我下楼去了，妈妈留在自己的房间里。

我走在楼梯上，楼上的妈妈和楼下的父亲都没有声息，只有我的脚步声。我想尽量梳理清我的思想，但是我不能够。

父亲坐着，保持着我上楼去时的那同一姿式。我不敢看父亲的眼睛，我说不上是为什么，只觉得自己没有这种勇气。

父亲说：“你都知道了。这是爸爸的错误。为了这个错误，你们不能原谅我，甚至不再认我这个爸爸，我都能够忍受……”

我哭了，泪水一下子涌出来，我觉得我那颗脆弱的心再也容不下这许多激烈的情感。而且我一下子明白了，刚才壅塞在我心中的那种情感是什么了。那是一种感激，是一种强烈复杂得到今天我也解释不清楚的感激：我

我的爸爸，我的妈妈，你们生了我，养了我，给了我血肉之躯，给了我做人的尊严。今天，在你们经受了这么多的苦难之后，你们仍然这么艰难地，给了你们的女儿以这样诚挚的信任和博大的爱。我能做什么呢？我只能任自己的眼泪流淌。我愿意用它们去冲刷掉覆盖在爸爸妈妈心灵上的哀伤。

我没有去拥抱父亲。我觉得经历了那么多的危难和折磨的父亲，此时此刻在我眼里是那么高大，那么圣洁。我说：“爸爸，相信我，我绝不……”

父亲相信我了，是的，他一定是相信我了。他抬起一只手。我把这只手贴在自己的脸颊上，我觉得它是那么温暖。

我们共七个兄妹。就是说，父亲也许经历了七次这样痛苦而严峻的时刻。亲爱的父亲，你真是有一颗金子一般的心啊。

一直到不久之前，几乎是在我拿起笔来将这一段往事记录下来时，我忽然发现，我们所有的人，包括父亲自己，在这件事的认识上面都犯了一个大大的错误。

党内长期以来存在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和多次政治运动中形成的不正常的组织审查手续，给我们带来了无法避免的影响。这些东西使我们背上了多么沉重的精神枷锁啊。我们被这些虚妄的概念禁锢着、压迫着，以至于使对自己，对他人应有的正确分析也模糊起来。看不清事物表象后面的真正本质。

为了党，父亲还有什么东西没有贡献出来呢？负伤、流血这些暂不去说，他蒙受了那么大的冤屈，受了那么多磨难。可是他数十年如一日，战斗、工作，竭尽全力去创造第一流的成绩，和党从无二心。难道他不该享有共产党员的称号吗？可是当时，我们被什么东西蒙住了双眼，我们为什么被这样一个僵死的所谓组织手续的问题苦苦地折磨呢？

当然，后来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终于走上了正轨，父亲理所当然地恢复了她的组织生活。他重又出席了党

的代表大会，担任了重要的职务。父亲去世以后，由邓小平同志宣读的悼词中对父亲的入党这样写着：“罗瑞卿同志是四川南充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他就参加了革命学生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从事革命活动。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危急关头，罗瑞卿同志于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党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再一次承认和慰藉了自己的忠诚的战士那颗不平静的心。在短短几千字的悼词里，是不可能详细地去陈述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的，何况还带有那么特殊的历史的、道德的、感情的因素。

说起来，也许有的人不会相信。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之后重新工作一直到他匆匆辞世，并没有什么人对“文化大革命”中他所蒙受的清白之冤的被诬陷的种种罪名做过一个正确的结论。父亲从来没有计较过这个，只要党给他工作的权利，只要给他为人民做事情的机会，他就把自己的冤屈、个人的恩怨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给父亲彻底平反的决定是在父亲去世以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做出的。

悼词、平反决定，这一切父亲都不会知道了。但我知道，父亲的心是坦然的。他相信党和人民会给他正确的评价。但是，我还是多少次深夜醒来，总觉有一件事堵在心头。我不知道父亲是否还把这件入党的组织手续

首值桦案英文
化研究会成立之日

祝

炎黄文化应弘扬，
瀚内同烟补此章。
通志修成史册，
黄河扬子永流芳。

魏传统

一九九五年五月十日

的事情留在心里，仍然觉得它是一个拂不掉、抹不去的遗憾。我忘不了父亲对我说过的那句沉重得像千斤磐石一样的话：“这是爸爸的错误。为了这个错误，你们不能原谅我，甚至……”

父亲啊，我亲爱的父亲。如果你在天上，如果你地下有知，你一定听得见女儿的声音：这不是，这绝不是你的错误！你在革命的危急时刻，你在共产党人的鲜血流成河的白色恐怖中，那么急切地把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党，这是你的光荣，无上的光荣。女儿为您骄傲，为有这样一个正直、勇敢的父亲感到永远的骄傲。

血染的记忆

林莺

上饶集中营茅家岭监狱生活纪实

五十年前，江西上饶有过一座出名的监狱，那里关押着八百多名皖南事变中被俘的新四军官兵。本文作者也是其中之一。半个世纪过去了，她抑制不住地写下了这篇——

经受考验

我原是江西青年服务团里的中共地下党员。皖南事变后，我被关押在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的西山监狱。敌人多次刑讯，要我承认是新四军派来的，逼我交待组织关系和同伙。我咬牙顶住了，折腾了三个月，把我送到上饶茅家岭监狱服刑。我知道，上饶集中营是关押被俘新四军将士的地方，我到那里是又回到了同志中间，于是，我精神抖擞、满怀希望地去迎接新的战斗。

一进到茅家岭监狱，同志们冷冷的目光使我像霜打了一样。走进女牢，里面稻草铺上坐着两个二十多岁的女同志，她们和别人一样，不冷不热地让我坐下，问了一下姓名就不再理我。我一下子控制不住了，委曲的泪水顿时流了下来，我意识到同志们不信任我。

来到茅家岭第三天，敌人就开始审讯我，他们给我上大挂、插竹签、夹手指，什么刑具都用上了。我事先有了思想准备，就是不开口。回到牢房，那个年龄小些的女同志（她叫刘秀珍）赶快扶我躺下，好像还要说什么，可是那位年龄大些的女同志（她叫李品仙）却给她递了一个眼色，她随即把我放下走开了。我理解同志们对我的冷漠，那是怕敌人用苦肉计。随后几天，敌人连续对我使用酷刑，把我折磨得遍体鳞伤，动弹不得，他们看着不像是苦肉计了，才把我搂在怀里说：“这几天太委屈你了！”在亲人的怀里我禁不住放声痛哭，泪水冲刷着从心灵到肉体上的创伤。李大姐一边抚摸我一边说：“这仅仅是开始，他们还会继续折磨你，要你开口。他们还会来软的引诱你。重要的是坚持，只有坚持到最后才是胜利。”我说：“有同志们的支持和帮助，什么考验我都能经受。”

果然，几乎每隔一天就对我用一次刑，而且一次比一次重。但是敌人的企图落空了。他们又以做演员、当明星引诱我，还对我实行“优待”，让我在监狱内随意走动，给监狱官兵教唱歌。我在李大姐的指导下，利用这点特殊的待遇，为同狱的难友们做了不少有益工作。

监狱的难友们绝大多数都经受住了考验，成为狱中对敌斗争的骨干。但也有少数人没能坚持住。一天早晨，从政治部送来一个二十几岁的男犯。听押送的士兵讲，他是上饶文化馆的职员，在政治部审讯时受不了上大挂、夹筷子，交待了二十几个男女青年。刘大姐让我去做他的工作。走进他的禁闭室，我问：“你是共产党员吗？”

“不是，就是因为我爱说公道话，才被怀疑抓来的。”

“你既然不是党员，怎么能供别人是党

员呢？”

“我受不了那么重的刑啊！”

我开导他说：“你想过没有，你供出了他们，他们也会被捕受刑，如果他们中再有人因受刑而出卖朋友，那么会有更多的人被捕受刑。这不是害人？你以为这样敌人就能放过你吗？你看，他们继续对你用刑，逼你供出更多的人，你这是害人又害己啊！刑罚有什么，我比你受的刑更多、更重，可我什么也没说，不就挺过来了。亏你还是个男子汉，一点苦头就把气节都丧失了，将来你怎么见人啊？”

听了我的话，那个青年陷入了深深的懊悔和自责中，他表示一定要和大家一样坚持斗争。

狱中斗争

一个冬天傍晚，由远而近传来一阵吆喝声和厮打声，原来是押来一个“顽固分子”（后来得知他叫李维贤）。他浑身上下鲜血直流，仍高昂着头，不肯屈服，两个宪兵还不住的双棍齐下，他挣扎着，嘴里仍不停地骂着。一个叫“王八”的管理员冲上来大吼：“给我打！打死这个狗杂种，看他还硬不硬。”打手们蜂拥而上，在这危急的时刻，男女难友们齐声高呼“不准打人！不准打人！”我不顾一切地冲上去，一面用身体掩护住李维贤，一面高声怒斥敌人：“住手！不许虐待政治犯！”

牢房里和院内一片吼声：“不许虐待政治犯！”

正义的吼声压倒了敌人的气焰。他们害怕死了人，事态扩大不好收拾，只好住手。

斗争胜利了。我把李维贤同志扶进牢房，他的头还在流血，我赶紧撕下一片裙子替他包扎伤口，难友们又烧了一些棉絮灰撒在他的伤口上。

这件事过后的一天清晨，我听到门外乱哄哄的，隔着窗户我看见几个宪兵又押着一个犯人走来。那犯人脸色蜡黄，瘦得弱不禁风。“王八”管理员没有让他进牢房，而是直接进了天井边上的铁刺笼。站铁笼是对犯人使用重刑。它容积很小，人在其中不能动、不能靠，四面的铁刺稍一碰上就被刺得浑身血流。站铁笼的人不能变换一下姿势，直到耗尽精力而死去。

听说有人站铁笼，牢房的门都打开了，难友们都挤在门边上看着。只见这位同志昂头挺胸，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李大姐一眼就认出了他，她对我说，这就是写《渡长江》的赖少其同志。我心领神会，高声唱起：

薄雾迷漫着江面，

江水冲击着堤岸，

在这黑沉沉的午夜，

我们要渡过长江。

接着，所有牢房的难友们都跟着唱了起来。



战斗的歌声表达了我们对少其同志的支持和鼓励。他会意地向大家点头，以微笑作答。那意思是在说，我一定能坚持下去。

听到歌声，“王八”管理员急跑出来，见大家在唱歌，想说什么又怕触犯众怒，只得无可奈何地缩了回去。

少其同志的精神激励了大家，大家也担心他那瘦弱的身体能否支持住，李大姐便和我商量办法。我搞一小包花生米、一小瓶白酒、一根木棍，等天黑后给他送去。

终于，等至月上高墙，“王八”管理员的门也关上了。我便带上准备好的东西偷偷溜到铁笼前，把木棍插进铁笼，让他后背能靠在上面，身体稍稍放松一下。随后，我把酒送到他嘴边：“喝吧，提提神。”又把花生米递给他。少其同志说：“谢谢大家，请放心，我能坚持下去。”正要离开，被宪兵碰上了，我正不知所措，只见那个宪兵转身走了，我认出那是爱听我教唱歌的年轻卫兵。我放心地走回女牢。

天亮了，少其同志依然挺立在铁笼中，泰然自若。敌人无可奈何，只好把他放了下来。

战胜严寒

一个寒冷的夜晚，从周田大队部押来一名男犯（后来才知道他叫甘戈），他只穿一件夹衣，冻得全身发抖，面色青紫，跌跌撞撞地进了牢门，连站都站不稳了。看到他这样，李大姐发愁了，狱中伙食恶劣，加上严寒，他可怎么熬过这个冬天啊！看着大姐为难的样子，我脱下身上的棉大衣说：“这件给甘戈同志穿吧，我还有一件夹大衣。”大姐听了我的话，用干瘦的手抚摸着我的头：“小鹭，你真懂事，是个好孩子。”当晚，我把大衣给甘戈同志送去了。他接过大衣，看到我身上穿的夹大衣，激动地流下了泪。40年以后，1983年中共江西上饶市委召开的对敌斗争历史座谈会上，我们又重逢了，昔日难友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他说，感谢你，带给我难友的情谊和温暖。

让我熬过了严冬，后来得以越狱脱逃，几十年来，战友情一直激励着我。我说，是啊，是战友情使我们坚持了下来。

从那以后，我们又想到男牢大多数同志还光着脚，我们三姐妹赶制出二十几双夹袜子，第一双送给了站铁笼的少其同志，随后，每个男同志都得到一双。

绝食斗争

初到这里时，每人每顿可以分到两平碗饭，后来，“王八”管理员克扣伙食，饭量每顿不足一碗，而且饭中尽是砂子，令人难以下咽。犯人们吃不饱饭。还要干重活，身体越来越虚弱，大家便悄悄地酝酿良进行绝食抗议。

一天，大队部送来七、八个犯人，而送来的饭却一点未增加，于是一场酝酿已久的绝食斗争，开始了，大家都不接饭，齐声高唱自编的“囚徒之歌”。

太阳出来又落山，
监狱永远是黑暗，
守望的狱卒不分昼夜，
日夜站在我窗前！……

直到太阳当顶，饭还是原封不动地摆着。“王八”管理员见此情景大声喝叫：“为什么不吃饭，是谁带的头？”

第二天，饭还是没人动，“王八”喊了一阵，就开始采取了镇压手段，他们把一个华侨青年吴必成作为突破口，高声叫道：“吴必成，出来！”

两个宪兵把吴必成拖出牢房，捆绑起来毒打。这时全牢的战友们都愤怒了，一齐喊：“不准打人！”宪兵们如临大敌，步枪、机枪都上好了子弹对准了我们。

没有人屈服，惨遭毒打的吴必成此时厉声怒斥敌人：“你们能打死我，可杀不尽全中国的青年和新四军！”

犯人们的高喊：“我们不怕死！”“改善伙食，不许虐待政治犯！”

第三天、第四天过去了，仍没有人吃饭，“王八”慌了神，他怕真饿死人无法交待，于是开始和我们谈判。

谈判中我们提出四个条件：给挨打的吴必成同志医治伤；向大家赔礼道歉，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饭量要足，不得克扣伙食；我们有唱歌的自由。经过反复斗争，敌人被迫答应了我们的要求。

茅岭诞生

绝食斗争胜利后不久，狱中来了一对夫妻，他们是福建人，来上饶探亲进入了监狱管区，被“王八”管理员当做探子抓了进来。女的叫杨碧云，男的叫陈聪成。杨碧云

刚来时整天抹眼泪，她已怀孕好几个月了，狱中生活苦，怕孩子保不住。我们鼓励她：“大家会尽力帮助你的。”

杨碧云不足月就临产了，我去找“王八”要求请接生婆，“王八”龇牙一笑：“下个小鬼子还要请接生婆？！”他不肯去。杨碧云痛得在床上翻滚。消息传出去，难友们都急了，拥在牢房门口高喊：“孩子有权降生。”“王八”一看势头不好，只好派了两个卫兵押着我下山请接生婆。

接生婆来了，谁知，杨碧云胎位不正，接生婆束手无策。这时有人想到，周田大队关押着一名新四军军医，应该去请他。可是“王八”却不同意，难友们愤怒至极，又以绝食相争，“王八”对上一次绝食还心有余悸，只好同意了。

军医来了，难友们的心情由焦急变成了期待。大家纷纷猜测生下的是男孩子还是女孩，还想着为新生儿起个好名字，想了许多，最后一致决定，是女孩叫“狱花”，是男孩就叫“茅岭”，让新生命永远记住监狱这段历史。军医确有本事，没多长时间，牢房里传来了婴儿的哭声，杨碧云母子得救了，生下的是男孩。啊，“茅岭、茅岭”，我们的“茅岭”，你可知道，我们这些脚踏死亡线的囚徒把生的希望全部交给你了。狱中，一片欢呼声。

冲出牢笼

在狱中，敌人为粉饰其罪行，欺骗社会舆论，组织我们搞剧团和球队参加社会活动，许多同志就借此机会越狱。赖少其同志和几个剧团队友赶到铅山石塘演出机会，穿着演出服就逃跑了。还有的同志是趁犯人球队到外边比赛的机会逃跑的。我是在保释出狱后强制到长官部剧团服务，借取行李的机会逃跑的。

1942年春，日寇发动了浙赣战役，逼近金华，监狱将随国民党三战区机关转移。同志们感到，敌人会借机屠杀一批革命战士。我们不能坐以待毙。于是推出了王传馥、李胜、宿士平、陈子吞、吴越五位同志组成暴动委员会，领导茅家岭暴动。此时我已来到解放区，在解放区听到了暴动的消息：1942年5月25日，狱中的同志趁部分宪兵外出、警戒力量薄弱之机，夺取敌人枪支，打开牢门，一举冲出了敌人的警戒圈，向武夷山区游击队所在地进发，与当地党组织汇合。

茅家岭暴动胜利后不久，又传来了福建崇安赤石暴动成功的消息。这两次暴动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国共谈判签定了双十协定，国民党不得不释放了上饶集中营的政治犯。

台湾“湖口兵变”之谜

沈默

30年前,在台湾发生了一场没有流血的“湖口兵变”。这桩株连到30多位国民党高级将领,并牵扯到蒋纬国的事件,到底是那么一回事呢?

1961年1月21日,台湾国民党装甲兵副司令赵志华到新竹湖口装甲基地作例行性的装备检查。驻守在湖口基地的第一师,是台湾装甲部队的主力,赵志华曾经是这个师的师长。

在大集合场上,赵副司令开始对在场的全体官兵训话。他首先讲了他与装甲一师弟兄们的感情,他对老部属的关切。老师长的讲话使全场弟兄感到十分亲切。但是接下来的话,就叫官兵们感到莫名其妙以至为之震惊了。

他说:“现在法国、日本争相讨好中共,台湾在世界日陷孤立。政府有些官员无德无能,是目前外交问题没有处理好的根本原因!最让人忧虑的有人竟鼓吹‘两个中国’的论调,此实乃卖国卖党之谋!”

“我们高级将领中,也有人胸无斗志,目光如鼠,生活腐化,他们早已把反攻复国之大业抛于脑后。让这些无能鼠辈领导国军指挥弟兄们,我们复国还家之日何望?……”

正笔挺立正听训的官兵,都觉得老师长慷慨激昂的话似有所指,其神情与往日大不相同。

赵副司令的训话如强弩之箭,一发而不可收。最后出语令石破天惊:

“目前,总统(指蒋介石)正受到一小批人包围,身为国军精锐的装甲部队理应挺身而出!”他横扫了全场一遍,大声呼道:“我们马上到总统府去保护总统,谁敢跟我一起去?!”

此时,整个会场静得鸦雀无声,众官兵内心里也许千思百虑,各有所思,可从外表看却全都呆若木鸡,不知所措。

好半天不见回应,赵志华掏出了手枪高高举起:

“谁敢跟我一起去?”他的声音有些颤,喉头有些紧。

师长徐美雄,黄埔十一期毕业,他心中暗暗叫苦:这不是搞“兵变”么?这种掉脑袋的事怎能轻举妄动!在老师目光的逼视下,他低下了头。只能以静制动,等待观望了。

正在气氛凝重得令人窒息之际,突然台上传来两声回应:“我们跟你去!”“老师长,我们跟你到总统府去!”

回答者,一名“政战”中校和一名士官。

“好,请到台上来!”赵志华高兴地大喊,他希望能更多的人响应。

就在赵志华与这二人握手并请他们向下面的官兵讲几句话时,那两人连抓带抢,将他按住,并高叫:“快来人把他抓起来!”

立时,台下猛然清醒的人蜂涌而上,将赵志华团团围住,推上一辆吉普车押往司令部。

“部队原地不动,我回来还有话要向大家讲,如有擅离,格杀

勿论!”徐美雄师长在押走赵志华之前,厉声对部队下了命令。整个大操场一片静默。

押解赵志华的吉普车开走不久,忽然站在队伍后边的一名“政战”官拔腿奔出,亮兵连开两枪,均未击中,其它怕被“格杀”的官兵更加动也不敢动了。

这名逃跑的“政战”官飞快地奔向最近处的一个电话间,直接要通了第一军团司令官罗友伦将军,气喘吁吁地报告:

“装一师叛变了!这里发生兵变!”

罗友伦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立即通报“国防部参谋本部”,并迅速采取了应变措施。

湖口以北的陆军各部队接到命令:沿纵贯公路两边,布置重兵及防御炮,拦截所有的装甲车,如有违抗者,就地开火。

桃园空军基地的战斗机进入战备状态,随时准备炸射“叛乱”战车。

同时工兵部队也接到命令,如果拦截无效,炸毁中兴、中正、台北大桥,断绝装一师战车进入台北市的通路。

就在外面大部队动员布防之际,湖口基地却是一片平静。其实,如说有“兵变”也只是赵志华光杆司令一个,从事发到事平,只有几分钟,没有发展,更没成气候,未见一滴血。

这次事件的主角赵志华,黄埔十期毕业,抗战期间曾在印缅战场的远征军与日军鏖战,后曾在汤恩伯部参加过“上海保卫战”。由于他在美国维吉尼亚州军校受过装甲训练,具有现代战争的知识观念,成为国民党军中的少壮派军人。但此人性格较内向,时常精神恍惚,也有人怀疑他精神有毛病。

事件发生前,赵志华因买房缺钱,便上了一个签呈给司令官郭东,请他代转陆军总司令,希望设法借支,以后按月摊还。不知何故,此签呈未准,使赵志华心生不快,有人猜测,这或许是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

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军方并未当成一场“兵变”,想将赵志华送往精神病院,同时犒赏在事件发生时无一人响应的装一师。另外,秘密调查装一师,装二师和装甲司令部,查询有无同谋分子。但是,几天之后,情况大变。

“最高当局”指示:要严惩责任,惩治叛逆!

赵志华即被移送军人监狱,按“陆海空军叛乱罪”获起诉,并被判死刑。30多名将领受到记过、调职等行政处分。装一师除制服赵志华和报告消息的“政战”官获得褒奖升迁外,后来的境遇都不怎么好,当年的“精锐之师”仿佛成了丧家之犬。特别是蒋介石的二公子蒋纬国,当时任装甲兵司令,从此背上“黑锅”,干了将近20年的“中将”,直到蒋介石去世之后才升为“上将”。

赵志华在印缅战场上就结识了蒋纬国,并倍受蒋纬国的赏识。蒋纬国任战车第一团长时,赵先任营长,后升副团长;蒋任装甲司令时,赵志华也升为副司令。但“湖口事件”时,蒋纬国已是陆军参谋大学的校长。

后来,由于宋美龄的“后援”,湖口事件受牵连的30多位将领才获“原职待退”,赵志华也被改判“无期徒刑”。可是“湖口兵变”之说却不胫而走,成为台湾军政界的一个谜。

1982年,赵志华病死狱中,时年65岁。蒋纬国将军在接受记者访问时淡然回答:“是非自有公论,我不预备去翻案。”

是非自有公论,事实不能篡改,30年前发生在台湾的这一扑朔迷离之案,终有一日会全部大白于天下。

板门店的“隐形巨人”

——朝鲜停战谈判中的李克农将军

板门店的 “隐形巨人”

·简妮·



四十多年前，朝鲜战争激烈进行的同时，以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一方，以打着“联合国军”旗号的美国军队为另一方，在战场西端的板门店，举行了一场历时两年零十几天，两易会场，五次中断，共开58次双方代表团大会，733次各种小会，历史上罕见的停战谈判。中朝方面出面谈判的是朝鲜人民军南日大将和志愿军邓华将军等。谈判开始不久美国代表就感到中朝谈判代表团中，有一个“巨大的隐形人物”在策划、指挥着一切。正是这个人，才是与他们较量的真正对手。还有人传说，板门店的中朝方面有一根线，一头通向会场上的谈判代表，一头就握在那个从不露面的幕后人物手里，谈判桌上中朝代表的一言一行，都出自他的决定与指令。

这一天，谈判中出现了罕见的僵局，双方都在等待对方开口，却又谁也不开口。沉默，沉默，……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只有钟表滴答滴答的走动声响，在谈判桌上每个人似乎都听到了自己心脏的跳动。整整沉默了132分钟，这大概是谈判史上无言相对最长的时间记录了。

我原驻朝使馆政务参赞，志愿军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秘书长柴成文，悄悄起身，走出会场来到谈判大厅旁边的一座帐篷里，那里坐着一个留着小胡，戴着眼镜的中年人，他就是新中国外交和军事战线重要领导人，谈判代表团党委书记李克农将军。这时，他正坐在桌前沉思，一支接一支抽烟，茶杯里的水已喝干，和谈判桌上的气氛很相似。

柴成文来到李克农身后，扶住椅背，在他耳边急促吐出三个字：怎么办？

李克农一言不发，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小纸条，写下三个字：坐下去。

柴成文又悄悄回到座位上去，将攥在手心里的小纸条，偷偷传给旁边的代表手里，这个人看完后又传下去，短短几分钟，中朝谈判代表成员脸上的表情全变了，由焦躁不安变为沉稳而又笃定，一个个沉下心来，挺直起腰板，稳稳地坐在那里，化为一尊尊石像一般。

对方再也无法忍耐这难堪、沉闷、压抑的沉默了，马拉松式的耐心竞赛终于见了分晓，美方代表首先宣布：休会，退席。

美方谈判代表一回到住所，把公文包一扔，就叫出声来，哎呀，上帝！我以为我麻木的双腿再也不会复活了，这该死的

谈判像是一个世纪那样漫长。

他不懂中国人的“打坐”本领具有千年的历史，这是个最有耐心的民族。

当然，谈判中也有最短的记录：25秒。双方代表刚落座，宣布开会之后，随即宣布休会。真是针锋相对的政治战。

新生的共和国在这场最重要的外交斗争中初露锋芒。历史也给了李克农机会，淋漓尽致地展示一个外交家的才干：战争前的战争。

翻阅一下1950年前后的报纸，你就会明白，那时世界变得多么敏感，紧张。

许多人认为只要新战争一开始，必将是一场原子武器的较量，一提到原子弹就令人发抖，胆战心惊。

更令西方某些国家统治者不安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快满周岁了，新生的共和国一天天强大起来。

按照预言家的说法，中美必有一战，不管发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以何种方式进行，这是不可避免的。那时还没有人能调和这种尖锐的冲突，只有战争，较量才能有暂时的和平。

历史选择了朝鲜半岛，这个美丽而险峻的地方，中美进行较量。

五星上将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不可一世地把战火燃向鸭绿江边。

南朝鲜总统，那位残忍好杀、惯于挑动争战的李承晚，杀气腾腾地宣称，战争

不能止于鸭绿江边，要打到中国去。

就像知道冬天将要来临一样，北京料到，中美之战不可避免了，情报战是战争前的战争。

李克农当时在苏联养病，开始，他每天通过报纸来了解朝鲜战争的动态，后来，朝鲜战争形势发展迅速，他很快返回国内。

双方的情报战都是在黑暗中摸索进行的。

1950年10月15日麦克阿瑟和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威克岛磋商时，对中国的军情分析，决策下了如此定论：中国对朝鲜战争将会袖手旁观，因为刚刚新生的中国百废待举，也不想介入。显然这被后来发展结局证明是错误的。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回顾1950年秋天的情形时说：“那个时候，我们对鸭绿江彼岸的中国共产党的军力及其部署是知道的。但我们还必须判断莫斯科和北京的意图。他们的秘密会议和秘密决定我们又不了解。在这种缺乏机密情报的情况下，情报官员想对敌方军事动态、部队调动以及战略物资供应等问题提出明确看法，显然是不自量力的，同时也是有危险的。”他同时承认，当时根据情报分析，情况判断家们的结论是：中国干预的可能性有，不干预的可能性大。

事实上，他们恰好是错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意图。在中美关系中，出现这样的

▽1953年李克农（右一）陪同彭德怀（中坐者）在朝鲜停战协议上签字



判断失误并非一次。最后美国人得出一条结论：决不能用衡量我们自身的标尺来判断共产党领导人的行为和反应。

虽然我们并没有确切的材料证明，李克农率领的情报机关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中能料事如神，当时情报工作的重点刚由国内转向国外，大量的情报来自于公开的报道的综合分析。但后来的迹象表明，在掌握敌军各方面的情报上来说，是颇有成效的。据说，中国还提供给朝鲜不少情报。毛主席曾经夸奖过说，李克农干的不错。

这也许是后来第五次战役后，毛主席点将李克农主持朝鲜停战谈判工作的因素之一。当时任代理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对这一时期的情报工作作了如下评价：“在我军情报工作人员的努力下，在朝鲜同志的密切配合下，一般说，朝鲜战争中我们的情报工作是做得比较好的，对敌情掌握得比较准，因而容易作出正确的判断。”

朝鲜战争爆发后，李克农每天在总参谋部里通宵达旦工作，他的目光成百次从朝鲜半岛上划过，这是一张特大号的军事地图，但他没有想到，很快他将亲自踏上这块土地。

1950年11月中旬，北朝鲜战场之所以突然变得沉静起来，这是因为20万中国人民志愿军正悄悄地从鸭绿江北岸跨越过来，准备反击美军及其盟友未加防范的部队。

刚刚从国内开过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善战，以凌厉的攻势使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全面溃败。

这是办公室里一个平常的早晨。

毛岸英把一叠文件放置案头，抽出几

份请李克农签字，签字完毕。李克农忙得顾不上和毛岸英谈话，又埋头于眼前的工作中去了，毛岸英站在他的办公桌前却没有走。

李克农觉察出毛岸英这几天有些心神不定，正准备抽时间找他谈谈心，但此时，他却丝毫没有留意毛岸英脸上表情的细微变化。

毛岸英是1950年春天到李克农身边当机要秘书的。那天，他提着一只小书籍，兴冲冲地到李克农处报到。

对于李克农，毛岸英并不陌生。他和刘松林结婚，毛主席请了几位客人在家里吃饭，席间毛主席曾指着一位胖胖敦敦神情和蔼的老头儿向他介绍，这位是李克农同志，他马上站起身来称：“李叔叔你好。”李克农微笑着拍拍他的肩膀，按他坐下来，他感觉到那只手掌很暖，很稳。

1950年，他作为李克农的俄语翻译到苏联。回国之后，因为中苏关系，李克农身边需要一个懂俄文的人，另外据说毛主席把毛岸英交给李克农很放心。毛岸英对外事情报工作也充满了年轻人好奇、探险般的兴趣，他十分情愿地做一名忙忙碌碌“伺候人”的小秘书。

后来，他和刘松林把家搬进李克农的住地，住在四合院一进门的一间平房里，小两口周末时团聚，星期天回中南海看望父亲，刘松林星期一就到学校去了，毛岸英平时和李克农朝夕相处。

李克农对毛岸英并没有特殊照顾之处，和对其他工作人员一样要求。只是每次见到毛岸英星期六下午频频向窗户外张望，便半开玩笑地说：“岸英，几天没见就想媳妇了，你是不是想接接松林。”刘松林当时在大学读书，乘公共汽车回家。

毛岸英便常常可提前一会儿下班。

毛岸英对李克农总有些敬畏之感。他生性活泼，敢和贺龙、陈毅开玩笑，敢当面叫彭德怀“彭老头”，但在李克农面前就拘束，也许是他们从一开始时起的上下级关系就奠定了这种交往的基调，也许是因为李克农以“严”字闻名，使秘书在他面前都大大咧咧不起来。一个字抄错了，全篇重写，每份报告、日记的时、分、秒必须写的准确、清楚，加上工作不分白天黑夜，加班是家常便饭，他总觉得李克农凡事做的滴水不漏，为人处世公私分明，周到勤勉，让人很难挑出差错。他从来不要你改正这个，注意那个，但从他的言行里，你自然明白自己该怎么做。他渐渐体会出父亲让他到这里来的一片苦心。但炮声，是朝鲜战争的炮声，使这个帅门之子再也不甘坐在这安静的办公桌旁边了。

李克农抬起了头。

“李部长，我要去朝鲜打仗，你放我去吧！”毛岸英直率，说出自己的想法。

李克农心中一惊，他思想上完全没有准备。他没想到毛岸英这几天心神不安是因此事引起的。

“在哪里都一样干革命工作，我看你不要去。”但他在心里想的是，你是毛主席的儿子，战争中生死难卜，万一……

血气方刚的毛岸英渴望靠自己的勇敢和无畏去赢得荣誉，去向世人说明自己不愧是伟人之后。

李克农心里暗暗赞叹，但他表面上的反应仍然是很淡然，对他说，这有一封紧急电报，你先处理完了再说。

毛岸英无话可说，只好先奔作战部处理文电之事。但他不甘心，又接连几次找李克农，央求他放自己出国作战。



△朝鲜停战谈判期间，李克农和警卫员李连水（左）、护士高玉槐（右）在一起。

△朱德与李克农合影



△1960年周恩来、邓颖超探望李克农。

最后，李克农被“磨”得没办法，只好对毛岸英说：“你的事我做不了主，你回家问你父亲吧。”

毛岸英一听有门，兴冲冲地回中南海。

当那瘦长的身影在门口消失时，李克农站起来，他心头充满了忧郁，说不清是一种不祥的预感，还是一种难以诉说的留恋。后来，毛岸英血洒沙场，他才明白自己当时心里为什么会有那种预感。

听说毛岸英兴冲冲地回家找父亲商议，恰巧毛主席在开会，江青看到毛岸英焦急的神色，便问起何事，听了毛岸英雄赳赳气昂昂的请战宣誓，江青轻轻启齿一笑，用少有的温和口气说道：“去打仗，好事情，这还用找你父亲，你去就是了。”

毛岸英出国作战之事，不大可能瞒着毛主席，毛主席一定会批准儿子上战场的，尽管他的用心和江青有所不同。

这是受命入朝的前夜。

李克农彻夜难眠。

他回想起前段日子见到毛主席时的情景。

那天，走过中南海的菊香书屋，李克农不由放慢了脚步。自从朝鲜战争爆发以来，他常应召而来，向毛主席汇报一些重要情况，而今天，他的脚步沉重极了，他执行的是有史以来最痛苦的任务。

1950年11月25日，毛岸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开始是瞒着毛泽东的，周恩来在1951年1月2日致毛泽东、江青的信中写道：

主席、江青同志：

毛岸英同志的牺牲是光荣的，当时我因你们都在感冒中，未将此电送阅，但已送少奇阅过。

毛岸英牺牲的消息传来，李克农陷入

深深的悲痛之中，他没有开灯，在漆黑的办公室里，借着月光，望着西侧毛岸英住过的那间小屋，仿佛又看见毛岸英一推门露出笑嘻嘻的脸庞，向他走过来的情景。他回忆当初没有拼命留住岸英，尽管他知道毛岸英是留也留不住的人。

那天在饭桌上，李克农把这一不幸的消息告诉了刘松林。毛主席为什么不直接对刘松林讲，而是把李克农叫来完成这一艰难的任务？

“克农，我想过了，还是把那件事告诉思齐吧。”思齐是刘松林的小名。毛主席大口大口地抽烟，看不清主席的面孔，听语调，他极力压抑着内心的哀伤，为了怕影响思齐的情绪，他独自咽下了这老年失子的巨创深痛，一直没有向儿媳透露这一噩耗。

李克农清楚地记得，当他离开毛主席住所时，偶尔一回头，正好看见毛主席转脸的一瞬间，他老人家眼角泪珠闪闪。

这已是他革命斗争中失去的第六位亲人。

来到菊香书屋。毛主席见到李克农的第一句话是：“我点了你的将，要你去坐镇开城，外交部组成一个班子，乔冠华也去，军队也要人参加。”

毛主席此刻已一扫悲切神情，泰然自若，举止中勃发着必胜的决心和意志。

“我马上准备出发！”

这一时期李克农严重的哮喘病复发，平时靠药物控制哮喘，每天靠打吗啡才能入睡。毛主席并不知道这一情况，李克农当时受使命召唤，无心作其他选择。

他回来静下心来想了想，还是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实事求是地讲了自己的病情，请中央根据这一情况有多种方案准备。毛主席稍稍犹豫了一下，仍然定下来：

李克农去。也许，他没有找出更合适的人选，他相信李克农能抱病出征。

李克农自然义无反顾。

1951年7月5日，李克农率领的谈判班子就到达了安东。

离开北京之前，正是炎炎盛夏，谁也没有想到带冬装，还是李克农夫人赵瑛提醒了一句：“克农，要不要带上棉衣？”

李克农患着哮喘病，穿棉衣总是比一般人提前半个月。

李克农摆摆手：“不用，到不了冬天就能回家了。”

谁也没有想到，这次谈判一去就是两年。

李克农一行从前门火车站上车乘坐的火车包厢是当年慈禧太后出行的“御辇”。虽说是座椅已旧，地板油漆剥落，车厢中间悬挂的珍珠玛瑙吊帘依然在，随着车厢的晃动轻轻摇荡，也足见当年的富丽堂皇非凡气派。

李克农一路上和乔冠华开着玩笑，“老乔，慈禧太后没想到咱们敢坐她的‘御辇’哦！”

踏上朝鲜的土地，并没有异国之感，只是蔓延正开得野火一般疯狂，干燥的空气里弥漫着硝烟气味，让人嗅出了战争的灼热气息。

李克农入朝后的第一天，7月6日早晨，就见到了金日成。

朝鲜人民军指挥所在大约离平壤东北50公里的地方，这里树木葱翠，幽静凉爽，隐蔽安全。李克农从长途旅程中一来到这里，浑身的燥热一扫而光。

一个伟岸的身影一摆一晃地向他们移过来，走近，是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将军。

金日成操着一口流利的中国话，确切

▷授衔授勋后与杨尚昆、李涛合影



1955年9月27日毛泽东在北京怀

仁堂为李克农授勋。



在朝鲜停战谈判期间和彭德怀在



地讲是吉林口音的中国话，和李克农一见面就十分亲热。他显然已收到了毛泽东发给他的电报，1951年7月4日，毛泽东给金日成的电报第一句话就是：“我方是此次谈判的主人。”而李克农又是主持这次停战谈判的实际负责人，因此他是把李克农当作贵宾来接待的。

在以后的岁月里，金日成和李克农由于工作上和历史上的原因，来往甚密，私交也不错。李克农和赵珠曾有一张身穿朝鲜民族服装的合影。这是在开城驻地拍摄的。那身做工考究的朝鲜服装，正是金日成送给李克农夫妇的礼物。后来朝鲜停战谈判结束，李克农回到北京，金日成每次到北京便要回到李克农，有时自己没有时间会见，便派人送去朝鲜泡菜到李宅，他连李克农喜欢吃又酸又辣的朝鲜泡菜这一点都很清楚。

也许这是毛泽东派李克农坐镇开城的一个因素。

李克农和金日成就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磋商。这次谈判中朝方面出席代表：首席代表朝鲜人民军大将南日、志愿军邓华和解放军将军、人民军少将李相朝。

此刻接到毛泽东电报，指派柴成文以中校名义为志愿军联络官。因为三方联络官中最高官阶的一人不得超过上校。

这次谈判，对外以人民军为主，而实际上朝鲜停战谈判的第一线由李克农主持，乔冠华协助。内部给他们规定了一个代号，李克农称“李队长”，乔冠华称“乔指导员”。李克农还任志愿军代表团党委书记。

开城的来凤庄自从1951年7月10日上午朝鲜停战谈判在这里举行以后，成了世人注目的热点。

从这天起，李克农便开始了身负重任、日夜不暇的两年谈判生涯。

这两年时间，李克农的责任范围之广，性质之复杂，日常面临问题的困难与重要，都超过了以往。每天的工作如此繁重，而他的身体状况又如此之差，却能以惊人的毅力支撑谈判班子，真可谓不同寻常。他常常是一边开会一边大把大把的吃药片，和谈判班子一起商讨对策，处理文电，组织实习，草拟电报和文件发言稿，谈判桌上无戏言，每一种方案都要反复字斟句酌，三思而行。李克农巨细必究，心思缜密，处处显现出他是外交上的第一流行家。

那些日子，由李克农主持的集体会议一般是在上午十点钟召开，先由第一、二线的同志汇报当天的谈判情况，当时开城

谈判代表团，分为前方，中间站和后方指挥三线。第一线是直接出面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谈判代表南日、邓华等。第二线是乔冠华、柴成文。柴成文是联络官，别人不便离开时由他来往传递消息。第三线是在幕后坐镇的李克农，负责掌握全盘。情况介绍过后，再研究出现的新问题。李克农归纳后，就谈判中全局性问题再作阐述，讨论出具体方针政策，形成文字上报中央、金首相、彭老总。每天开会至凌晨，便有电报发向国内毛泽东、周恩来处。他们二位不看过朝鲜“克农台”发来的电报，商议以后发了回电是不会去就寝的。回电通常一个半小时左右便可发回“克农台”，李克农看到了国内指示便对今天的谈判方案有了进一步确定。

有时来往文电每天多达十几份，电报内容十分丰富，大到谈判方针，外交策略，小到帐篷、食物，标点符号，事无巨细，国内有明确意见，实则是毛泽东一手指挥若定。

这个历史时期，毛泽东发给李克农的电文，大约有几十万之多。电文开头一般是这样写：“克农，并告金、彭。”

金是金日成，彭是彭德怀。

从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顺便引用两份：

关于坚持将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列入议程等给李克农的电报。1951年7月11日。

克农同志，并告金、彭：

来电收到。（一）撤兵一条必须坚持。（二）在各项谈判未得到完全协议以前，不要让新闻记者参加。只有在获得完全协议、在举行签字的那一天，才可以让双方同等数目的新闻记者参加。

毛泽东 7月11日7时

关于更换谈判会址问题给李克农的电报。1951年10月3日。

李克农同志并告金、彭：

关于更换谈判会议地址问题，经我们再三考虑，认为目前还应采用你们原先的主张，拒绝敌人这项无理要求，并准备与敌人拖一时期。因为敌人目前的政策是拖，我急他不急是无用的，到了敌人真想解决问题的时候，那时就可以扯拢了。因此，所拟复件，便可简单，对于未了事件的处理，既不取消，也暂不提，看敌人如何反映（应）。复件现附上，可于10月4日上午送出。北京拟在4日晚播，5日登报，请平壤亦同时发表。

毛泽东 10月3日10时

以外事情报专家著称于世的李克农，

此次在外交谈判中毫不逊色的表现，更加证实了情报和外交实际上是有许多相通之处的。

李克农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周旋于国民党和帮会组织之中，联络关系，收集情报，又多次担任办事处主任，和各种政治势力、各色人等打交道，有丰富的人际关系方面的经验，又有很高的谈判手腕，他忠实地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谈判战略思想，又将这种指导思想和灵活的策略结合起来，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随机应变，实事求是，从现实出发处理各种棘手问题。

两年多来，当年亲临谈判现场的人回忆起李克农，有这样一种印象：在风云变幻的谈判桌上下，在成千上万次会议、报告、讨论中，他如同调度演员、摄影师的导演，很少讲理论，也很少发议论，只是把实际的探讨方法交给你，并且很详细，时而用形象的幽默来协助表达思想，精心设计之后，他沉静地坐在观众席上，让人们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出场人物身上。

历史如是说，朝鲜战争中的用人安排上，处处表现出毛泽东的精明之至，李克农和彭德怀，一文一武，一打一谈，“打的坚决打，谈的耐心谈。”如同毛泽东手中一柄得心应手的双刀利剑。

李克农上任伊始，在第一次会议上就开宗明义：

“我们是为和平而来的，要把这个主张打出去，使它产生一种力量，也就是政策的威力。我们不要在会场上纠缠于枝节问题，主要是坚持三条原则：一、在互相协议的基础上，双方同时下令停止一切敌对军事行动。二、确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武装部队同时撤离三八线十公里，同时立即进行交换战俘的商谈。三、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撤退一切外国军队……”

李克农面对着桌边上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中国人、朝鲜人，从外表上看不出多大区别，只是语言、文化背景不同。他们一个个神情专注，埋头记录，李克农此刻心头充满了同甘共苦的友爱之情，但同时，他也想到了需要提醒大家一个重要的问题。

刚刚从厮杀的战场上来到会场上坐下来谈判，“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双方心理感情上还不适应。李克农反复叮嘱大家，“对于我们的同志来讲，我不担心哪位同志会在谈判中丧失立场，担心的还是多数同志年轻气盛，经不起人家的挑逗而冲动。”

他的担心不是多余的，谈判桌上唇枪舌剑，驻地上空常有飞机扫射，伤亡不断，

代表团成员心里憋着一肚子火，坐下来时还要彬彬有理。宠辱不惊，真是难上难。有时候就发现由于不冷静造成对方乘隙而追的情形。

李克农细心观察之后，在谈判对手中找到了一个活“教员”。他发现美方首席代表乔埃将军不仅是一个极端机灵的政客，还是一个沉着大度的谈判高手。他总是笑意挂在脸上，言词中寸土必争，并且在对手的连连逼问下方寸不乱，把那一双湛蓝色的眼睛眨动的狡黠而又富有表情。

李克农对部下指着乔埃那瘦长的身影说：“想一想，我们能不能做到把对方的长处吸取过来，成为我们手中的武器。”

他恨不得钢上加钢。

谈判不仅需要策略技巧，而且需要坚强的神经。谈判中有一个技巧就是“拖”，可以这样说，李克农这次可把“拖”的谈判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了。

李克农在1951年12月28日一时关于第三项议程（机场建设问题）和第四项议程（交换战俘问题）小组谈判情况给毛泽东、金日成、彭德怀的电报中说，我们计划：（一）对于第三小组，如对方继续采取拖延政策，根本不讨论什么问题，则我亦不急。他提议休会我即同意休会，表示我们不怕拖，（二）对于第四小组，继续以四万四千战俘的问题和对方的所谓五万多战俘的问题对抗下去。对于对方第一次交来及第二次补交来的外俘下落的问题回答，我们觉得亦不必忙于交给他们。

两个半小时后，毛泽东即回电：

“李克农同志并告金、彭：

12月28日一时来电，两组简报及附件均悉。同意来电所述各点，并且不要怕拖，要准备再拖一个较长的时期才能解决问题。只要我们不怕拖，不性急，敌人就无所施其技了。

毛泽东 12月28日二时半

于是就出现了谈判桌上的沉默对峙战。

后来，李克农又提出协议修正案不成熟就不如不签，拖一拖。

北京回电：李克农同志并告金、彭：

望即根据你们11月19日廿四时来电报所提三条在21日小组会上提出。惟20天仍改回为30天，即同意敌人所提的时间，因敌人急于求成，我们不应表示比敌人更急。我们的态度是能在30天内成立协议固好，拖长时间也不怕。

毛泽东 11月20日18时

北京来的每份电报上几乎都留下了李克农潇洒刚劲的繁体字笔迹，但终于有

一天，他的笔尖在一份电文上凝固不动了。

“家父病逝，望节哀。”

他大吃一惊，不知所措，泪水在心里翻滚，环顾左右，大家都沉浸在对眼前的谈判策划当中，他便把这份电报悄悄收了起来，又继续刚才的讨论，无论如何他无法回国奔丧了。

人渐渐散去以后，他怀揣电报，来到漆黑的帐篷外。默默向着家乡的方向三鞠躬，这些年他南北奔波，父母二老一直跟随着他，担不少惊，吃不少苦。1946年母亲在山西去世时，他正在北平军调执行部，没有回家；这次父亲去世，他又不在身边，并且在这样的环境下，连黑纱也不能佩戴，心中充满了悲痛与内疚，想着想着，泪水不觉流满脸颊。

从此一直到返回家乡，素爱整洁的李克农没有刮过胡须，以此纪念父亲。

冬季来临，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糟，哮喘也越来越重，经常大口大口地喘气，几乎失去知觉。一次正在开会，他突然头一歪，昏迷过去了，幸亏在场的人抢救及时，才苏醒过来。这次是心脏病复发，他的身体更加虚弱。

李克农强支病体主持谈判的情报没有能瞒过毛泽东、周恩来。中央担心他的身体支持不住，便开始考虑派人去接替他的工作，让他回国休息和治疗。

1951年11月，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根据中央决定，赴朝替换李克农。他日夜兼程赶到开城，看到李克农的身体状况的确令人担忧。

前面我们提到，李克农对于生命的理解，与众不同，他以为生命不仅是为着吃喝呼吸，而是为理想奋斗并且有所作为。只要一息尚存，没有丧失斗争的能力，就不能退出岗位。作为他来说，作一个无用的旁观者，目击别人在斗争中搏击，心灵的苦痛超过了肉体的疾病折磨。

但这个要强的人，如今已不堪一击。

他坐在朝鲜式的土炕上，视力微弱，眼睛几乎要贴在炕桌上面看东西。一会就要仰天躺一会儿，大口大口喘气，长时间的伏案，胸口挤压的很难受，心脏跳动时急时缓，好像停止跳动了。两只手也开始发抖，手中的笔几次从炕沿上滑落下来。朝鲜的地坑闷热干燥，很不适合像他这样的严重哮喘病人，隔一会，他就拉开门走出去，站在寒冷的夜空下，透几口新鲜空气。回来再把一把把药片塞进嘴里，端起白开水杯子，喝口水咽下去。

伍修权看到此情景心中十分痛惜。他

和李克农是老战友，在长征中，在延安，共同处事已多年，彼此讲话不忘讳什么。伍修权说：

“你的身体不好，中央让我来替换你一下。”

李克农喘了一口气，静静地闭了一会儿眼睛，一字一顿地回答：

“临阵不换将！”

他接着说，感谢中央的关心，我现在身体不太好，但是熟悉谈判工作的全部情况，已经摸透了各方面的规律，如果现在中途换人，一切又得从头做起，对整个工作不利，因此建议在我尚能支持的情况下，不马上换人。

三十多年后，伍老回忆这段往事时说，“临阵不换将”这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刻印象，表现了李克农对当时工作高度的负责精神和忘我精神，也表现了他的坦荡作风，我理解我代替不了他那个工作。当时第一助手是乔冠华，“乔老爷”可不好领导。1950年去联合国，我是代表团团长，他是顾问，那可是个大顾问，我还要受制于乔顾问，我们在工作中产生过一些不愉快。但他有很大优点，我虽向李克农说过，乔冠华很有才干，只是太骄傲。我和乔冠华之间的矛盾，李克农心中有数，他不怕我有什么想法，讲“临阵不换将”，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完全有办法领导好老乔，让我留下来就有困难。我决定观察一段时间，等克农病情有好转，又向中央打了报告，李克农可以继续工作了，我便返回北京，同时了解了谈判情况，这就是我的开城一月。

乔冠华在自己圈子里被称为“乔老爷”。他精力充沛，足智多谋，行文洋洋洒洒；张口妙语连珠，但高傲自负、不拘陈规。和他配合工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眼里也没有几个佩服的人。李克农坐镇开城，不仅在对外谈判中施展出卓越的策划才能，在协调内部关系上也得心应手。他一方面坚持高效、铁面无情的作风，另一方面体恤下情。

他和乔冠华一个队长一个指导员，尽管他感觉和乔冠华较难相处，有时非常别扭，但他从不当着人的面指责乔，也制止部下议论他的长短，他认为一个人有其长必有其短，而往往缺点正是优点造成的。

后来他们成了好朋友，乔冠华很有个性，但他毕竟是共产党杰出的外交家，他和李克农可以说在整个谈判期间配合默契，互相信赖。但真正令他感动的是在李克农死后了解到的一件事情上。

谈判签字后的第一个中秋节，乔冠华

喝醉了酒，摔了两个酒杯，大家劝他回去休息，他醉醺醺地说，我辛辛苦苦地给毛主席的报告，都是老头子一个人签名。

老头子指的是李克农。当时他并不在场。

事后，周恩来为此事狠狠批了乔冠华，并且让乔冠华给李克农赔礼道歉，写出检查，乔冠华也意识到自己做的太过份了。他向李克农承认错误时，眼泪都出来了，李克农只是平静地说，这事我早知道了，你眼里没有几个人，要吃大亏的。

李克农又向周恩来说情，不要处分乔冠华。数年后，乔冠华才知道这份情谊。他对人说，李克农对我这么宽宏大量，我深受感动。我写检讨是出自真心。

中朝两国一起参加谈判，人员中也常有些误解和矛盾。但不到半年，李克农威信有加，大家有话都愿意给他讲，使中朝两国工作人员融洽相处。

朝中方面的首席代表南日将军，讲着一口流利的俄语，他受过大学教育，又上过军事院校，开始有些看不起中国老农民的土样。而乔冠华更不是等闲之辈。平时他写了稿子别人一字一句都不能改，而南日又年轻气盛，两人发生了一些争执。

7月10日至7月底，是谈判斗争激烈的时刻，李克农在处理完公务之后，分别找乔冠华、南日谈心，在李克农神奇地说服工作后，这两位同样骄矜而富有才干的人不久便握手言欢。到了8月下旬，谈判进入更加紧张持久阶段，他们俩的关系处得可以说是相当好的，一直到谈判结束都关系融洽，配合有方。

李克农身上很快形成了一种吸引力，不仅中国人，连朝鲜人也找他谈心。李克农常说，如果我们内部就争论不休，人家会怎么说呢？我们不能自相争斗，要和睦相处，同舟共济才是。结果随着时间推移，中朝代表团里似乎越来越淡忘了国籍，彼此相处的和自己人一样。

代表团里的一位担任翻译的朝鲜族姑娘，未婚先孕，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快要瞒不住的时候，她的朝鲜族未婚夫也束手无策，姑娘泪流满面地求教于李克农，并把自己未婚夫的姓名告诉了李克农。李克农先是用父辈般的话批评了他们，又批了点钱，让柴成文安排女翻译到哈尔滨住一段，生过孩子再回来，为了保护这姑娘，他对任何人都未讲过女翻译突然消失又回到代表团的真正原因。连柴成文也是过很久才知道的。

这件小事体现了李克农关心部属的人情味，他在这方面赢得了代表团成员的

敬佩和赞赏。

1952年谈判中断，板门店会场冷冷清清，思乡之情弥漫在中国代表团成员心底，每到外交部派信使送文件、信件时，大家都眼巴巴地盼望着这一天。

有一次信使来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信使是乔冠华的夫人、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龚澎，派这么大的“官”当信使，这还是第一次，据说是周总理的安排。

大家正看着乔冠华、龚澎夫妇俩眼睛对眼睛，笑嘻嘻的样子很有意思，李克农把大家招呼到一边问，“你们看到了吧，周总理人家怎样做工作，做得这个细，咱们都学着点儿。”

李克农拍电报，请解方、柴成文等夫人来板门店探亲，不能前来的也千方百计捎信带话。这个做法深得人心。祖国亲人的到来，使冷清的驻地变得热闹而富有生气，大伙在一块开玩笑。“胡公就是胡公，我们学不来，咱们也学不来峡公，连夫妇和私生活也想到了。”

胡公是指周恩来，峡公是对李克农的尊称。他们两人有一个共同点：善解人意，富有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

对敌斗争中偏激和生硬常闹出笑话，有人把美军对方谈判车头覆盖白旗称之为敌人无耻的投降，这恰恰是负责安全的中朝双方提出并商定下来的，而中朝代表团的车头也是白旗覆盖，这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时有发生。谈判代表中有的刚从战争中走出来，满脑子是敌人，恨之入骨，便忘记了谈判方式。此间的许多来往文电内容李克农都记不清楚了，但是1952年周恩来写给他和乔冠华的一封信，一直没有淡忘，信中写道：

克农、冠华两同志：

我们的发言稿和新闻稿件中所用刺激性的词语如“匪类”、“帝国主义”、“恶魔”、“法西斯”等甚多，以致国外报刊和广播方面不易采用。各国友人特别是世界各国朋友们对此均有反应。望指示记者和发言起草人注重简短扼要地揭发事实，申述理由，暴露和攻击敌人弱点，避免或少用不必要的刺激性语句。国内方面亦将采取同样方针，并告。

周恩来 5月18日三时半

李克农可称得上是以智取胜的专家，但在周恩来面前，他深感自己还缺少许多东西。

1952年8月的一天，李克农家里传来一个喜讯，孙儿平安出世。得知李克农家添了一个孙子，代表团里大伙纷纷嚷着让李克农请客庆贺，李克农笑得眼睛眯成一

条缝，还真拿出了不轻易喝的茅台酒。席间有人提出给这孩子起个名字，议论了半天，南日大将说，“他是爷爷战斗在开城出生的，为了纪念这个地方，纪念朝中人民友谊，就取名叫开城吧。”

众人齐声称妙，李克农也笑着点点头，于是，一份带着美好心愿的新生儿名字电报到了北京。李克农夫人取其谐音为凯成，盼望凯旋成功归来之意。这个有双重意义的名字的婴儿，30年后已成为总参谋部里一名上校军官。

朝鲜谈判目的是为了停战，实际枪炮声不绝，连谈判中立区也常常发生炮击事件。一次李克农乘坐的吉普车被美国飞机扫射的子弹打破了轮胎，还有几发子弹擦着耳边飞过去，幸亏司机沉着镇定，车子没有扣翻过去。回来后，李克农的马靴上还有擦过的弹痕，许多同志都有些后怕。真是有惊有险。

1952年11月中旬李克农、乔冠华、解方、边章五等几位领导同志回国短暂休假，见到家人，李克农风趣地说，“差点儿翘着辫子去见马克思。”还拿出在这辆打坏了的吉普车旁拍摄的一张照片。这大概是李克农又一次在枪口下死里逃生。

李克农写信常常是洋洋洒洒，非常有味。这从他1952年给边章五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那时边章五暂时回国。

章五同志：

6月17日交信使带回的信包括头尾并加年月日共计334字，你的懒，你的吝啬已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建议在北京医院顺便检查，抽去懒筋，俾改懒病。

杜平同志6月17日去碧潼开敌工会议并彻底了解俘管工作。双瀑别墅，朝夕在一起的仅解、乔（即解方，乔冠华）、我三人。花影月下，柳荫溪前，不无寂寞之感，所以希望你病好后，如婉文愿同来开城的话，请早日命驾。我已托朱早观同志仍按去年旧例，请他代办一些“八一”、“十一”招待与联欢的食用品，如你有可能，即由你督促带回，否则由外交部派人送亦可。抗美援朝纪念章已代领三枚，除你一份外余两份请转郭得顺、李振发二同志。你回时必须向胡公（胡公，即周恩来。）处多求指示，对敌总估计、谈判前途（包括政治谈判）、对友可能援助的具体方针、今后干部安排等等，力求尽详，万不可再懒，否则见面时严重后果由你负责。聂总处你出院后应该去一趟，并替我请示问好，开城情况亦具体的报告一下。尚昆处必须去，因为他对代表团全体同志是关心的，同时也可在他那里请示一番。

“打灯笼的外甥”每天在板门店“照舅”，除两次休会共六天外，无更多的新闻可告。老乔身体甚好，我亦健康，反正胜利后再说，现在多谈无补于事。

好小说旧小说——如小菜加油等类的内容的小说，东安市场书摊上多得，能捎些来亦好，否则太寂寞了。

“来而不往非礼也”，你来信简单，我去信亦简单，但内容字数都超过你，我批评你懒的立场，还是端正的。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并问婉文同志好。

李峡公 6月27日

朝鲜停战谈判是一场军事、外交互相交织的尖锐复杂的斗争。而且是第一次面对美国作为直接的谈判对手，场内场外，波澜迭起，经常处于极度紧张状态。两年过去，原来满头青丝的李克农已双鬓斑白，乔冠华更加瘦削，每一个参与谈判的人员都有一种精疲力尽之感。1953年6月8日终于达成并签订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的文件，周恩来深夜打电话给李克农，慰问代表团全体成员，每个人都忍不住热泪盈眶。

紧接着，李克农倾注全力为争取达成停战和停战协定签订后各项条款的实施。在处理一些重大问题时，他的独创性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一件事是关于军事分界线划分的问题。

军事分界线本来在谈判之前我方已经确定，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但美方拒不承认，因为他们五次战役之后，东段三八线以北所占土地较之志愿军在西段三八线以南所占土地面积稍大。双方僵持不下，看来这个问题不解决，下面的许多问题无法解决，下一步谈判便旷日持久地拖下去。

李克农和乔冠华、邓华、解方商量后，又和参谋人员仔细研究，具体对比三八线的实际接触线得失。研究结果认为，不能光从地图上看面积大，志愿军在西段三八线以南地区人口多，物产丰富，而且有古都开城，较之东段三八线以北地区，无论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美军并沾不到什么便宜，在商得南日同意后，李克农大胆向中央发电，提出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建议。毛泽东、周恩来立即批准了这一建议，使军事分界线和非军事区的协议得以达成。

第二件事是著名的送签仪式。

1953年7月26日，是停战协定签字的头一天，经过千辛万苦争取到的时刻终于要降临了，中朝代表团驻地沉浸在一片喜庆的气氛当中，连新闻记者也到驻地来讨杯酒喝，高兴高兴。

但李克农此时却异常冷静，他皱着眉头在地上走来走去，越想越感到事关重大，便立即召集会议，他看着大家兴奋轻松的神情。脸庞一个个都消瘦了。他喝了一杯水，捋捋下巴一寸多长的胡须说，李承晚不得不接受停战，是在中朝人民军队打击下和美国政府安抚下不得已的，他不会破坏，谁也不能保证，如果破坏，最坏的可能莫过于在签字的时候搞一次使敌我双方不得不再打起来的行动。比如说对双方司令员的任何一人进行袭击，这种事件造成后果将不堪设想。

这么一提，大家立即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在胜利面前保持冷静头脑不容易呀！

经过反复研究，李克农说，我们完全拒绝李承晚集团的人员进入板门店中立区有一定可行性，但不可能完全限制记者入会场，这里面就可能出问题，还是不选择双方司令员到现场签字的办法，由双方首席代表签字后立即生效，然后各自向自己的司令官送签互换文本。

李克农的送签妙计立即得到了北京的同意，这完全是在预料之中。因为北京已经考虑到了这点，正在寻求解决办法。

值得耐人寻味的是，美方也很快接受了这一提议。看来对李承晚不放心的并不是一家。

早在一个月前，原定停战协定要签字时，李承晚制造了扣留战俘事件。彭德怀司令员从北京到平壤就和李克农通了电话。李克农说，彭总，现在李承晚是狗急跳墙，又在扣留战俘上出难题，制造危局。但这种局势很快会过去的，我们相信你仍然很快能到开城来。

“我一定会来的，这个李承晚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不晓得辣子的厉害！”彭总在电话里的吼叫声大伙都听见了，人们心里明白，这次该给李承晚来点“辣”的了。

果然，彭总指挥的金城战役也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最后一战，歼敌7800余人，收复失地七百七十八平方公里，给李承晚军以沉重打击，他不得不同意坐下来老实签字。

这就是会场与战场上的巧妙配合。

1953年7月27日上午十时，不寻常的签字仪式在板门店新修建的大厅举行。南日大将、哈里逊中将分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然后又送到美国陆军上将马克·克拉克，在汶山的帐篷里，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于首相府在停战协定上也签了字。按照双方商定，双方首席代表南日、哈里逊签字时间即做为停战协定签字时间。

7月27日下午，彭德怀如月前李克农之约，果然来到了开城来凤庄；7月28日上午9点30分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

彭德怀身材魁梧，脖颈却很短，他习惯于背起手走路，样子很像朴实的老农，但目光锐利，谁让他认真盯住一眼，心里的秘密再也藏不住似的。他签字时面对用血肉写成的文本，说了一句：可惜。

是可惜这文本来之不易，还是没有给敌方以更大打击，似乎有些可惜。

但，人民的和平愿望高于一切。

李克农这天一早就起床刮干净了胡子，为父亲蓄须纪念已过周年，停战谈判签字即将大功告成了，他边刮胡子边照镜子，那舒展的眉梢仿佛最能流露出他心中的轻松兴奋。

当李克农陪同彭德怀一步步迈上台阶，走进志愿军新修建的办公室签字时，记者拍摄下了这一历史性镜头。

和平第一天，李克农躺在土炕上，屏心静气地聆听窗上的动静。半夜时分，硝烟和火药味都随夏风荡然无存。一阵阵潮湿清新的空气扑进窗来，四周静寂无声，静得连虫鸣听得分明。近三年来，李克农紧缩的心第一次这么舒展地放松，周身的血液畅快地流通着，他心里默念道：

“和平是多么美好呵！”

这一夜，他睡得很沉、很香。

将近10年后，1962年2月11日北京之夜。张爱萍将军惊悉李克农去世的消息时，哀思如潮，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他披衣下床，展开白纸，饱蘸墨水，一挥而就：

悼念克农同志

“铁虎”原是纸老虎，板门店里伏山姆。

半生探囊忘己生，无名英雄足千古。

这首诗，是对朝鲜停战谈判中李克农的生动写照。

本文主人公的名字，年轻读者比较陌生，然而他也是与鲁迅、郭沫若等同辈的中国文化名人。他在我国现代文学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作用和地位，也是不可一笔抹煞的。读者将从他女儿的这篇回忆录中，了解他的经历、业绩和风貌品德。

一名 代士



我的父亲林语堂

1911年的一天早晨，生活于中国福建省乡村的林氏家庭乘船离家，送二十岁的梅昆出嫁。与此同时，他们还要把十六岁的林语堂送往上海读书。这是对林家有着重大意义的一天。

梅昆也想上大学，但她作牧师的父亲不答应。对当时的女子来说，受教育是一种奢侈。所以，当梅昆意识到上学无望时，只好同意出嫁。

结婚那天，梅昆掏出40文钱给了语堂，说：“我们家很穷，我只能给你这么多。我是个姑娘，不能上大学。弟弟，你要珍惜这次机会，努力学习，要有出息，光宗耀祖。”

这些话使语堂觉得他似乎将代表姐姐去上学，而且一定要实现她的希望。但她未等到实现的这一天。结婚的第二年，梅昆就因鼠疫死去。

当父亲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的眼里充满了泪水。我坐在他的书房里，周围环绕着他的著作。我知道，梅昆的话一直在影响着他。

在世八十年，父亲著有（翻译）五十多本书，是世界著名作家。他去世时，《纽约时报》这样评价：“作为翻译家，林语堂对西方的思想、习俗、愿望及人们心理的理解可谓独一无二。”父亲集小说家、散文家、哲学家、语言家、字典编纂学家于一身，还发明了中文打字机。

父亲出生于1895年，即光绪21年。他兄妹八个，在六个儿子中排行第五。他的童年幸福快乐，充满了乡村的鸟语花香。他曾对离开这田园风光之地的人感到迷惑不解，但他又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祖父对他讲过世上第一架飞机的故事。“我读过有关它

的一切。”祖父说，“但我不知道我是否可以相信。”祖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敏捷、幽默、富于想象。他把从国外传进的现代思想灌输给孩子们。中国正受到日本和西方列强的威胁，她必须迎头赶上，通过科学进步使自己强大。所以，祖父决定，他的孩子必须接受西方教育。

父亲八岁时，就宣布自己想成为一名作家。他的一个小学老师曾这样评价他的作文，“像一只正在穿越稻田的蛇。”意思是拐弯抹角，含意不清。父亲反批道：“是一只穿越沙漠的爬虫。”意指他是一个小人物在探求知识。对林氏家庭来说，求知的欲望如饥似渴。祖父给他的孩子们上课，孩子们一起学习，编造故事。当父亲经过书铺时，他总是希望能买下每一册书。他觉得自己与那些对人生无多渴求，能够结婚，生儿育女，有一个好职业就心满意足的人格格不入。

父亲做好了上大学的一切准备。那年夏天，家乡突然变得很小。世界如此之大，历史如此之长，他渴望去听、去看，去体验人生的一切。

“没有钱无所谓”

上海圣约翰大学重视英语。父亲入学后，将第一学年中的一半时间用于掌握语言。并开始研究语言学。

第二学年快结束时，父亲因学习上成就获得了四项嘉奖。消息传到家乡，也传到邻校——圣玛丽女子学校。在那里，父亲遇到一个来自厦门，学艺术的漂亮姑娘。然而，当她的父亲，一个富有的医生，得知一个牧师的穷孩子在追求他的女儿时，他感到不高兴。医生已经决定将女儿嫁给另一富家的儿子。因此，他试图把邻居廖家的女儿介绍给父亲。这个姑娘叫翠凤。

得知这一消息，父亲很生气，觉得蒙受了耻辱。但当他把自己对医生的女儿的爱情告诉他大姐时，她叫道：“你疯了！你怎么养活她？！简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他明白自己的目标毫无希望。回到上海时，他变成了另

一个人。

第二年夏天，父亲去廖家吃了一碗晚饭。翠凤在屏风后偷偷地观察他。她知道将与他订婚。翠凤的父亲拥有一片商店和一个货栈，而且经营得不错。翠凤喜欢眼前这个活泼的年轻人，他无所顾忌地打着手势，充满自信。他不修边幅，胃口也不错。她渴望嫁给他。

她母亲问她：“你怎么看这桩婚事？林语堂是个聪明的年轻人，但林牧师家很穷。”翠凤的回答连她自己也感到吃惊：“有没有钱无所谓。”

父亲的大姐全力推荐翠凤。她是个标准的中国姑娘，而且肯定是一个贤妻良母。她颇具魅力：大眼睛，高鼻梁，动人的唇和一双大耳垂——幸福长寿的象征。父亲同意了这桩婚事。

但他们没有马上结婚。父亲于1916年毕业于，应聘去北京清华大学任教。在那里，他苦读中国历史，参观那里的楼堂殿宇、长城和十三陵。此时，他感到先前所受的基督教育实在不够。他知道来自北方的号角吹倒了长城，却不明白孟姜女哭倒长城并埋葬自己的故事。

父亲决心补上所缺的课。他赶到书店，询问要读的最重要的书有哪些——因为他实在不好意思去问别人。他犹如传说中的猴王回归森林，采集祖先遗产中的鲜花与果实。

在阅读的时候，父亲试图发明一种更易查阅中文字典的方法。23岁时，他出版了《汉语索引系统》，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为之作序。著作引起学者们的广泛注意，并成为进一步变革的催化剂。但父亲很快就对自己的方法感到不满意，一生都在继续修订，最后形成了不朽的著作：《现代汉英词典》，在77岁高龄时出版发行。

在北京，父亲与著名学者胡适相识，并为其所吸引。早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时，胡就倡议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回北大执教前，胡已经以文学革命领袖而闻名。他认为，中国必须西方化，否则就不能赶上时代的发展。他的追随者在后来爆发的“五

·四运动”中，向文言文、包办婚姻及妇女缠足等发起了挑战。这正处社会骤变之时。

父亲在清华执教三年，随后取得去美国哈佛大学文理研究生院留学的资格，享受半额奖学金，以近代语言为自己的研究专业。这时他认识到不能再推迟婚事了。翠凤已24岁，如果还不与她结婚并一起赴美，那对她就太不公平了。

廖家给女儿一千元钱作嫁妆——这是一个不错的解脱。俩人购买了赴美的单程船票。廖家的唯一要求是，不要向家里讨回程的盘缠。

祖父体验着一种完全不同的感情。儿子将去著名的哈佛大学学习，他感到非常高兴，他的梦想开始实现。

国外求学

新婚夫妇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租了两间房子安顿下来。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他很活跃，而她却喜欢安静地坐着；他能言善辩，而她却不知道怎样把自己的情感变成美妙的语言；他喜欢肉，而她却喜欢鱼；他情绪高昂，而她却忧郁悲伤；他喜欢阅读，有时甚至听不到她在对他说话，而当听到他说不喜欢《圣经》时，她会觉得感情受到了伤害。

父亲有时独自一人坐在窗前，吸着烟，沉思到天明。他似乎不需要多少睡眠，次日醒来仍然充满活力。

翠凤决心作一个好妻子。当父亲把读到的东西讲给她听时，她会费力但认真地倾听。年底，父亲的经济来源中断，翠凤又拒绝向她家里要钱。绝望中，他给胡适发报，请求从北大贷款，因为赴美前曾答应学完后去北大任教。胡教授寄来一千元，但这不足以使父亲维持到在哈佛完成学业。

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时已经结束，中国派了15万劳工去法国。父亲接受了教授这些人用英语写与说的职位。父母俩移居法国。

不久他们去了德国耶拿大学，那里的生活费用较低。父亲在那里上课

并把学分转到哈佛大学，取得硕士学位。接着，他又让胡适从北大给他寄了一千美元，并去莱比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这时他可以集中精力钻研中国语言学。他给祖父写信，祖父很自豪，但他未活着看到自己的儿子从海外回来，于1922年在家乡去世。

翠凤在渴望。他们不得不返回祖国，因为孩子就要出世。父亲对获得博士学位充满了自信。他买了船票跑回家时，翠凤正在门口焦虑地迎接他。

“怎么样？”她问。

“没问题。”他回答说。

她如此高兴，以至于在街上就吻了他。

1923年，一回到北京，父亲就跑去向校长表示感谢，感谢学校借给他的两千元。

“什么钱？”校长问。

这时父亲才明白胡适是把自己腰包里的钱借给了他——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一个有良心的人

他们回到祖国时，局势混乱，封建军阀之间相互混战，担任北大英语系教授的父亲开始写文章批评腐败、低效率的政府。

1926年3月，在天安门广场上爆发了大规模反对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一天早晨，父亲接到他的一个得意门生的电话，询问能否请一天假去参加游行。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父亲当时已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英语系的教导主任。

当天下午两点，他听说打电话的学生死了，是段祺瑞军阀政府派军队镇压了学生，死伤有二百多人。对父亲来说，他们的死就像国家的灭亡。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里，父亲分析了当时中国的状况，敦促各党派联合起来，推翻军阀政府，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战。

自回到中国，已成为母亲的翠凤就一直为丈夫的安全担忧，她不止一次地劝他致力于教学，不要批评政府，招惹是非。可他听不进去。

“批评犯错误的人是一个学者的责任，”他说，“如果一个人有独立的思想，如果他是真诚的，那他必须批评（错误）。”

他不仅写文章，还参加示威游行，用竹杆和砖头与警察战斗。一次，他的前额被刺破，留下了个永久的伤疤。他说他扔砖头很在行，因为小时候常学着往水面上扔漂石。

封建军阀继续镇压。屠杀学生后，段祺瑞下令逮捕50名批评政府的教授和报人，父亲也名列其中。两位编辑被逮捕后，当天晚上就遭枪杀。

“这次你可做到头了！”母亲哭着说。母亲有些愤怒，她刚生下第二个孩子，也就是我。当她从医院回到家时，发现父亲正在准备绳梯，一旦警察来了，可以越墙逃走。

“要跑，就一起跑。”母亲叫道。全家人开始逃往一家法国医院，然后又藏在朋友家里。三个星期后，我们回到厦门，父亲在厦门大学任教并担任文学院教务主任。许多北大教授，包括著名作家鲁迅也在那里。但是，校园政治使父亲难以继续呆下去。一年后，由于敬仰当时的外交部长陈友仁，他到武汉政府外交部任职。1927年，蒋介石推翻了武汉政府，立南京为首都，父亲辞职，举家迁往上海。

在上海，父亲开始编纂《开明英语课本》，并取得成功，被采用为中学教材。

如果我不出声，父亲允许我在他的书房里玩耍。我经常在打字机上用英文打字，我喜欢他的机器。我记得他曾说过：“如果有一台同样容易操作的中文打字机就太棒了！”

我喜欢在父亲工作时呆在他的书房里，我愿意亲近他。屋子里装满了书，但散发着香烟味。我常帮他削铅笔或灌墨水，当我不耐烦时，就爬到他的膝盖上问他在做什么。

“写作。”他总是说。

“我也想成为一名作家。”我说。

“要成为一名作家，你必须对周围的一切感到好奇，深深地感觉，对事情要有比别人更多的理解。”他教导我

说。

他把书房叫作“未完成的影棚”，并解释说：“我从未实现孙中山的愿望，没有阻止自己在做礼拜时心不在焉；我从未翻过跟头——无论是体力上，精神上，还是政治上。我甚至不知道风是怎样吹的；我从未说过任何话去取悦别人，也从未有这样做企图；在探讨国家政治时，我从不冷静，也不圆滑。”

弄潮儿

1932年，随着《论语》期刊的创办，父亲在中国获得声誉。杂志以幽默和讽刺见长，他的文章吸引了大量读者。他曾这样嘲讽腐败的政府官员：“虽然你是一名官员，但看起来不像个人。”每一期，学生们最先要读的便是父亲的短文。

父亲打动人心的诙谐语言使之声誉大振，人们称他为“弄潮儿”和“幽默大师”。1934年和1935年，他又创办了半月刊《人间世》和《宇宙风》。与此同时他在《中国评论》杂志上主持英文专栏“短评”。他还着手编纂具有《牛津词典》风格的中文字典。

对父亲来说，生活就是获取知识的旅程。他学习中文、希腊文、法文并研究英国哲学家。每天上午他工作完走出书房，犹如他刚去世界旅游了一趟。接着又埋头工作。

父亲把持家的事完全交给母亲。他把母亲从严厉的儿时教育中解放出来，告诉她应该享受生活。她并非对他说的全都相信，依然去教堂做礼拜，以她独特的方式无微不至地关心着我们。

母亲身高五英尺，腰板挺直。她戴着一副无框夹鼻眼镜，一边用细链钩住耳朵。她对在德国购买的这副眼镜感到自豪，因为很少有人长着足够高的鼻梁来戴这样的眼镜。

母亲生了三个女儿，没有儿子。父亲并不介意。他不迷信传宗接代，尽管这在中国十分重要。“生活犹如一场梦，人类如时间长河中的旅行者。”他写道，“在此地装船，而在彼地卸船，

以此为候者腾出空间。”

父亲浪漫，而母亲现实。一次，我们去无锡旅行。行前，我们告诉佣人第二天才能回来。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当天晚上就赶了回去，发现厨师与佣人正在父母的床上睡觉！母亲甚感气愤。“把床单换掉！”她喊道，并说翌日就要把这俩人解雇。

我年少而天真。“为什么一定要解雇他们呢，妈妈？”“把床单换掉，把一切都整理好。”

父亲失声大笑，并为厨师求情。厨师留了下来。父母亲配合得很好。“婚姻中追求浪漫的人终将失去它。”父亲写道，“而忘记浪漫，安分守己，乐观向上的人终将得到它。”父亲是个矮个子，身高只有五英尺四英寸，但身体健壮，前额微突，两眼深邃。他给人最深的印象是精力充沛。记得一天晚上，他叫我去花园，从书房透出的灯光照着一只蜘蛛，正在玫瑰枝上结网。“看看”，他叫着，“一个蜘蛛竟然知道结构如此了不起的网，而且在上面爬行，真是不可思议！”

我学过的知识说明蜘蛛网很脏，但爸爸解释说，只要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好自己的事情，那它就是美丽的。

山之子

父亲发表在“短评”上的短文，引起美国作家赛珍珠的注意，她当时正在中国，她的小说《大地》获得过普利策奖。“这个栏目对日常生活的某些方面作了新颖、敏锐和准确的评论。”她写道，“使我钦佩的是它的无所畏惧。”

两位作家在一天晚上相遇。他们正在议论在中国的外国作家，父亲突然说，“我很想写一本书，谈谈我对中国的确切感受。”

“你正是做这种事的人。”赛珍珠热情洋溢地回答。

父亲于1935年完成了这本书，叫作《吾国吾民》。它剖析了中国所存在的问题，同时，也赞扬了她的美德。这本书使他在西方成为中国的著名翻译

家和作家。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黑暗的年代。在书中，父亲分析了中国人民的道德观念及理想。“中国太大了，她的国民生活有许多方方面面，”他写道。“我剖析她的问题是因为我没有失望。”

“如果一个人必须是一位作家，”他说，“他应该有勇气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与成为一个好作家相比，成为一个好人更重要。”

父亲已经41岁，从他离开家乡，所见所闻常使他怀念故乡的高山、简朴而快乐的童年，以及祖父对他的期望。“如果你住在山村，你在内心里永远是一个乡娃，不会改变。”他说，“家乡的山峦影响了我一生。它们使我变得勇敢，也教我谦逊。它们使一切，金钱、政治、名利，变得渺小。这些山峦给我以无限的内在力量和独立，谁也拿不去。”

1936年，在赛珍珠的建议下，我们举家迁往美国，原来只准备呆一年，可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只能滞留在海外。上海成为战场，当那里的战斗结束后，父亲得知他未带往美国的52册中国字典的手稿被毁，悲痛万分。

在纽约，父亲开始着手写《生活的艺术》，这是他最出名的著作之一，为他的哲学思想构筑了框架，成为1938年美国最畅销的书，并被译成12种语言。

谈到家庭的重要性，父亲写道，“在我看来，任何文明的最终检验是，丈夫们、妻子们、父亲们及母亲们将成为各种类型的人。除此之外，文明的每一个成就——艺术、哲学、文字和物质生存——都会黯然无色。”

成功并未改变父亲。“我仍然是个婴儿，睁大眼睛观察这变化无穷的世界，”他说，“我有很多东西要学，任何事情都引起我的好奇。我只有一个兴趣，即更多地了解人生，它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并把它写出来。我不喜欢名利，即使它闯入我的生活。”

创造性的发明

战争结束后，父亲参加了一次探险活动，这花费了他的毕生积蓄，并负了债。但我仍深深地敬仰他的勇气和忠诚。

父亲决定发明一台中文打字机，以便任何人不经训练就可以使用。由于他写作并编辑了一本很受欢迎的著作集。其中包括1942年写成的《中印名言录》，他觉得可以担负这笔费用。事实上，早在二十年代一到北京，他就一直试验发明一台打字机。他认为他可以完成，尽管中文有成千上

▶林语堂和他的妻子



▶林语堂及女儿在试验打字机

▼林语堂及三个女儿。



万的表意文字，而英语只有 26 个。

当时有一种中文打字机，是根据《康熙字典》系统发明的，但很复杂，要学会怎样使用需要六个月的时间，而且打字并不比手写快多少。

为了能早日完成发明，父亲黎明即起，直到半夜才入睡。在纽约中国城，他发现有一印刷工可以铸造汉字，接着，他帮助购置了机器和车间，开始生产零件。

我当时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常陪父亲去车间视察进展情况。要解决的问题一个接一个，预算也在不断增加。随着父亲的积蓄在消失，母亲开始不安。她太了解自己的丈夫了，他在生活上无所谓，在其它事情上却倔得很。发明打字机便是其中之一。

父亲的一个朋友卢清才闻讯后，慷慨解囊，使试验得以继续进行。终于，在 1947 年 5 月，父亲完成了自己的发明，把它带回家，起名为“明快打字机”。打字机有 72 个键，屏幕也相当好。

我开始练习打字。机器也绝非完美无缺：声音大，而且跳字。但它确实令人感到惊奇。我能够找到需要的字。逐渐提高了打字速度。

一个雨天的早晨，父亲与我携带打字机来到曼哈坦区中心的莱明顿打字机公司，屋里的人正翘首以待。我们把机器放在一张小桌上，我在桌前坐下。

“世界上有四分之一的人在使用汉语，”父亲开始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实用的中文打字机，中文里表意文字多而复杂。我刚发明了一种打字机，只有 72 个键，任何人都能使用，甚至不需查看屏幕。”

父亲示意我开始操作。在工作人员的注视下，我按下打字机键盘，没有反应。再试另一个键。仍无动静。父亲过来又试一次。机器仍不工作。我们又试了几分钟，最终父亲只好对工作人员表示抱歉。死一般的沉默。我们把打字机装进箱子，离开了。我能够想象那些美国人正在想什么：“林语堂疯了？”

外面大雨倾盆，好长时间我们才找到一辆出租车。发生了什么？我疑惑不解。在家里，打字机干得很漂亮。第二天将有一个新闻发布会，父亲将向世界宣告他的发明。我们应取消发布会吗？

父亲立即给车间的机械师打电话。人很快就赶来，几分钟内，打字机就恢复完好如初。在第二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打字机工作得相当顺利，赢得广泛的好评，我们收到大量贺电和鲜花。我为自己能给父亲一些帮助而感到骄傲。

但父亲负债累累。一天，我回家后发现母亲正在哭泣。父亲与许多打字机公司取得联系，但没有结果。中国正在内战，对这个最大的潜在市场丝毫无把握。

1948 年，美国林诺打字机分公司同意生产中文打字机，期限为六个月至两年，每半年给父亲五万美元。数目不大，但我们很受鼓舞。后来父亲以二万五千元的价格将专利卖出，另有百分之五的专利使用费。但明快打字机终因成本太高而未能生产。

1965 年，我担任《读者文摘》中文版总编后，试图把专利再买回来。我找到多年前负责此项目的工程师。他对我说：“你晚来了三个月。打字机在我们公司躺了近 20 年，公司搬家时，我把它扔了。”

1985 年，台湾美太克机械公司购买了父亲的《快速索引系统》，并使之成为计算机输入系统。“这是我对中华民族的贡献。”父亲说。

生命的意义

1948 年，父亲应邀担任设在巴黎的联合国科教文组织 (UNESCO) 艺术文学组组长一职。父亲卖掉公寓来还债。就在起程的前几天，美国国家税务署突然来了一封信：赴法前，父亲必须交纳三万美元的个人所得税。父亲手抚前额喊道：“噢，上帝！”

他再一次求救于好友卢清才，然后加一些版权收入，总算交足了税。父

母亲及妹妹香橘带着三十多箱书离美去法。刚结婚的姐姐菊梓和我留在纽约。

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里，父亲撰写回忆录，起草报告，参加会议。他发现自己的计划被打乱，并显得焦躁不安。“世上有两种动物，”他曾写道，“一种只管自己的事情，另一种却在管别人的事情。前一种为食草者，如牛、羊及脑力劳动者；后一种为食肉者，如虎、鹰及体力劳动者。我经常羡慕同事们的管理能力，然而我从来就对此不感兴趣。

哥伦比亚大学为外国学生准备了一个聚会的地方，叫作国际小屋。在那里，我遇到了黎明。我们决定结婚。遵从父母的意见，我们在巴黎举行了婚礼。再次见到父亲，我感到很吃惊，他体重下降，头发脱落，而他只有 54 岁。

1949 年，父亲辞职并迁于法国坎内，在卢清才的别墅借居。那是一座漂亮的住宅。一天午饭后，我们坐在阳台上欣赏花园风光。突然，我问父亲：“死后还会有生命吗？”

“死后不会有生命。”他回答说，“有生必有亡，这是自然规律。在这一点上，人与蜜蜂之间没有差别。”

我记起他所写的：“没人能说生命从少年到中年再到老年不是一个好的安排。一年有春夏秋冬，一天有早晨、中午和黄昏。如果采取生物学的人生观，只有傻瓜和不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才会否认人生犹如一首诗。”

看着他变白的头发和那双深邃的眼睛，我突然感到悲哀，甚至害怕。我不愿时间流走，不愿人们变老，我要永远把握住现在，然而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甚至感到自己腹中的胎儿在成长。

父亲在《生活的艺术》里这样写道：“信仰自然规律，就像意识到我们最终会像一支蜡烛一样逝去，是一个好事情。它使我们镇定，虽有一点悲哀，但会使我们中的大部分充满诗情画意；它使我们下定决心去虔诚而有意识地生活，对自己的缺陷有清醒的

认识；它也带来和平，因为心灵真正的和平来自对最坏事情的接受。”

父亲热爱法国的南方，他渴望简朴的生活——坐在屋里观望回归的渔船。这里的生活比在纽约更能使人接受。他还想租套房子，恢复写作，作一名自由自在的人。他攥着母亲的手说：“翠凤，不要紧，一切从头开始。我的这支笔还能赚点美元。”

在坎内生产后，黎明和我带着新女儿回到他在马萨诸塞州的家。妹妹到纽约读大学。姐姐离了婚，心情忧郁。母亲太想念我们姐妹，所以父母也回到纽约。

南洋往事

1954年10月，父母亲、妹妹、黎明、我以及我们的两个孩子乘机前往新加坡。迎接父亲的是南洋大学常务委员会的成员及当地华人界的二百多名代表。对那些在这块殖民地上组建了第一所中文大学的人来说，这确实重要的一天。林语堂，大学的首任校长乘机到达。

当地华侨界领袖此前给父亲写信时说：“如果不采取措施来保护我们的文化，从现在起十年，我们这里的教育根基就会颤抖；二十到三十年内，我们的语言和文学将会消逝；四十至五十年内，我们就不会再叫我们自己是中国人。”

父亲认为，一个人很少会再有比这更振奋的职业。但他仍然坚持他要有绝对的行政权力。学校要有严格的、纯正的、无政治色彩的宗旨，学校教师要有绝对的思想自由。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南洋应是一流的大学。

父亲要黎明担任学校的常务秘书。此前，黎明在联合国翻译署当翻译。但我们还是决定去南洋，因为他在哥伦比亚师范大学学习过。而且这正是他学有所用的机会。

然而，校园里仍然充满了政治气氛，这与父亲的愿望不符。最后，父亲终于辞去校长的职务。

“显然，我只能辞职，除非我抛弃

我所坚持的一切。”父亲后来在《生活》杂志里写道：“我的职位难以保住。世人认为我和我的同仁可以牺牲，这办不到。根据常理，我下令撤退。”

父亲并未因为在南洋大学的这段不愉快经历而改变自己。离开新加坡后，他和母亲回到法国坎内。黎明在英国广播公司（BBC）找到一份工作。我与他迁移到伦敦。父亲又开始写作，母亲在阳台上栽种土豆。虽然已年届六十，但父亲并不觉老。“我不渴望春天，但在秋天里也不感到悲哀，”他说，“因为我妻子不觉得我老。”

父母亲生活简朴，犹如儿童。他们相依为命。幸福快乐。每吃到一次新鲜的饭菜也会感到高兴。他们还一起散步、逛街。“只有成为一个心胸豁达的哲人，一个人才能聪明。他首先感受到生活的悲剧，然后才是喜剧。所以，笑之前，我们必须哭。超越悲哀才会觉醒，超越觉醒才会豁达。”

他应该写写他自己。

父亲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人，但我觉得在他心灵深处有我们谁也不能触碰的东西。他是个天才，或许需要别的天才来陪伴。“人类的特点之一就是理想的永恒追求，生活在这个现实世界，却梦想另外一个世界。”他说，“联想越丰富，越难以得到满足。”

满圈

重返美国两年后，父亲又恢复信仰基督教。在此之前，他脱离基督教有三十多年。1959年出版的《从异教徒到基督教徒》一文，叙述了父亲的转变。

“三十年来，我唯一的信仰是人道主义：理智指导下的人类对自己会感到很充足，知识进步的本身将自发地带来一个更好的世界。然而，在我生活的深层产生了一种因事物的反映和经验带来的不安。我意识到人类本身不断增长的信仰并未使自己似神如仙。他变得越来越聪明，但在上帝面前，镇定和谦逊却越来越少。教条主义使我很难听到信仰的内在声音。”

“因此，正当我处在十字路口之时，一个星期天，妻子说服我陪她去教堂，这是一个转折点。连着几个星期，我回到教堂。我在那里很快乐。几乎是自然，我重新信仰了基督教。”

但是，在父亲到达转折点时，姐姐却难以从离婚的阴影中恢复过来。她感到沮丧。无论父母说什么也不能把她拉出来。父亲因此而压力很大。

1962年，黎明在香港政府情报服务部就职，父亲来港，准备与我们住几个月。他好像在寻找什么。

我们带他观光。我说香港因山水风景而显得非常漂亮。但父亲说这些山不够好，不如他家乡的山。哦，他在寻找孩提时代的天真与幸福。

“在你母亲身上，我造就了一个好女人。”父亲喃喃地说，“而你姐姐却在慢慢地灭亡自己。”

母亲从纽约来电说姐姐生病，所以，父亲只呆了几个星期就飞回美国。

1965年，父亲70岁。他认为该回东方的时候了。在访问台湾时，发生了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人们说的是父亲家乡的方言，就好像他又回到了故乡，尽管并非如此。他觉得与他们有着自然的直接联系，因而决定以台湾为家。

蒋介石许诺为父亲建造一幢房子，他接受了。这幢父亲亲自设计的房子建在台北郊区的阳明山上，面向群山，下面是一个花园。

父亲为此写一首诗：

家里有花园
园里有院落，
院里有大树，
树上有蓝天，
天上有月亮，
哦，我多么幸福！

在此地，父亲撰写《无所不谈》专栏，全球中文报纸争相转载，读者达五百多万人。

1969年，父母亲庆祝了他们的金婚纪念日。当被问到婚姻成功的秘诀时，他们只说了一个字：“让。”

父亲回忆起母亲在其经济来源中断后不向家里要钱的情景，并说她是

一个伟大的女性。母亲则回想起父亲第一次去廖家吃饭时，她怎样在屏风后偷看的情景，她承认当时她正在数他吃几碗米饭。

父亲为自己的女儿而感到自豪。香橘是生物化学家，在香港大学任教；菊梓在台北博物院工作；我刚任《读者文摘》中文版总编。但事实上，姐姐并未痊愈，有时她会感到莫名的恐惧，焦躁不安，看起来完全脱离了现实。

父母亲为此焦急。但父亲把自己描述成为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欢迎人生。”他似乎在逆境中也能看到光明。他认为他能从痛苦中解脱出来，而普通人却在痛苦面前退却。

“难道他不像其他普通人一样吗？”

1969年，父亲被推选为台湾国际笔会会长，两次——1972年和1973年——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那时，他正在编纂《当代汉英词典》。社会与技术的发展急需一本新的汉英字典来满足人们的需要。

像以往一样，父亲长时间、努力地工作。完成最后一页的那天，他两眼模糊，看不清他写的是什么。第二天早晨，母亲发现他面颊绯红，双唇扭曲。在医院里，医生说他有中风的前兆。

我飞往台北，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谢天谢地，父亲像以往一样，并与我们开玩笑。医生说，几天后他就可以出院，但需要至少两个月的彻底休息。他的思想没有受到损害，我如释重负，返回香港。

一天下午，我刚从办公室回到家里，电话铃响了。是父亲。

“你姐姐今天上午自杀身亡。不要着急，我会照看好你母亲。”他说。

“什么？”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正在与博物院院长吃午饭，这时有人来找我，”他说，“清洁女工发现她吊在自己屋里的屏风梁上。”

大地在我脚下颤抖。妹妹、黎明和我赶往台北。一进家门。父亲扑向我大哭起来，母亲倒在妹妹的怀里。此时我明白，我们的位置与父母换过来了。以前他们照顾我们，从现在起我们要照顾他们。父亲76岁，母亲年轻一岁。

葬礼后，我们把他们带到香港。我每天去妹妹公寓看望他们。“我活着为什么呢？”母亲自问。她变得很少说话，忘记了微笑，即便是孩子们去看望她，也是如此。她非常警惕，观察父亲的一举一动，害怕他会中风。她面色灰白，双唇紧闭。他们俩似乎一夜之间上了年纪。

父亲紧张地校对字典。一天晚上，我们带父母亲去一家著名饭店吃烤鸭。餐后，父亲突然吐血不止。

医生说 he 因过度劳累而引起肠下垂。当我去看他时，他侧卧在床，沉着睡。我盯住他那稀少的白发，淡红色的额头，他只剩下一把骨头、神经、血管、肌肉和器官了。难道他不像其他普通人一样吗？我问自己。他的光辉精神真的藏在那里吗？我听到他在深深的喘息。睡吧，爸爸。我想，连梦都不要做。然后，我离开了，心被一种从不知晓的伤感扭曲着。

从医院回到家，父亲的体力开始恢复，本性回归。我听到他对母亲说：“女儿们有自己的生活要过，只要我们能做的事，就不要麻烦她们。”但母亲只想依靠孩子。父亲不愿放弃他非常喜欢的台北房子，但他最后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香港度过。

镶满珠宝的花冠

被父亲称为一生中辉煌成就的《现代汉英词典》，于1972年隆重出版发行。这是第一本由中国学者编纂的汉英词典。《纽约时报》称之为“世界两大语系联合体的里程碑。”

1975年10月10日，香港的朋友们隆重庆祝父亲80大寿。父亲穿上西服，打上领带——他好久没这样了——母亲给他梳了头。我身着长服，沉

浸在父亲成功的荣誉海洋里。

台北为父亲举行了更隆重的庆祝活动。

父母归来时，我去机场迎接他们。父亲的眼睛泛着兴奋之光。他的杯子是满的。他想到而未得到的唯一荣誉是诺贝尔奖。但对此，他又回到自己的哲学本性。“让我们现实些”，他说，“我们应该持这样的态度：对生活不要索取太多，也不要太少。”

父亲曾就变老和不可避免的生活规律写道：“我喜欢春天，但它太年轻；我喜欢夏天，但它太傲慢。所以，我最喜欢秋天。它知道生活的局限并且满足现状。早秋的风吹落银色的树叶，在大地上欢快地跳跃。你不知道这落叶的歌曲是笑声之歌，还是分别的眼泪之歌。”

我以为我对生活知道得很多，但我还有一堂课要上。位于波士顿的西蒙斯大学教授A·J·安德逊编辑了一本书，名为《林语堂：最好的老朋友》。父亲在前言里写道：“我喜欢的一位老作家说过：‘古人不会被迫开口，但他们突然完全自愿地谈论。他们有时所说的是事件，有时是他们自己的感情。说完了他们要说的，他们就告别而去。’同样，我完全自愿地写作，说完了我要说的，人也要告别而去。”我感到震惊。他是在预卜自己的死期吗？

父亲变得非常容易流泪。一天，我为他做了一条鲜美的鲤鱼时，他哭了起来。圣诞节，我带他去百货商店。在一个柜台前，他拿起一些装饰物一个一个地看，洒下两行热泪。我有些生气。原谅他吧。我想对售货员说。这个人太热爱生活了。他曾说过，如果不快乐而只求活着便心满意足，那就是忘恩负义。读了他写的书，你就会明白他为什么哭了。

不久，父亲不得不使用轮椅，即使在家里也一样。晚上，他有时从床上掉下，不能爬起来，就躺在地板上直到天亮。

“你为什么不喊我呢？”妹妹问。

“我不想叫醒你，”他回答，“早晨

你还得去上班。”

即使看着父亲的身体衰落下去，我也不能接受这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我没有先知，我只是不知道如果他不在将发生什么。

一天早晨，妹妹打来电话，“快来！爸爸患心脏病。情况不妙。”

我开始发抖，手脚冰凉。在去医院的出租车里，一切都变得奇怪，似乎我以前从未见过这些建筑和街道。

赶到医院时，父亲已被送进急救室。妹妹和我换上罩衣，也跟着进去。他们正在往父亲头上套氧气罩，被父

亲推到一边。他喊我的名字，这可能是他的最后一个字。

母亲和黎明来了。从下午到晚上，我们一直坐在走廊里。一次门开了，我看到七、八个人围在父亲的床前。

最后，我们被允许进去看他。他平躺着，心脏停止了，但又跳了最后几下。这时是1976年3月26日晚10时10分。

安德逊教授称父亲是“人类文明的楷模。”父亲作品的一位评论家把他的英语描绘成“中国人所写的东西中

最好的。”

父亲接到的最热烈的赞扬来自美国《读者文摘》的奠基人德威特·活伦斯：“林把他的字典看成是自己一生的‘花冠’。对任何读过他的著作的人来说，他的花冠上镶满了珠宝。”

我们把他的遗体运往台北，葬在自己家的花园里。晚上吃饭时，我企望他微笑着走进来，要我们做他最爱吃的羊排……

（宁先绪编译自美国《读者文摘》，一九九一年第二期）

（上接第15页）方志敏烈士殉国前在1935年3月25日写了一封给全党同志的信，信中说：“我们临死前，对全党同志诚恳的希望，就是全党同志要一致团结在中央领导之下，发扬布尔什维克最高的积极性，坚决性，创造性，用尽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学习列宁同志‘一天做十六点钟工作’的榜样，努力为党工作！”

烈士们的遗言，难道不应当认为也是对我们和子孙后代的遗愿和希望吗？

烈士们生如闪电之耀亮，死如彗星之迅忽。有挽诗曰：“丹心贯日情中海，碧血雨花气若虹。”“铁骨铮铮壮烈死，高风亮节万年型。”烈士们的品德和精神诚足以为我们万世的典范和楷模。

五

我们请邓小平同志为《革命烈士传》题了词：题词是：“用革命的事迹来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像我们前辈那样，像我们的先烈那样，永远当一个革命者，永远当一个为人民大众的集体事业服务的社会主义者，永远当一个共产主义者。”我们请陈云同志题写了书名，还请李先念同志作了序。

《革命烈士传》前3卷，已于1985、1987和198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第4—10卷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在1990年到今年上半年陆续出齐。各地党史部门编印的《烈士传》或《英烈传》也正陆续出版。

这些是献给中国共产党诞辰70周年的一份厚礼。这些是向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提供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编辑这部烈士传的过程中，我们常怀着一个虔诚的心愿，就是要在亿万人心树丰碑，要在子孙后代人心中树丰碑。

第2卷里有一篇传记《多松年》。多松年（1905—1927）是内蒙古地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者之一，曾在1925年同乌兰夫等一起被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担任过党的“五大”代

表，1927年8月在张家口被捕，在一座雄伟的城门——大境门前，壮烈牺牲。他的事迹过去是鲜为人知的。

这一卷《革命烈士传》在张家口发行以后，特别引起了党和团组织的重视。1990年清明节前后，各中小学校和幼儿园以多种形式开展了纪念活动。

大境门小学师生庄严肃穆地举行了“举先烈旗、爱共产党”的队会。会上宣布成立了以多松年命名的少先队中队，由多松年烈士的儿子、前呼和浩特市副市长赛希和儿媳巴美茹前来参加为他们授旗。在多松年烈士遗像前，人们佩戴着一朵朵白花，敬献上花圈，流着眼泪，朗诵一篇篇祭文，在青少年心头燃烧起“祭英雄精神，树革命理想”的希望与奋进之火。

在铁路斜街小学的队会上，大队辅导员鼓小红和她的新婚丈夫向多松年烈士遗像献上一对花瓶，上面写着：“在我们的幸福的时刻不忘先烈”，还写着两句诗：“赠君花瓶如赠心，但愿我心似君心。”

8月间，大境门小学的少先队员们当年多松年烈士殉难处捧了一把把圣洁的泥土，用红领巾包起来，派代表团护送到呼和浩特大青山公墓，把它放到多松年烈士骨灰盒里，与呼和浩特市人民一起举行了多松年烈士英灵安放仪式。张、呼两个市还商定，把今后每年的8月11日定为多松年烈士殉难纪念日。

怎样才能把印在纸上的文字，变成人们心中的丰碑呢？张家口市的同志已经做出了榜样。

希望全社会共同努力，用先烈们高尚的思想道德品质和伟大的无私奉献精神，来影响人们的心灵，把它变成在人们心中燃烧的圣火，把它变成在人们心中飞扬的红旗，激励人们继承先烈的遗志，永远当一个革命者，永远当一个为人民大众的集体事业服务的社会主义者，永远当一个共产主义者。

蒋纬国的仕途与婚恋

汪兆骞



1986年的初夏，位于海滨的台北市，笼罩在连日的绵绵细雨之中。

从高大丛林掩映的别墅里，驶出一辆超豪华黑“奔驰”，剪开雨帘，缓缓地沿着广州街武昌新村的马路行驶。这一带，是台湾当局军政要员居住区。一座座造型别致的洋楼，在细雨中炫耀着它们主人的显赫。

两鬓花白的蒋介石二公子蒋纬国，扶着方向盘，目光怠倦的望着前方。今天，他脱去上将戎装，身着西服，70岁的人，看上去并不衰老。几天前，他那多病的哥哥蒋经国召他去家里。兄弟俩，过去除公事和家务偶尔聚会，很少来往。这天，蒋经国拉着弟弟的手，免去了家礼和寒暄，不无动情地说：“纬国，父亲死后，只剩下你我兄弟俩了。在这国事艰难之秋，我希望你能为党国多做些工作。你也看得出，我虽在其位，无奈身体大不如前。你我从小相依为命，诸多苦衷，你应理解。”

说着，竟泪涌眼眶，弄得蒋纬国不知所措。最后扯入正题，蒋经国告诉他说：“你辞去联训部主任的职务，准备出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一职。”

国安会是台湾最要害的部门，平日可掌握情治、机要实权，直接监视台岛内外，党、政、军各部；在必要时，可超越宪法，为巩固当局实施最高权力，是为各路诸侯仰见之职。过去一直由蒋经国把持。

去年深秋，曾在台湾军界供职多年，刚刚在美当上富翁的叔父，突然取道日本飞抵枫叶正红的北京。

一别41载，骨肉团聚，欲语泪先流。年逾古稀的老人，看到祖国的巨大的变化，兴奋异常，游名胜古迹，发思古幽情，又返故里，寻觅旧日之梦，兴致很高。秋夜秉烛漫谈。偶尔谈到他曾写过关于蒋氏三代秘闻一书之事。老人惋惜地说，那本书材料翔实，多为外人鲜知。曾在台印好，惜被当局查禁销毁。多年心血，付之一炬，甚为痛心。后来听说此书被稽查人员偷拿出来而辗转流传海外，但至今未幸见到。如我对此书极感兴趣，便对我讲了半个多月，秋夜苦短，常常讲到曙色临窗。后我根据记忆整理，竟有数万言。

——题记

蒋纬国早就摸透了蒋经国。他知道，这位兄长之所以授重柄于他，并非出于对他的骨肉之情，而是蒋夫人宋美龄亲自出面，化解它们兄弟俩长年积累的矛盾，逼蒋经国作出的让步。

看着哥哥那张苍白浮肿的脸，不知为什么，他突然可怜起他来。蒋经国受命于危难之秋，尽管他竭尽全力，苦苦支撑，台湾孤岛也未迎来太平盛世。他更清楚，蒋经国让他东山再起，是想利用他挟制继王升之后，红极一时的一股日益膨胀的势力。

汽车停在海边。他披上风衣，沿着一条通往沙滩的小路，向前走去，穿过树木葱郁的林带，脚下便是浪涛堆雪的海滩。面对茫茫细雨中的大海，他说不出是兴奋还是烦躁，抑或悲哀。

这几日，他就任国安会秘书长后，重又成为新闻人物，消息一经公布，岛上舆论哗然。人们总是摸不透蒋氏次子的变动。1984年人们猜测他可能接任国防部长，或得到参谋长之职，但他却被调到联训部做有职无权的主任去了；同样地，在蒋经国多次否认蒋氏家族再接班时，蒋纬国又出人意料地出掌重权。于是有人说：“蒋氏兄弟的和解，反映了蒋经国的忠实伙伴和心腹人数寥寥，可以放心地授以重柄的，实在没有，只好不顾愚弄舆论，在自己的嫡系亲人中寻觅了。”

至于对他蒋纬国,更是议论纷纷,都认为他是蒋家宫廷中的一个极神秘的人物……

人海和细雨溶为一体,而对浩渺的大海,他感到前途险恶。双手拢起飘散的白发,时光倒流,往事如烟,人生如梦……

春雨绵绵 初恋人情网

黄埔军校的黄昏是静谧的。白天的喧闹伴着暑热渐渐退去。从缓缓流淌的珠江,飘来习习凉风。

军校的礼堂,灯火通明。年轻的士官们,端坐在座位上,脸上浮出平时难得的轻松的微笑。

军校校长蒋介石,全身戎装,容光焕发地就坐在主席台上,一扫往日的冷峻。

一声军号,消失在夜空之后,一位精瘦的少年身穿合体的小军服,昂首挺胸,走上主席台。身躯高大的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紧随其后,来到台上,向学员们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讲话:“诸位,我把大家请到这里来,不是以军事顾问的身份,也不是和大家研讨军事,而是以一个普通苏联军人的身份,向蒋将军的二公子蒋纬国表达我美好的感情。蒋纬国九岁随父投身革命熔炉,我谨以这支小手枪,祝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军人。”

在学员们热烈的掌声中,何应钦从加伦将军手里接过左轮手枪,又躬身捧到蒋纬国面前,蒋纬国立正行礼,双手接过对他来讲颇为沉重的手枪,那脸上闪着欣喜的光彩……

蒋纬国从小便无母亲,出生上海后,先后寄养亲戚家里。1924年,由三年前和蒋介石在上海结为连理的陈洁如带到广州黄埔军校。据宋希濂孙元良等人回忆:每到傍晚,蒋介石常与陈洁如携手在校园中散步,有时会牵着天真活泼的蒋纬国一道出游。几个月来,这里的军人生活,使九岁的蒋纬国感到新奇和兴奋。他天资聪颖,很有礼貌,深受师生们的疼爱,加伦将军应邀来这里做军事顾问,身在异邦,常想念自己的儿子,对蒋纬国则格外喜爱。加之当时蒋介石也深受加伦将军的敬重,所以才有授枪之举。

接枪之后,蒋纬国先向加伦深深鞠躬,又向台下深深鞠躬,最后向蒋介石行军礼,颇有军人的风采,更博得一片喝采之声。

蒋介石更是笑容满面,加伦将军向蒋纬国授枪,正合“经文纬武”的宿愿。他决心把两个儿子培养成一文一武、治国平天下的人物。

蒋纬国在蒋氏家族中,具有独特的经历和传奇的色彩。早在他五岁时,他的名字就写入孙中山先生的电报中,尔后,那电报成为中华民国档案中的重要资料。

那是1922年6月,伪装革命的军阀陈炯明突然叛变革命,纠集所部,枪口对准孙中山,炮轰广州观音山越

忍

蒋纬国
一
敬题

忍以性空
忍以成念
忍以主成
忍以仁念
忍以清念
忍以福念
忍以人念
忍以群念

望楼总统府。当时形势极为险恶。6月16日,总统府卫队浴血奋战,孙中山先生和宋庆龄安然脱险,来到黄埔岛。孙中山先生为商讨革命大计,立即急电正在奉化老家居住的蒋介石。电文是:

“宁波、江北岸、引仙桥、十号。蒋纬国先生,事有急,盼速来。孙文,巧。”

当时,蒋纬国仅五岁,正由蒋介石的妾姚怡琴抚养。这姚怡琴长得天姿国色,温柔贤淑,是天津卫一大美人,蒋介石搞到手后,成为其半公开的家眷,民间称姚怡琴为“第三任夫人”。蒋纬国由她照料,在奉化县幼稚园就读。

五岁的蒋纬国的名字,成为孙中山和蒋介石联系的代号,一方面说明蒋介石对他十分钟爱,另一方面也说明孙中山先生对蒋纬国也有深刻印象。

后来,蒋纬国又随蒋介石过军旅生活。在外征战,天气冷时,就和蒋纬国挤在行军床上。有一次蒋纬国在地上睡了一夜,醒来时,浑身麻木、嘴唇发紫、手脚冰凉,蒋介石立刻给他揉搓面颊,掰手掰脚。其舐犊之情,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1925年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誓师北伐。老大蒋经国告别故土赴苏留学,蒋纬国随父征战疆场,兄弟俩开始了不同的经历。

北伐之初,蒋介石从广州乘火车北上,出征之前,戴季陶等各界官绅云集车站送行。蒋介石的夫人陈洁如手拉着蒋纬国,含泪为他整理行装。那蒋纬国虽然只有10岁,却像一个真正的军人,军衣略显肥大,皮腰带也显宽松,加伦将军所授的左轮手枪,佩在腰间,有些不成比例,但看上去仍威风凛凛,别有一种英雄气概。无怪当时美国《时代》杂志报导说:“尤可敬的,是蒋介石带了儿子出征,他的公子蒋纬国,现年10岁,随侍他身边,和父亲出入硝烟弹雨之中。”

蒋纬国15岁随吴稚晖学文武韬略。17岁入东吴大学

理学院物理系就读。这是一所贵族子女云集的大学，不少人来这里，为的是学得科学知识，将来服务于国家。他们刻苦攻读，有些人后来成为杰出人才，当然也有到这里镀金的纨绔子弟，时常闹出些风流韵事，惹得社会上议论纷纷。

东吴大学设在苏州，校园不大，但林木茂密，校舍整洁，其间花草点缀，倒也是个环境幽雅的存在。

一天，夕阳西沉，蒋纬国从图书馆借书出来，走到芍圃前的小径上，被丁香树下的一位女生所吸引。那女生正双手捧着书本低头默读，那长长的颈子，在淡红的夕阳里楚楚动人。

他好奇地走近姑娘，轻轻地咳嗽一声，姑娘惊愕地抬起头。那是一张清丽秀美的脸庞，淡淡的细眉下，有一双明澈的大而长的眼睛。姑娘看到面前来了一位陌生人，有些紧张。

此时蒋纬国已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他从未在校园里见到这样标致的姑娘。“你大概是刚入学的吧？”蒋纬国问。

“是的。”说罢又羞怯地低下头，歉意地一笑，轻轻地走了。从此那白皙的颈子，深深刻在他的记忆里。

蒋纬国多方打探，得知她是中国银行董事冯幼伟夫人的妹妹，叫施利聆。他几次主动去接近她，却被她冷冷地碰了回来。

对一个热烈的追求者，成功的机会总是有的。

南方的绵绵春雨，总是淅淅沥沥下个不停。蒋纬国从苏州码头急匆匆地往学校赶，正巧遇到施利聆独自一人持伞在雨中漫步，那张红得像榴花般的小伞，在路旁碧绿的桐树叶的映衬下，显得格外耀眼。她看到蒋纬国光着头在雨中奔跑，思忖一下便说：“我们一起走吧！”

蒋纬国受宠若惊，便连连摇头：“伞小，你自己打吧，我没关系。”

由苏州码头到校园，道路并不遥远，但这绵绵春雨却滋润了他们心中萌生的爱情幼芽。

他们的爱情是真诚而热烈的。春去秋来，偷偷的爱情结下了秘密的果子。不久，在她父亲的催促下，身怀六甲的施利聆，来不及和蒋纬国商量婚嫁养子之事，便被飞机载往加拿大，永远地和蒋纬国失去了联系。

几十年后，一位自称是蒋纬国和施利聆之子的中年人，从遥远的内地来到北京，戏剧性地找到了一位曾和蒋家打过多年交道的老人，表示要到台湾寻父。经老人劝阻，中年人默然地回去了。那位年迈的施利聆女士，现在还在大陆。

如醉如痴留怨艾 灰色的海上罗曼史

蒋经国和蒋纬国兄弟二人的生活道路，在其父的精

心安排和命运的摆布下，颇有点戏剧性。

蒋经国负笈赴社会主义苏联留学文科，而他的弟弟晚他十年去纳粹德国研习军事，从此跻身戎马生涯。

在西渡大洋的轮船上，西服革履的蒋纬国扶栏远眺，苍茫浩瀚的大海使他心旷神怡。在离他不远处，有位金发碧眼的姑娘，不时向他投来热情而大胆的目光。在情场上虽不是新手的蒋纬国，在异邦姑娘面前，仍感到一阵心慌。那姑娘突然走过来，用英语对他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请你喝杯白兰地。”蒋纬国稳定一下情绪，心中狠狠咒骂自己，“混蛋，怕什么！”他向姑娘很有礼貌地点点头，故作幽默地说：“小姐，我们东方人是讲究礼尚往来的。请您把午餐付费的荣誉让给我。”

轮船的酒吧陈设典雅，微暗的灯光，给这里蒙上了一种神秘的色彩。情侣们相对酌酒，听着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笼罩战争风云的欧洲似乎异常遥远。

那姑娘是法国人，父亲是传教士，很早就来到中国，此次是她探望父亲后返回法国。在中国短暂的逗留，纯朴正直的中国人给她留下美好的印象。从登上轮船，她就注意到年轻英俊的蒋纬国，她并不知道他的特殊身份，只是出于一种好奇和好感，才主动亲近他的。

他们默默对视。法国姑娘热情奔放的性格和充满活力的青春气息，使他如醉如痴。特别是异国姑娘那鲜红的嘴唇，丰满的胸脯，窈窕体态，唤醒了他熟悉的欲念。此刻在异国姑娘雪白肌肤的诱惑下，失去施利聆的痛苦，早已被抛进脚下的大海。

他们在漫长的旅途中相依相伴，热烈的拥抱和甜蜜的亲吻，使他们年轻的血液汹涌澎湃。躺在豪华的特等客舱里，望着酣睡在身边的法国女郎，他有时感到内疚。和这姑娘邂逅相遇，那不是爱情，只是欲望。这姑娘使他在漫长的旅途中，没有感到寂寞，他很感激她。有时，他感到好笑。哥哥在苏联爱上了一个俄罗斯姑娘，结成了毫无光彩的姻缘，同时还要去经受炼狱的磨难。而他，需要的只是忘情的沉醉，并不想让哪个女郎的温柔成为他远大前程的羁绊。

在轮船驶抵大洋彼岸的时候，他捧起姑娘那白皙的脸，轻轻地一个吻，就结束了这段浪漫曲。当他们分手时，他蓦地发现那姑娘的大眼睛，流露出一种深深的怨艾。这使在情场涉足不深的蒋纬国的心灵，受到了不小的震颤。他已经离开姑娘了，不知是鬼使还是神差，他猛地跑过去，又紧紧地拥抱着在一起……

蒋纬国到了德国，希特勒关照有关方面予以高级待遇。1937年正值中日战争爆发，他被编入德军98山地步兵团受训，担任二等兵。因表现突出，先后被提拔为班长、排长、连长等职务。之后，又被送到德国慕尼黑军校步兵科受训，接受军官基础教育。毕业后，任纳粹德国陆军山地兵少尉，分到德军第八师见习。此时的蒋纬国已成为希特勒纳粹主义的热心追随者。

正当蒋纬国春风得意的时候，和中国交战的日本加入德意轴心国家联盟。中德关系突然恶化。蒋介石比蒋纬国更心急如焚，几次电令蒋纬国火速离德返国。蒋介石知道希特勒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的。但是，希特勒非但没有加害于蒋纬国，而且还把他保护起来，送他安全回到中国。起初，蒋介石大惑不解。但不久，他品味出，这是希特勒向他发出的一个信号，是为将来和他作交易埋下的伏笔。

德国的盖世太保把蒋纬国送上轮船，小心而周到地警卫着这位客人。但对蒋纬国来讲，却感到不大自在。此刻，他对于年轻貌美的女郎们暗送秋波和大胆调笑，已失去往日的兴趣。战争的阴霾使船上的旅客忧心忡忡，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军人，他的心底涌起另一种渴望，战神在向他呼唤，他想立刻赶回祖国，去疆场争战。

海上的夜是漫长的。他躺在舱里，闭上眼睛。两天前经历的那一幕，顽强而清晰地闯入他的脑际……

那天，柏林飘着初冬的细碎的雪花。他坐在咖啡店，呷着苦涩的咖啡，漫不经心地看着窗外匆匆的行人。他的心绪很不好。他所崇拜的希特勒一夜之间成了日本的盟国，也就成了中国的对头。当希特勒和父亲二者必须择其一的时候，纳粹精神在他的思想里开始动摇，因为他最清楚，他的前程不在德国，而是在父亲统治的中国，但这种抉择是痛苦的。

突然，他的眼睛瞪大了。窗外，一位面色苍白抱着婴儿的少妇闯入他的眼帘，他的心一下子紧缩了，忙放下杯子，快步走出咖啡店，追上少妇。当他们的目光相接时，少妇的大眼睛迸发出明亮的光彩。但当她的目光稍向上移动，看到他纳粹军人帽徽时，光彩倏然消失了。接着是难堪的沉默。

过了很久，蒋纬国燃上一支烟，猛吸了几口，小声问道：“真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你。”

少妇抱紧婴儿，像陌生人似地说：“是的，我也没有想到……”

“你好吗，从下船分手这么多年……”

“看得出来，你过得不错，对吗？纳粹少尉先生！”少妇说罢向他投去愤懑的一瞥，继续向前走去。他先是怔怔地站在那里。随后想起了什么似的追上少妇，从衣袋里抓出一把大面额钞票，塞到少妇手里。他不敢看她的眼睛，匆匆逃开……

山城异国 情拴石榴裙

蒋纬国返国后，玩了几个月，老蒋即命他赴美，入陆军航空队战术学校受训。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烽火。弥漫欧亚，而位于地球另一边的美国，却是一派和平繁荣的景象。仪表堂堂而且显得成熟的蒋纬国，对于浪漫率直的美国姑娘很有吸引

力。每当军校周末，他便被姑娘缠住，要么在夜总会和她们调笑，要么驱车到海滨幽会。他发现，德国严格的军纪比起美国的松弛的纪律，简直太乏味了。德军的生活较之美军也过于清苦。他沉湎于温柔之乡，真是乐不思蜀。报效国家、血染沙场的誓言，都融化在这歌舞升平温馨的绿叶中了。

一天，他和同学去夜总会跳舞，与一位神秘的中国姑娘不期而遇。

在龟皮竹背后，有一双深邃的大而黑的眼睛总是凝视着他。一支曲子奏罢，他极潇洒地谢过舞伴，便来到一直坐在那里的中国姑娘身边。在袒胸露背的美国姑娘中间厮混惯了，偶尔看到一位身着旗袍的中国姑娘，他感到很亲切。

他们相视一笑，算是结识了。她那莞尔一笑很妩媚，东方美人的典雅的妩媚。

悠扬的舞曲又飘荡在舞厅。蒋纬国站起来彬彬有礼地弯下腰，请东方美人跳舞。但是姑娘只是歉意地摇摇头，仍旧坐在那里，这使他大为尴尬，自尊心受到伤害。于是他这才重又端详这位傲慢的美人。她皮肤白皙，俏丽迷人，举止端庄，剪裁合体的旗袍，勾勒出窈窕的身段。特别是那纤细手指，更勾人心魄。

姑娘见他呆呆地看着自己，笑道：“蒋公子，贵人多忘事，我们不是早就认识了吗？”

蒋纬国的脸红了，显得更加尴尬。两个月前，他从德国返回重庆，接受大纺织业主石凤翔的邀请，和各界官绅乘坐一艘漂亮的游艇，观赏山城夜色。那夜，细雨方歇，轻风习习，漫游在有些威尼斯情调的嘉陵江上，自有一番情趣。但蒋纬国对石凤翔之流，在国家危难之时，尚有雅兴夜游山城，颇有些不满。明月升空，江雾渐浓，远看山城一片灯火明灭，他的兴致全消。扶着栏杆，呆呆地想着心事。这时，一曲柔曼的轻歌，轻悠悠地飘散在江面，溶进淡淡的夜雾。他心里愤然骂道：“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其实，歌曲不是来自他处，而是从舱内飞出。

兴致很高的石凤翔和各位官绅，来到厅中。灯光璀璨，美酒佳肴摆满一桌。东道主石凤翔举起酒杯，让大家品尝窖藏二百年的法国红葡萄酒。同时回头冲内舱喊道：“静宜，你也来干一杯！”不多时，一位身着白衣裙的妙龄少女，便飘然而至。经石凤翔介绍，蒋纬国认识了他的女儿石静宜，并握住了她那纤细细手……

蒋纬国不无抱歉地说：“对不起，半年不见你已经让我认不出来了。”

石静宜只是嗔怪地一笑。自嘉陵江上和蒋纬国相识，她便一见倾心，特别是他当时那忧民的伤感，尤使她动情。她是当时中国数一数二大财阀的千金小姐，她的任性和奢侈是用独特的方式来表达的。她得知蒋纬国赴美，便尾随而至。今天，她为演出了这场别开生面的异国重逢好戏，甚为得意。那蒋纬国本是倜傥人物，对这并非意外的相逢，当

然也能品出其中的别样滋味。

蒋纬国在美结束受训后，即返重庆，石静宜因要学习钢琴，暂留美国。

他被派到西北潼关，任少尉排长。从富庶和平的美国，到这荒凉的黄土高原，遥望弥漫的烽烟，耳听隆隆的炮声，特别是仓皇而过的批批难民，那衣衫褴褛面呈菜色的老人和孩子，曾激起他作为一个军人的责任感，使他一度与日寇疆场奋战，屡立战功，升至连长、副营长。正在这时，在重庆的蒋经国奉父命，邀他去大西北访问调查，尽管西北之行也是风尘仆仆，但能逃离这无边的战争苦海，他还是欣然前往。

“访问”归来，被升为中校营长的蒋纬国，接到石静宜将返重庆的电报，匆匆赶到重庆。

石静宜如一朵桃花，灿然飘下舷梯。她风姿楚楚，仪态万方。比在美国相逢时更有一种风韵。握住她那纤纤细手，闻到她身上的异香，他心旌摇曳，不能自持。从此，在嘉陵江畔，在成都杜甫草堂，常有他们亲昵的身影。在战火纷飞的国土上，这对恋人却自寻了一块温馨的爱情绿洲，尽情地在爱河中游泳。自称是战神的蒋纬国有时不无自嘲地对石静宜说：“战神败在爱神脚下，也是一种幸福。”石静宜说得更风趣：“征服爱神的明明是战神！”

石静宜出身名门，举止典雅脱俗。也博得了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欢心。于是由他们夫妇主婚，这对情侣在重庆结为秦晋之好。

升任上将 借母有余威

蒋经国和蒋纬国的矛盾由来已久。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蒋介石迁都重庆，住在黄山官邸。一次蒋经国去看望父亲，特意携带几瓶蒋介石爱喝的泰山毛尖。谁料刚到大门，就被警卫团营长王瑞钟挡驾。蒋经国讲明情况王瑞钟仍无动于衷，就是不让蒋经国入门。已作了江西省政府保安处少将副处长的蒋经国，忍无可忍，一反平日儒雅风度，勃然大怒道：“我是儿子，来看父亲的！”

王瑞钟仍不让步，只是摊开双手，无可奈何地说：“大公子，我没接到上峰的指令，爱莫能助。”

事有凑巧，双方正在争执，蒋纬国却驱车驶进官邸大门。蒋经国呼叫不及，老二早已无踪无影。于是，当天的晚报就登出蒋经国被阻黄山官邸的消息。更有甚者，公然在报上称蒋纬国为“小委员长座。”从此，蒋经国和蒋纬国心里，都埋下了不和的种子，也成了以后蒋纬国遭嫉招谤的把柄。

其实呢，蒋经国黄山官邸受阻，与蒋介石宠蒋纬国并不干系。老蒋自西安事变被少帅张学良扣押，一直心



有余悸，所住之所，无不戒备森严。黄山官邸是他办公居住之处，又时逢乱世，自然守卫更严，飞鸟难入了。

蒋介石规定，除孔祥熙和戴季陶二人可自由出入、不爱检查外，其他任何人，不论亲疏，哪怕是老蒋的小舅子宋子文求见，也要先由侍卫长俞济时命令门卫放行，方能入门，进到第二道警卫处，还须搜身检查一番。蒋纬国刚才在大门长驱直入，是因为侍卫长早已命令门卫放行，大家又都认识他，所以不加盘查。不过到了第二道警卫，他也得乖乖地接受检查，并无例外。

蒋经国在大门受阻，是因为他从江西到达重庆比预定的时间早，老蒋还未来得及向俞济时交待，即使王瑞钟营长认得蒋经国，也不敢贸然放行。

尽管如此，在蒋经国心里，还是深深地埋下了猜忌的种子，待老蒋1975年死之后，他以嫡长子继位，蒋纬国一直遭到冷落。后来勉强晋升为二级上将。

随着老蒋作古，台湾原来动乱的政治局面更加紧张，新的权力再分配，使宋美龄的势力严重受挫。于是她眼不见，心不烦，索性躲到美国去静养，以观事态发展，再作道理。

台北的八月，暑气难当。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台北机场，机飞机落，异常繁忙。在为贵宾准备的豪华候机室里，宋美龄在登机前被军政要员簇拥着，愉快地谈笑。

老臣们也知道，蒋家王朝断无东山再起的希望。但他们只有相倚相傍，借助蒋家势力，才不至在政治斗争中被暗流吞噬。

正当他们强作欢颜，彼此安慰的时候，全身戎装的蒋纬国走进候机室，他平日总是穿便服的，特别是家事活动，如老蒋、宋美龄的生日家宴，祖母王太夫人的寿诞和忌辰，春节元旦，端阳中秋等日，蒋家人都穿便服的，这已成为一种不成文的规矩。今日蒋纬国全身披挂，佩戴勋章勋标，元老们莫不惊异。只见他走到宋美龄面前，毕恭毕敬地行军礼，宋美龄有些蹊跷，她端详一下年逾60而不失英武的蒋纬国，不解地问：“怪事，又不是军事会议，你穿什么军

装？”然后又不无欣赏地说：“不过，你穿军装的确很精神。”

蒋纬国苦笑道：“妈有所不知，我再过些日子，再无资格穿军装了，所以今天给妈送行，想特意给妈留下一个军人的印象。”

宋美龄更加奇怪，忙问何因。蒋纬国便趁机把蒋经国在军中推行强制限龄退役的制度，说了一遍。并说：“孩儿已整60，按我中将军的军阶，已到退役的年龄，怕妈返台时，再也看不到孩儿穿军装了。”

宋美龄从未听蒋经国谈到过军中强令按年龄退役之事，心中便对他有些不满。她问：“那何应钦、薛岳、顾祝同都已逾古稀之年，为何还穿军装呢？”

蒋纬国忙回答说：“那是一级上将，终身任职的。”

宋美龄便不再说话。正巧这时蒋经国带一家老小也来送行。蒋纬国又忙走到哥哥面前，又行军礼。蒋经国一怔：“自家人的活动，为何这副披挂？”

宋美龄对蒋经国不向自己请示军政大事本来就有所不满，再加之上他又姗姗来迟，便弦外有音地问道：“作为军人，纬国干得还行吧？”

蒋经国一时还摸不透宋美龄的用意，便说：“禀母亲，弟弟一直干得不错。”

“既然他干得可以，为何要他退役呢？”

蒋经国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蒋纬国在宋美龄面前告了自己的状，又当众将他一军。但他不敢在宋美龄及众人面前表示不满，便十分恭顺地说：“请母亲放心，孩儿已听说纬国报请退役，不过，我即可交待有关部门给他办理升任上将的事体。”

这次谈话，原来是应在家里谈的，宋美龄硬把它端到众人面前，是想杀杀蒋经国的威风，看看她宋美龄尚有余威，还能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

宽柔并济 富有人情味的将军

蒋纬国带兵一向注重“宽柔并济”，特别是对其所部，常常表现出军人少有的人情味儿。

1964年，台岛的蒋军对蒋家偏安小朝廷失去信心，军心浮动。蒋纬国的部下，在湖口发动了震惊台湾的军事兵变。

为稳定军心，蒋介石在处理“湖口事件”时，只是把兵变首领赵志华判了无期徒刑。身为上级的蒋纬国在“湖口事件”发生之后，他没有去缉捕当事者，而是为部下受过。他含泪走进禁闭室，锁上门，面壁而立。副司令参谋长们闻讯急忙赶来，苦苦哀求不要为部下的过失而自处。那蒋纬国益发悲痛，泪流满面，说正是自身带兵无方，才使部下误入迷途。他用双手蒙面，然后不再说话。硬是把下属们急得团团转。

深夜降临，蒋纬国依然面壁直立，神情极度悲哀，部

下莫不感动。部下几次端来热饭菜，蒋纬国总摇头长叹。

“如果你们硬要逼我，我将以死谢天！”说着竟仰天长啸：“是我害了志华！”

副司令、参谋长们见状，再不敢去劝说，都恭恭敬敬地站在禁闭室外。整整过了24小时，待旭日临窗前，蒋纬国才丢出钥匙。等把禁闭室的铁门打开，他整整戎装，昂首挺胸而出，和一直守在那里的部下们一一敬礼握手，便径直走到司令部上班，直到夜幕低垂，他方驱车回家。事有凑巧，车子行出营房千把米，忽见一人拦住汽车。借助灯光，他认出那人正是要缉拿的逃犯，赵志华的副官。

副官跪在蒋纬国面前，双手把手枪举过头顶：“蒋将军，我在自首以前，总算见了您一面。部下参予兵变，至今不悔，只是牵连将军，实在不安。请将军受我一拜，也许来世重逢了……”说罢转身而去，隐没在茂密的林木中。

据说，副官没有去自首，几天以后，在海边岩石上，有人发现了他的军装和手枪。

一天，蒋纬国手持鲜花，来到岩石上，把花瓣撒向大海。

“湖口事件”之后，蒋纬国失去带兵权，但他的部下们，一直想念这位有人情味的长官。

蒋纬国从小不知生母是何人，先后由苏州吴忠信夫妇和蒋介石的妾姚怡琴抚养。他长大之后，总不忘他们的养育之恩。每当养母们寿诞之日，蒋纬国总是邀来挚友和亲近袍泽，一起去祝寿。到了家里，把养母扶到寿堂中央坐下，然后他便跪下，连连磕头，其孝敬之心，使在场的人无不感动，老人们更是潸然泪下，忙拉起他，紧紧拥抱。

1963年，吴忠信夫人病逝，由台湾最有名的疗养院移灵极乐殡仪馆。当时已出任陆军指参大学校长的蒋纬国闻讯赶到，分开众人，直扑到吴忠信夫人尸体上，抚尸痛哭，其声极为凄切，其情甚是真诚，周围的亲眷莫不弹泪。

吴忠信夫人埋葬之日，亲友致哀之后，陆续离去，唯有蒋纬国手扶墓碑而跪，任秋雨纷纷……

对于蒋纬国的人情味，也不是众口皆碑的。前不久，谋杀刘宜良（江南）命案，就有人指控蒋纬国染指其事。继而从美国购置军用飞机吃回扣的丑闻受到谴责，弄得舆论沸沸扬扬。

生父、爱妻病逝

人民解放军在辽沈、平津两大战场，风卷残云，给蒋家王朝以致命的打击。33岁的蒋纬国被委任装甲兵少将副司令。从淮海战场溃退下来，龟缩上海，奉命戍守。

蒋纬国是蒋介石和纳粹德国培养的军人，精通军事，再加上装备先进精良，不可一世，根本不把解放军放在眼里。但是，在孟良崮、黄泛区与解放军较量之后，这位蒋二公子，才尝到了苦头。

到台湾还未站稳脚跟，逃离战场的余悸也未消失，他

所崇拜的戴季陶在广州服安眠药自杀，消息传到孤岛，朝野上下，莫不震惊。蒋介石闻得此讯，放声痛哭，蒋纬国早知戴季陶是其生父，自然更不能无动于衷。一日，蒋介石把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和蒋纬国唤去。走进屋里，蒋纬国吃了一惊，几日不见，老蒋面色苍白，形同槁木，神情恍惚，声音嘶哑：“季陶追随我多年，情同手足，如今弃我而去……”说到这里，有些哽咽，“请家骅兄代我去四川季陶故居奔丧，纬国也随你前往。以表拳拳之心。”

飞机飞抵动乱不安的重庆。那里笼罩着一种毁灭的恐惧，也透出了一丝新生的曙光。汽车急匆匆驶在冷落萧条的街市，唤起了蒋纬国对逝去的往事的回忆：

六年前，他和石静宜结婚之后，戴季陶的公子戴安国请他们到重庆大酒店吃酒。他们三人坐定，戴安国为他们夫妻斟上酒：“我是代家父祝贺贤弟和弟媳新婚的。他因公事不能亲自祝贺。”

蒋纬国忙道：“我与安国兄，情同手足，血浓于水，你的酒我领了，叔父的酒实在不敢当。”

后来，他碰到戴季陶，表示感谢，戴季陶笑了：“蒋戴视为一家，你们新婚，岂有不贺之理？”蒋纬国自和石静宜结为秦晋之好，后两人感情还算不错。只是那石静宜出身名门，是个广为交际的千金小姐。一次过生日，单从法国购衣物一项就花去黄金790两，使得官财两盛的蒋家，见了也无不咋舌。蒋纬国俸禄不多，怎能满足石静宜的奢侈？原来石静宜嫁到蒋家，自恃石家是中国的首富，她的一切开销均回娘家支付，从未花过蒋家一个铜板。

石静宜随蒋家到台湾后，她父亲石凤翔的大部分产业丢在大陆，只把在上海的“大秦厂”的纺织设备迁到台湾，虽也不愁受用，但较之过去，家境已一落千丈。于是已经荣任装甲兵少将副司令的蒋纬国，便利用装甲兵旅采购物资的便利条件，从香港偷运大量舶来品入台，使石静宜甚为惊喜，对她认为只是带兵打仗的丈夫，不得不刮目相看了。

到了1952年，久未怀孕的石静宜，突然身怀六甲，这时蒋纬国已是三十有六，宏图大志，早已化为乌有，如今中年得子，使他产生了一种类似于神圣的责任感。于是对石静宜格外关心体贴。此外，他还努力完成装甲部队整编工作，与于豪章等人，编写《装甲部队作战准则》，受到军内外的赞赏。蒋介石见次子有所建树，自然是很高兴。特意唤到身边夸奖一番。

农历九月初，在石静宜接近预产期的前几天，蒋纬国又奉命赴美考察，临行前把妻子送到台北唯一的一座贵族医院，设在广州街的中心诊所，安慰一番，便走上赴美的飞机。

石静宜的预产期是9月15日，这一天恰巧是公公蒋介石的70大寿。作儿媳的想讨公婆欢欣，决定采取一切手段，在这日给蒋家生个公子，为老头子贺寿。

她住院以后，多次嘱咐医师控制产期。14日深夜，尚无阵痛。石静宜便把医师唤来，要求注射催生剂。医师仔细观察之后，劝石静宜不要着急，但一惯任性出名的石静宜，岂能听从医师劝阻？强迫其立刻注射。医师深知蒋纬国夫人的骄横，不敢违命，可又怕出现问题，神色慌张，不知如何是好。在石静宜多次催促下，医师只好战战兢兢为其注射。过了不久，石静宜感到不适，继而呈痛苦难忍状。主治大夫们急忙赶来会诊，发现石静宜心跳加骤，于是立刻进行抢救并通知家属。

蒋纬国身在大洋彼岸，无法即刻飞回。石静宜的父亲石凤翔也外出难觅，几经辗转，好容易找到蒋经国。待他闻讯赶到中心诊所时，那石静宜虽经千方百计抢救，但终因回天乏术，而永远闭上了眼睛。胎儿也死于腹中，可怜那石静宜，在闭眼之前还梦想把自己的儿子奉献到蒋介石的寿宴之上，洗刷因多年不育所遭受的冷落……

原本是蒋家子孙聚会的喜庆之日，不料被这飞来的噩耗，搅得大家心神不宁，蒋家人的心头都笼上了浓重的阴云。寿星老蒋，身着长衫，呆坐太师椅上，众家眷敛声屏息垂立一旁。生日蛋糕上那无数燃亮的红烛，幽幽地闪烁，照着一张张哭丧的脸。

蒋纬国收到电报，急匆匆从美返台。走进庭院，只见黑纱在秋风中抖动。赶到客厅，灵堂中的鲜花丛中，摆着石静宜那俊俏美丽的遗像。他的心头突然涌出一股难以遏制的悲怆，泪水夺眶而涌。

石凤翔已是老态龙钟了。几年前，重庆游艇上那个富足而潇洒的企业家的影子一点也找不到了。他声音嘶哑地劝慰一番之后，悄然离去，只在离开庭院之前，回头向小楼留下凄然的一瞥。

住在隔壁的阎锡山扶着拐杖前来吊唁。蒋纬国忙拭泪搀扶。阎锡山只说了声：“望公子节哀。”再不言语。他能揣摩出蒋纬国内心的痛苦。年近40，膝下无子，好不容易妻子梦熊有兆，却不料天有不测，妻子双亡！那蒋纬国岂有不伤心之理，作为邻居，不得不出来吊唁一番。

天色将晚，老蒋和宋美龄在家人的簇拥之下，赶到这里，蒋纬国又忙迎上前去……

石静宜逝世之后，蒋纬国倾其积蓄，创办了“静心小学”和“静宜女子英专”两座现代化的学校，亲任两校董事长，以资纪念亡妻。当时报界都出来捧场，一时蒋纬国口碑甚好。

又堕情网

1953年料理完石静宜丧事之后，蒋纬国又随国防部作战次长徐培根中将再度赴美，入美陆军指参学院正规班及防空学校飞弹班受训。

在美受训期间，由他的好友戴安国介绍，和中德混血儿的美人邱爱伦结识。那是在美国旧金山的唐人街。蒋纬

国正在这里度周末，下榻中华酒店。一天，先他而来的戴安国兴冲冲地跑来拉他便走。他们走进一家极豪华的饭店，宴会厅里坐满了各界名流，这是旧金山市长举行的一次大型宴会。

戴安国拉蒋纬国坐在一位漂亮小姐的面前，蒋纬国简直呆住了，他根本没听清戴安国的介绍。这位小姐既具有西方人白皙的肤色和深邃的大眼睛，又有东方人端庄的仪态和典雅的举止。

看到蒋纬国怔怔地看着自己，连握手的礼仪都忘记了。邱爱伦灿然一笑，收回早已伸出去的手。怔了一会儿，蒋纬国猛地意识到自己忘乎于礼，忙搓着手，歉意地笑道：“对不起小姐，你的美貌使我失礼了。”

邱爱伦依然是灿然一笑，落落大方地重又伸出手。

邱爱伦的手是温软的，比起石静宜那纤细冰凉的细手别有风韵。

戴安国早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宴会之后推托有事先告辞了。

蒋纬国早已过了容易激动和钟情的年龄，可不知为什么，在这位漂亮的女性面前却有一种强烈的冲动，他请邱爱伦去喝咖啡。

邱爱伦非常得体地一笑：“对不起蒋公子，我还有一个约会，不能奉陪了，认识你很高兴，再见。”说罢款款而去，直到目送她消失在璀璨的灯光之中，蒋纬国才怅然叹了口气。邱爱伦那灿然一笑，使他激动不已……

回到军校之后，他一连给邱爱伦写了几封充满感情的长信，但都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弄得年近四十的他，坐卧不安，饮食无味。他在思恋熬煎中度过十几天之后，给在旧金山的戴安国写信询问情况。那戴安国见信不由窃笑。这位仁兄还真动了感情，便到邱爱伦家。邱爱伦的父亲是位华裔巨商，娶了一位德国夫人。听女儿说在宴会上遇到蒋介石的次子，便劝女儿少与其来往：“我们世代为商，从不参预政治，况且蒋介石现已偏安孤岛，政局险恶，自身难保……”女儿听了有些不乐，娇嗔地说：“我又不去台湾作大总统，您何必瞻前顾后？”

待戴安国登门来访，邱老先生颇感不快。那戴季陶的臭名远扬海外，自己也曾受其威胁，现在其儿子造次来访，他决定不予理睬，只让女儿去接待。

邱爱伦在客厅和戴安国谈了片刻，戴安国便话入正题，说蒋纬国如何一片痴情。邱爱伦那时已过二十，虽不乏追求者，但她却看不上。上次宴会上与蒋纬国一见，便有几分好感，只是她不知这位公子的人品究竟如何，便没有贸然应允去喝咖啡。今日听戴安国这么一说，她相信蒋纬国那几封信是出于真情，便对戴安国说：“戴将军，请您转告我对蒋公子的歉意，我因正在学画，无暇分心回信，请他谅解。”

戴安国也摸不清虚实，只好告辞，飞到蒋纬国那里讲明情况，那蒋纬国着实痛苦了一阵子。

蒋纬国于1954年毕业于回到台北，就任国防部侍从高参。第二年又升任国防部第三厅少将副厅长。这两年，他尽管忙于公务，他写信给大洋彼岸的邱爱伦，从不间断。真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突然有一天，他刚下汽车，侍从便呈上一封字迹娟秀的信件。他打开一看，差点昏过去。那信极简约：“纬国，如晤。樱花盛开的三月，我将飞往东京。爱伦。”

蒋纬国如获至宝，激动得不能自己。

翌年春，他飞抵日本富士山，在如霞似锦的樱花下，他与邱爱伦梦幻般地会面了。这一切都带有点神秘的色彩，使蒋纬国简直不敢相信这都是真的。

东方式的环境，东方式的恋爱，也使奔涌着一半西方血液的邱爱伦感到狂喜和新鲜。

1957年3月4日，41岁的蒋纬国和邱爱伦征得双方家长的同意，在日本东京举行婚礼。由戴安国主婚。

四年之后，邱爱伦为蒋纬国生得一子。79岁的蒋介石大喜，赐名蒋孝刚，排在蒋经国的儿子孝文、孝武之后。

这几年，蒋纬国先后出任过国防部第五厅厅长等职。1958年伊朗国王巴列维访台时，担任荣誉侍卫长，非凡的仪表，军人的气度，深得巴列维的赞赏。不久荣升装甲兵司令，后晋升陆军中将，成立两个装甲旅，任装甲部队指挥官。到了47岁，任陆军指参大学校长，从事军事教育工作。

邱爱伦已习惯西方的自由生活方式，现在在家里做起养尊处优的太太，特别是繁文缛节，尤使她不能忍受。在生了孝刚之后，便移居美国。

对蒋纬国和邱爱伦的私人生活，当时有各种传闻，有人说蒋纬国夫人在美另有新欢，有人说蒋纬国又有了红粉知己，冷落了太太。弄得蒋纬国甚是尴尬。

他经常搭上飞机，往来于台美之间，被人戏称“太空人”。

是蒋门之后还是戴的骨血

1975年，蒋介石一死，蒋经国子承父业，这之后，台湾当局的形势变得更加严峻。

近来，逐渐掌握权柄的蒋纬国，成了人们瞩目的大人物，早就传闻“蒋纬国不是蒋家骨肉”的话题，又重新成为被人热烈谈论的热门话题。

更令人不解的是，台湾的《政治家》周刊突然披露蒋纬国著文说自己不是姓蒋而是姓戴的新闻，令舆论界哗然。上自庙堂，下至市井，无不对这一旧话重提大感兴趣，弄得整个台岛风风雨雨。

据台湾《政治家》周刊透露，香港女作家孙淡宁根据蒋纬国口述，整理了一本叫《蒋纬国报刊》的书。整理好之后，送交蒋纬国审阅。他认为没有问题并授权孙淡宁出版。

据说此书分两大部分。前两章是蒋纬国自述他为什么要潜心研究战略，后几章则是重点谈战略。其间加入了一段自己的身世之谜，既不是军事战略，又不是正经自传。显得不伦不类。但正是这些内容，成为奇货，几家报刊为抢夺发表权而明争暗斗，大动干戈。正当抢夺到白热化的时候，忽又传出《蒋纬国报刊》一书不许出版和刊载的消息。于是这又引起人们的兴趣，到处询问其中的原因。奇怪的是蒋纬国和出版社却缄口不语，保持沉默。人们纷纷猜测，莫非是因该书披露了蒋家的隐私，犯了禁忌？或是蒋纬国的部下亲信，怕此书一出影响他们的既得利益，而极力劝谏，使蒋纬国改变初衷？都只是揣测而已。

其实，有关蒋纬国姓蒋还是姓戴抑或他姓的问题，几十年来，一直是个谜。读者大约记得，前面已经交待，蒋纬国一出世，便寄养别家，不知其生母是谁。

要弄清蒋纬国的生母是谁，这要追溯到1913年。

袁世凯窃夺大总统职务之后，便复辟帝制，革命宣告失败。袁在全国悬赏缉拿革命党人。革命党人被迫亡命日本，准备再积蓄力量，待机东山再起。这时，陈英士、蒋介石和戴季陶便到了日本。蒋戴共租一屋，陈另择他处。

蒋戴经常出外活动，又不会料理家务，便请求房东代找佣人。一天，房东领来一位妙龄少女，说是刚刚从日本服务学校毕业，年方17，可以替他们做饭洗衣，打扫卫生。蒋戴二人见其面孔姣好，欣然同意。从此，他们和女佣人朝夕相伴，非常融洽。

那女佣人叫芳子，家境贫寒，为养一家人，只能出来做工。她性情温柔，聪明敏慧，手脚勤快，深得蒋戴喜爱。

那时，他们二人也正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人，英姿勃

发，也博得了芳子的好感。三人在一起，年轻的热血总要澎湃奔涌。先是芳子接受了蒋介石的求爱，有时偷偷与他同居，而后又以温热的身躯去伴戴季陶共枕，为他生得二子。蒋戴既是生死与共的朋友，当然不会为一个女佣人撕破面皮。到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在日本各地的革命党人纷纷回国，蒋戴也告别芳子赋归。蒋戴二人各携一子。大的归戴季陶，取名戴安国，小的属蒋介石，即蒋纬国。

有人说，上述情况并不准确。戴安国是风流倜傥的戴季陶与一位中国女子所生，后交原配夫人纽有恒抚养。蒋纬国才是戴东渡日本之后，与一位日本情人结下的爱情之果，这情人当然不是芳子。芳子乃是蒋介石的情人，戴季陶安敢夺他的兄长之美！现在看来，蒋纬国究竟是日本还是中国女子所生，无关紧要，有一点是清楚的，他的生父是戴季陶。

到了台湾之后，有人发现蒋介石和蒋经国的血型同是O型血，而蒋纬国则是A型。于是早就对蒋纬国耿耿于怀的蒋经国，便抓住血型问题大作文章，说“O型血是英雄血”表示只有自己才是蒋介石的嫡传。这一攻势果然奏效，蒋介石死后，蒋经国操掌权柄，自然顺理成章。

其实，早在老蒋晚年，蒋经国掌握实权之后，特别是掌握情报权之后，便对其弟进行严密监视了。他的情报人员，天天暗中窥视蒋纬国，多方搜查材料，待整理好之后，便呈送到老蒋和蒋经国的办公桌上，弄得蒋纬国异常困惑和恼火，他曾仰天长啸：“我如果不姓蒋而姓戴就什么烦恼也没有了。”

综观蒋纬国的70年历史，真可谓多姿多彩，享尽了人间尊荣权势，也饱受各种困扰。往事如江河东去，年逾70而又重掌权柄，对他来说是福是祸，只好等待历史作出判断……

欢迎订阅《炎黄春秋》杂志

《炎黄春秋》由本社自办发行。1991年为双月刊，逢单月1日出版，每册订价为2.80元，另收邮费0.28元。银行汇款户名：《炎黄春秋》杂志社，开户银行：北京地安门分理处，帐号：032—144230—76。邮局汇款地址：北京景山后街11号。《炎黄春秋》杂志社出版发行处，电话：401.4030 邮编：100009 联系人张君、曹萍 无论银行或邮局汇款，都请函告您的详细通信地址、单位、姓名、邮编。

本社已迁新址，收订汇款银行帐号及邮局暂不变。

有关原《炎黄子孙》、《中华英烈》的财务事宜，均与本社无关。

访

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

李默庵先生

孙本尧



在全国政协七届四次会议上新增选的全政协常委名单中，我看到了李默庵的名字。他，就是著名爱国人士、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现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李默庵先生吗？想到这里，我就决定去采访他。

4月17日，我按照约定时间到他的北京新居去采访他。这是一所高20层新建的大楼，楼里宽敞、明亮、舒适。这位老人在会客厅里热情接待了我。他虽87高龄，但仍神采奕奕，保留着军人气质。他热情爽朗，让家人给我泡茶拿烟，并接着就和我开门见山地谈起来。我是第一次见他，但很快就有一见如故之感。这次采访使我对李默庵先生有了更多了解，也使我对他更加敬佩。

热爱祖国 始终不渝

李默庵先生字霖生，1904年9月9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县北乡沙坪北山村的一个穷苦家庭。他青少年后期刻苦学习，1924年从长沙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一期。

李先生谈到这里说：“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改组国民党后，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共第一次合作创办的，目的在于建立一支革命军队，培训革命军队干部。”

他从军校毕业后留校在政治部工作，不久，1926年调任60团党代表。当时，这个团的团长就是叶剑英元帅。接着，他由做政治工作改为带兵，到第一军任连长。1926年7月，他随军北伐，攻下武昌，升任第一军65团1营营长。在北伐军攻克南昌后，东征浙江、江苏，1927年春攻克上海，他升任团长。1930年又升任第十师师长。

谈到这里，他说：“从1926至1930年5年间，我没有离开过部队一天，且年年打仗。从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到师长，每级都干过。从1930年至1937年，我一直当师长，也是年年打仗，国内一些重要战役几乎都参加过。”

1937年“七七”事变后，李默庵升任第14军军长，参加了山西忻口会战。李默庵当时任代冀兵团指挥官，指挥第10、83、85、60、66各师与日本展开激战，自10月13日至28日共16天，双方打得残酷、激烈，伤亡都很惨重。这次战役是抗日战争开始后对日本侵略军打的第一仗。1938年任第33军团长。1939年2月至1940年2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在湖南南岳创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蒋介石兼任主任，汤恩伯为教育长，叶剑英为副教育长。后李默庵接任教育长。周恩来和叶剑英都曾为训练班讲课，深受学员们的欢迎。训练班共培训来自全国各战场的干部2000多人。1941年李默庵升任第32集团军总司令。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他带兵驰杀疆场，抗击日本侵略军，为保卫祖国作出了贡献。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同年9月5日，李默

庵率部在浙江绍兴解除了驻浙日军的武装，接受了日军投降。

1946年他接任第三方面军司令官（后改为第一绥靖区司令官），1948年任湘赣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十七绥靖区司令官。1949年他在长沙随程潜将军和平起义，同年5月离湘到香港。

据他回忆，当时黄绍竑邀约在香港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数十人，联合发表主张和平反对蒋介石通电，他欣然报名参加。

李先生说，那时香港情况复杂，不宜久留，于是，在当时在美国工作的胞弟李宗元的协助下于1950年迁居阿根廷，1964年到美国居住。

他谈起1981年10月他被邀请回国参加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大会这件事，心情非常激动。他说，记得纪念大会于10月9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国内外来宾、各界人士共一万多人出席大会。在主席台中就坐的有270多人。叶剑英是大会主席，坐主席位，后边依次是邓小平、邓颖超、陈云……，他被排在第11位，在大会上讲话的依次为胡耀邦、屈武、胡厥文、李默庵、缪云台。在他讲话前，邓颖超专门作介绍，称他是1949年在湖南随程潜起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之一。

李默庵于1984年2月在美国与宋希濂、侯镜如、蔡文治，发表了黄埔军校同学及其家属促进中国统一筹备委员会宣言。宣言提出国家第一，民族第一，统一至上，建设至上，希望在台湾、大陆和海外的黄埔军校同学秉承孙中山先生遗志，继续发扬黄埔精神，为促进中国统一而奋斗。1984年北京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时，他被选

为副会长。

从李先生的言谈话语中可以感觉到，他在1949年怀着深深的痛楚离开祖国的。侨居海外岁月虽然漫长，但他始终怀着一颗炽热的爱国心，他时刻都在关注着祖国的变化。特别是大陆开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他为大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欢欣鼓舞。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虽在海外，但一直心系祖国。几年中，他数次飞回大陆参看看望，对祖国的眷恋之情越来越深。终于，李默庵老人于1990年6月1日，只身一人，手捧着刚刚去世的夫人的骨灰，从美国起飞，穿过万里云雾，回到祖国大陆定居。

李默庵先生几十年一直站在爱国的立场上，就是侨居海外，也始终不渝。多年来，对海外一些报刊发表的攻击大陆、鼓吹“台独”以及煽动反华的文章，特别“6·4”事件以后，个别动乱分子跑到国外发表诬蔑祖国的文章，他怒不可遏，多次奋笔疾书予以揭露和批驳。正如他说的：“我无论到了哪里，都始终站在爱国家、爱民族的立场上。”这对于一个在解放前后和海内外都生活过的老人来说，是多么可贵的品格啊！

国家统一 一定能实现

李默庵先生告诉记者，他虽长期身居海外，但无时不在关注祖国的一切，盼望着祖国的统一。

他说，1981年他应邀回国参加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大会，感到很受教育。当时叶剑英委员长发表谈话，提出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项方针政策，十分合情合理，我听后很受感动。中国共产党这样以大局为重，致



聂荣臻会见李默庵

力于祖国的统一大业，国民党没有理由再拒绝了。

在谈到国共第三次合作时，李先生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我正在黄埔军校上学。那时，同学们的革命热情很高。我的同期同学，国共双方高级将领中都有很多人，例如徐向前、陈赓、左权、杜聿明、侯镜如等。他说，孙中山先生倡导国共合作，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同时创办了黄埔军校，建立了革命军队，进而统一了广东，开始了北伐。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成果。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之际，国共两党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全民族大团结，一致对外，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现在，中国共产党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着想，提出国共对等谈判，希望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这是非常正确的。我希望台湾当局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积极响应这一号召，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共同努力。

李先生语重心长地说，我从60多年的亲身经历中深深感到，国共两党合作就给国家带来兴旺发达。分裂就给国家带来灾难。今天，虽不是50多年前遭受外国侵略者蹂躏的年代了，但世界上并不太平，还是要居安思危，为国家、民族的利益着想，为子孙后代着想。所以，国共和谈，实行第二次合作，是人心所向，符合历史潮流。国民党当局如能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同中共实行第三次合作是明智的。从现实可以看出，台湾的出路在于实现与祖国大陆的和平统一，中国国民党的出路在于实现国共两党的第三次合作。

他说，我经常和许多老朋友一起谈起祖国的统一问题，大家认为，国家统一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一定能实现的。

振兴中华 匹夫有责

我去采访时，李默庵先生刚参加完全国政协七届四次会议才回到家里。他不由谈起对这次会议的感受说，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很重要，开得很好。听了李鹏总理关于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的报告，和钱伟长副主席的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感到特别亲切，特别振奋。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是今后十年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总目标。这个规划集中了全国人民智慧之大成，是符合全国人民需要和利益的，只要各方面共同努力，我相信是一定能实现的，中华民族一定会振兴的。

李先生认为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提出“振兴中华”的旗帜，深得海内外人心，受到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的一致欢迎。这是孙中山先生成立“兴中会”时就提出的愿

望，也是近百年来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

他是在海外听到“振兴中华”这一口号的。近年来，他多次回国，通过探亲观光，参加会议、实地考察，亲眼看到大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深深感受到，大陆正在进行着“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

李默庵先生说，现在大陆政局稳定，经济发展，是一片兴盛的局面。据有的历史学家说，中国历史上曾经有三个中兴时期，第一个是汉武帝时期；第二个是盛唐时期，第三个是康熙、乾隆时期。我认为，现在中共领导大陆人民，齐心协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中国的第四个中兴时期。

李先生深有体会地说，振兴中华，匹夫有责。必须全国人民共同努力。我们有了发展的总目标，但光凭空口号或依靠外国人，是实现不了的。“6·4”事件后，我在国外看到极少数中国人，被外国人利用，是非不分，甚至污蔑祖国，感到气愤和伤心。大家都有责任爱护和建设自己的国家。我认为，现在是近百年来中国腾飞的大好时机，每个炎黄子孙都应顺乎历史潮流，为振兴中华尽心尽力。

桑榆之年 再展鹏程

李默庵先生在86岁高龄时，毅然从美国回归祖国。当记者问到他为什么回国定居时，他说，在美国物质生活的确是比较好的，但思想上精神上总觉得不被平等看待，有寄人篱下之感。所以，在海外特别希望自己的祖国强大，否则，就难以挺胸直腰。这一点我在国外体会非常深刻。近年，我在国外看到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建设得很快，就非常向往祖国。现在我老了，尽管在美国生活条件比较好，但我还是愿意回祖国大陆定居。

谈起他回到北京后的生活，李先生显得很满意。他说，我的夫人刚去世不久。我有7个子女，5个子女在美国工作，还有一个儿子叫李希刚，在沈阳工作，一个女儿叫李碧如，在北京工作。现在李希刚夫妇照顾我的生活，对我服侍得很好。更使我高兴的是国家对我照顾很好，我感到很满意。

在我们的谈话快要结束时，李先生说，现在我虽然已经老了，但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名黄埔军校的老毕业生，我还要尽我的职责，联络海峡两岸的黄埔军校校友，一起为台湾回归、祖国统一尽心尽责。我还要努力做好人民政协的工作，使海内外的中国人都团结起来，为振兴中华，共同奋斗。

谈到此处，他拍了拍自己的胸脯说，我虽87岁了，但身体很好。我长年累月，风雨无阻，每天早晨散步半小时。我相信，一定能看到祖国统一的那一天，中华振兴那一天。

本刊特邀编委、学者温济泽同志特约并推荐来本文。温老认为，文章涉及的史实，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国的抗日战争，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赞成始于“9. 18事变”的看法。他说：“‘9. 18事变’后，东北军民开辟了武装反抗侵略的战场，全国人民首先是学生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斗争。这段历史长期被忽视。今年是‘9. 18事变’60周年，似应作比较全面的回顾。”本文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以大量翔实史料和生动感人的笔触，既写出了张学良将军爱国至诚、忍辱负重的拳拳之心，又展现了东北人民奋起抗日的英勇斗争。历史早该还其本来面目了，中国抗日战争到底是从1937年“7. 7事变”开始，还是从1931年“9. 18事变”后开始？希望广大读者和研究者能提出自己的看法。

1990年6月和8月，日本广播电视协会（NHK）记者在台湾连续两次采访了张学良将军。当问及“‘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是何原因”时，半个多世纪以来对此一直缄口不语、毁誉由人的张学良将军，激动而又爽快地作了回答。他说：“骂我‘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我是一点也不认这个帐的。”“骂我是封疆大吏，没把日本的情形看明白，那我承认。”60年后的今天，他仍然一如既往，对中国现代史上与他有关的成败纪录，只就自己应负的历史责任作自责，而绝口不谈其它，也不自悔，个中原委，不难理解。其豁达胸怀令人起敬。

众所周知，1928年末张学良出于一片爱国至诚，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毅然决定东北易帜，他是想凭借统一后的国家力量，使东北逐渐摆脱日本的控制。因此，“九·一八”事变前后，他在处理中日关系问题上，不得不处处听取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意见。

事变前，日本借口“中村事件”向东北当局不断施加压力，沈阳形势日趋紧张。同时，蒋介石指令：“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东北外交总的方针是和平解决，不能酿成军事行动，东北能解决的就解决，不能解决的由中央负责。”9月12日，蒋介石在石家庄火车上与张晤面，又亲自对张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重要的是你要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挑衅的，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那时

隐忍未必不抵抗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张学良将军

·周平生·



就分辨不清了。”在新横凶狠的日本侵略者面前，张学良从来未退缩过半步，但他却必须接受蒋介石的指令。这时，他还从自己的善良愿望出发，对疯狂的日本军国主义份子作了一个错误的判断：认为日本还不致冒天下之大不韪，立即在东北挑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他更没有料到，日本关东军根本不待“交涉”解决，就突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事变爆发后，固然由于东北军接受了张学良不予抵抗的命令而使大片国土迅速沦丧；然而，不抵抗命令却源于蒋介石，这一历史事实却是铁证如山的。

顺承王府的日日夜夜

1931年9月18日深夜，正在北平的东北军统帅张学良接到沈阳发生事变的报告后，立即召集在平的于学忠、戴翼翘、万福麟、施文越等重要将领开会，张学良按中央的意见谈了自己的看法。他首先分析：“日本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这次挑衅的举动，来势很大，可能要兴起的战争。”并且认为：“现在我们既已听命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的问题，我们只应速报中央，候候指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最后，他仍抱有一种幻想：“这次日本军队寻衅，又在柳条湖制造炸坏路轨事件，诬称系我方军队所为，我们避免冲突，不予抵抗，如此正可证明我军对他们的进攻，都未予以还击，更无由我方炸坏柳条湖路轨之理。总期这次事件，勿使事态扩大，以免兵祸迭结，波及全国。”

19日晨，他又召集在平的东北外交委员会委员顾维钧、章士钊、罗文干、莫德

漢卿世兄屬

天下為公

惠等十余人举行会议，21日，继续召集平津名流李石曾、胡适、潘复等及东北军将领共计27人的联席会议，研究东北问题。这两次会议中，有的人认为，国联不会坐视；有的人认为，日本内阁也许会抑止日本军部势力；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听命中央为是。

从柳条湖炸药声响起，日军一日之间占领沈阳。同时，在辽、吉各地又占城20余座，掠地千余里，而且还在继续扩大军事行动。在朝鲜的日军师团，也越境向中国东北源源开来，其侵略野心昭然若揭。在这种情势下，张学良与敌一战的念头油然而生，极希望蒋介石也能早下决心，举国抗敌。为此，23日他特派万福麟、鲍文越飞南京面蒋请示，但蒋对万、鲍的回答却是：“你们回去告诉汉卿，现在他一切要听我的决定，万不可自作主张，千万要忍耐负重，顾及全局。”张学良本来是一个不受人左右而又敢于决断的人，但在蒋介石的“中央”面前，在事关国家民族大计的“国策”面前，他一筹莫展再次服从了。

随着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不断高涨，北平市各界民众和从东北流亡到北平来的众多学生，对政府屈服于侵略者的横行也愤怒起来，他们的不满情绪集中地向这位从坐镇华北、睥睨当世的少帅身上发泄，在街头上甚至出现了“打倒不抵抗主义者”、“打倒张学良”的标语。就连东北军中的部份中下级军官，要求对敌作战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有的干脆离职回东北去参加义勇军的抗日斗争。这一切深深地刺激了张学良，但性格坚强的张学良并不因此而萎靡不振，他敢于面对现实，向各界代表表明自己的态度。

他在接见北平市各界人民抗日救国会代表时激动地说：“我姓张的如有卖国的事



情，请你们将我打死，我都无怨，大家爱国，要从整个去做，总要使之平均发展。欲抵抗日本，必须中国统一；如果中国在统一的局面之下，我敢说，此事不会发生。我如有卖国行为，你们就是将我的头颅割下，也是愿意的。”

他在召见东北籍学生代表时诚挚地说：“我的听从中央，忍耐负重，不求见谅于人，只求无愧于心，我敢断然自信的，第一，不屈服，不卖国；第二，不贪生，不怕死。”并与同学们相约：“有愿投笔从戎的，请先行报名，以便将来我和你们一同抗日。”

他多次含着眼泪向主张立即与敌人作战的军官们说：“我爱中国，我更爱东北，因为我的祖宗坟墓均在东北，如由余手失去东北，余心永远不安。但余实不愿以他

人的生命财产，作余个人的牺牲，且不愿以多年相随、屡共患难的部属的生命，博余一人民族英雄的头衔。日本这次来犯，其势甚大，我们必须以全国之力赴之，始能与之周旋。如我不服从中央命令，只避一时之愤，因东北问题而祸及全国，余之罪过，当更为严重。诸君爱国的热忱，可暂蓄以待时，将来必有大可发挥的一日。”

矛盾丛生、痛苦已极的张学良，似乎只有讲出这些话时，才能在精神上得到一点安慰。

运筹帷幄之中

张学良虽然屈从于“隐忍自重”^②和“不抵抗”命令的束缚，但并不因“听命中央”而消极等待，在当时情势下，他尽自己之努力，于运筹帷幄之中，组织和支持东北军民，进行抗日斗争。

首先，在日军占领辽吉黑三省并组织伪政权的同时，他毫不迟疑地重建了东北三省的抗日政府和军事指挥机构，使之立即与日本侵略军展开局部斗争。

1931年9月23日，张学良将东北军政中心西迁锦州，并通电全国：“在锦县暂设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行署，辽宁省政府行署。”委任已在锦州的张作相代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米春霖代理省主席，荣臻代理参谋长。25日，已经撤退到北平的黄显声等人首批返锦，月末，米、荣等两署人员相继到锦。榆州军政两署的及时建立，对辽宁和整个东北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也为中外人士所瞩目。

10月10日，张学良电委原步兵第三旅旅长、黑河警备司令马占山代理黑龙江省政府主席，兼代东北边防军驻黑龙江省副司令长官，任命谢珂为军事副指挥兼参

谋长，同时还从北平派专人赴黑龙江与马联系。10月20日，马占山到齐齐哈尔宣誓就职，并发表演说：“倘有侵我疆土，及扰乱治安者，不惜以全力铲除之，以尽我保卫地方之责。”使“风声鹤唳，一夕数惊”的齐市商民顿时稳定下来。

11月12日，按照张学良电令，吉林省政府在宾县成立，诚允代理省主席，李振声代理边防副司令，丁超代理护路军司令，冯占海任吉林省警备司令。接着张学良电令诚允“整饬一切。”又从黑龙江省库中拨给5万元和大量枪炮弹药。吉林省政府的成立，形成了与熙洽为首的伪政权对峙的局面，使一些处于徘徊观望的人物纷纷向抗日政府靠拢。

三省抗日政府成立后，立即与日本侵略军展开了殊死的斗争。

黑龙江省军在马占山的指挥下，进行了震惊中外的嫩江桥抗战。战役从10月16日开始，至11月19日结束，历时35天。其间，张学良极其关注并从多方面予以支援。10月17日，张学良电令马占山：“除原驻黑省军队统归其指挥外，所有原驻哈尔滨之吉林省军队及洮索路各军、东北屯垦军及前由邹作华统率之炮兵，均归其指挥。”24日，张学良又电令“哈尔滨中国银行拨款50万元接济马占山，作为整军建军费用。”11月17日，因马捍卫省土有功，北平副司令行营通电嘉奖。并令“全权主持军政。”随后，张学良又派专人赴黑慰问。12日，张学良专电令马“矢志死守，勿退却。”使黑省将士“得副司令鼓励，士气极旺。”

嫩江桥抗战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来所遭到的第一次最沉重的打击，在几次较大规模的战斗中，日军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嫩江桥抗战不仅打破了全国抑郁的抗日气氛，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忱，振奋了民族自强精神，而且也压抑了妥协投降论调，对东北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出于这些原因，国民政府也于11月17日正式任命马占山为黑龙江省省主席。

吉林省政府成立后，冯占海的警备军迅速扩大，接着在水曲柳、舒兰等地连续向日逆军发起进攻，给敌人以极大的打击，推动了吉林抗日义勇军的迅速发展。后来，李杜、冯占海、赵毅等部联合组成吉林自卫军，在哈尔滨保卫战中再次给敌人以重创。

锦州的战略位置十分突出，张学良最为关注，也是他最便于直接指挥的地方。两署成立后，他即将原驻通辽的骑兵第三旅、

驻洮南的第二十旅调至锦州，连同驻锦州的第十二旅一起在大凌河一带布防。

黄显声按张学良的意图，在扩充公安骑兵总队的同时，还大力发展民众抗日义勇军。当时一些到北平找张学良要求抗日的爱国志士，他也一一介绍到锦州来，一个时期，张学良密委黄显声组织义勇军的消息不胫而走，各方爱国志士来锦州请缨抗日者纷至沓来。黄显声在短短的时间内，即组织了20余路义勇军，开展抗日斗争。

为了颠覆张学良的锦州政权，10月间，关东军唆使汉奸凌印清袭扰辽西。黄显声派熊飞率公安骑兵总队往剿，并向逆军项青山等人晓以大义，项等举义生擒凌逆及其全部日本顾问。不久，关东军又扶植张学成组织逆军与锦州政府相对抗。由于张学成是张学良的堂弟，野心极大，身边所聚党羽大都与东北一些要人有各种关系，因此许多人都反对与其兵戎相见，即使是荣臻、米春霖也感到处理此事棘手。深深了解张学良的黄显声力排众议，指出：谁投降日本作汉奸，都应当消灭他，张学成也不能例外，并且张副司令也不会同意他的堂弟作汉奸的。遂派骑兵总队进剿。高山子一战，将逆军击溃，生擒张逆，张学良随即下令将其就地正法。

锦州政府灭凌除张之举，使辽西民众为之振奋，也使张学良深受感动。

11月26日，日军向辽西侵犯，当其先头部队第四旅团一部进入新民县青岗子一带时，受到黄显声调集的义勇军的猛烈阻击。日军在遭到重大损伤的情况下，关东军司令部冷静地分析了辽西政权的形势，最后，不得不下令将所有入侵辽西的部队撤回，宣告第一次西侵的失败。

寄希望于民众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酝酿拼凑伪满洲国的同时，还扶植了蒙族王公甘珠尔扎布，在辽北蒙边一带策划成立伪蒙古独立国。张学良得知这一消息后，特委派熟悉该地情况的东北军事委员会少将步兵组长高文斌赴辽北，组成“辽北蒙边宣抚专员行署”，收编蒙族武装，组织民众抗日义勇军，抵制日本制造分裂的阴谋。高文斌到辽北后，先后收编了蒙族武装统领包善一、韩色旺、刘振玉、李胜等几支队伍。高还邀他们到北平会见张学良。在会见中，李胜开口就问：“你是否忘记了你的父亲是被谁炸死的？”张学良慨然回答：“国难家仇，皆不敢忘记。”使李

等很受感动。张学良还对他们作了诚挚的勉励，希望他们能为国家民族建立功勋。其后，专署领导的各部转战辽北各地，在开鲁、郑家屯、康平一带给日逆军以沉重打击，彻底消灭了甘珠尔扎布的“蒙古自治军”，粉碎了日军策划成立伪蒙古独立国的阴谋。

1931年9月27日，流亡到关内的东北爱国人士阎宝航、卢广绩、高崇民、王化一等人及青年学生400多人，在北平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该会“抵抗日本侵略，共谋收复失地，保护主权”的宗旨和把军事、宣传作为工作的重点，都得到了张学良的赞许。又由于救国会的领导人中有许多是他的幕僚亲信，深受他的信任，所以他对这个组织非常重视，不仅明里暗里给予各种支持和保护，有时他自己的一些抗日措施也通过这个民众组织去贯彻，使救国会发动和组织民众抗日义勇军，抵制和揭露不抵抗政策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救国会组织义勇军的工作中，有时需要派人出关联系，张学良就将签名盖章的白绸“手谕”交他们带出关外去找人（有的是指定人）联系。黄宇宙就曾拿着他的“手谕”三次出关，往辽东一带活动，后与唐聚五、邓铁梅、李春润等人发起组织“辽宁民众自卫军”，成立了一支下辖19路、拥兵数万名的义勇军队伍。后来，救国会又在辽宁就组织起来50余路义勇军，划分5个军区，在各地开展对日斗争。

1932年4月初，“国联调查团”③到达北平，张学良在设宴招待时，特将救国会的许多领导人请来参加作陪，并将他们向调查团团长李顿作了介绍。会后，他即指示救国会，迅即整理外交材料，揭露日军侵略中国东北的罪行。他还特别强调：你们是代表中国人民向国际讲坛讲话，要有中国人的骨气，不能让他们像法官审案那样看待我们。后来救国会整理的材料，以大量的事实证明了中国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是蓄谋已久以武力灭亡中国的第一步，而并不是什么地方性事件；东北各族人民奋起抵抗日本侵略的行动，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日本制造的在中国东三省没有反对所谓“新国家”的势力，纯属一派谎言。

为了敦促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1931年11月初，救国会组织了“东北民众救国请愿团”，准备赴南京请愿。南京方面事先得到消息，立即给张学良打来电话，要他进行劝阻，但他对此事却采取“睁一只眼、

炎黄文化 光照千秋

为《炎黄春秋》题 伍修权



闭一只眼”的态度，对救国会的行动表示默许。请愿团到南京后，11日下午3时半，蒋介石被迫出见。请愿团代表高崇民面对蒋介石慷慨陈词：“东北人民对促成统一，保卫国土所作的努力，对得起中央，而中央在敌寇入侵以来，不发一兵，不作明确抗日表示，一味依赖国联，使敌寇得寸进尺，侵略无止境，中央何以对得起东北人民？”他还质问蒋介石：“政府是否还要东三省？”义正词严的诘责，蒋介石面红耳赤，最后只好以“依靠国联正义制裁”，“在必要的时候，中央一定抵抗”等话来搪塞。

无可奈何的电文往来

当日军以三路重兵指向锦州，义勇军奋起抵抗之时，张学良连续多次电告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痛陈日军向辽西进攻的战况和东北军民要求对日宣战的决心。其中指出：“以我东北一隅之兵，敌倾全国之力，强弱之势，相去悬绝……我东北军队，止有此数，顾此失彼，必不能免”；“此端一开，平津必受扰乱，我军有首尾难顾之虑。”几封电报还反复提到，“枪炮弹药，极感缺乏，稍一支撑，即难为继”，要求“所有弹款，务请于一星期内发到”，“敬请统筹全局，确切指示为禱”，等等。这时蒋介石对此类电报已不屑一顾，南京政府只作了“已分交参谋、军政两部核办矣”一类电文来敷衍。张学良深知，如果没有蒋介石的指令，任何参谋、军政各部都是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的能力。

战或是退的决定刻不容缓，张学良在与东北部份将领和幕僚分析形势后一致认为：“中央阴谋以外力消灭东北实力，俾中国政治舞台上再设东北扮演角色。在此际，进退战和，大伤脑筋，战则要东北独力支

持，中央坐观成败，和则要冒舆论之大不韪，遭全国唾骂或致丧失政治地位。”最后，张学良表示：“如果是‘玉碎’还可以碎，要是瓦碎则不必。”加之当时日本所支持的阎锡山、韩复榘、石友山反张联盟的阴谋未散，向张学良发难取而代之的可能性随时存在。于是，为了保存抗日的实力，张学良在有“说不出的苦衷”的情况下，终于撤销原定计划，命令锦州一线全部撤军。

张学良率东北军撤出东北之后，尽管他被逼到内忧外患的绝境，又背负各种罪名，但他从没有忘记过国恨家仇，没忘记过收复国土，他一直坚持抗日斗争，不懈地促蒋抗日，“西安事变”正是他这一思想发展的结果。他的名字应该永远镌刻在抗日战争的丰碑上。东北军民同仇敌忾，救亡抗日的斗争，应是抗日战争之始而载入史册。

注①1931年6月，日本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等化装成中国农民，在中国东北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军事地理调查，6月26日，被驻防当地的中国屯垦军三团逮捕处死。事为日本奉天（今沈阳）特务机关侦知后，日本政府及关东军即利用这一事件宣传“满蒙危机”，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煽动战争狂热。

注②1931年7月，日本在我国东北挑起“万宝山事件”后，蒋介石即电告张学良，称：“发生全国的排日运动时，恐被共产党利用，逞共匪之跋扈，同时对于中日纷争，更有导入一层纷乱之虞，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张也复电蒋：“努力隐忍自重，勿使日本乘其间隙。”

注③“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不发兵抵抗，反而希望“国际联盟”（简称国联）主持“公理”和“调停”。国联一味袒护日本，后又在取得日本政府同意的情况下，于1932年1月正式成立了以英、美、法、德、意五国成员组成的调查团，由英人李顿任团长，赴中国东北进行“调查”。

为炎黄春秋杂志题词
弘扬民族正气
讴歌先进人物
记录时代风云
反映当前旋律
伍修权
一九九二年三月



张学良二三事

赵云声

孙中山题字

1929年,张学良将军毅然易帜后,社会各界对张学良备加赞誉,报刊上醒目地登出了孙中山对张学良的一幅题字:“天下为公”。

众所周知,孙中山先生于1925年3月12日逝世,那么,这一题字是何时写的?

原来在1921年的直奉战争之后,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段祺瑞以执政的名义约请孙中山共商治国大计。孙中山在宋庆龄等人的陪同下,抱病北上,乘轮船抵达天津时,正随父张作霖驻守天津的张学良,率领天津各界人士前往迎接。

孙中山为了感谢张家父子,决定往晤张作霖。随行人员唯恐张作霖设置鸿门宴,于是让汪精卫、邵元冲、孙科和李烈钧四人陪同。进入客室后,许久方见体瘦矮小的张作霖缓缓走出,迳自踞于上座,态度傲岸,似旁若无人。坐定后,孙中山起身说道:“昨天抵埠,承蒙派军警迎接,盛况可感,特来申谢。”又云:“此次奉直之战,赖贵军之力,击破吴佩孚,实可为奉军贺。”谁知张作霖竟说:“自家人打自家人,何足为贺!”话语中,颇有不悦之意。陪同人等一时陷于尴尬。这时,李烈钧站起来,先向孙中山和张作霖点首为礼,然后说道:“事虽如此,若不将国家之障碍、如吴子玉诸人铲除,则欲求国家之进步与人民之幸福,终属无望。总理孙公之贺,实有价值,亦唯公能当之也。”张作霖听后,哈哈大笑。孙中山接着徐徐说道:“协和之言是也,自民国成立以来,得我之贺词者,亦唯雨农兄一人耳。”话到这里,满座皆欢。张作霖也高兴地举杯请茶,孙中山与他相互握手,并欣然为张学良题写了“天下为公”四个大字。

不久,孙中山肝病剧变,赶赴北京协和医院诊治,遂于3月12日溘然长逝。所以,给张学良的这幅题字,几成孙中山之绝笔。

而张学良将军没有辜负孙中山先生之意愿,后来当张作霖再次挑起内战时,张学良多次劝谏,以致和其父发生争吵。待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谋害以后,成为东三省最高长官的张学良,不计较个人得失,顶住日本人的威胁利诱,毅然决然地实行易帜,以果敢行动实践了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教诲。

注:张学良字汉卿;吴佩孚字子玉;李烈钧字协和;张作霖字雨农。

倡导女子游泳

1934年,张学良驻节武汉期间,为了倡导游泳运动,曾多次偕同政府大员前往武汉大学游泳。五月的东湖,风光绮丽,湖水清澈,和大海相比,竟别有一番情趣。同来的诸要员中除张群外,均带了夫人,其中当然少不了日夜陪伴张学良的赵四小姐。

军政大员夫人前来游泳,引起武大师生,尤其是女生的极大兴趣。纷纷赶到游泳池附近,在警戒线外围观。原来,在三十年代的武汉,相当一批人尚认为女子游泳是有损“国风”的事,就像武汉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也明文禁止女学生游泳。刚刚从欧洲游历考察归国的张学良就是针对这一情况,特意将这批大员夫人请来,并首先让赵四小姐下水表演。自此,女生不准游泳的禁令不攻自破了。

同年9月,张学良在武汉还倡导了首次横渡长江的比赛。那天,人声鼎沸,盛况空前,江面船只不得通行。30名游泳健儿从武昌黄鹤楼下水,一直游到汉口五码头上岸。这次横渡长江的壮举,使整个武汉三镇之轰动。

四个“九·一八”

1930年4月,中原地区爆发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军阀大混战,战场绵延数千里,一百多万军队互相厮杀。史称“蒋阎冯中原大战”。战争呈现难解难分之势。在这种情况下,实力雄厚的东北军就成了全国瞩目的对象。如果张学良偏向阎、冯、汪,出兵相助,则蒋介石必将被迫下野;如果张学良归附南京蒋介石,进兵关内,则反蒋阵线势必瓦解。因此,各派势力纷纷派代表对张学良实行拉拢。

张学良经过几个月的观望,思索,终于在9月发表了拥护中央、呼吁和平的通电,继而统帅三军,挥师入关。中原战争风云急转直下,不出两个月,阎锡山和冯玉祥便宣告失败,联名通电下野。至此,历时七个月的军阀大混战得以结束。

张学良发出通电的那一天,是1930年的9月18日,所以人称这是张学良的第一个“九·一八”。这个“九·一八”是他一生中最光彩的时刻,从这天起,年仅30岁的张学良,成了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他的名字响彻大江南北。

谁会想到,仅隔一年,1931年9月18日晚10时左右,日本关东军在沈阳近郊制造事端,突然用炮火猛轰北大营,并入侵沈阳城。这便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九·一八”事变。在这个事变中,由于张学良被迫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致使日军长驱直入,占领了东北三省。

日本关东军这一阴谋得逞后,他们欣喜若狂,为了纪念这一事变,实行其吞并中国的野心,他们把沈阳通往北平的火车,改为“九点十八”开车。这就是所谓的第三个“九·一八”。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当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主持的投降签字仪式完毕时,一位《大公报》的记者抬手看了下手表,时针恰恰指在9点18分。这具有讽刺意味的第四个“九·一八”,大约是对玩弄历史者的一种回报和惩罚吧!

羡慕大陆生活

面对台湾社会的波涛汹涌，和大陆的急速改革，三毛两岸纵横后，脑袋里的价值观翻了几翻。

对大陆人的生活悠闲，物价廉宜，三毛表示非常羡慕。她算了一笔帐：一对大学毕业的夫妇普通收入，在大陆是400元，台湾是4万元，但一间房子的租金在大陆是3元，台湾是一万元；半公斤的白米，大陆是0.13元，台湾120元。收入是台湾高一百倍，但

支出是大陆的一千倍，相比之下，大陆生活要轻松多了。

谈到追求，三毛说，对一般青年人来说，台湾人追求金钱，梦想买一栋房子，于是各施各法，炒股票、摆地摊、兼职和补习等把式俱全；而大陆人也想钱，但却鄙视那些“个体户”，“恨”钱又恶有钱人。在三毛看来都十分古怪。归结中国的问题，三毛认为是人口过多。她又认为大陆埋没了许多优秀人才，却养了一批懒人。

三毛的《滚滚红尘》是第一部长片外景的台片，片商是香港汤城（台资）公司，但从导演、编剧到演员，从头到尾都是台湾情怀。剧本是写乱世儿女的爱情故事，背景是国共分裂到两岸交流中间分隔的40年，目的是要从女性心理探讨传统女性的爱情观。透过轰轰烈烈的时代背景和动人的爱情故事，点出爱情的矛盾——女性的梦是男人，男人的梦却是国家和事业。具有传统观念的女人总认为有个男人就有安全感，不为什么就爱个死去活来，甚至愿意付出自己的生命。三毛本人却认为，现代女性不一定要有男人，爱情变得可有可无。

三毛收入有多少？台一家杂志估计月入300万台币。三毛见了笑哈哈，她很认真地把她的“身家”告诉记者。

她十多年来共出版了19本书，包括录音带的有声书，收益分红是出版商九成，作者一成，一次卖断是15万新台币。畅销的书出版多至100版，最差的也有一万本。以平均一本收入20万计，三毛共收380万元。大陆方面，去年交来“转载费”每千字15元人民币，共收2万多元。现时的稿费是每字新台币一至二元，过去二年只写了5篇3000字的稿，共3万台币，偶然演说、编个剧本也是有薪水的，合共多少？三毛也说数不清，总之现在她的资产有东区的一个单位值400多万，翡翠湾度假屋时价98万，一部日本小车和若干美金存款，估计资产总价新台币800万。三毛说现在即使不做事，不写字，每月都有3万多的版税收入，生活还可以。

回顾她的19本作品，三毛概分为五个阶段：一、16

岁的苍白少女阶段，从《雨季不再来》开始；二、是10年以后的“新娘阶段”，“一个好快乐的女人”；三、“失去丈夫的妇人”，三毛说那时在教书，境界变了，情操也开始出来；四、“根本不写稿阶段”，只写剧本，就是现在；五、一字不写的“无字天书”阶段，是三毛的目标。如果写作是希望与人分享的话，三毛说，根本不寂寞，也不要与人分享，她要享有绝对的自由，所以不写作。

在三毛的世界，只有看书、旅行、听音乐、扫地和发呆。平日就过着半隐居的生活。她拒绝社交，可以做到不收挂号信和包裹，朋友交往，只靠电话，毋须见面。她说自己的生活方向非常模糊，已做到拒绝写作、赚钱的地步，三毛雀跃地说：“真棒！快成仙了！”

足迹遍及59国

三毛原名陈平，1943年3月26日生于四川重庆，原籍浙江省定海县，6岁时随父母到台湾，13岁以前就读于台北市第一女子中学，但到初中二年级便休学，转为自修，并自14、15岁开始写作、投稿。三毛辍学7年后，入中国文化学院哲学系为选读生。21岁转赴西班牙马德里大学文哲学院、西德歌德学院就读。

三毛游历过撒哈拉沙漠、南斯拉夫、波兰、丹麦等59个国家。居住海外18年之后回台湾定居。曾多次到香港。近两年还到过大陆北京、上海、新疆、西藏、浙江、杭州、成都等地。她与大陆的不少作家成为好友，并称漫画《三毛》的作者张乐平为爸爸。

她的作品多数以自己生活的体验为题材。强调文学的“真”，畅销作品包括《撒哈拉沙漠》、《雨季不再来》、《哭泣的骆驼》、《温柔的夜》、《迷航》。以她的作品编成剧本的《滚滚红尘》，在1990年12月台湾电影“金马奖”的评选上获得8项殊荣。三毛的作品风格诙谐、机智，充满传奇色彩和异国情调，她在台湾、香港、大陆、新加坡、美国等地都拥有一大批读者。

她与她的西班牙丈夫荷西定居撒哈拉沙漠，过着恬静而淡泊的生活。荷西对三毛宠爱有加，但夫妻之间却非卿卿我我。三毛说，荷西就像“一个大平原的野男人，也是他可爱之处。”不幸荷西在工作中发生意外丧生。



三毛生前故事二则

文哲



“局外人”李雪健

·何东

1、新闻大战同行冤家酒后真言

一把宋大成，一把焦裕禄，李雪健红透了北京，火遍了全国。

尽管早就有内行外行相干不相干的人暗地里盯上了他，但这么多年，李雪健还真没像现在这么红火过。

过去的10年，大概是中国影视界最热闹的10年，什么新鲜的没见过？奶油、深沉、潇洒，土、洋、古、土洋结合、土洋古三结合，中外合资，出口获奖转内销，万花筒一般转得人瞧着头晕眼花的。

有人立志要当“阿兰·德隆”。

有人铆足力气要学：“高仓健”。

那阵儿谁认识李雪健？

直到所有的新鲜劲儿全看过去了，人们这才回过头来，一下子全盯住了李雪健，仿佛就像从秦皇陵旁的1号坑里突然发现了一个新模样的兵马俑，宝贝疙瘩似地赶紧全都扑上来搂着抱着亲热地琢磨起这位菏泽老乡来。

就这么“火”，李雪健自个在琢磨什么呢？他自个儿是不是已经把自个儿琢磨透了？天知道。

不容他自个儿定下神琢磨琢磨，电影《焦裕禄》公映之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新闻热潮平地掀起，《渴望》引起的热闹，虽然

被李雪健小心机地躲开了，可这次他却像一个守大门的被对方彻底逼到禁区之内，没法防了。多少家大报、小报、雅的、俗的、首都的、外地的，各种报纸杂志的记者们，歼击机一般跟踪上来，追着、撵着、粘着、撵着，一场瞄准李雪健的新闻大战在各式版面上全方位拉开。

拿起笔作刀枪，诸位行家高手底下都叫了劲。消息、特写、通讯、评论、报告文学，一时间，李雪健的名字铺天盖地，信手拈来随处可见。报纸，整版整版地抢。杂志，整本整本地干。纺织、法制、经济、水利、老年，以往和影视表演艺术一点不沾边的报刊，如今一下子全都和“焦书记”挂上了钩，因为一部国产片，因为一个中国男演员，国内报刊照这么煽乎还是史无前例。

有清高的记者开始在一边摇头了：“对李雪健的宣传有点戏过”。但说这话的哥们儿似乎是忘了，戏过还是不过，还不全是记者们甩手之间干下的事。

几位真有“手眼”的记者，不露声色地为记者捧出了几篇耐读的文章《走进焦裕禄的世界》、《他从哪里来？》、《您的朋友李雪健》。平静的叙述中含着爱护和帮助，热情的赞扬中和着冷静地分析，衷心的希望中寄托着小小的嘱咐叮咛。采访与被采访之间，李雪健和记者交上了朋友，以他那双不大不小却敏锐异常的眼睛儿，他能一下子洞穿真伪虚实和应付糊弄。

当然，还有抄抄拼拼东挪西借凑份子完成任务，跟着起哄架秧子的。有多少国内的演员，就仗着记者们手下那一枝枝毛笔，一夜之间就成了贼亮亮的明星，“噌”地一下升上九天，红遍神州，可后边接着跟两部片子，表演上稍一马失前蹄，生活上稍一不检点，翻过手来回头在报刊上抢圆了骗你大嘴巴的，还是这帮练笔杆子的。有人从正面宣传你，会不会有人也握紧笔杆子在一边悄悄等着你呢？诸如走穴、家庭内讧、风流韵事等等，若不小心留点“贼”，稍稍和这些糟践事儿着上点边，立刻社会有人在报纸版面上给你播出最大冷门新闻来。回过头看看这几年的影视圈里、通俗歌坛中，一时间红极一时，一时间又臭不可闻，翻云覆雨之间，摆平折翻了多少风流娘子和英雄好汉？写作的手法虽然在不断翻新，但内里的招法功夫却仍然还是老一套，喧叫“江山代有才人出”、“老谱将不断袭用”。

久怕出名猪怕壮，古人早已有言在先：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有哥们儿在边上儿悄悄嘱咐李雪健：“得留点神，这是‘过堂’啊！里面辣椒水、老虎凳齐备，你得小心，别给‘煮’（熬）！”
镜头一：李雪健的妻子于海丹是个脾气火爆生性爽落的人，为人处世全是一副水晶肠子——透明人。眼瞅着丈夫一个人连续几个月之间独当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新闻攻势，她不免有点心疼孩子他爸，在旁边替他招架不住了，这边外省报纸来的记者刚堵进家门口，屋里那常年被冷落的电话机又闹心地“铃铃”上了。一个下午之间，她曾一口气替不在家的李雪健连着接过26个电话，直瞪得眉毛眼睛都要立起。刚巧一位知近的朋友进门带着她去换煤气罐，

她随着那双孩子气的眼睛，倒吸着凉气发问：“人一出名就都这样？这也太稀得慌啦！”

一个一个地接待，面对面地访谈，跟淘金矿似地从李雪健的肚子里往外掏内容、找素材，饶着还得陪上多少茶水和面条。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我看就是李雪健肚子里那副好下水。就这么翻过来掉过去地折腾，他依然底气十足愣是没事，一个囫囵觉睡过来，还是那股子不屈不挠的精神头儿。

镜头二：就是铁人也经不起这么架在高炉上烤，两个月之间，李雪健外表没事，内火走心，全拱到牙床上肿起多老高，最后终于到灯市口医院牙科拔了4颗牙。如果可能，他真恨不能把心也掏出来绞成馅分成份儿奉献给诸位。

人命关天，能饶给他一会儿清闲吗？

他还真是有点邪的，无论这江湖八面风怎折腾，李雪健死活就是不入“大明星”那个套，随着“形势”发展，也在暗中不断悄悄地调整着自己的心态，可一回到现实生活之中，他仍然还是那么没“派”，不起“范儿”，这大约已经让很多对他期望值过高的人，多少感到有那么点失落，咋办呢？他就是那么一块料，所有的玩艺儿都在影视之上和亿万观众交流过了，想真正了解他吗？那就去看他演过的片子吧。

一轮接着一轮的采访，犹如多国部队轮番轰炸巴格达。面对着无孔不入见缝插针的新闻界，李雪健又拿出了宋大成那磨磨唧唧的皮实劲，实在心里烦极了，他就用手指甲使劲抠皮鞋带子，脸上仍然还是耐心耐烦地不露声色。

除了新闻界，同行之间那还有一关哪！不久前，一位知名度较高的男演员就挺深沉地在一边叨唠：“李雪健嘛，他是挺会挑戏演的。”这话大概是针对他演《焦裕禄》而言的。李雪健真有那么机灵吗？在挑角色上他还真是那个“二百五”，就看看他这几年所演的那些角色吧，什么侦探、鼓书艺人、宋大成之类皆在不入流之列，外加上两部未能公映的《特区移民》、《高敬亭》，他的“挺会挑”又在哪儿呢？再仔细琢磨琢磨《焦裕禄》，究竟是表现了多浓的政治色彩？还是显示了一名演员的深厚表演功力？这些，观众心里都明镜似的。反正你一出名横竖就得让人挑出点不足来，要不然心里怎么衡量自个儿呢？再者说了，中国的影视界是什么样的码头？什么平地里忽然就长起他李雪健这么个山东菏泽的“船老大”来，还能不容个别同仁酸酸地说两句闲话？

当然同行里也有真在心里疼他的铁哥们儿，3月底宣传正热时，李雪健在首都机场候机时，迎面遇上了“钻山豹”申群宜，交到心的哥们话不多，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哥哥，别累着。”内中蕴含着关心和调侃，雪健也对他会心一笑：“兄弟放心，累不着。”

入春后的一个晚上，我陪李雪健到一个朋友家吃了一顿便饭，饭桌上他多贪了两杯，脸上露出了几分醉意，话也比平时显著多了。

回家的路上，骑车走到建国门立交桥底下，那酒的后劲有点往上涌，李雪健下车指着清静的马路牙子对我说：“咱们在这儿歇会儿。”

入夜，宽阔的长安街上人声冷落。

长久地，他将视点落在远处的古观象台上，默默地出神发痴。过了好半天，他目光一转，手指着远处的东单路口慢慢悠

悠地对我说：“拍《渴望》那会儿，我每天一大早就从灯市口骑自行车赶到那儿，时候早就找个小铺弄点早点，时间赶不上，空着肚子就坐车直奔西山去拍戏，还差50集真够忙活的。当时就跟拍别的电视剧没啥两样，谁知后来这一部室内剧竟闹出这么大动静来。”

我趁他不注意，抽冷子问了他一句：“记者现在整天整天一拨一拨围着你转，心里烦不烦？”

他似笑非笑：“还行。挺好玩的。”

“你别让报纸给你绑架了，日后拍戏找不着感觉喽！”

“还行，我心里还算明白。——哎？不对。光你一个人就在报上写了我4篇，人家背地里都说你当记……记……记者的，真有点意思！”说到这里，他露出了结巴。

见我听了他的调侃神色有点尴尬，他不由仰起头亮开嗓门放声大笑起来，赶忙凑得挺近拍着我肩膀说：“行，没事，兄弟。随你们大家抡开了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吧，嗨！我自己也有过倒楣的时候，知道被人冷落是个啥滋味，所以能给别人一分热，就甭搭那么大的架子。反正大伙儿谁都挺不容易地端着自个儿的饭碗。哪天，你瞧着我不顺眼不高兴了，再找张报纸给我吹吹冷风骂我两句，甭拣那些好听的话往上边堆。”

迷茫的路灯下，我使劲盯着他看了半天。认识的时间已不算短，可他那憨厚朴实之后，却总有点什么东西让我怎么也琢磨不透。也许这就是所谓个性的魅力？这时候，我忽然想起了导演田壮



壮对他那入木三分的评价：“可别小看这家伙，一脸憨厚相，一肚子坏水。没有他不行的。”古时候，老子曾对孔子说过这么一段话：“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自卑，强烈的自卑时常溢于他的言表。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对自己的不满足，和为了克服这种对自我的不满足不懈地努力、奋斗、挣扎、解脱，这种性格与热情的反复循环恐怕将伴其一生而巳。总觉得自己不如别人，从一开始就已成了李雪健生存发展的真正动力，也将是笼罩他一生劳苦忙碌于影视上下的根源所在。

的确，在平常他不上戏的日子里，我无论怎么费劲观察和“钻探”，都看不透他的个性魅力究竟是藏在哪儿，你就看他平时那两步走吧：一件夹克或西服总敞着怀，微驼个背，身板有点懒散地向前倾，一步一步踏实地向前迈，那颇具喜剧色彩的态度，不知是不是当年因为他演《9.13事件》中太过认真地模仿林彪以后落下了毛病。我暗自寻思，也许他的魅力，就在于他从来就不玩什么矜持，也不总踮着后脚跟站在这茫茫人世间。

正沉默之闲，李雪健从衣服口袋里摸出一封信递给我，“哥们儿，你看看这封信，人民大会堂一个警卫战士寄给我的。”

我就着路灯光，读了起来——

李雪健：你好！

随着《焦裕禄》的公映，蜂涌而来的造访者肯定会使你同时感受到成功的欢欣和成功后的苦恼。一位老人曾说过这样的话：“吃了鸡下的蛋，为什么还要看下蛋的鸡呢？”这句话耐人寻味，我相信这是一位长者对人生的经验和总结。你是不是也这样认为呢？还有一位诗人说过：“永久的魅力在于保持一定距离！”你说他说得有点道理吗？想想也是，如果一个人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推销得一干二净，被别人分割得四分五裂，那岂不就失去了自身原有的价值，别人风风火火之时，若你能保持心的沉默冷静，那你就更能洞察而不世故，更可以为自己的艺术丰富更多的人生内容。

在你周旋应酬邀请、会议、造访等各种活动时，千万别忘了那些曾真心帮过你的老朋友、老同事、老师和亲人。也许，他们在为你成功而欣喜之余，正盼望着你久违的问候和报喜呢？

吃木耳时，切莫忘记那哺育木耳成长而深扎在地层里的大树桩啊！

原谅我在你最得意的时候给你送来一盆凉水

……

没加任何佐料，全是一个普通人为朋友掏心窝子的话。我被这朴实的文字深深震撼，它的份量远远超过了所有为李雪健捧红的文章！

“抽空，我一定得给这位朋友好好写一封回信。”李雪健愣愣不丁冒出这么一句。

2. 李雪健宋大成及其局外感

从《9.13事件》中的林彪至今，执拗拗拗磕磕绊绊，李雪健一点不串味儿地给观众留下了好大一堆角色，工、农、兵、教授、艺人、侦探、县委书记。直到今天，仍有那么多观众叫不全他的真名，却牢牢记下了他所扮演过的每一个角色的大号。

然而，如果说他以往在电影中所扮演的角色还都算瞧得过去的，那么真正在影视界甚至在全社会也引起了巨大争议的角色，却是《渴望》中的宋大成。

《渴望》播完之后，报刊文章连同成不了铅字的“地下影评”，刚刚开始对这个人各抒己见尚无定论之时，《焦裕禄》的公演，一下子就把对宋大成的争论冲到了一边儿。但在许多私下的场合，不同的阶层不同档次的各色人中，我仍然能听到许多人对宋大成这个角色发议论。

看过《渴望》的人，都从属于自己的生活、视角出发，对宋大成作出评断，众议纷纭，莫衷一是。不要说观众，就连《渴望》的编剧、导演、李雪健自己对这个人物的理解、认识也不那么“英雄所见略同”。

关于宋大成，编剧李晓明本人在《91新苑渴望增刊》上的一篇文章中，这样谈到自己对这个人物的设计：

“宋大成是‘默默的追求者’”；

“宋大成属于刘慧芳与王沪生那种一有矛盾就跟着折腾的人。宋大成最大的愿望就是娶刘慧芳。宋大成不像其他男人那样容易转移，他的痛苦化解不开。宋大成没什么内涵，宋大成与王沪生都代表一种人生体验”；

“宋大成、王沪生这两个男人都太弱”；

太弱、没有什么内涵、一见刘、王有矛盾就跟着折腾，若是真按这种人物设计走向去演，宋大成本该是个一见旧日情人有事儿就幸灾乐祸的齷齪小人。

显而易见，编剧一开始就没把宋大成这个傻冒放在眼里，多姿多彩的笔墨始终都在围着“圣女”、“落魄公子”以至王家小楼转，着力点始终都是在刘慧芳如何向王家施恩和王家姊弟又是如何忘恩负义之上。和现实生活中一模一样，在雅士与淑女们的眼中，宋大成是一个无足轻重只配给别人垫背的角色。

然而，宋大成又被李雪健演成了什么样呢？

纵观50集《渴望》，宋大成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不断陷入人生荒寥和失落，而又拼命顽强执拗的局外人。

乍看上去，他显着那么窝囊、呆木、口讷，既不潇洒，也无风度。他原本光棍一个，失落了内心所恋之后，匆匆忙忙间就被余月娟趁虚而挟成了丈夫，可媳妇的爱又不完全对自个儿的心思，溜溜盼了15年，可连个能带点天伦之乐的后代都没盼来。按说，他才真是《渴望》中最苦命的人，但他却不因此就活得特别累。电视机下，多少一片纯心的孩子就记住了“大成舅舅”，芸芸众生之中，他叫人感到踏实、放心。他从不靠对“贵人”低眉顺眼、姑息迁就熬煎自个儿，全仗着一条宽敞透亮的心路“韧”着人生。

李雪健在50集《渴望》中的表演实在太耐人寻味了，即使到了全剧的结尾处，众人皆在“大团圆”之时，宋大成也只能一个人蹲在房下，靠那憨直发痴眼神与观众直接交流，这条顽强的苦命汉，始终都是在挣扎、艰辛、奋斗，执着地面对着他自己的那份儿人生。

人们说李雪健大智若愚，憨里透“精”。可他到底“精”在哪儿呢？依我看，他这个“精”就“精”在他那出神入化的个性表演之中。别看李雪健平时老实巴交一副磨磨唧唧的外表，骨子里他却是个最不听任编导随意摆弄的“道具”演员。一旦当他发现编剧对角色的事先设计严重脱离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时，对不起！他又开始一点一点循着自个儿的蔫主意慢慢“执拗”开那戏了。也许是由于

在天份、悟性、阅历上都略有区别，因此他对宋大成这个角色内心认识的程度，也就远远超过了编导的认识水平。李雪健小心翼翼地凭着极其出色的表演，在表面上并不打破原剧本的规定性，而实际上却一步一个脚印，直至最后完全彻底地改写了宋大成这个人物，让角色脱尽编剧原先设定的狭隘小气的人物内涵，而重新赋予这个角色以更深刻、更本真、更丰富的人生涵义。

正是由于李雪健在实际拍摄中的“暗中谋反”，所以宋大成自然而然也就成了《渴望》中表演难度最大的一个角色，对这个夹在诸种矛盾中的人物，多演一分则会成为藏奸小人，少演一分便真成了编剧原先设计的痴情大傻瓜。可李雪健到底不愧是个精在骨子里的大演员，宋大成被他演得不多一分，不少一点，一切都恰到好处。

有专门从事表演教学的专家评论说：“李雪健的宋大成那不是在演‘戏’，而在演‘生活’，所以还不能算是真正的表演艺术。”其实，在时下早已令观众反胃之极的许多影视男性形象中，连最起码的生活真实都尚不能达到，常常连一个最细小的形体动作，一个微笑，一句对话交谈都充满了非生活化的做作、矫饰，过于职业化的模式敷衍，恰在此时，一个自然的、现实的、真诚的宋大成却踏踏实实不踟躇地出现在了《渴望》之中，带着所有普通观众自身都可能具备的朴实、善良、热情、执着、犹豫、压抑、优柔寡断、婆婆妈妈、磨磨唧唧；这多层次丰富而复杂的个性角色，一扫以往许多影视男性形象的苍白与贫血，因此他刚一崭露头角，就立刻赢得了众多普通人的大面积认可。李雪健表演的宋大成并不是绝对完美的，然而却是崭新真实的。

其实，对李雪健表演角色的争议，也并非自宋大成始，当别人在舞台上踮着脚尖演革命领袖的时候，他练出了一个不拉迂腐架式的革命大教授李大钊，弄得许多有学问之人直摇头说：“教授就是他演的那样吗？”大教授应该是什么样呢？就非得天天端着脸挺着挺着抬着才对味，一副不食人间烟火不拉人屎的模样吗？我看这也未必，权延赤笔下的《走向神坛的毛泽东》，写老人家在生前，就专门在大便时想天下大事。

我曾花了几个月时间，专门对李雪健的整个生存状态进行了紧逼盯人的跟踪采访，非把他这个让人琢磨不透的家伙弄明白了不可。时间一久，却发现他真有些相似于宋大成，本身就充满了“局外感”。他这条山东汉子是有点较劲，跟自个儿，跟人生，也跟表演较劲。

因为《焦裕禄》这一红火，钱这能让鬼都推磨的魔票，恨不能就像水银似地顺着他家的门缝跟着往里流，请他去担任主角的片约，勾他去外地高价走穴的，叫他录唱歌磁带的，求他去拍电视广告的，不一而足。就单说走穴这一项吧，一场两千，干不干？不干，再加一千，连替5场，轻轻松松拿下一万五，影视界多少名男名女，全都被孔方兄那小钱眼套进去了。李雪健本是个俗人，当然也不能免俗，而对那50元、100元面值的绿票，他的心里也照样悠悠忽忽的。去过他家多少趟，看看那很一般的室内装饰，我知道他并不富有。

他可没有一出名就忙着去接钱。

说起他这些年所扮的那些个角色，也总跟“时代感”较拗着劲。

人家在表演上拼命赶洋时髦时，他大模大样悠悠哉哉地拍了国产《大侦探》，人家在银幕上玩潇洒时，他迷迷登登地演出了个不明不白的宋大成，人家什么都不信牢骚满腹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时，他呕尽心血，走进了焦裕禄的世界。

不论别人如何评说，反正李雪健有自己的筹主意，他小心翼翼地又执着顽强地在表演艺术上，有文化、有体验、有积淀地悄悄独树一帜着自己的那一面旗帜。真正称得上艺术创作的表演，优点和缺陷总是同样明显地交错存在裸露于观众面前，怕就怕既无优点也无缺点毫无特点的表演。

有人内行地评价李雪健：“他演的全一个味儿！”

什么味儿呢？且容我在这儿斗胆带他说句大话吧：那就是几千年来中国人那天不能死，地不能埋的民族味儿！

李雪健是个地道的中国农民的儿子，在表演艺术上，他更注重和讲求以现实主义、民族形式的眼光去看待与把握每一个角色。电影《焦裕禄》公映之后，有位电影界的人评价地说：“李雪健在这部影片中已经到顶了，完全成熟了。”

他真“熟”到顶了吗？我看他还“生”着呢，至少在他身上还有着喜剧、古装戏和大坏蛋的表演潜力，这就只等慧眼独具的导演去发现去挖掘了。

每个人都可能会从自己的角度去肯定、否定、欣赏或大骂李雪健所演过的角色，然而个人的视角其实永远比实际的人生都狭隘和简单得多。

人生的境界其实极为有限，出名了，获奖了，发财了，当官了，真的把这一切都搂在怀里又能怎样呢？依我看，真正能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还是埋下头去踏踏实实地做人做事比较更牢靠更有趣。

也许说不定就有那么一天，李雪健的红火劲过去了，观众也噤着口哨不带他“玩”了，报纸杂志上关于他一点动静也没有了，花开自有花落时，千里搭长棚，自古没有不散的筵席。那也没事儿，只要别拿自己太当回事儿就全有了。

还是李雪健自己那句粗话比较来劲：“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从“羊”字说到汉文化

●韩少华

去年到古城涿州采访，一路直觉得兴味渐浓。且不说蚩尤冢遗址和燕太子丹送荆柯的华阳台旧丘，据传都在涿州城近处，只就北魏学者、《水经注》作者郦道元，初唐“四杰”之一、诗人卢照邻，北宋周易学家邵雍，以及汉昭烈帝刘备、桓侯张飞和宋太祖赵匡胤等历史名人，均自古涿一地出而言，就兴味盎然。

不过，这里要说的一件往事，却只可从刘备先祖刘邦的早年经历上开头。

刘邦故里远在沛县。他平民出身，曾任“泗水亭长”，不过一名地方小吏。同村有个名叫卢绾的人，与刘邦自幼交好。除乡谊之外，另有一层原因，即二人同年同月同日出生。每到二人生辰，乡里都送礼祝寿。《史记·卢绾传》就有“里中持羊酒贺两家”的记载可以为证。其后卢绾参与了刘邦自沛地的起义。直到刘邦称帝之后，在除灭叛王臧荼的征讨中又立大功，被封为燕王。涿地就在他的封疆之内。立涿为“州”，始自这位诸侯王。《名胜记》即载有“州制创自汉卢绾”的话。而身为刘备老师、后来官至尚书并因得罪董卓以致罢官的卢植，至今在涿城东郊仍有其墓地遗址。其后，自晋、隋、唐、宋至元、明、清数代，只涿籍文学家即有卢谌、卢思道、卢纶、卢挚诸人于史中有传。涿州卢氏，已蔚为望族。这自是后话。

要说的是刘卢二人做寿，乡亲们的礼物不是别的，而是“羊酒”。京剧《空城计》中《城楼》一折，诸葛亮唱词里也有“备下了羊羔美酒犒赏你的三军”。而羊可以祝寿，可以礼宾，成了古代人际关系中的吉物，也并非没有根据。只由“羊”字的造型，即可略知其一二。

这“羊”，确实是个好字样。在汉字出现的早期，比如甲骨文中，其形为“𦍋”。一眼即可看出那突出的标志，就是那一对高高竖起在头顶上的角。难怪孔老夫子说：“牛羊之字，以形举也。”可见，这“羊”字当属汉字中的象形一类无疑。样子好认，也好看。

“羊”字还是个好字眼。就字义而言，《说文解字》里即释曰：“羊，祥也。”在古代典籍中，“羊”字可以代“祥”字用，

“吉祥”可以写做“吉羊”。例如，汉代有件青铜器皿，做盥洗使用，如古人所解释的，即“承盥洗者弃水器也”，名为“洗”。这件青铜洗，铸有铭文于其上，曰：“大吉羊，宜用”。这件文物即被清代学者阮元定名为“大吉羊洗”。阮元，就是《经籍佚话》主编者，曾校刻《十三经注疏》，并撰有《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金石学专著。前文提到阮氏为汉洗所定之名，即见于这部《款识》中。

其实，“羊”字与“祥”字在意义上有相通之处；除音韵相近，事理似也相关。比如说，在原始社会中，猎人猎获羊只，常比猎获猛兽要少冒凶险——获而避险，自然被看做吉祥之事。狩猎生活如此，游牧生活也如此。一个部族，拥有大群羊只，呈富足安泰现象，也少不得被视为吉祥之兆。直至农耕阶段，羊为“六畜”之一，圈养着相当数量的羊只，仍是安乐祥和的某种标志。所以，“羊酒”，或“羊羔美酒”，在中古史上，早已成了一定的礼遇甚或庆典之必备饮饌馈赠物品，也成了人际关系与社会气氛融洽和谐的一种象征。这就不难理解，清代文字学家段玉裁，在确认“羊，祥也”之后，为什么进而说：“羊大为美”，为什么还引用《考工记注》说：“羊，善也”，又补注说：“羹（义字之繁体——引者）、美字皆从羊”了。也就是说，“美”、“善”、“羹”三个字的结构，都没有离开“羊”字。由此可知，“羊”字确是个好字样，好字眼。

先说“羊”字同“美”字相关。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里，早有“羊大为美”的解法；又解“美”与“舌甘”相联系。亦即所以称“羊大为美”，概出于味觉。这似可以叫做“东方式的美学阐释”。固然，美也可以出自视觉，例如，形容建筑规模的壮丽，有“美仑美奂”之说，而形容诗风书法的秀丽，也有“美女簪花”之誉，是皆可谓之曰“美观”；固然，美更可以存在于道德范畴，例如，形容思明君、恋故国的观念，有“美人香草”之喻，而形容社会风俗的高尚，也有“美化淳风”（“化”指“风化”、“教化”）之论，是亦皆可谓之曰“美德”、“美俗”。但是，如果就“美”字在汉字构成的最初意义上进行探究，那么“羊大为美”的解释就更物质化；比起“美观”、“美德”或“美俗”来，这种“美味”之说，似乎更切近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生活条件。“美”字从“羊”，“唯物”得

很。这同西方古典美学家关于美的概念的阐释大不相同。柏拉图不就认为美是来自“心灵的聪慧和善良”的么。而东方的汉学家如段玉裁氏，却把“美”同“口福”联系了起来，倒是别具一种情趣的了。

至于“善”字，即“恶”之反义。但其本义何以从“羊”字，据段氏注说：“羊在六畜，主给膳也。”可见古时候“善”字与“膳”字相通；或者说，“善”就是“膳”的古字，表露出“民以食为天”的意味。至于《礼记·檀弓》所说的“善颂善祷”，《史记》中《太史公自序》所说的“善善恶恶”以及《陈丞相世家赞》所说的“善始善终”，取的都已是“善”字的引申义。

这里要着重说的，则是这个“羹”字同“羊”字相关的事情。

一般说来，“羹”字即简化了的“羹”字，即“适宜”，见《礼记·中庸》的“义者宜也”；可以解释为“正义”，见《孟子·告子》的“舍生而取义”；还有“威仪”、“情谊”、“意义”诸解，不一而足。而另一种以“羹”字的字形结构为根据的解释，是最有兴味的。这就不能不提到我所经历的一件往事了。

记得是在五十年代中期某年的暑假里。那时候，我正在北京二中任语文老师，有机会听了几位名学者的讲座。地点么，好像是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一座大殿里。那天的主讲人是王力先生，课题也自然是古汉语方面的。讲课中间，似乎还穿插了些有关古代祭祀的典章制度知识，或许由于那文化宫所在处，就是清朝太庙的缘故吧。好像是由“饗”（即“牺”之繁体）字的字义，讲到了“羹”字的。王先生讲，大家尽可以想象，上古时代猎人打得猎物，最初是没有个人占有念头的，因为那个时代的生产力水平太低，只有将猎物归为公有，由部族共占、共管、共享，才可能维持集体的生存。后来不知经过了多少岁月，忽然有个猎手，在他打得猎物的片刻之间，产生了一个新念头，比如打到了一只羊，就在这片刻间，他头脑里开始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念头：这只羊是我打到的，那么，这“羊”就应当是“我”的呀，就该扛回去归自己支配呀……记得王先生还讲道，这种新念头的出现，只是在生产力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水平之后，才是可能的；也可以说，这个“羹”字的形成和运用，就是那个时代对那

张学良渴望访问大陆

他坐在椅子上，把身倾前，诚恳地说，“甚至‘张学良’这个名字——我也不想要！我不想做‘张学良’！我只想当个普通老百姓，自由自在地做我想要做的事，我不能接受每一个人的赞誉。”

1936年，他参与改变中国历史，发动了“西安事变”。他释放了蒋介石，并与蒋介石一起，乘飞机回南京。他从此受到软禁，销声匿迹半个世纪。

张学良在解释他决定接受惩罚时说，“我是个军人，有上级也有下属。这是造反的行为，我必须对此负起责任，我曾准备被枪毙。”

去年张学良90岁生日时，他是自1936年以来第一次公开露面，与敬仰他的人士在台北一家酒店庆祝寿辰。他的行动看来已不再受到任何限制，他接受记者一百分钟访问，随意交谈，这是他第一次在其寓所接受访问。

一位三十多岁的大学讲师说，“对我这一代人来说，他几乎是神。他是义气和正义的象征，是一个扶助弱者和伸张公正的典范。”

张学良深得众望的关键，是因为他的干预行动完全是为了抵抗外敌。张学良愿意接受半个世纪隔离生活，只是使传奇故事更加添色彩。

他的夫人赵一荻（70岁）说，“他不支持任何党派，他只是热爱他的国家和人民。”

赵一荻女士在解释张学良绑架蒋介石的决定时又说，“很简单：他反对内战，他不愿见到人民被杀，为什么中国人要杀中国人呢？”

张学良说话带有微弱的东北口音，反映出他的出生地点。他充满活力，眼睛露出神采，偶尔会说笑，思路看来非常清晰。

张学良在整个软禁期间（初期在大陆，后来在台湾），同蒋家保持极不寻常的互敬和友谊关系。

张学良已洗礼受教，随着岁月过去，他变得愈来愈虔诚。每适星期日他到蒋家的小教堂与他们一起做礼拜，他都见到蒋家的人。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亲自挑选这间环境美丽的官方拥有的房子让张学良居住，房子四周有高墙，并有园丁和女佣照料护理。

张学良两眼露出神采地说，“有些人说我并不自由，但事实上我感到非常自由，身体是否自由那并不要紧；最重要的是我获得精神上的自由。除上帝外，没有任何人能限制我的精神自由。”

对张学良的软禁在过去五年逐渐解除，因为很明显，他不会向政府挑战，对成为名人也不感兴趣。

他说，他希望不久以后能隐姓埋名前往美国观光游览。问及他是否也希望访问中国大陆时，张学良似乎非常渴望。他以充满激动的声音说，“我非常渴望访问大陆，因为这是我的家乡。”

他担心访问会带有政治色彩，说，“大陆当然欢迎我，可是这样的欢迎，越发令我难以成行。”

（《纽约时报》记者台北通讯，选自《大公报》）

着对另一种新的时代精神的首肯，尽管当时的表述颇有些寓庄于谐的情味。那么，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弱化以至消亡，公有制和公有观念的兴起以至取前者而代之，都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过程。只是人为地强行提前或推后，却置客观社会实践于不顾，就都会违反历史的必然规律罢了。

可惜王先生已经作古。关于“羊属于我”和“羊高于我”的话题，只可做为永久的纪念而已。倒是他那句“汉字发展史为后世所提供的简直是一部汉民族古文化史”的论述，令人永远不忘。

1991年春于北京

种新念头的确认。即“我打的羊就是我的”这种观念及其相应行为，是“适宜”的，甚至是合乎“正义”的……而这一番阐发，也已超出了古汉字学的具体课题。记得王先生随之讲了一句令人过耳不忘的话：

“汉字发展史为后世所提供的，简直就是一部汉民族的古文化史。”

回想起来，王先生的这番见地是科学的，合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谁想竟成了五十年代后期，高等院校“拔白旗”运动中“资产阶级学术观点”之一而横遭批判，即所谓“宣扬‘私有制是天经地义的’”云云。其实，那天王先生是继而又讲了一段类似“但书”的妙论的，说“羲”字是“羊”在上，而“我”在下；也就是说，举“羊”高于“我”的头顶，正意味着某种新时代精神呢。记得王先生讲到这里，自己也忍俊不禁了，据说这是同他历来的严肃教风不甚相符的。果然，王先生立即正色说，时代总是要进步的，今天不是连“羲”字也快成了“活化石”了么。那或许是由于首批简化汉字推行，“羲”字也简化为“义”的缘故……直到二十多年之后，我去燕园再见到王先生，重提这段往事的时候，老人却只笑了笑，说：“当时我还很高兴，自以为那是我学习唯物史观的一点点心得呢……”

事有凑巧。1987年秋，我在海南岛采访。同行的中央电视台一位姓董的摄像师，曾给我放了一段他在1980年摄下的录像。摄的是五指山麓，一名年轻猎手打到一只山羊，却并不扛走；直等来到了两个过路人，因听枪响找过来，由这猎手切下两条羊腿分给他们，连谢也不道一声，就提着羊腿默然离去。这大约就是原始共产观念的痕迹了。后来，我在采访中参加过几次关于开发海南的专家论证会。与会者在列举过有利条件之后，几乎都指出那里某些社会观念的落后状况及其对改革事业的影响，都不容低估。而想起王力先生关于“羊”字的那些高见不是很值得回味么……

不错，历史确是一个过程。尽管这包含着“甲乙丙丁”和“子丑寅卯”在内的天干地支，以每60年为一个“甲子”的形式，呈循环之状而往复无穷，但一部中国编年史却并非简单循环。正如王力先生所言，在历史某一阶段，“羊属于我”的新观念，恰恰标志着历史的进步；而王先生那段关于“羊高于我”的发挥，似也意味着

炎黄艺术馆 和 画家黄胄

·
邢俊勤
·

黄胄，是位中国画坛上一个响亮的名字，他的画中总洋溢着一种浩然之气和浓郁的民族精神，因而他的艺术受到了国家和海内外人民的喜爱，人民大会堂等国家高级活动场所以及国外许多博物馆和著名人士都收藏了他的精品。他为华夏灿烂的文化增添了光彩，为祖国获得了荣誉。

作为一个热爱祖国、是永远不会停止对艺术事业之追求的，如今已功成名就并在国画艺术上自成一派的黄胄，又开始了新的追求和奉献。为了保存、收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拖着不方便的腿，奔走呼吁，和夫人郑文慧女士策划筹建了炎黄艺术馆。并将一直珍藏的中国历代大师名家精品和名瓷名陶等国家珍品，特别是自己一生的优秀作品，全部献出来长期陈列展览，供人们观摩、研究和欣赏，这一壮举得到了我国政府和海内外炎黄子孙的高度赞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亲临工地视察并给予极高的评价。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和中国美协副主席华君武、蔡若虹等专家和领导同志都来到工地对黄胄壮举表示大力支持。海外华人著名科学家李政道博士感慨地说，国外各种博物馆星罗棋布，我们国家的文化很古老悠久，博物馆反而很少。炎黄艺术馆的建成，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创举。他热情地表示愿尽力支持和帮助。黄胄和夫人兴奋地说：“你们从道义上支持我们就是最大的支持。我们一定不辜负炎黄子孙的共同愿望。”

现在，这个愿望快要实现了，在北京的亚运村旁，炎黄艺术馆的主体工程已经结束。不久，人们将走进那艺术的殿堂之中饱览华夏艺术的古典名作和黄胄本人的优秀作品。



①李瑞环和黄胄及其夫人在炎黄艺术馆建筑模型前。



②黄胄近照。



③华君武（右）蔡若虹（左）和黄胄在炎黄艺术馆工地上。

福建省西南的崇山峻岭之中，屹立着一座座圆形、方形的民居古建筑群——“生土楼”。它凝结着我国劳动人民勤劳的汗水，闪耀着中华民族智慧的光芒。登高一望，星罗棋布的土楼犹如碧海中的颗颗明珠，璀璨夺目。这种土楼在闽西、闽南山区各县都有，但以永定县为最多，多达150多座。据历史记载，这些特殊的楼房大都建于清代，尚有少数建于明代。据考证，这种土楼的创造发明者是西晋年间从中原黄河畔逃难来此的“客家人”。当时，这些“客家”农民为了防备匪盗的劫掠与官府的迫害，把简陋的泥瓦房改建成厚墙牢固的土楼；把分散在穷山野场的“客家人”聚集在一起，由单屋连成了屋群，由单房发展成多层的土楼。它既具有鲜明独特的民族特色和艺术风格，又充满了浓郁淳美的乡土风情和家族亲情。这些堪称华夏奇观的土楼，多年来与创建它的主人一样默默无闻，鲜为人知，是改革开放的春风拂去了蒙住土楼的历史尘埃，焕发了它应有的奇光异彩，吸引了成千上万中外游客到这里来观光考察。

土楼之尊长

永定县古竹乡有座贞固楼，为四方形生土楼，高四层，分内外两圈。据老人介绍，此楼是当地最古老的土楼，已有几百年的历史。由于年久失修，现已有一角倒塌，只有外墙存在，但门口青石匾上仍镌有“贞固楼”三个大字，匾侧所注“明甲申年间”一行小字便是历史的见证。尽管此楼看来破旧，里面仍居住着几十户农民，并有许多户拥有现代化的彩电、录音机、洗衣机等。



浑圆的世界

被列入《中国名胜词典》的“承启楼”（又名“天助楼”）是当地最大的圆土楼。始建于清康熙年间，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建筑规模宏大，设计构造精巧，整个楼三圆一中心，呈大圆之中套两个小圆。远看是圆，近看还是圆，走到里面楼是圆的，地是圆的，天也是圆的，简直进入了一个浑圆的世界。此楼建筑艺术极为奇特，呈外高内低形状。外圆周长229.34米，分为四层，底层有68个房间，多用作厨房；二层贮藏物用；三、四层住人用房，高12.4米，共有272个房间。第二圈只有两层楼，每层40个房间，一般都是住人用。第三圈为单层，32个房间；中央为全楼的公共场所，也是逢年过节祭祖的地方。全楼80户一个姓，形成了几代人居住的大家族。楼内左右各有一口水井，供人畜饮用。据说秋收以后稍加准备，把大门关上三个月全楼居民也不愁吃喝。

整个楼的建筑面积约5300多平方米，是圆楼建筑之冠。楼内以当地杉木板隔成一个个房间，犹如鳞次栉比的蜂房。夜晚灯光辉映，从下往上看，如见天上的玉楼琼阁。可惜，由于经济尚不发达，光住不修，有些脏、乱、破，当地政府正筹措资金，以备修缮，不久将恢复它清洁美丽的容颜。

楼内还有楼

以华丽堂皇著称的“振成楼”是闽西南山区几百座土楼群中的佼佼者，它博采各楼之长，按照“八卦图”构想设计建造而成。整个楼内的房屋建筑就像一朵盛开的莲花。

外圈四层楼，由八道青砖砌成八卦防火墙，分隔成八个院落，每层40个房间，层层有拱门相通，造型别致，美观大方，采光良好。大门的楹联为：“振纲立纪”，“成德达材”，整个楼由外圈内圈的圆楼组成，中心为祖堂。人们常说“天外有天楼外楼”，这里却是“天内有天楼内楼”，令人叹为观止。第二圈二门楹联为：“干国家事”，“读圣贤书”。

过了精雕细刻的活动屏风，方见祖堂又是一个戏台。正厅堂联：“自古文章正乃奇”，“从来人品恭能正”，戏台前正中立有四根四米高的石柱，据说是从20里外，花了三个月的时间运来的，每根石柱都要有40多人才能抬得起。二层

民居古建 华夏奇观

（摄影作品见封三）

廊道用精致铸铁栏杆做制。全楼数百居民都可在廊道和戏台前的天井内观看演出，比起北京颐和园的大戏台，这里更显得幽深谐和，别有洞天。楼内有不少名人雅士的赋诗题字，可以看出主人乃书香门第之人。祖堂右边的观音厅是供奉烧香的地方，这里立有家训：“操作哪有网时少时壮时老年时时需努力；成名原非易事家事国事天下事事要关心。”

瑰宝传佳话

外国朋友参观后称誉：“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神话般的山区建筑模式”；“中华一绝”，“东亚奇观”。1985年4月美国洛杉矶举办的国际建筑模型展览会上，“振成楼”与天坛模型摆在一起展出，引起国际建筑界学者、专家们的极大兴趣。他们不由地惊叹：“奇迹呀，奇迹。”

闽西南山区多台风地震，由于土楼构造坚固，每次灾害都没有遭受什么损失。当地人认为，土楼的优越性还有许多，如有利于大家庭的团结，有利于互通信息，互助合作。另外，这种楼多为圆楼，加上分房时从一层一直到顶为一户，不必如城市楼房分配时要考虑层次差别。住在这里的人一律平等，没有高低之分。生土楼虽是民间住宅，但也不愧为一座座坚固的小城堡。在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有一批没来得及转移的红军伤病员，就和当地农民驻扎在土楼内。国民党军队围达两月之久，仍未攻破。军民团结一心，患难与共，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佳话。

关于闽西南的生土楼，这里流传着一则趣闻，传说70年代初，美国卫星在这里上空拍摄到一圈圈的土楼照片，美国军事部门百思不解，竟误认为中国闽西南山区部署了大量导弹发射场或原子反应堆。因此，土楼模型在美国展出时，特别引起美国人的注目和高度赞扬。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闽西南山区的这些瑰宝，必将吸引更多的中外游客，必将蜚声于世界。

（林其宇）

千秋壮举 四海瞩目

炎黄二帝巨型塑像雄姿

为了弘扬中华文化，振奋民族精神，满足海内外炎黄子孙寻根拜祖的心愿，经众多海内外专家、学者、爱国志士和各方名人发起，倡议在中华民族发祥地黄河之滨兴建炎黄二帝的巨型塑像。这一倡议当即受到了全国人民和世界各地华侨、华人的热情支持。炎黄巨塑模拟像经十次修改，已经定稿，定于年内在郑州黄河游览区破土动工。这个四海瞩目的千秋壮举可望成为现实。塑像着重表现了炎黄二帝英姿的宏伟、庄严、睿智，有顶天立地、排山倒海之气概，但又亲切、慈祥、浑厚，是人，而不是神。巨塑将依山就势，面朝黄河，以山为体，巍峨奇雄，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高度自尊、自强、自信的风貌。整个巨塑外部以花岗岩建成，总高一百米，其半中高八十米，头高二十米。塑像胸体内部将设天象、渔猎、农牧、石器、冶炼、兵器、科技、民族、文化等十大展厅。塑像前的山下为数十万平方米的广场。塑像犹如一座高大的民族精神的丰碑，在四周壮丽河山的映衬下，将形成一派美仑美奂、动人心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人文景观。 子 辉(塑像编及效果图见封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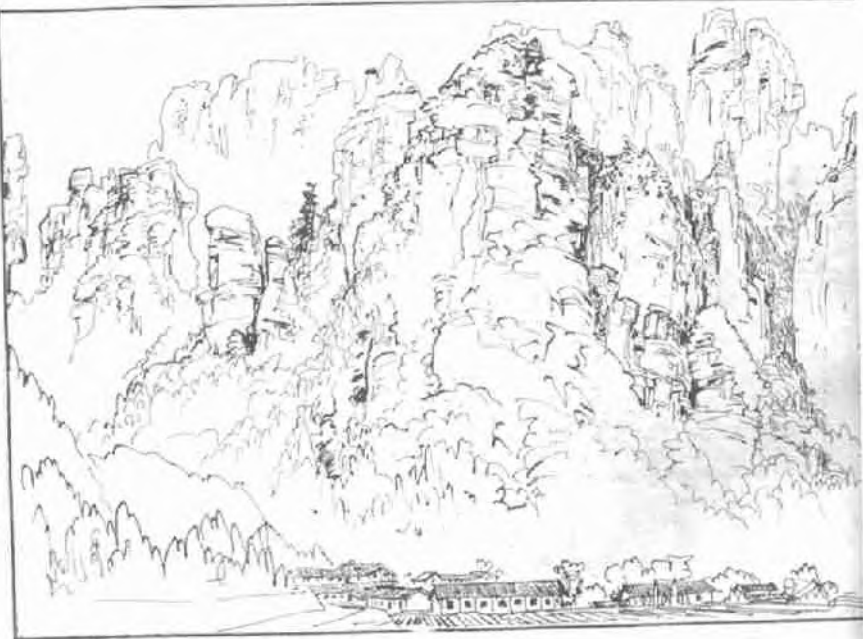
神州山水 处处如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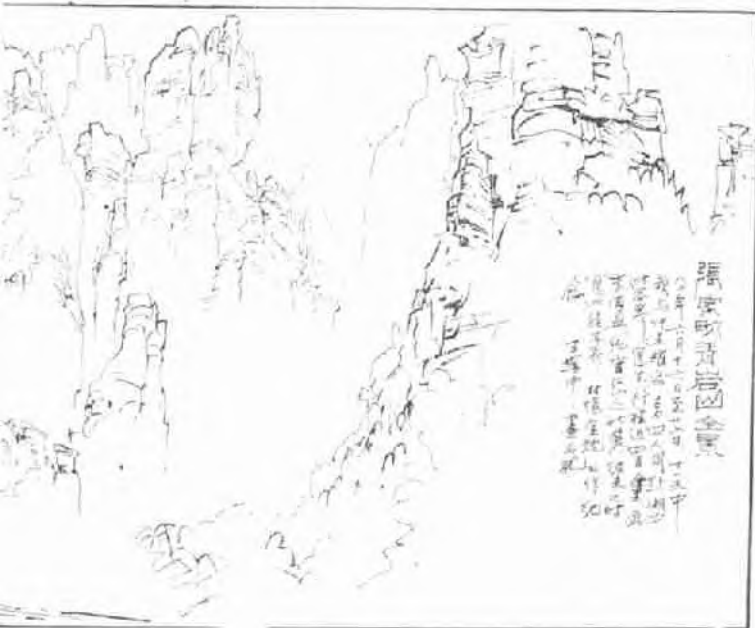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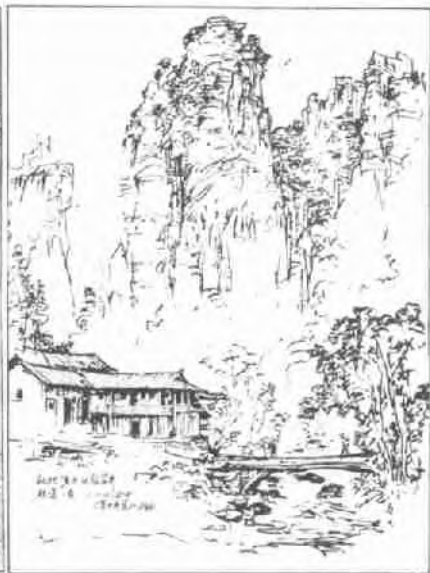
湘西张家界速写

深圳边镇有座小学校，小学校里有个大画家。说他大，并非因为他已年过不惑，而是由于他出手不凡。他的国画山水及其书法颇见功力，他的风景速写又技高一筹。国画创作可以用皴擦渲染和浓淡设色等各种手法来施展才华，速写则不然，只靠一支秃笔，在方寸至多方尺之地，一边经受风雨侵袭日头晒，一边匆匆捕捉景物，时间地点和环境都容不得他细看慢画。然而就在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中，真正一挥而就的作品（虽然只是速写），其气势神韵竟毫不亚于有的巨幅名作。我没有去过张家界，但是画家笔下的张家界，比我间接见过的和想象中的，都更引人动人和感人，因为其中不仅有胜境美景，更有着画家本人的豪情雅兴。本刊特选发几幅，与广大读者共同欣赏。

画家王耀中，1943年出生，曾在湖北艺术学院美术系习艺，后在襄樊从事舞台美术及群众书画辅导工作，1988年到深圳沙头角田心小学任教。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及广东分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广东分会会员。

王耀中画 洪 炉文







炎黄二帝历史考略

上古时期，中华大地上有“三皇五帝”之说。“三皇”一说是伏羲、女娲、神农，“五帝”则指炎帝、黄帝、太皞、少皞、颛顼。另一说则指伏羲、炎帝、黄帝为“三皇”，少昊、颛顼、高辛、尧、舜为五帝。这些传说中所指的人物虽然不完全相同，但“三皇五帝”在当时社会中，极有可能是现实存在的人物，不过他们或是指某一强大部落的统称，也可能是指某强大部落酋长式的代表人物。在远古时期，人类在生活斗争中逐渐形成部族，称之为“三皇五帝”的代表人物，在率领本部族与大自然及部族之间的争斗中，取得了统治地位，因而受到本部族人的尊崇，并把他们加以神话化，成为半人半神的偶像。这也就是有关“三皇五帝”的传说，都是带有很浓厚的神话色彩的原因。炎帝和尧帝也就是在这个历史条件下产生出来的人物，因此，史书上有关炎、黄二帝的史料记载，有许多都是神话传说与事实参半。不管是神话还是现实，中国历史上确实是存在过这两个伟大人物，他们在中国大地上，推动人类由愚昧向文明过渡的历史长河中，立下

了无与伦比的功绩，为源远流长的古老中华民族文化奠定了根基，因此被后代子孙尊为“人文始祖”。

炎帝考

炎帝，名榆罔，又称神农氏，姜姓。史传炎帝成为部族首领之后，以火德王，故称炎帝。

关于炎帝故里，史书上有几种不同说法。相传他是有熊国君少典氏之子。有熊，即河南新郑县。春秋《国语》载：“少典娶有蟠氏，生黄帝、炎帝”。又载：“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又有一种说法是，少典国君妃有蟠氏生炎帝，而黄帝母则是少典国君聪明美丽的次妃曰附宝者，“生帝于轩辕之丘，名曰轩辕”。轩辕即黄帝。按照这个传说，则炎帝、黄帝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虽然史书记载与民间传说各异，但有一点基本相同，即炎、黄二帝都是少典氏之子，出生于有熊，炎帝故里当为新郑。

炎帝出生之后，被养于姜水之滨，

故以姜为姓。炎帝成长之后，率领他的部族沿渭水、黄河东迁，经河北、河南、湖北还到过山东曲阜。炎帝是个传奇人物，史载，他“生而为牛首人身”，这当然不可信，可能是当时炎帝部族以“牛”为图腾，故而把部族首领也神牛化了。

传说中的炎帝不仅面目奇异，而且慷慨勇武，智慧超人。在他率领部族东迁途中，击败了不少当时散布在长江流域的许多弱小部落，还“定都于陈”（今河南省淮阳县）。炎帝在陈定都时，与一个叫“九黎”的部族发生过多次战斗。“九黎”部族是当时长江中游一带各部族中比较强大的一支，首领蚩尤，性格残暴。神话中说蚩尤“铜头铁额，食沙吐火”。蚩尤兄弟81人，都是凶恶残暴的性格，炎帝与蚩尤多次大战，力不能敌，只好由陈州败退到曲阜。蚩尤继续追击，炎帝不得已又率部再徙阪泉、涿鹿（均在河北省境内）一带。

就在炎帝与蚩尤作战同时，黄帝统率的有熊部族已逐步发展壮大，势力扩张到涿鹿。黄帝为了和炎帝修好，曾派遣使者说服炎帝归顺，炎帝自恃

强大，不仅没有采纳黄帝的建议，而且在阪泉与黄帝大战。史记《五帝本纪》中说：“轩辕氏时，神农氏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氏战炎帝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志。”阪泉之战，黄帝三战三捷，炎帝只好臣服认输，归顺黄帝。阪泉大战后，蚩尤又追击北上，骚扰中原。炎、黄二帝媾和遂订盟邙山，共讨蚩尤，于是发生了远古时期的一次著名战斗——涿鹿之战。

史书载，炎、黄二帝订盟邙山时，曾在邙山东口竖立二帝木刻像。木像高可钻天，可见威武无比，可惜遗迹已不存，无从考证了。

传说炎帝在为部族首领时，曾亲尝百草，教民识五谷，发展农耕。说他在尝百草时，发现各种野生植物的不同习性，有的可以用于食用，有的以之为药，用来医治疾病，为古代医学奠定了基础。所以，后人不仅尊称炎帝为神农氏，而且还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医圣”。

炎帝归顺黄帝之后，专心致力于走访民情，教民稼穡，究药习医。一次，他到南方巡察，误尝了剧毒的断肠草，不幸中毒身亡，人们把他葬在湖南酃县一带。

黄帝考：

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乃有熊国君少典之子，因母附宝生黄帝于轩辕之丘，故称轩辕。姬姓。

关于黄帝故里，很多史籍都记载有他出生于有熊轩辕之丘。清乾隆年间新郑县志载：“新郑古有熊之墟，黄帝轩辕氏居有熊……”又云：“黄帝开国于有熊，有熊国今之新郑，有熊黄帝所都。”

关于炎·黄传说中还有这样一段故事：炎帝母亲有蚩氏游华阳时见到神龙，因而生了炎帝。黄帝母亲附宝也是在郊游时见大电光绕北斗而行，感而有娠，在轩辕丘生下黄帝。因炎帝相貌丑陋奇异，不为少典国君所喜，

遂将有蚩氏及炎帝置于姜水之滨，少典氏自己偕妃附宝及黄帝居住于姬水之滨。姬水古称阴水河，因少典次妃附宝极为美貌，人称美姬，故改阴水河为姬水河，黄帝遂以姬为姓，炎帝以姜为姓。

史书记载中的黄帝为人敦厚朴实，才智过人，成人以后，又好行仁义，以仁施政，深受部族人民的爱戴尊崇。他成为有熊部族首领之后，在故里姬河两岸，利用天然的地理优势与丰富物产资源的有利条件，操练兵马，冶炼干戈，鼓励部族勤于农耕，发展生产，部族越来越强盛。而且黄帝在政治管理上也非常贤明，他以仁义治天下，善于团结人，因此很多弱小部落都来投奔归顺，使有熊部族在中原地区逐渐形成一支强大的部族。为了扩张疆域，黄帝率领有熊部北上涿鹿。当时炎帝已先于黄帝到达涿鹿一带，因而引起冲突，双方在阪泉激战，炎帝失利，归顺了黄帝。从此，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大地上，出现了以炎、黄两大部族为首，逐步成长发展壮大起来的华夏民族，也就是中华民族，这就是我们民族的历史渊源。

相传黄帝在涿鹿大战蚩尤之前，部族已相当强大。他在姬水之滨屯兵操练，制造兵器，发明指南车，为涿鹿大败蚩尤，取得辉煌的胜利作了充分的精神和物质上的准备。涿鹿大战时，黄帝亲自率领以熊、黑、貔、貅、豸、虎六种猛兽为图腾的部族参加战斗，最终击败了蚩尤，灭九黎族。

黄帝击败蚩尤之后，大会诸侯于釜山，被推为天子。黄帝在统一中华、建立大业上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占有了绝对的统治地位，所以后人尊崇他与炎帝共为中华民族之始祖，而实际上黄帝的威望要高于炎帝，史记《五帝本纪》以黄帝为首篇，是有其历史根据的。

黄帝统一中华之后，亲自察访八方黎民，安抚归顺的众多弱小部族。他曾东到东海，南到湘江、黄山，西到昆仑，北征戎山，足迹遍及黄河、长江流域。

古代部族崇尚图腾，黄帝一统天下之后，有人建议仍以有熊部族的“熊”为图腾，这个建议被黄帝否定了。他认为若采用“熊”为图腾，将伤害归顺的各个部族人的感情，为了团结这些部族，他提出以蛇为主体，以鱼鳞为鳞，以鱼尾为尾，以狮头为头，以鹿角为角，以鹰爪为爪，新图腾命名为“龙”。后世称为“龙的传人”的说法，就是根据这个传说来的。

史载“黄帝三十而婚”。他结婚时以功德取妃，不以貌选。黄帝有四个妻子，元妃嫫祖和次妃嫫母功劳最大。嫫祖发明植桑育蚕，嫫母发明缂丝织布。在她们的倡导下，人们逐渐摆脱了以树叶兽皮遮体的原始生活，穿上了柔软温暖华丽的衣裳。

黄帝还命仓颉造字。上古时代人们都是“结绳记事”，随着时代的推进，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原始的记事方法已不能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仓颉造字在推动人类由愚昧向文明过渡的历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由于有了文字，加快了信息的传递，生产得到迅速提高，社会治理更加文明进步，人们的智慧得到充分的发挥，因而各项发明创造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史书记载，在黄帝统治时期，科学技术发展迅速。尽管许多发明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还非常原始简朴，但在五千多年前，人类由长期蛮荒愚昧的状态中逐步过渡到文明之光初露的时刻，能以高度的勤劳与智慧发明创造出那些先进的生产、生活工具，该是多么不易，该是多么珍贵。更何况有些发明，经五千年历史之考验，至今仍为后代子孙造福，甚至成为全球人类文明社会的共同财富，从这里充分说明了我们的祖先是多么勤劳智慧。

相传黄帝除命嫫祖、嫫母育蚕织帛，命仓颉造字以外，还命伯高采矿炼铜，开创开采、冶炼、铸造之业；命宁封子为陶正、赤将木正，主持制陶和制造木器，发明釜灶、沙甗，使人们有了完备的炊具；命邕夷制大辂（车），命共鼓制车楫，解决交通运输之苦；命羲和、常仪观日月星辰，命

容成定历法，隶首兴算数；命岐伯、雷公编医经；命伶伦选律吕、荣猿铸十二钟、大容作咸池之乐……。这些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创造，极大的丰富和提高了人们的生活。

黄帝在治理国政上也建立了一套公正贤明的制度。他以仁义治天下，用禅让的办法挑选人民爱戴的国君，黄帝在位时崇尚土，“以土德王天下”，土为黄色，是农业的象征，因此黄帝非常重视发展农业。他亲自教民播百谷、植草木，还提倡水土保持，爱护自然环境。他还教百姓驯养猪、牛、狗、羊等，开创了畜牧业。

相传黄帝有 25 子，其中 14 人得姓。所谓得姓，就是被封为国君，建立了新的氏族。后来这些氏族逐渐和其他部族融合，遍布各地，繁衍子孙，形成中华民族。

相传黄帝在位百年而崩，享年 110 岁。关于他死的说法有两种，一说他在首阳山采铜，在荆山铸鼎，鼎成之后，黄帝劳累而死。人们把他葬在桥山（今陕西黄陵县城北），并在陵墓前建黄帝庙，庙内古木参天。其中有一株特别高大的古柏，相传为黄帝手栽。庙的大殿中间高悬“人文之初”匾，直到现在，每年清明节都有大批群众代表和海外侨胞、华裔到黄帝陵扫墓。

另有史载，黄帝殁于有熊故里，死后衣冠葬于桥山，鞋袜葬于荆山。现河南新郑县仍有万寿宫遗址，传说是黄帝殁天之所。

关于黄帝之死，虽有多种传说，但历代史书都公认桥山仍为黄帝正陵，祭祀不绝。

另有一种传说，黄帝在位三百年。据《史记》载，宰予曾为此问孔子：“黄帝何人也，抑非人乎？何以至三百年乎？”孔子曰：“生而人得其利百年，死而人畏其神百年，亡而人用其数百年”，可见黄帝对后世子孙们的影响有多大。尽管黄帝只是被人神仙化了的古代贤明部落首领，但他确实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中华文明之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黄帝被世代子孙尊

为中华民族始祖的形象，将永远镌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

新郑考：

新郑，今河南省新郑县，古为有熊国。至战国时，郑武公居有熊，遂改名为新郑。史书记载：“汉中期始置邑为新郑。”清乾隆年间，新郑县志记载：“新郑古有熊之墟，黄帝之所都也。郑氏从居之，故曰新郑也。”

现在的新郑县仍保存有不少有关黄帝故里的遗迹，这些遗迹分别划为三个区域，即故城区、姬水河、具茨山风后顶。

在故城区的遗迹有轩辕故里碑，有熊氏之墟、天心石、仓颉造字台、附宝感光处等。沿姬水河两岸的古迹有：黄帝口、天寿宫、自然山、玄女庙、造指南车遗址、少典祠、嫫祖嫫母祠。在具茨山及具茨山主峰风后顶存留的遗迹更多。具茨山位于伏牛山脉东崖，海拔高 1166 米，古有“中天一柱定中原”之称。传说黄帝及其大将风后，大隗、常先等在此屯兵习武，统一中华定都有熊后，又以具茨山的主峰风后顶为行宫，因此在具茨山留有多处古迹和流传着许多美丽的神话传说。

涿鹿考：

涿鹿，即今河北省涿鹿县。在涿鹿矾山镇西，有黄帝城遗址，城呈正方形，建筑在土丘上，城墙为夯土所筑，现在残存的城墙最高处还有六米，低处厚有七米，周长有六华里左右，在矾山镇南三华里的黄土崖上，也有三个故城寨，分南、北、中犄角相依，毗连相护，据传说是蚩尤当年屯兵扼守与黄帝抗衡的地方。

历史文献记载：“黄帝大战蚩尤于涿鹿”。从涿鹿黄帝城和蚩尤三城相对峙的地形来看，这些遗址似乎是当年战斗时双方的堡垒，黄帝城则为黄帝屯兵及指挥作战的军城。史书曾有“黄帝建都于涿鹿”的说法，从遗址考证，建都涿鹿说似难证实。

炎、黄二帝繁衍了中华民族，特别是黄帝大胜蚩尤、统一中华，为古老的中华民族文明奠定了辉煌的根基，这个功绩深深铭刻在每个炎黄子孙的心上。炎、黄之后的历朝历代，每年都要举行对二帝的隆重祭祀典礼，并在炎、黄故里和活动过的地方，修建庙祠，让后世子孙追怀凭吊。

1949 年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非常重视对群众进行中华民族历史渊源的爱国主义教育，并多次重修黄陵，每年清明组织群众祭扫。在炎黄故里及一些重要的遗址古迹，已经重修并将继续重新修建。据黄帝故里新郑县人民政府介绍，中共新郑县委、县政府于 1989 年建立了修复轩辕黄帝故都筹建委员会，并成立开发黄帝故里游览区筹委会。故都筹建委员会将根据历代文献记载，对有关的遗址、遗迹或加以重修，或加以新建，不少中央领导同志和著名的史学家、知名人士都为修复炎、黄故里、故都撰写碑文，题写匾额。许多海外华侨、华裔也为重修二帝故里遗址出谋献策。1988 年八月在香港正式成立有 62 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同源宗亲参加的“世界同源会”，还为新郑黄帝故里筹建委员会寄来文章，追念始祖在新郑发迹历史，缅怀始祖功德。

1990 年 7 月，新郑筹建委员会在郑州邀请各地史学专家、教授、学者和有关领导参加的，关于黄帝故里、故都在新郑的论证会，并筹集资金，计划修复轩辕故里之后，再修复炎帝故里。

目前还计划在郑州邙山南崖黄河游览区凿山取石雕塑炎、黄二帝巨像。为领导这个巨大工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还正式成立了“炎黄二帝巨型塑像筹建委员会”，正积极进行筹建工作。这个计划得到中央有关部门、河南省郑州市各级领导以及海内外同胞的大力支持，许多海外侨胞为二帝巨像早日建成，积极筹资献策。

（方德编写）

炎黄文化在海外

《孙子兵法》与 海湾战争

陈雄

在海湾战争中，“飞毛腿”、“战斧”、“爱国者”各类导弹令关注这场战争的人们大开眼界，然而更令人瞩目的是美军和伊拉克军队都使用了比导弹更具神奇威力、被誉为“无声导弹”的武器，这就是中国古代兵书《孙子兵法》。在战争中，双方在攻防中均以这部中国古代兵书为最高指导原则，既斗勇，也斗智，既打军事仗，也打外交战，演出了一场令人叹为观止的活剧。

《孙子兵法》是我国最早的古代军事名著，对我国军事思想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孙子为春秋末期齐国人，是我国古代大军事家。他所著的这部兵书共十三篇，运用简洁语言深刻揭示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的军事规律和战争指导原则，历来为军事家所重视和推崇，并在世界军事史上占有相当地位。这部兵书早就有日、英、法、德、俄和阿拉伯等文译本，流传于世界各国。近年美国研究这部军事名著的人越来越多。美军要求高级将领要熟读《孙子兵法》，著名的西点军校规定《孙子兵法》为学员“必读经典”。包括伊拉克在内的许多阿拉伯国家军界人士，也把《孙子兵法》称为“军事圣经”。因此，在海湾战争中，对阵双方采取的战略和战术都贯穿了孙子的军事思想和指导原则。

在美国方面，布什总统作为美军总司令，以及参谋长鲍威尔和国防部长切尼，其“床头柜上都各有一本《孙子兵法》”。驻海湾美军前线司令还把这部“兵家奇书”下发给校、尉级军官，人手一册“日夜苦读”，还向上兵讲授和解释。孙子指出，“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意为不战而使敌人屈服才算得上是高明中最高明的。白宫依据孙子这一战略原则，最初对海湾危机迅速作出的反应，一是舆论上谴责，二是实施经济制裁，三是紧急调兵集结于海湾，施加军事压力。目的是想“兵不血刃，不战而胜”，迫使伊方屈服，从

科威特撤军。为此，布什还参照孙子“伐谋、伐交、伐兵”的策略思想，大力开展外交工作。他不仅派遣国务卿频繁走访西欧盟国和海湾国家，而且自己为此而“改变作息时间表”。在危机高峰时，他平均每小时“要打一次电话”给有关国家首脑，“常常为了越过两地的时间差而凌晨起床”打电话，以便拉拢盟友，扩大阵营，力争对伊不战而胜。当这一谋略失灵后，美不得已而采取“攻城”这一“下策”。“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美国为主的多国部队战争初始对伊发动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大规模的空袭，也同孙子这一作战原则相符。其意图在于凭借空中优势一举摧毁伊军有生力量和战争潜力，扫清地面进攻障碍，实现速战速决。这就是所谓“兵贵胜，不贵久也”。在地面作战中，以美军为主实行孙子提出的“避实而击虚”，“因敌而制胜”的原则，兵分三路，一路沙科正面佯攻，避开伊军坚固防守；西路从沙伊边界突入，东路从海上登陆进攻伊军后方，使伊军腹背受击，全线迅速崩溃，地面战役三四天便结束，美军以少的代价取得了胜利。

另一方面，伊军在防御作战中，其战略战术也有不少可取之处。日本《每日新闻》发表文章说，萨达姆总统采取的战略战术“在较程度上融进了孙子的意图”。孙子指出：“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意思是说善于防守的人，像藏于深不可知的地下一样，使敌人无形可窥。伊方根据孙子提出的这一原则，战前便修建了大量坚固的地下掩体。萨达姆总统的指挥所藏于地下深处，他的飞机和导弹也藏于地下钢筋水泥建筑里，他的坦克和装甲车藏于万里沙海的地层下，他的士兵和百姓也钻进地洞里。萨达姆运用了孙子的“兵者，诡道也”的原则，采取各种欺骗的战术，诸如设置假坦克、假导弹、假战车等，引诱敌机进行无用轰炸。因而，尽管美军轰炸烈度是空前的，伊军损失却很有限。美中央情报局曾专门成立一个特别小组，来追踪和确定萨达姆活动的“电子指纹”，以便为派机轰炸他“提供数据”。但是，“这种努力全落空”，根本“找不到萨达姆藏身之

点”，直到战争结束萨达姆依然安全无恙。由此可见，萨达姆把孙子的“九地之下”的防御原则运用得十分出色。战争中，萨达姆还把“亲而离之”这一谋略具体化，让飞毛腿导弹一个个飞到战场之外的以色列，目的在于利用阿拉伯民族的矛盾破坏多国联盟。根据孙子的“以正合，以奇胜”的原则，萨达姆派小股兵力奇袭沙特海吉夫城，使多国部队大为震惊。如果萨达姆多采用这种奇袭战法，派遣小分队突入敌后作战，恐怕还会争取到更多的主动权。面临多国部队兵分三路发动的地面进攻，要是萨达姆能按照孙子的“我专而敌分”、“以十攻其一”的原则，集中优势兵力围歼从沙伊边界进入境内美军一个师、一个旅，那起码可使美军多吃些苦头。

《孙子兵法》2000多年来广为流传，在海湾战争中又为对阵双方所应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孙子在书中提出了一系列富于哲理的军事理论原则。因而，许多国际军事家认为，《孙子兵法》虽然是中国最古老的兵法，但它“同时也具有非常出色的现代性。”对当代世界各国“军事计划者和军事思想家依然产生着深刻影响”。我们身为炎黄子孙，应为此而感到骄傲，并应深入研究这部优秀的军事典籍。

《三国演义》 在日本

《三国演义》在日本称为《三国志》。日本的大街小巷中许多五光十色的广告牌上都赫然写着大字《三国志》。在形形色色的电视录像片出租店里，《三国志》的录像片摆在很醒目的地方，借阅的人非常多。出版社出版了各种各样的《三国志》，大本和袖珍本，甚至连连环画都有。去年伊拉克侵占科威特，并扣押了在伊工作的日本人，日本政府谴责了伊的侵略行为，承担为多国部队提供军费，同时为被扣人员送去大量食品物资，其中就有大型本《三国志》。日本人在这种情况下还要看《三国志》，他们对《三国志》的喜爱可想而知。

日本人绝大多数是公司雇员。各种公司的首脑们都对《三国志》感兴趣。他们

普遍认为,日本社会的现状与《三国志》中描写的孙、刘、曹三方割据争雄的时代很相似。各个公司各掌握一派人马,各占一块地盘,各产一种产品,以占领市场,谋取利润。要在竞争白热化的市场争夺战中执牛耳,日本产业界认为,首要的就是人才的争取和团结对外的精神。日本一位著名财界人士就说过,看《三国志》启发颇大。刘备之所以能割据称雄,实赖于他善于知人、察人、用人。他对关、张用桃园结义之法,对孔明则三顾茅庐,对后来招降的赵云、黄忠之辈也是大加重用。正是五虎大将对他的拥戴,才使他称雄一方,桃园精神是刘氏王朝生存之基础。现代商战日益激烈,企业要生存、发展,桃园精神实乃生命之所系。不少日本企业大力提倡桃园精神,号召公司内部上下左右之间要像刘、关、张一样,贯之以一个诚字。即以诚待人,精诚团结,共同对外,占领市场。日本许多地方都有关帝庙,逢年过节之时,不少公司头头要做的一件重要工作就是带领部属到关帝庙烧香,要大家牢记桃园精神。

对于人才,日本公司以桃园精神对之。大学是日本公司斗智的场所,大学生到三年级时,公司就找上门了,许以种种好处,要学生内定。特别是对那些有创造发明的学生,公司更是不遗余力,以三顾茅庐之法使你就范。这在日本叫做“割青苗”,即“苗”虽未成熟,也先“割”了再说。求人求才之心,可见一斑。

(摘自《人民日报》1991.4.19 吴建华文)

一个日本《孙子兵法》研究家

1947年,毛泽东主席曾接到一位日本友人馈赠的著作《新编孙子兵法13篇》。这位馈赠者及书作者就是日本企业家、《孙子兵法》研究家服部千春先生。

去年8月,当一本本九十页的英译《孙子兵法》开始运往沙特阿拉伯的沙漠,供应美国年轻的陆战队员阅读时,服部千春先生正着手准备到北京参加第二届国际《孙子兵法》研讨会。

现年53的服部千春先生说:“我从幼

年、小学、中学、高中到大学,随着成长便有志于研究兵学。我长年持之以恒地钻研中国古典著述,特别是《孙子兵法》,大学毕业时曾撰写《孙子十三篇考》的毕业论文。一直到今天,始终一贯地发展‘孙子学’之路。”

年青时的服部千春为了明志,曾剃净眉毛,安居深山研读兵书。《孙子兵法》改变了他的命运。1961年,服部千春从日本大学毕业后就从事实业活动,他把《孙子兵法》应用于现代企业管理,取得了卓越的成效。

近些年来,日本许多家大公司、大企业都规定下属管理人员必须学习《孙子兵法》、《三国演义》。美国哈佛大学商业管理学院要求学生必须熟背《孙子兵法》中的某些章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会主席罗杰·史密斯曾说:“我们能从两千多年前的中国的一位战略家写的《孙子兵法》一书中中学到许多东西。”

服部千春说:“在日本近代企业管理史上,《孙子》的贡献良多,《孙子》的魅力至今犹在。”他说:“我学会了将晚上的研究运用到白天。”从1987年至今,他用中文在中国出版了四部《孙子兵法》方面的研究专著,其研究在日本及中国都有一定影响。现在,他受聘为天津南开大学管理及南大企业管理研究中心的客座研究员。

(摘自《中国青年报》1991.4.25 刘武文)

唐诗在欧洲放异彩

唐诗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一大主流,它流入欧洲,主要是留学生和传教士的传播。19世纪末这种交流日益频繁,在欧洲逐渐掀起翻译和研究中国文学的风气,特别是唐诗的风气。早在1905年,德国著名作家汉斯·贝特格便翻译了一些唐诗,并结集成书出版,名为《中国之笛》。其后,英国、法国多位学者相继翻译了李白、杜甫、王维等的作品。匈牙利还有《唐诗三百首》、《李白诗选》、《杜甫诗选》、《白居易诗选》等多种唐诗译本流通。苏联等国曾出版了研究唐诗的专著,还举办过杜

甫、李白等诗人的专题性学术研讨会。

与此同时,西欧还流行出版和研究唐代隐士寒山子(寒山)诗歌的热潮。英国的华特生、史奈德和魏雷等人先后出版了寒山子的诗选译本。而由法国汉学家卡瑞翻译的《寒山诗集》,更一度名列巴黎畅销书榜。

另外,唐诗还进入了欧洲乐坛。在这方面,奥地利作曲家马勒居功不浅。1908年,他阅读了贝特格翻译的《中国之笛》,触动了灵感,从中选取七首唐诗谱写成交响乐套曲《大地之歌》。1911年,《大地之歌》交响乐曲在慕尼黑首次公演,大获好评。此外,瑞典作曲家约格伦和奥地利作曲家威伯恩,先后把李白的多首诗包括《春夜洛城闻笛》、《静夜思》、《春日醉起言志》等谱成歌曲,使它们流传更广。其后,德国音乐家施特因又根据李白的事迹,改编成歌剧《皇帝的诗人》,在德国各地上演。

(君摘自台湾《海华》杂志)

中国菜名趣谈

中国菜举世闻名,而菜名更是逗趣谐谑,妙趣横生。很多菜名用字典雅瑰丽,含意隽永深远,充满吉祥喜庆之气,诸如把豆苗比作“龙须”,鸡蛋美名“芙蓉”或“凤凰”,鸡脚易称“凤爪”,豆腐叫成“白玉”等。不少菜名豪奢气派,美不可言,像有种汤名叫“珍珠玛瑙翡翠汤”,只是豆腐番茄加青菜,有道菜“金钩挂玉牌”,原来是把黄豆芽放在豆腐上,蛇鸡一块炖烧变成“龙凤呈祥”,加上一尾鱼就叫“海陆空”。一些含有祝贺或象征吉祥的菜名,如竹笋炒猪天梯(排骨)是“步步高升”,发菜炖猪蹄“发财到手”冬菇摆在青菜上就成了“金钱满地”。有些菜名采用的是成语,如鱿鱼炒鸡片“游龙戏凤”,苦瓜炒鸡肝鸭肉“苦凤怜鸾”,菠菜炒番茄“翠柳啼红”,黄豆上面放置猪血或鸭血“碧雪黄沙”,萝卜丝上放只鲜红辣椒“踏雪寻梅”。还有把松花皮蛋、咸鸭蛋、茶鸡蛋等各种蛋合放在一起,叫做“丹凤朝阳”,将7片莲藕孔眼灌入江米,再切5片萝卜刻成梅花,竟然是“梅花欢喜漫天雪”。

(君摘自台湾《联合报》)

本期要文简介



▷ 共和国副总理兼公安部长、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罗瑞卿，曾是一个“冒充”的共产党员。可贵的是他“混”入党内时，正是革命的危急关头。

罗瑞卿入党轶话



▽ ——朝鲜停战谈判，历时两年，美国人在战场上没有得到的，在谈判桌上仍然没有得到。美方代表惊呼：中朝代表团中莫非有个举足轻重的“隐形巨人”！

人们熟知他为民运筹帷幄周恩来的另一个世界，又为我们揭示了他幽默随和，兴趣广泛极富人情味的一面。



访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
李默庵先生

——戎马生活几十年，1949年怀着深深的痛苦离别故土，1990年6月，86岁高龄的李默庵手捧夫人骨灰盒，毅然辞别侨居多年的美国……



板门店的“隐形巨人”



一代名士林语堂

△ ——他八岁就宣布要当一名作家，大名果然镌刻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上，最辉煌的《现代汉英词典》，是他一生业绩中的花冠。对他的一生颇多争议，现在且看他女儿怎样为他立传。

“天京事变”始末

——太平天国为什么仅生存十四年？太平天国专家苏双碧以深沉的笔触，真切地叙述了太平天国领导人在胜利后的相互猜忌、残杀，由内讧酿成了一幕惨痛的大失败悲剧！



隐忍未必不抵抗

◁ ——他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却又坚决支持数十万义勇军，转战白山黑水。东三省沦陷后，他怀着国恨家仇，继续促蒋抗日……。有人说，抗日战争的上限应从“九一八”事变后开始。

民居古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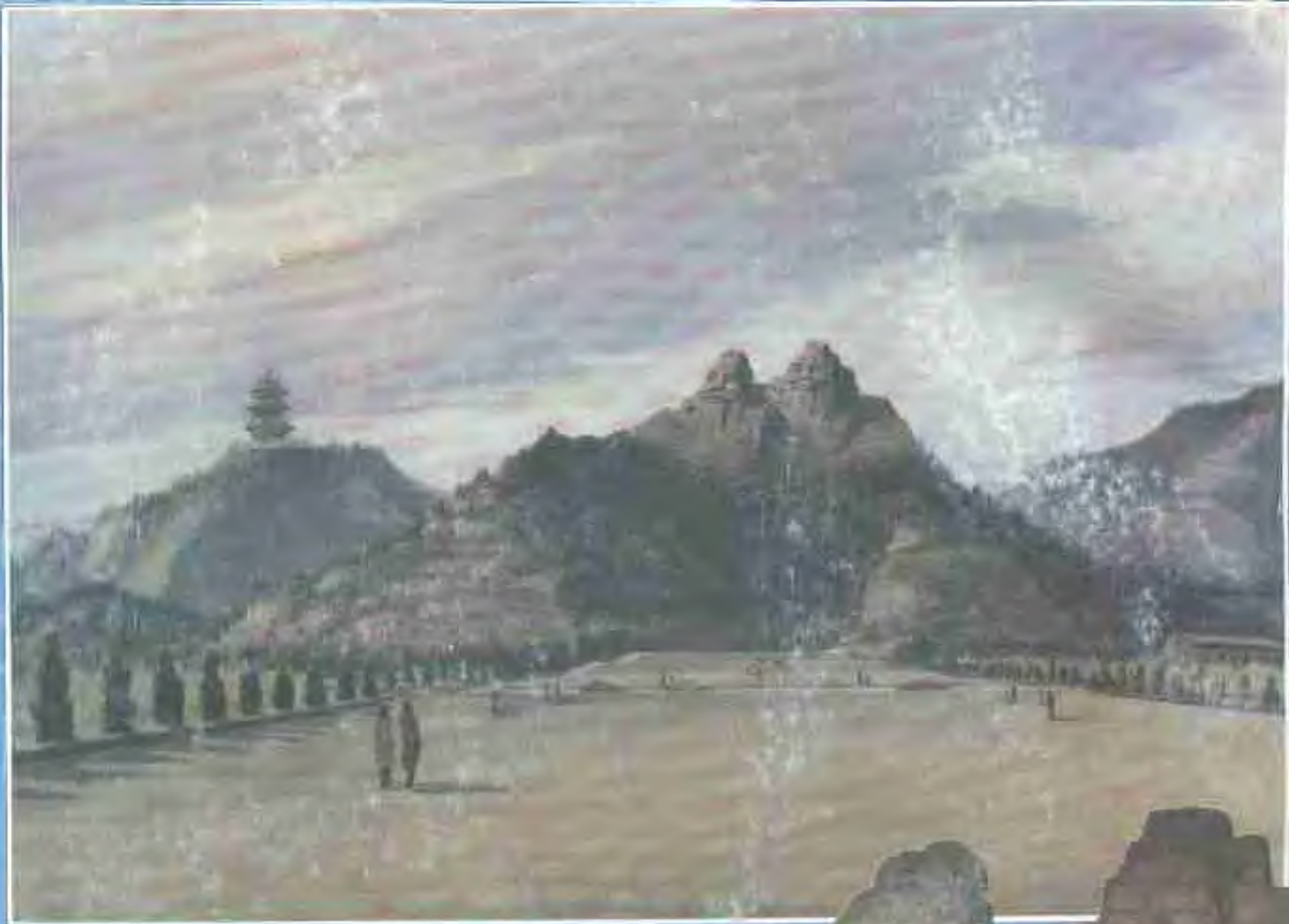
华夏奇观



孙振宇 摄影

(文字说明见94页)





炎黄二帝巨塑雄姿

(国家视觉形象图)

